

全球南方学术论坛 会议论文集

2023-2025 年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

2026 年 1 月

目录

序篇	4
历史并未终结	4
新冷战、和平与发展：李普曼-凯南论战的当代启示	7
第一编 21世纪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14
1.1 全球南方的信息传播新秩序之争	14
1.1.1 超越冷战的世界传播新秩序	14
1.1.2 泛非主义与媒体殖民主义	18
1.1.3 关于全球南方媒体未来的三个问题	23
1.2 非洲的媒体主权与反殖民叙事	27
1.2.1 媒体对北非民众抵抗的呈现	27
1.2.2 美国软实力及其在非洲的媒体霸权	30
1.2.3 从卢蒙巴遇刺到今日刚果危机：西方媒体在影响国际团结中充当的角色	32
1.2.4 媒体主权新殖民主义信息控制非洲叙事全球南方合作	35
1.2.5 国际媒体对非洲的报道：观念与挑战	36
1.2.6 南非的媒体和阶级斗争	38
1.2.7 在西非民众抵抗中发展泛非传播	41
1.3 拉美的信息战与南方联盟	43
1.3.1 21世纪初拉美进步浪潮中的媒体改革实践	43
1.3.2 拉美媒体国际传播形势及展望	47
1.3.3 制造混乱：从社交媒体到政治	52
1.3.4 古巴：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挑战与构建新的传播与信息秩序的必要性	60
1.3.5 拉丁美洲新闻社媒体合作美国封锁全球南方信息主权	72
1.3.6 拉美媒体全球南方传播去政治化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74
1.4 争夺叙事权——全球南方的媒体抵抗	77
1.4.1 媒体叙事西方宣传全球南方多极化世界金砖国家	77
1.4.2 主流媒体在美国政治中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发展替代媒体	79
1.4.3 俄罗斯媒体国际传播形势及展望	83
1.4.4 PressTV 在西方霸权逆境中取得的成就与全球南方媒体团结	84
1.5 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与反思	85
1.5.1 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85
1.5.2 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下的国际传播	93
1.5.3 用正确的本地化传播战略解构西方全球话语霸权	96
1.5.4 从传媒视角看中国人对非洲认知的变化	100
1.6 数字主权：全球南方的新万隆时刻	103
1.6.1 从关键矿产到关键数据——全球南方的数字主权之路	103
1.6.2 马来西亚与东盟视角下的数字丝绸之路	106
1.6.3 大众数字主权	109
1.6.4 有序创新：人工智能监管的中国之道	112

1.6.5 人工智能在俄罗斯媒体的应用——机遇与挑战.....	117
1.6.6 从多极世界到多极中心世界：通信经济的新范式.....	121
第二编 全球南方发展理论.....	123
2.1 突破西方束缚的理论与实践.....	123
2.1.1 全球南方从第三世界计划到情感新浪潮.....	123
2.1.2 全球南方面临的多重挑战与新秩序构建.....	126
2.1.3 全球南方政治经济学.....	129
2.1.4 什么是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	132
2.2 美元霸权危机与全球南方的货币解放.....	134
2.2.1 美元霸权与去美元化：全球南方国家崛起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134
2.2.2 铸币税与中国的货币体系困境：生产大国与货币小国的矛盾.....	136
2.2.3 去美元化与货币多极化：民主化美元过度特权的理论框架.....	137
2.2.4 地缘政治分裂与国际货币格局.....	140
2.2.5 世界金融体系改革：技术模式转变与金砖国家的历史机遇.....	143
2.2.6 金砖货币储备及支付体系：超主权货币的运作机制与实施路径.....	145
2.3 全球南方的发展逻辑与自主之路.....	147
2.3.1 资本、国家与发展：全球南方的新话语.....	147
2.3.2 市场创造的政治经济学：工业化道路与收入陷阱.....	153
2.3.3 经济与民族解放：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157
2.3.4 建构性市场模式：国家在战略性部门中的系统集成作用.....	161
2.3.5 新自由主义政策批判：土耳其的经验教训.....	162
2.4 从象征到实质的国际主义实践.....	165
2.4.1 主权与友谊：全球南方团结的辩证法.....	165
2.4.2 国际主义传统下的全球南方合作：以中巴农业合作为例.....	169
2.4.3 中非共同现代化的愿景与挑战.....	172
2.4.4 金砖+：为什么选择对东盟很重要.....	174
2.4.5 俄罗斯在支持全球南方合作中的作用.....	178
2.5 从能力流失到能力重建——全球南方的结构困境.....	180
2.5.1 超越华盛顿共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多层次作用.....	180
2.5.2 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去建设能力？：后殖民遗产与知识体系重构.....	183
2.5.3 能力建设的根本悖论：当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断流失.....	185
2.5.4 重建“一吨卡车”的承载力：全球南方能力建设的系统方案.....	187
第三编 反法西斯战争 80 周年.....	190
3.1 人民的力量与法西斯主义的当代形态.....	190
3.1.1 两个谎言与一个巨大的真相.....	190
3.1.2 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战争.....	194
3.1.3 作为当代法西斯主义的霸权治国术.....	200
3.2 国际秩序的失衡与重建——全球南方的声音.....	205
3.2.1 联合国八十周年纪念的历史思考.....	205
3.2.2 20世纪以来国际秩序调整及其经验、教训与21世纪国际秩序前景.....	208
3.2.3 世界的平衡之道-雅尔塔体系、《联合国宪章》与新国际秩序所需的平衡.....	212

3.3 清算战争债务,拒绝冲绳再成战场.....	215
3.3.1 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在东亚的意义: 韩国李在明政权的实用主义与日本高市极右政权的登场.....	215
3.3.2 日本军国主义复苏与对华战争准备.....	218
3.3.3 冲绳与西南诸岛的导弹危机现状.....	225
3.3.4 宫古岛军事化与日本军国主义复兴.....	231
3.3.5 冲绳历史与东亚和平: 再无冲绳战争.....	234
3.3.6 不要再有冲绳战 不要再有中日战争.....	237
3.4 历史正义、和平统一与东亚反帝连带.....	242
3.4.1 全球反共体系下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	242
3.4.2 台海和平与两岸统一的历史正义.....	244
3.4.3 台湾问题的两个“掏空”与反帝斗争传统.....	247
3.4.4 反「台独」、反介入运动与东亚反帝反战运动.....	249
3.4.5 东北亚和平、"台湾有事论"与日美军事同盟.....	251
3.5 去殖民化未竟与东亚战争危机.....	253
3.5.1 去殖民化、朝鲜战争终止与东北亚和平.....	253
3.5.2 东亚战争危机与反帝战线的构建.....	256
3.5.3 韩国实用主义的局限.....	259
3.6 对抗遗忘:守护国际合作与共同胜利的记忆.....	262
3.6.1 反法西斯战争在西方史学中的编撰与捍卫东方战线的必要性.....	262
3.6.2 被忘却的合作.....	266
3.6.3 被遗忘的视野-南斯拉夫与中国的联系及全球南方团结.....	269
3.6.4 被唤醒的记忆: 俄罗斯媒体在揭露 731 部队真相及彰显二战期间苏中两国合作方面的作用.....	272
3.6.5 俄罗斯媒体和研究者守护 1945 年苏中共同胜利记忆的贡献.....	274
结语.....	282
人民战争、永久和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实践论.....	282

序篇

历史并未终结

- 发言人: 维杰·普拉萨德
- 年份: 2023

历史并未终结。2021年11月联合国COP26气候大会期间，我在格拉斯哥机场等待新冠检测时，遇见几位得克萨斯州石油服务公司的高管。其中一人询问我对会议的看法及此行目的。当我解释自己正在报道莫桑比克德尔加多省的冲突——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控制着近海天然气项目，而当地社区却未获得任何利益——时，他们的表情变得忧心忡忡。其中一人回应道：“我从未听说过这些事。你说得没错，但没人关心。”这次交谈揭示了三重现实：此类冲突信息难以获取，企业将利润置于当地民众之上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强权国家的冷漠态度。

媒体定义全球事件的能力毋庸置疑，某些国家的媒体机构甚至能决定哪些事件成为历史记录。乌克兰冲突加速了全球格局变迁，既暴露了西方的脆弱性，也凸显了中国实力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不结盟立场。西方霸权在金融、资源、科技等多维度持续衰落，却仍牢牢掌控着武器系统与信息两大领域。本文通过萨米尔·阿明的“新殖民主义五大控制”理论解析这些变迁，重点探讨信息控制及其对知识生产者的深远影响。

新殖民主义国际结构的五大控制机制

新殖民结构诞生于去殖民化浪潮，延续了西方通过殖民主义获得的优势。当殖民强权直接掌控资源时，后独立时代的安排通过五大机制确立了西方的控制：

金融控制依托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运作，辅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及伦敦/巴黎俱乐部等机制。这些机构通过债务杠杆维持对新独立国家的支配权。随着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全球南方引擎崛起，这种垄断格局受到挑战，替代性金融渠道应运而生。

资源控制权使西方企业得以在名义承认当地所有权的同时，主导开采条款。1974年提出的“新国际经济秩序”倡议虽遭压制，但南方主导的资源主权倡议正逐步削弱西方霸权。

当西方机构将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为围绕最终产品而非生产过程时，对科技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以中国为首的全球南方国家取得的意外技术突破，引发了美国的贸易战，暴露了西方对技术霸权衰落的焦虑。

尽管前三项控制力已然削弱，西方在武器系统和信息领域的霸权依然存在。军事开支凸显这种不对称性：全球军费总额达 2.868 万亿美元，其中西方国家占 2 万亿美元。尽管其他国家取得进展，美国仍保持着无与伦比的毁灭性能力。

通过殖民时期建立的媒体垄断及对基础设施（海底电缆、卫星）的掌控，西方对信息的控制仍近乎绝对。

西方对信息的统治及其批判

信息控制体现在硬件与软件的双重主导。全球 95% 的数据流量通过 436 条总长 130 万公里的海底光缆传输。西方企业（阿尔卡特、SubCom）及美国盟友科技巨头（Meta、谷歌）掌控关键网络，主导该基础设施。卫星分布图显示类似失衡：4550 颗轨道卫星中，2804 颗（62%）属美国所有，仅 SpaceX 运营的卫星数量就超过中国总量的三倍。

这种硬件垄断催生了隐形审查机制——在缺乏公众监督的情况下限制或阻断信息流通。SpaceX 的星链网络等项目正深化这种控制，使非洲陷入网络连接依赖。与此同时，西方媒体通过所有权集中化、企业广告影响力及亲政府的“专家”维持着意识形态垄断。乌克兰报道便是典型例证：排除非西方视角的同时放大北约叙事。

全球南方对信息控制的抵抗始于早期。1934 年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入狱时，发现路透社与殖民当局协同进行亲英报道。二战后去殖民化运动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先推进媒体主权，最终在 1953 年研究中揭露西方通讯社对全球新闻的垄断。后续举措包括：1958 年基多会议成立拉丁美洲国际高级传播研究中心（CIESPAL），1961 年曼谷会议创立亚洲通讯社组织，1963 年突尼斯会议创立非洲通讯社联盟。

1973 年阿尔及尔不结盟运动峰会提出重组殖民时期传播渠道、修订剥削性电报费率、建立集体卫星所有权及加强南南知识交流等原则，这些理念构成了《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NWICO）提案的基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0 年《麦克布莱德报告》（《多元之声，同一个世界》）揭露西方媒体垄断集团扭曲全球南方现实的行径——印度观众通过西方视角解读 1973 年欧佩克行动便是典型例证。

西方立即作出反弹。1984 年，美英两国以反对 NWICO 和新国际经济秩序为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此同时，媒体私有化催生了 CNN 和新闻集团等媒体巨头，扼杀了多元叙事空间。此后接连出台的《温得和克宣言》（1991）、《阿拉木图宣言》（1993）、《圣地亚哥宣言》（1994）、《萨那宣言》（1996）等文件，在世贸组织推动的私有化浪潮中逐渐失色。西方媒体将私有化包装为“新闻自由”，同

时贬低公共媒体为威权产物，从而巩固了娱乐与新闻混杂的媒体形态，侵蚀着公众的信息素养。

三大挑战

对抗西方信息控制需在三大领域协同推进：

信息战需重建跨国新闻共享网络。1976年成立的"不结盟新闻社"虽已停运，仍为政府支持的合作模式提供范本。当代项目如"人民通讯社"（提供英西双语内容）证明，协同媒体计划可创建替代性新闻专线。

思想之战需借助现有媒体传播反叙事。当企业媒体撤出国际报道领域，环球漫游者等服务（以八种语言向500余家媒体供稿）证明南方视角可绕过西方把关人。这构筑了促进相互理解的独立分析框架。

情感之战需聚焦解决人类困境的草根方案。企业媒体的消极叙事削弱社区力量；我们必须彰显普通民众的变革行动，重塑历史能动性。

格拉斯哥石油高管的冷漠折射出系统性抹杀，但三十载新闻实践证实替代方案存在。当企业媒体忽视莫桑比克天然气冲突时，环球漫游者的联合报道使其登上全球数百家媒体。我们的媒体生态不会由他人构建——必须亲手打造。

（根据录音整理，内容有删减）

新冷战、和平与发展：李普曼-凯南论战的当代启示

· 发言人：吕新雨

· 年份：2024

最后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很难的角色，因为大家都很饿了，所以我会尽量地快点来结束最后的结语。但是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关于东北亚的内部讨论，我们和来自韩国、日本和琉球的朋友讨论了一些问题。我当时说：我可以利用最后结语的这个机会来讨论一下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们这两天的论坛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那个霸权在威胁和平，这个威胁是从哪里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发展：我们怎么样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赢得全球南方的发展？

在这个所谓的新冷战的阴影下，去年我们全球南方国际论坛的时候，我们说的新冷战是打上引号的，我们说我们不希望它成为真正的新冷战，但是今天这个引号实际上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事实上的新冷战已经发生了。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去回应：旧冷战是怎么回事，新冷战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冷战设计师凯南先生，他 1946 年的一个长电报和他的一篇很著名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这篇文献也被认为是冷战的来源。之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回顾这个论述，是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埋下了今天俄乌战争爆发的两个历史伏笔：一是苏东解体之后，作为“去共产化”的冷战胜利者之宣言的“历史终结论”；另一个是后冷战时代，为美国军事霸权张目的“文明冲突论”和新势力均衡论。这两者一前一后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也打造了欧美知识生产和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高地。

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 X 先生，即凯南先生当时遭到了一个很著名的记者李普曼的一个很猛烈的回应。李普曼当时主张：冷战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英美两个国家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是同盟，同盟怎么胜利了之后会变成敌人呢？这件事本身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李普曼主张战后的英美苏的同盟应该继续。而且他预言了如果发生冷战，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这都是针对 X 先生的那封长电报，包括他那篇著名的长文章的回应。这是国际政治领域的经典公案。奇怪的是今天，无论国际政治领域还是新闻传播学领域，却少人重新讨论这一论战。在西方的冷战史领域，苏联解体被公认为是预言者凯南的胜利，虽然宣布胜利的是福山，而李普曼的咒语早已经被忘却，或者被判定为失败。

美国通过二战走出 30 年代的大萧条，1944 年的工业产出已经是轴心国的两倍，至 1945 年是苏联的三倍、英国的五倍，占据着全世界半数工业产出和四分之三的黄金，二战结束时的 GDP 达到世界 GDP 总和的 50%。所以工业能力是决定冷战胜利与否的关键，特别是当杜鲁门手中握有军事工业的最新成就——原子弹时，这一点是需要我们重新理解的。但是问题是，苏东解体以后，美国一如既往把“国家的潜力”和“显能”（特别是军工能力）在中东和前苏联地区不断投射的时候，为什么李普曼当年的“咒语”在特朗普时代却不断地显现呢？

那我们回头看：长电报，它把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原因收缩为、归结为俄国革命，把俄国革命收缩为是俄国的内部问题和民族问题，苏联由此成了世界大战的替罪羊。正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美国人觉得美国才是二战的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者，那就为如下的诊断铺平了道路，就是我们看到去共产化并不能够解除莫斯科的所谓独裁，共产化和种族性的叠加才是俄罗斯的原罪。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俄乌战争中，这一针对斯大林时代的逻辑依然是美国和北约以及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独裁”的主要描述——“去共产化”后的俄罗斯依然是西方的敌人。把欧洲资本主义危机诞生的法西斯主义问题转化为“东方主义的问题”是X先生的贡献。这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美西方内部出现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规模兴起现象之后，持“遏制主义”主张的新凯南主义者们无法自圆的困境，也是“攻击现实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挺身来救场的原因。

所以，当自由/专政这一由冷战胜利者和发动者打造的二元论成为世界史的主导叙述，由美国大萧条引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就不再被纳入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资产负债表之中了。美国大萧条触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深刻危机，不仅仅是德国法西斯、日本法西斯崛起的温床，也是苏联30年代强制工业化、农村集体化和政治大清洗的底层逻辑。大清洗其实是为了保证强制工业化能够在党内被推行下去。当苏联党内的政治大清洗被判定是不可理喻的个人独裁，它就遮蔽了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对苏联依靠农产品出口换取技术和资本推动工业化道路的一个灾难性的摧毁，它也决定了整个苏联生死存亡的残酷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当年强制闯关的工业化道路的不均衡发展其实正是美国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危机的一个镜像。而在这个基础上的所谓的专制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残酷进程中的利益。

也正是在这些论述中，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专制、国家与社会、西方与中国、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这些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构成了今天现实政治的历史投影，也是冷战分割线的投影，它隐藏在今天“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深度深处。

今天，这个世界依然被禁锢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之中，这也是今天所谓新冷战之所以再次发生知识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基础——它的诉求其实就是从西方中心主义和冷战胜利者的立场收复失地，并且在世界范围内驱逐社会主义的幽灵，只不过这次它针对的是中国。

美国工业化的成功是一定是要以更大的残酷为代价的。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是新旧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工业化原料和市场的产物，是世界工业化残酷进程的提现，也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战争的动因。而二战后美国对苏联的冷战和遏制是单边主义进行的全球政治制裁。我们这次也讨论了很多关于制裁的问题。

通过外部极限施压和物质禁运，迫使被制裁国家内部政治紧张、升级和收缩（它必然会表现为“集权”），在经济上也陷入从生产到消费的长期短缺。所谓的短缺经济学就专指冷战时期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经济现象。其实，计划经济本身是应对短缺和制裁的战时经济的方式，并不天然属于社会主义的专利，只是因为从一战和二战中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处于军事干涉和被制裁的处境。

犹如列宁当年指出的一样，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国家应对战争危机的计划经济，而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是处理危机状态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攻击苏联计划经济的背后，其实是对苏联工业化道路的攻击。在X先生看来，非军事化的禁运和意识形态遏制会更有效果。

但是，通过制裁和禁运产生的经济短缺，再把短缺指控为社会主义制度或者任何的极权制度本身或者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外部遏制的连锁反应，由此号召和支持内部的反抗，促使被制裁国家的政治体制解体或者轮替，这既是冷战者的战略也是话术。所谓冷战，其实就把外部制裁和禁运转化为内部解体的力量，它的军事化过程是其二元论不可避免的逻辑后果。热战和冷战的相互转化是由其目标所设定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策划的军事政变都是冷战的内部构成。所以，苏联解体既是冷战的最大成就，也是最大的代价——今天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是它的回旋镖，麦卡锡主义在今天的大规模回潮也是必然的结果。而俄乌-巴以-以黎战争则是新冷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演。

苏联解体之后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和朝鲜继续被困在旧冷战遏制中，而中国通过毛泽东策动的中美建交、继之而起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打破了冷战的遏制和封锁，也在今天再度遭遇了新冷战、新遏制。新旧冷战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冷战和热战转换的逻辑也没有转变。

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结盟的纽带被西方冷战的胜利而摧毁，成就了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右翼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结合的斑斓的政治图景。今天，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聚集的是世界范围内以种族、民族、文明为边界的浩浩荡荡的右翼势力大会场。它说明的不是别的，正是冷战胜利者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市场这一套新自由主义的普世话语——从话语到实践层面的全面失败。所以，米尔斯海默为什么要抛弃这套话术？他所谓的“进攻式现实主义”不过是图穷而匕首现，是对当今世界格局下美国霸权赤裸裸的军事背书。而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海默“进攻式现实主义”不过是“历史终结论”的一个最新版本——帝国主义版本。

当年论战的李普曼就尖锐地意识到：X先生的文件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是杜鲁门主义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文献。所以，1947年，李普曼把他针对X先生和杜鲁门主义的专栏文章集结成另一本书《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出版。1959年中文版面市。李普曼观点受到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并屡屡被《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新华电讯等转载。

李普曼和凯南政治立场是相同的，但是他批评杜鲁门主义的政策错了，因为它最终伤害的是欧洲和美国自己。X的遏制战略从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一定会导致美国滥用自己的力量。而遏制是一种反世界市场的行为，如果要有效执行遏制政策，就意味着放弃世界市场的供求原则，按照苏联的模式对付苏联，最终导致的是美国的苏联化。

按照遏制原则，美国未来必须进行全球干涉，必须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个阶段用运用美国的经济和政策、政治力量以及归根到底的军事力量，这必然导致美国对全世界内政的干涉。这就构成了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基本的政治框架。因为美国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对付苏联。所以X先生所需要的对抗力量必须由中国人、阿富汗人、伊朗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以及反苏的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等等。要执行这个政策，只能靠招募、津贴和支持一支由卫星国、雇员、附庸和傀儡组成的杂牌军。意味着美国需要不断地投入金钱，意味着将不断干涉亚洲、中东和欧洲各国内政，新的联合战线不过“是一锅沸腾着内争的稀饭”——这是李普曼非常著名的一个比喻。

2021年8月美国从20年战争的阿富汗仓皇撤军，正是李普曼咒语的现实版。

李普曼说，美国势力所及之地，往往就是民族分裂的内战爆发之地——从冷战遗产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国台湾问题等，到后冷战时代的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从前苏联解体中的诞生的民族主义浪潮到今天的俄乌战争，屡见不鲜。因美国插足而爆发的内战，在“文明冲突论”的叙述里却意味着只能以“族群冲突”的“民族主义”问题的形式出现。这样，美国才能被亨廷顿的意识形态隐身法转变为“救世主”，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替罪羊。

其实，正是因为战后美国“反市场”的遏制政策，以及巨额资金流动性的投入，才使得战后的欧洲、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和“民主”前沿的日本、韩国得以在“冷战”红利的基础上，突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获得发展，代价则是附庸国和新殖民主义的政治地位。没有朝鲜战争爆发带来的军需以及美元的流动性，就没有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资本主义在70年代的腾飞。朝鲜停战后，各种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全世界各地大量海外军事基地的支出都成为美国提供流动性的渠道。在贸易领域，美国为吸引盟国，也是为解决美元短缺问题开始实行非对称合作，像向盟国全面开放美国市场，同时允许这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美国产品的进口。美元作为关键货币和美国作为流动性主要提供国，是支撑美国打赢冷战维护霸权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这个问题我们这两天有充分的讨论。所以并不存在什么自身自发的资本主义市场。

李普曼辩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欧洲安全问题。如果把力量和资源集中于苏联的外围地带，欧洲就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

今天的苏联已经如X先生所愿“烂熟”为十五个国家，但俄国作为最后退无可退的“生存之战”，正在忠诚地执行半个世纪前李普曼的“咒语”：当欧洲被迫直面战争威胁的时候，这就意味着：

“它们的城市和田野将成为一场总体战中的基地和桥头阵地，而且这个总体战将和一场普遍性的内战结合在一起，成为极其残酷而又难分胜负的战争。”

这是在描述今天的俄乌战争吗？所以他看来，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能接受欧洲大陆沿着雅尔塔线分裂，所以必须发动外交战防止俄国扩大和巩固他的势力范围。所以，只要红军不撤出欧洲，苏联势力就不能回缩。因此唯一的方式就是要美苏共同撤军。所以，李普曼关于杜鲁门主义的最后的精彩批评是称其将导致联合国的毁灭，因为遏制战争必然迫使所有的国家选边站，而这就是联合国的危机。这样的做法是在断送联合国的前途。

事实上，当这些西方的谋士们绞尽脑汁想让苏联撤出欧洲、使德国中立的时候，斯大林其实一直通过媒体喊话，做和平的最后努力。1948年5月，他在答复华莱士的公开信中，依然呼吁全世界响应华莱士提出的主张，即：“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缔结对德和对日和约，从这两个国家撤军；从中国和朝鲜撤武器；缔结对德和对日和约，从这两个国家撤军；从中国和朝鲜撤军；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和不干涉其内政；不许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内建立军事基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消除一切歧视；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援助和在经济上恢复那些遭受战争灾难的国家；在世界各地保卫民主，保障公民权利。”

这是当年美国的声音，也是斯大林的声音。但是 1947 年“长电报”之后的美国等西方阵营已经不可能与苏联“和平相处”了。正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冷战遏制政策，它使得美国不断走向走上一条通过发行国债一手向外国借钱，一手向盟国提供流动性，并在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条件下回避结构性调整的不归路，这导致巨额国债、金融自由化下的经济空心化以及离岸生产对出口的削减。

所以，特朗普“反建制”目的就是要对这些冷战遗产进行彻底清算。他要求偿还美国付出的所有军事和贸易的“所谓的代价”，他认为美国承担北约军费的百分之七十五是不合理的，日本和韩国需要支付美军基地的费用，退出 TPP，重新谈判 NAFTA，并与多国同时打贸易战，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关系仍然在延续冷战时代的非对称合作，允许他国向美国大肆出口，同时对美国出口设置各种贸易壁垒。简言之，特朗普并不是要放弃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而是要重建被冷战时代为吸收盟友而破坏掉的美国经济结构。

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红利的消失。历史资本主义的重生，靠的是二次世界大战，而二次战之后的资本主义繁荣，靠的是与苏联社会主义竞争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与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当美资本主义的逻辑不再得到“扩张主义”的庇护，债务开始索要赔付，特朗普式“美国优先”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正是美帝国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国际格局带来的反噬效应。为了抵御这种“反噬”效应，我们看到了俄乌战争这样的轮盘赌，这就是今天世界格局背后的冷战逻辑。

今天我们看到主宰世界体系阐释的主要有两个主导叙述，一个是所谓“民主和平论”，另一个就是与“文明冲突论”，它们构成了一组互相配合的“新冷战”的理论辨术。亨廷顿所谓“文明断层线”不过就是对美国干涉主义失败的“替罪羊”，描述的是同一个事实，他以此掩护美帝国在中东地区的冷战中，为了与苏联争霸，打压弱小民族国家，扶植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的现实，并迫使肉炸弹和核武器成为今天弱小民族伸张和保卫主权的工具。今日的俄乌战争，再次证明而不是否定了主权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版图中的重要性，问题只在于如何阐述当今世界的民族、种族与主权的关系。

所以，当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也就是打破种族和文化的边界、建立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民族政治底层和弱势民族的反抗势力就只能被引导到宗教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而在铁与火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其民族理论和实践追求的从来不是民族隔绝，而是民族融合，是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团结——这是唯一能够对付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它需要在失败中浴火重生。而没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就不能应对新老殖民主义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全球南方其实就是新的世界体系下的“三农”问题，全球南方和北方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城乡关系。《共产党宣言》描述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逻辑，即 19 世纪以来英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扩张过程。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以及我们的发展传播学与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这个逻辑，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命运。和平是发展的前提，

和平与发展是二十一世纪的主题，也是我们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的主题。明年是万隆会议七十周年纪念，我们希望我们的论坛能为万隆会议的七十周年做点事情。

我们今天论坛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参与者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所有的志愿者对本次会议的贡献，谢谢大家！

第一编 21 世纪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1.1 全球南方的信息传播新秩序之争

1.1.1 超越冷战的世界传播新秩序

- 发言人：吕新雨
- 年份：2023

超越冷战的世界传播新秩序。其实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也讨论了很多不结盟运动和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问题。那我想把世界经济新秩序和 70 年代不结盟运动和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问题再把它回顾一下。

那我们简单回忆一下背景。

它就是 70 年代石油危机下的一个不结盟国家提出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外交上的胜利，也是一种物质上的胜利，使人们意识到全球南方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信息传播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为了改变全球北方所谓信息自由流动的旧秩序，不结盟运动提出要建设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诉求，并得到了当时苏联的支持。有一个主要的历史节点，比如说 1973 年第四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发表了阿尔及尔宣言。第一次讨论了与大众传播媒介有关的问题，并且宣布说帝国主义的活动并不局限于经济与政治的领域，还存在于文化和社会的领域，要求不结盟运动的国家要在大众传播领域采取统一的行动。

还有 1976 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国家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信息非殖民化的新德里宣言。这个宣言也否定了西方国家所宣传的自由主义至上的媒介理论，认为自由流动实际上是单向流动，是帝国主义垄断的表现。也指出了在全球信息流通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的现状。信息表达的集中和垄断也复制了殖民主义时期的依附于主导的关系。所以不结盟国家是这种现状的一个受害者，所以提出了信息权利的主张。但是也意识到要落实信息权利的主张，是要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和物质保证的。

另外就是，77 年不结盟运动就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建制，以缩小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交流差距，以便实现更加均衡的国际信息传播。这是 77 年我们在联合国教科组织层面上取得的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这个运动实际上在 80 年代是失败的，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然就是西方国家从石油危机中走出来了。里根和撒切夫人上台了，他们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的时候，就发动了一个全球北方针对信息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攻势。出现了像世界自由出版委员会发表的一些宣言。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就刚才那个宣言会导致各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控制，所以是一个反自由主义的宣言。然后最重要的是，美英分别在 83 年和 85 年相继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开始退缩了。当然我们也知道，美国也第二次退缩了，就是 03 年它再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教科文组织在 17 年接受了巴勒斯坦作为成员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简单的历史，就是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击败了 70 年代在不结盟运动在南北和东西阵营中试图推动的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政治构想和努力。在这个上是失败了。

在这失败之后，就是对失败会有一些左的和右的反思和批判吧。既有来自左的也有来自于右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说来自右翼的说是对世界新闻自由的伤害，因为它保护的是独裁政府，西方媒体也进行了很多负面的报导和抹黑。另外的批评是比如说，只批评美帝国主义，对苏联不置一辞，不批评苏联，因为这后面是有苏联的支持。所以是把联合国教课文组织进行了政治化，是共产主义对新闻自由的攻击。然后另外批评就是说参与推动的左翼学者只注重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的视角，对民众的参与视角不够重视。另外作为国际传播的一个范式，它是以国与国之间的民族国家的视角作为限制的，忽略了国家内部的阶级分析，这是一个左派的批评。

其实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背后一个理论主张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的主张。这个主张实际上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全球化的时代，受众是可以对媒介内容进行抵抗性生产的。所以很多的文化研究就把重点放在注重怎么进行抵抗性生产的角度。所以认为单向的信息传播已经被更多复杂的传播所替代。

其实最简单的回顾。在今天的这样的格局下，我们有没有可能重建 21 世纪的不结盟运动和世界传播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因为他的问题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世界传播不平等、不公正的局势，随着贫富分化、南北极化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危机的爆发，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愈发的严重。所以在意义上说，70 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也没有终结。

那我们看到全球化的浪潮，因为苏东解体加速了。80 年代之后全球化的浪潮。那因为中国的崛起而逆转，中美贸易战之后美国开始去全球化。所以我们说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能够看见海底。或者说我们只有在只有退潮时候才能看到裸奔的人。那在情况下我们才发现，所谓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底层逻辑是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这一上说我们反帝反殖民依然是今天新的不结盟运动推动 21 世纪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一个共识的基础。所以我是今天把问题给大家来讨论，说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可能在新的反帝反殖的基础上，重建 21 世纪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共识基础。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些我们需要重建的一些的任务和挑战，一个是学术知识生产的问题。全球南方知识分子的联合战线有没有可能获得完成，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会的一个主旨。我们反复听到了特别是巴西的无敌农民运动对葛兰西思想的重视。和我们第一天听讨论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农民运动的结合、和社会主义在乡村运动的结合之间的勾连，是我们全球南方知识分子的建立知识生产的互换体系，或者说我们建立一个联动体系的很重要的阵线。媒体实践中，南南合作的媒体的连接和信息的流通，有没有可能建立让我们能够互相看见而不再是通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介机器或者媒介垄断机制来让我们互相看见，来实现我们的文明互鉴。这个有没有可能，这是在媒体实践层面上。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也是其实昨天我们反复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媒体主权的问题。媒体主权的问题，我觉得起码是在几个层面上展开。民族国家就是我们今天主权国家有没有权利来发展自己民族的媒介工业体系。媒介工业体系的背后实际上是工业化发展。因为我们说中国社交媒体网站，刚才金老师说到的我们观察者网的突围。但它的前提是国家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对电信基础的国家投入。比如说中国的乡村村村通、工程通、电视通、电信通、铁路通、公路通，这些村村通工程是我们

金老师能够进行突围的前提。所以工业化发展是民族媒介工业发展的一个前提。电信基础建设是需要依托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积累的。

还有就是媒体的制裁。我们今天看到跨国社交媒体对若干民族国家的信息进行一个制裁。它实际上是主权制裁。所以社交媒体平台针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的媒体制裁，背后实际上是全球霸权的政治制裁的一个复制。所以问题也是媒介主权。我们怎么去看待单边主义的制裁问题，也是我们要讨论媒介主权的事。

还有社交媒体平台之所以能够成功，我们要看到社交媒体平台成功的关键，不是资本家，而是无数的媒介使用者，他们的劳动和贡献。所以世界是劳动者创造的，媒介平台也是劳动者创造的。问题是说，劳动者创造的成果它的所有权该怎么样为人民服务，该怎么样让它的利益为所有的人民所分享。这才是关键所在。所以在意义上说我们怎么推动社交媒体平台和大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民主化过程，这才是关键。

所以昨天的媒介主权讨论会上，提到了国家媒介提到 CGTN 作为国家媒体的正当性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大家都认为中国对于今天的世界发展特别的重要。既然承认它的重要，那我们当然要知道中国的声音在哪里。中国怎么去看世界，中国怎么样看自己。那不通过国家媒体，那通过谁来表达？所以当然问题不在于说 CGTN 是国家媒体，问题应该是另外一个层面上是说，作为国家媒体和作为党报的国家媒体，它是不是真正的走了群众路线的问题。他是不是在中国的国内走群众路线，有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走群众路线。它有没有能够克服自己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而不是说它是因为是国家所有。那在一个被全球资本主义包围和猎杀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媒体当然要为捍卫国家的主权而奋斗，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问题正在于，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中国的国家媒体的角色。他在国内的社会、政治治理的过程中的角色和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角色。

所以在这上面说，我们希望考虑的方案是在新的不结盟运动。我觉得今天汪晖老师其实今天也讨论了新的不结盟运动的可能性。在今天我们怎么样在新的不结盟运动的框架下来重新建构多种分步式的连接的体系。它既包括国际组织，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是仅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层面上的突围是不够的，所以 70 年代那个失败了。我们要更多的建立在主权国家、民间、政党、企业、教育，后面的破折号还可以无限的延续下去。这样的一个分步式的连接的体系是以最可能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反帝反殖民的突破垄断的构想。

所以我们 21 世纪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基本构想是我们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的宗旨。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致力于记录历史真实、倡导和平发展、反对信息战争的各国进步媒体，提供一个交流与协作的平台，共同探索一条符合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群众力路线的国际传播的道路。

好，谢谢大家！

1.1.2 泛非主义与媒体殖民主义

- 发言人：弗雷德·蒙贝
- 年份：2023

曾经，在历史的迷雾中，新兴的新闻媒体成为18、19世纪新民主运动的焦点。正如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在他19世纪40年代反对普鲁士审查制度的第一篇报纸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新闻媒体被视为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但媒体作为人类的捍卫者和变革的预言者的短暂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

现在，我们正目睹整个西方陈旧且奄奄一息的政治枯竭和空洞化。在没有其他渠道的情况下，媒体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唯一途径。必定有机会让新的进步媒体再次开花结果，进行关于新愿景和替代观点的辩论。

我担心的是，一个新的媒体时代的机会有可能被浪费掉。正如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也总是留给有思路、有志向、有韧劲的人们的”。

我这里说的是各种形式的新闻媒体。只要人们需要新闻、娱乐和意见，媒体就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也许是多种形式。重要的是，新闻业作为一种严肃、开放和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在新的媒体时代得以存续。当然，正如普拉沙德教授恰当地指出，还有一个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问题：到底是谁的媒体？对世界/西方媒体现状的批评者经常——有时是痴迷地——关注媒体所有权问题。新闻媒体机构越来越集中在几个媒体公司巨头手中，这不仅被指责为媒体的问题，而且似乎也是社会和整个世界的问题。

媒体所有权集中在国际私人企业集团中当然是一件坏事——这没什么可庆祝的。事实证明，它往往阻碍信息和思想流动。希望看到媒体多样性的人们不会欢迎这种状态。然而，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并不被激进的批评家们所关注：另类新闻机构未能维持一个严肃的受众。

但指责“易受骗”和“随大流”的观众，甚至指责鲁珀特·默多克都无法使另类媒体蓬勃发展。除了一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很难设想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所有权会出现奇迹般的民主化。那么，有什么选择呢？除非我们尝试，否则我们不会知道。如果把用于攻击媒体大亨的精力转而集中在发展替代性媒体的想法和投资上，那么进步媒体的未来——一个既坚持事实又让无数想法和意见以各种形式绽放的媒体——看起来前景会更加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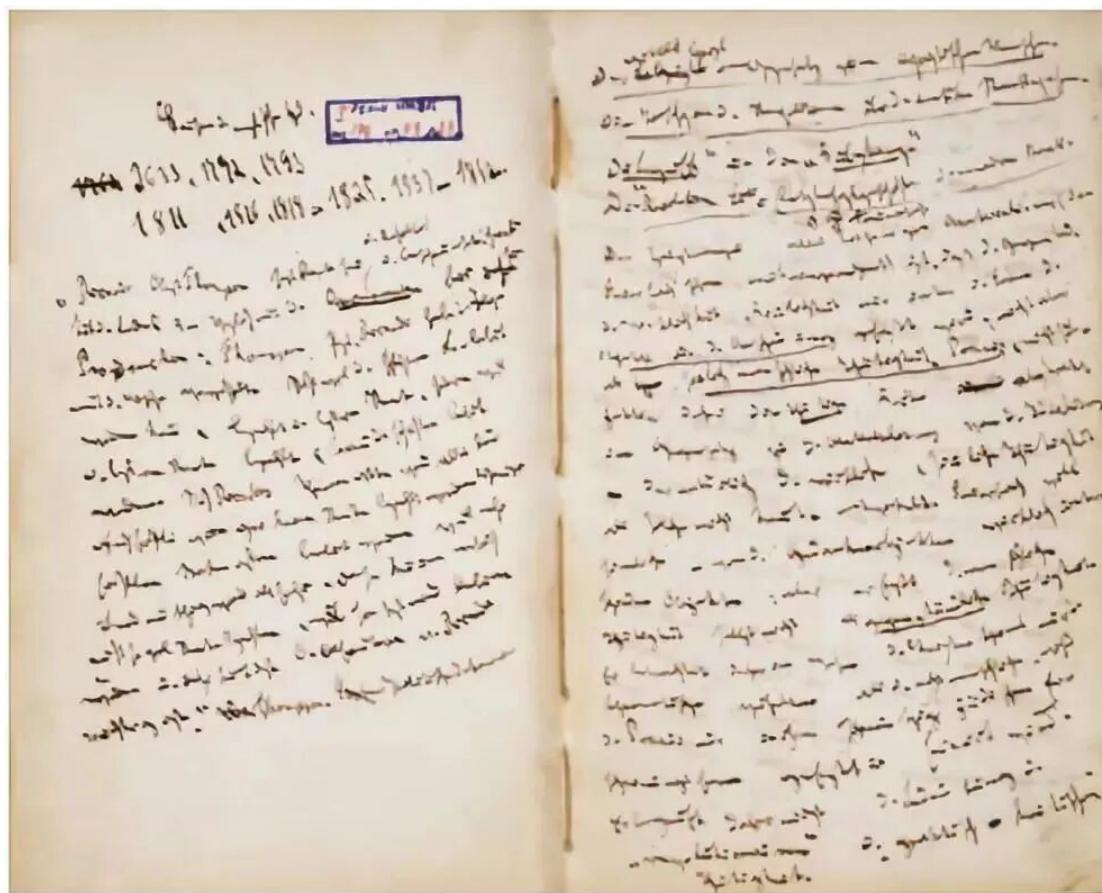
媒体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媒体和新的想法，让人们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开始建立一种新意识，需要一个新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的、复杂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新的媒体和原则，需要更多的意识和新的媒体来传播这些想法。我们需要寻求其他方案，并承认人类能够以更合理、更人性化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谁将成为新媒体和我们正在寻求的新世界的建设者？是我们自己。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齐聚上海，这里有南方电视台（teleSUR）、今日俄罗斯（RT）和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我们将很好地加以利用。我们必须好好利用它们。我们的基本工具会是什么？我们的基本武器将是什么？想法将成为意识。谁来播种它们？谁来培养它们？谁将使它们立于不败之地？是聚集于此的我们自己。

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身处艰难且具有挑战性的时代。但这不应该意味着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它意味着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决定和行动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我们的世界、它的政治、它的经济走哪条路。我们需要新的想法，但这些新想法必须得到传播。谁来传播它们？是今天的帝国主义媒体，以目前这种形式，以目前这种安排？当然不是。需要一个新的媒体。需要新的安排。需要新的组织。如果我们要使命运逆转，如果要实现所寻求的变革，这些想法就必须传达给所有有心存善意之人。

我坚信卡尔·马克思关于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谁将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今天齐聚于此，但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把想法传给所有其他人。基督教信徒会同意我的观点，即《圣经》中最重要、可能也是最有趣的经文，即《约翰一书》中的“面对面”，其中说：“太初有道”。有了道就创造了一切，包括地球，包括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手稿

菲德尔·卡斯特罗说，思想不产生危机，但危机产生思想。我们正处于这个阶段，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不平等，越来越多的失业，越来越多的贫困，当然还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遭受越来越多的破坏——是一个开始产生新思想的危机。但同样，这些思想，如果被束之高阁，将毫无意义。它们必须被传播，被分享。它们必须传给所有其他人。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在某些方面作出贡献，启动这一进程。

最后，我必须再次感谢这次会议的发起人，感谢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这里花几个小时探讨如何传播这些思想，如何尽可能广泛地在地球上传播它们。

帝国主义媒体不会为我们这样做。不管我们如何哭泣，他们都不会为我们这么做。他们把媒体当作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以继续传播维护他们的谬误、剥削、和羞辱他人的思想。需要一个新的媒体来把人类从所有这些恶习中解放出来，这实际上是为了保证我们繁荣且和平地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今天莅临的媒体，特别是南方电视台（teleSUR）、今日俄罗斯（RT）、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等，在我看来，肩负重任，要利用其专业知识、资源，包括人力和财力、技术和其他资源，协助创造一个新的媒体，一种新的传播形式。



公众号 · 车头太史令

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共产党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被誉为“古巴国父”，是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

我们的对手，那些想继续施行谬误、剥削和羞辱他人的思想的人，正在全球范围内投入数十亿巨资，以巩固他们统治世界的思想。英国广播公司（BBC）为此正在非洲花费数十亿英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为此在非洲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以至于由我们的人民和读者发起的各种泛非计划都被消灭了。

我们原本有泛非通讯社（PANA），这是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项伟大计划，在整个非洲传播新闻，现在已被摧毁。它无法继续竞争，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然

而，它是一个伟大的构想。1991年的《温得和克宣言》是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全球媒体的伟大构想，特别是在非洲大陆，但现在已经消失殆尽。



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12月宣布《温得和克宣言》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个构想。我们知道教科文组织的现状，了解教科文组织在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公正、更平等的世界方面一直面临的挑战。说到传播。那些想主宰世界的人从来没有给《温得和克宣言》的构想一个机会。他们不会这么做。

因此，非常感谢今天在上海所参与的这项倡议，以尝试研究我们如何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经验、人力、智力，以确保我们的读者每天产生的想法传给我们的人民，使他们有能力进行斗争。

1.1.3 关于全球南方媒体未来的三个问题

- 发言人：普拉桑斯·拉达克里希南
- 年份：2025

我曾密切关注 2023 年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及《上海学术共识》的进程，该文件呼吁建立 21 世纪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这一秩序显然是对 1980 年通过的原始《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呼应，后者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写的《麦克布莱德报告》获得批准。该报告由顶尖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专家组撰写，深入剖析了当时的传播困境。事实上，我们刚刚迎来该报告通过 45 周年纪念——它于 1980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期间获得通过。除本次论坛外，该纪念日几乎未被任何场合提及，这既昭示着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揭示了亟待完成的使命。

这份报告实为漫长历程的结晶。早在 60 至 70 年代，全球南方国家便尝试在传播领域构建替代方案，尤其通过新闻机构间的实质性合作——其中关键节点是非盟国家新闻社联合会的成立。到 1981 年，已有 87 个组织协同运作，每日以四种语言交换 4 万字信息。但这不仅是信息交换，更是在构建运作机制。不结盟运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互补努力，催生出一个深入剖析信息生产传播物质条件、并致力于构建替代方案的进程。《麦克布赖德报告》堪称典范，因其全面审视了传播领域的每个维度：谁掌控着所谓硬件设施？谁培养记者？信息不均衡如何影响我们？法新社、美联社和路透社仍垄断大量信息的事实？社区在新闻创作、生产与消费中扮演何种角色？报告对所有这些方面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以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公正、更有效、更平衡的国际传播体系。今天阅读这份报告是一种有趣的体验。报告的理想主义和具体性都令人印象深刻，虽然某些方面，特别是关于技术的方面已经过时，但其他部分的分析和建议仍然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

因此，当今日在上海探讨本世纪新秩序建设时，我们同样需要构建类似进程。在此背景下，我试图提出若干问题。

上海学术共识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建立团结的国际传播阵线，共同抵御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过去数年间，我们目睹了这一阵线的实践——全球南方记者，尤其是勇敢的巴勒斯坦记者，正奋力反击西方叙事与宣传攻势。

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探讨结构性问题。请听我讲个故事。今早坎巴勒·穆萨武利提到海底光缆。诸位或许知晓，全球约 600 条海底光缆承载着 90% 的互联网流量。全球仅有四五家公司具备铺设这类海底光缆的能力。2023 年有报道提及一条名为 SeaWeMe-6 的海底光缆项目。

中国企业 HMN 科技本应获得该项目合同，因其报价远低于美国 SubCom 公司。但很快结果却出人意料——美国政府官员先后造访参与该项目的多家企业，警告联合体成员若参与将面临制裁，同时提供培训补助金，导致联合体成员分裂，最终 SubCom 公司赢得项目。他们提供诱因，开出资金条件，耗费数百万美元确保中国 HMN 科技公司无法获得 SeaWeMe-6 海底电缆合同。这并非商业决策，而是战略决策——美国当时正推行名为“电信团队”的跨部门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什么？确保通往美国的海底电缆不经中国境内铺设。

截至 2023 年，电信团队已破坏四项海底光缆计划，其中包括谷歌、Meta 和亚马逊支持的项目。他们会主动接触相关企业，迫使谷歌和 Meta 实际调整光缆路线，确保这些线路不抵达或不经过中国。这正是我们亟需思考和应对的关键问题。

再举一例。坎巴勒·穆萨武利提及去年非洲发生的互联网大面积中断事件。2024 年 3 月，海底电缆损毁导致非洲多地网络瘫痪，影响了各阶层民众。这些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此类中断？加纳政府的解决方案似乎是向埃隆·马斯克的星链公司发放许可证，此后数月星链用户数量激增。此次断网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正是马斯克，因为他的星链公司获得了快速审批。许多国家的大量民众纷纷注册星链服务。

当我们讨论通过通信技术建立反帝反新殖民主义统一战线时，必须直面这些问题。我们已开始探讨平台议题，已开始讨论谷歌、YouTube 和脸书。但我们的报道和分析必须聚焦核心问题——谁掌控着海底光缆和卫星网络？这至关重要。这些国家的讨论聚焦于提升韧性与数字主权的必要性。然而显然，若民众无法在全球通信网络的骨干架构中拥有话语权和利益共享权，这些讨论终将停留在理论层面。在通信领域，我们面临的核心课题是如何将对帝国主义的认知延伸至技术领域，并使其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与科技战，本质上也是通信战争。

现在第二个问题涉及人工智能。上午对此有过讨论，我认为非常有趣且富有启发性。我不会再谈那些常被提及的担忧——就业岗位流失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需要讨论。幻觉问题同样存在，但这也是我们可以解决的。我更关注积极面。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将使文章、视频等内容的数量与深度实现飞跃式增长。但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我们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不仅是内容生产工具，更是内容传播工具。

整整一代人不仅将人工智能用于获取信息，更将其作为理解世界的途径。他们的社会政治认知正通过人工智能形成。这意味着当年轻人用它来探讨个人问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时，已不再像社交媒体那样能通过创建账号进行抗争——这种方式已然失效。人工智能如同黑匣子。全球南方媒体在此情境下该如何应对？

这至关重要。以我所在的印度为例，谷歌和 OpenAI 等公司正向印度用户免费提供先进模型一年。OpenAI、谷歌、Perplexity 都为印度用户提供为期一年的免费高级模型服务。很快你会发现，OpenAI 这类公司将效仿 Facebook 和谷歌的做法，主动接触各国政策制定者，试图影响人工智能政策走向。当我们作为全球南方媒体既无法影响内容创作又无力抗衡时，该如何应对？

我认为答案在于提卡今天上午分享的巴西经验：构建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必须让媒体机构参与其中。引导年轻人将人工智能视为工具的过程，同样需要媒体机构承担。我明白这在现有繁重任务之外又添新责。但若缺失这一环节，全球南方媒体将失去话语空间，其议程将无从推进。除非我们能在年轻人使用 AI 时介入引导——融入我们的观点，让他们意识到偏见的存在，理解新闻消费方式与传播本质——否则这项任务将异常艰巨。

最后一个问题也与《上海共识》相关，其中呼吁建立传播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国际团结。团结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于我而言，团结是表达人类共同性的方式。西方记者往往将我们视为模糊群体或个体——例如西方记者来到南方国家采访出租车司机时，我们总被简化为群体或个体。我们不被视为社区成员，不被视为组织成员，

更不被视为持续抗争、建设项目的群体。因此在构建具体团结行动时，我认为必须彰显这些建设性故事。

非洲萨赫勒地区正发生着耐人寻味的现象。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人民正面对巨大暴力，努力构建主权项目。你不会在北方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这些。但当我们报道时，必须置于组织运作的语境中——讲述组织成员如何与政府协作、他们试图构建什么、如何不断演进。这个过程至关重要。

我特别要指出人民之声和真实巴西媒体集团的同仁们所做的努力——他们正是致力于此，试图透视萨赫勒地区正在发生的进程：他们的愿景是什么？议程是什么？这样当拉丁美洲或亚洲最偏远角落的读者看到这些抗争时，会产生“这也是我的斗争”的共鸣。我认为这种叙事方式至关重要。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类似的故事。最近，我来自的印度喀拉拉邦成为继中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消除极端贫困的地区。在诸多制约条件下取得如此成就实属非凡。该邦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政府执政，通过广泛的调查、福利措施和社区动员，最终实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

有趣的是，此后涌现了大量新闻报道，聚焦于数据、方案和流程等重要内容。但最令我震撼的，竟是主流媒体刊载的一个家庭故事。这对夫妇都是视障人士，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需要住房，因为他们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但他们无法拥有房子，因为他们居住的土地登记在丈夫和他兄弟的名下。问题在于，丈夫的兄弟在27年前失踪了，无人知晓他的下落。为消除极端贫困，政府机构联合社区组织展开追踪，最终在异省某餐厅寻获这位失踪者。他们带回当事人完成签字手续后，为这对视障夫妇及其女儿建起了新居。这个见诸主流媒体的轶事，以微小却有力的方式展现了扶贫行动的实效。

我认为这样的故事，仅凭一个微小篇章就完整呈现了扶贫行动的全部内涵：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仁心、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工作方式，以及政府、民间社会与民众如何携手共进。所有这些要素都如此鲜明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因此当我们探讨扶贫故事时，我认为呈现这类故事至关重要。

最后我想引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句话作为总结，这句话我非常欣赏：新知识分子应当是建设者、组织者和永恒的说服者。我认为这三个词精准定义了我们作为全球南方媒体应肩负的使命——成为建设者、组织者和永恒的说服者。

谢谢大家！

1.2 非洲的媒体主权与反殖民叙事

1.2.1 媒体对北非民众抵抗的呈现

- 发言人：加萨内·库米亚
- 年份：2023

在探讨北非媒体之前，必须从意识形态和历史视角审视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所使用的概念及其应用动机，确保这些概念既符合我们的目标，又契合我们共同构建的现实。本次会议的定义性概念正是"南方"。该术语并非地理概念，而是通过与"北方"的对立来界定——后者同样不具严格地理意义，实则象征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因此，在探讨非洲或北非地区的南方视角媒体之前，我们必须先厘清南方概念理解的内涵：南方作为理解信息与概念的源头与框架。

南方概念的界定源于其对所谓北方概念、北方叙事及北方霸权（亦可称西方霸权）的对立。这种西方霸权不仅通过殖民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显现，更深刻塑造了我们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们所报道和传播的现实，正是由军事干预、经济社会剥削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知识生产所塑造的历史产物。本文聚焦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的知识生产。我们皆在学校接受过教育，认为多数学术机构与"学院"相关。若从正式机构角度审视，该术语可追溯至柏拉图的学院——在西方希腊知识生产传统中，它被视为首个成熟的学术研究与知识创造机构。

然而简要的历史考察表明，最早的知识机构早在数千年前便已建立——考古证据显示伊拉克地区约公元前 3800 年便存在此类机构，非洲、中国及亚洲亦有类似发现，这与"知识始于希腊并随希腊发展"的欧洲中心论观点相悖。更需注意的是，柏拉图的学院仅是富人的知识中心而非穷人之地，这一意识形态特征值得铭记。其创立初衷本是为纯粹知识生产服务，并阻隔贫民获取知识。我强调这段历史，旨在厘清我们对"南方"的认知——因为殖民主义将式的学院概念强加于我们。此后它便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生产机构，其对精英阶层与民众的影响至今未息。

所谓所有文化历史皆可追溯至希腊、继而欧洲、最终汇入所谓"西方"的叙事，实为一种政治驱动的"雅利安模式"。这种知识认知模式建立在"人类历史由欧洲白人创造"的认知基础上。与此相对，当代南方视角的知识生产正逐步构建新范式：将知识视为超越希腊文明的人类建构过程，涵盖美索不达米亚等中东文明及远东文化（尤指中国与印度）。这种认知在探讨当代南方形象时至关重要，因其本质上亦是历史观的重构。如前所述，这种历史观由两种政治定义的区分驱动：其一是将历史

起点定于希腊并由白人主导的叙事；其二是我们正在塑造的反叙事——承认历史可追溯至希腊文明数千年前，是人类持续理解自身、认知现实并构建福祉的进程。

这引出了本地区媒体如何受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塑造的讨论。我所指的区域是北非。尽管北非存在数千年之久——最新考古证据表明人类已知最古老起源地就在非洲——其政治意义却由殖民主义所定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等国家的存在，实为殖民势力的政治决策。这些国家独立后，民众亟需建设繁荣经济、完善社会体系、推动知识生产的工具。在媒体层面，众多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大多与独立后政权紧密相连，服务于反映人民建设现代社会愿景的后殖民议程。由此，北非涌现出众多新兴媒体机构和印刷厂。

埃及作为主要媒体机构与生产设施的输出地，在北非媒体发展中扮演特殊角色。其媒体议程主要聚焦泛阿拉伯主义，秉持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立场，但这种泛阿拉伯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问题的本质根源——资本主义问题。埃及媒体与出版社蓬勃发展，涌现约 200 家短命报刊及 15 种杂志。阿拉伯语世界还与中东及近东其他国家存在联系，这些地区拥有各自独特的媒体发展历程，其中黎巴嫩的媒体创作尤为丰富。当时媒体多为国有或党控，政党将其作为组织动员、宣传鼓动、传播政治理念及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黎巴嫩的《信使报》《新报》《旗帜报》等报刊媒体便是典型代表。苏联解体后，该媒体领域面临财政与政治双重挑战，导致上世纪末众多政党媒体相继倒闭，所谓“独立媒体”由此崛起。

“独立媒体”这一术语本身就具有批判性，因为其独立性值得怀疑。正如非营利组织常为幕后利益集团服务，所谓独立媒体的兴起不过是西方资助的企业试图利用 1990 年后形成的新世界秩序。这些由英美企业资助的媒体机构，旨在让西方叙事主导北非及中东地区。尽管被视为独立媒体，其实际服务于资助方的政治议程。此类媒体包括《独立报》《新闻周刊》，以及与埃及《金字塔报》、科威特《祖国报》、沙特《生活报》和《中东报》等机构相关的媒体。这些曾主导西方叙事的媒体，后来随着通信工具的发展受到挑战——更多人接入互联网，获得了超越传统媒体的互动信息来源。这导致印刷媒体衰落，电子新闻网站应运而生。该地区最早的电子网站虽是印刷媒体的网络版，但新媒体也开始发展，尤其在中东地区涌现出如《埃拉夫》等创新平台。这家网络报由被誉为“阿拉伯世界默多克”的沙特媒体人创办，他同时供职于《中东报》。

随着半岛电视台的崛起，这些新媒体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该频道成为阿拉伯语世界的重要信息来源。半岛电视台不仅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发挥信息传播功能，更成为动员力量，其穆斯林兄弟会的议程塑造了众多活动家的认知。该媒体还支持突尼斯

等亲阿拉伯之春政权，并在叙利亚事件中发挥作用，促使其他国家及政权纷纷效仿建立类似媒体平台。最终，众多媒体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均受不同实体（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党）的特定议程驱动。正因如此，我们坚信塑造当今世界需要拥有自主媒体资源。我们必须携手合作、凝聚共识，共同构建我们期望塑造的自我形象，为我们人民的未来与繁荣开创局面。

1.2.2 美国软实力及其在非洲的媒体霸权

- 发言人：米凯拉·恩洪多·埃尔斯科格
- 年份：2023

从 2022 年 12 月的美非领导人峰会，到 2023 年 1 月至 3 月间包括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内的四位美国政府高层代表相继访问非洲，美国在经历数十年忽视、敷衍了事、随后全面竞逐以及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后，正争先恐后地争夺非洲。随着中非关系深化、不结盟意识增强以及自主合作机制增多，华盛顿在非洲争夺霸权的举动不足为奇，这不禁让人追问：我们究竟何时、如何失去了非洲？

2022 年 8 月出台的新版非洲外交政策，昭示了美国当前重振非洲大陆软实力与媒体霸权的应对策略。这份长达 17 页的文件中，中美俄三国被提及十次，承诺抵制有害外部势力，却未提及主权或非洲自主发展利益。尽管官员反复宣称非洲领导人自主选择伙伴，并声称美国关注非洲发展利益，但文件中对主权或非洲自主发展利益只字未提。这份 17 页的文件中，中俄两国被提及十次，誓言对抗“有害外部势力”，却未曾提及主权或非洲自主发展利益。尽管官员反复宣称非洲领导人自由选择伙伴，并声称美国致力于支持非洲发展计划，但文件毫不掩饰地将美国野心聚焦于竞争性条款——围绕非洲外部伙伴的存在与关系展开博弈，而非支持非洲自身目标。

该战略重启了陈旧的麦卡锡主义，将二十年来中国在贸易与发展领域取得互利进展的竞争，转向令人联想到过去数十年的军事主义。我们在三洲研究所的网站研究中记录了这一转变。正如本所指出的，这种军事化举措的一部分涉及信息战——美国在非洲仍占据绝对优势。

2022 年 3 月通过的《竞争法》正是此种思路的典型体现。美国将一切问题都框定在竞争与对抗的语境中——通过战争与战斗来解决。该法案涉及美国科技、通讯、外交关系及国家安全领域，承诺向美国全球媒体署拨款约 5 亿美元，其措辞明确带有攻击性，针对的是外国合作伙伴而非非洲的现实需求。

由此，非洲本土的民间社会组织正加速行动，一方面削弱中国发展合作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推广美国民主发展模式。该法案通过数月后，津巴布韦流传起美国大使馆资助的教育研讨会报告，称其鼓励非洲记者针对并批评中国投资。执行机构“发展信息信托”曾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尽管该信息两年前已公开，如今却无法在网上查阅。

非洲媒体从业者亟需对这类资金来源建立更全面的认知体系。正如本等人所指出的，这些动态根植于殖民、新殖民及新自由主义时代塑造的历史进程。为阐明美国媒体战略数十年的演变轨迹，我将以生活多年的南非为例。

华盛顿当局通过削弱苏联及其盟友关系的框架审视局势，阻碍了反种族隔离运动的进展。尽管有确凿证据表明该政权对南非黑人多数群体及邻国实施暴行，但其仍被视为抵御社会主义和苏联影响的战略屏障。1980 年代中后期，华盛顿在援助种族隔离南非镇压解放斗争的同时，竟策划针对性媒体行动，声称要向黑人群体普及民主理念。

1989年一份内部文件披露，美国向南非媒体机构及记者输送数十万美元资金，旨在黑人社区中传播民主理念。美国政府在向某媒体集团的资助文件中宣称：“对民主价值观的具体探讨，将有助于抵御强力胁迫南非黑人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引导他们认识更理想且可实现的民主政府形式。系统性传播神话可引发对民主原则的大规模认知。”此论调否定了1980年代遍地开花的群众运动、工会及妇女组织对民主价值的认知，坚称民主原则只能通过主流黑人媒体的常规刊物传播。

他们收编了当时南非发行量最大的《城市报》，将其作为推广美国式发展模式为最佳民主形态的宣传工具。国家民主基金会作为1980年代的主要资助方，虽标榜独立非营利机构，实为里根政府创立。创始人艾伦·温斯坦1990年代坦言：“如今基金会许多工作，25年前都是中情局秘密执行。”

该机构同时资助阿富汗圣战者、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东欧反苏工会及格林纳达反政府团体，至今仍秉持这一特定历史立场资助民间社会组织。这凸显了媒体项目必须认清政治利害关系、历史节点与阶级利益的必要性。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人异化、受辱并加剧危机；唯有反帝反资本主义的媒体框架才能实现真相传播与基层组织建设。

众多致力于此的组织亟需通过团结协作的传播渠道扩大影响力。我们面临共同挑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在向国际传播中国故事的东升平台，我的播客《鹤》正体现着双重挑战：同时把握宏观与微观的瞬间。尽管多数非洲国家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北约战争打破了历史惯例，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抵抗北约的政府往往未能推进本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利益。

当下媒体面临三重挑战：谁的故事得以讲述？如何讲述？如何兼顾复杂性？从南非金属工人全国联盟到巴西知识分子群体，我们需运用多元形式，在有限资源下实现传播效应倍增。在非洲，美国资助项目与主流媒体平台之间的旋转门机制，要求我们基于团结精神与替代性政治理念，在区域主导权基础上开展创新、创造与协作。

1.2.3 从卢蒙巴遇刺到今日刚果危机：西方媒体在影响国际团结中充当的角色

- 发言人：坎巴勒·穆萨武利
- 年份：2023

我来自泛非电视台——这家位于加纳阿克拉的电视台覆盖约 46 个非洲国家、南欧地区，以及当今所称的中东与西亚地区。我们致力于向世界传递非洲故事，而讲述这些故事必然包含历史维度。正如前人所述，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当她分享这番见解时，我不断自问：我该讲述怎样的历史？作为共产主义者，我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源自比利时人，直到成为美国难民后，我才真正了解刚果的历史。

1997 年 5 月 16 日，我 17 岁，恰逢卡比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夺权前夕。当时我们身处动荡的金沙萨。那夜的记忆因成长背景而格外鲜明——叔父身为军人奋战前线，最终他们攻占了首都。我目睹了大量枪械，此后再未见过那般景象。主流媒体几乎未曾报道：美军曾降落在名为“金沙萨美国学校”（TASOK）的校园，那里有片足球场，随后进入市区与攻城部队并肩作战。这段历史从未见诸报端，但那晚发生的事我亲历亲闻。

真正让我们在那天存活下来的，是某个电台频道。整个首都被攻占期间，唯一持续播出的只有美国之音。这段记忆至今萦绕心头，每当我们讨论此事，那些画面便愈发清晰地浮现。这让我不禁思索：战火纷飞之际，当国家电视台瘫痪、地方电台失效时，首都民众竟只能通过美国记者的播报得知战况——“叛军已占领恩吉利机场我们目睹他们逼近时任总统蒙博托居住的宫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终究建立在所听闻的信息之上。因此我们必须解构接收到的信息。这不仅关乎宣称“历史站在我们这边”或强调讲述自身历史的必要性，更要重新审视既往教育，重新学习诸多的事物，进而书写新的叙事——人民抗争的故事。

2019 年 9 月 8 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刊发题为《歌手、裁缝、士兵、间谍：中情局特工如何成为乌干达顶级乐队台前人物》的文章。我早已知晓这段历史，当看到中央情报局（CIA）正为即将任命的新任局长大肆宣扬时，不禁感到震惊。候选名单中出现了一位黑人——达里尔·布洛克，其面容似曾相识。在非洲大陆的视角里，来此地的人形形色色，包括传教士、记者和艺术家。如今我们才知晓，当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通过美国国务院文化外交项目访问刚果时，身边就跟着中情局特工。而 2004 年，一位非裔美国音乐家曾与乌干达乐队“坎帕拉全明星乐队”合作演出，此人如今竟被提名为中情局新任局长。乌干达民众听闻此讯时，恐怕会惊呼：“等等，我常在本市酒吧见到他！这不就是坎帕拉全明星乐队的那位成员吗？”这引发了软实力的本质及其在非洲大陆的运作方式之问：究竟收集了哪些情报？这些情报如何实际左右我们的认知？

现在我想转换话题。与其讨论软实力或硬实力，我更想谈谈每天让我心惊胆战的词汇：“希拉里·克林顿”。多数人没关注她担任国务卿的提名听证会，但我全程关注。她发言时提出一个前所未闻的概念：“智慧力量”。她向美国国会阐述若就任国务卿将采取的外交策略及工具——既非单纯依靠硬实力，也非仅凭软实力，而是运用“智慧力量”。她对智慧力量的定义，正是我们十年后仍在探讨的议题。她战略性地阐述了技术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中的双重作用，阐明社交媒体对美外交及海外

政策推进的决定性意义。多数人当时并未意识到此事，而岁月流转间，我愈发清晰地看到技术正被用作推进美国利益的实际手段。

欣慰的是，当她访问埃及时，当地青年拒绝与其会面。我们中有人知晓阿拉伯之春期间如何颠覆当地青年运动的内幕——美国国务院资助的青年团体精通技术操作。我们不禁疑惑：这些青年为何能掌握如此高超的技术？他们远比 等平台的用户更具前瞻性。我们使用相同工具，拥有社交媒体账号，但为何他们的账号能触达更多人群？由此我们得知，他们已殖民并掌控算法，确保特定信息传播，从而混淆青年对真正改变世界的认知。早在 2012 年我就强调：Facebook 不会创造革命，革命源于实地行动。点赞帖子不会引发革命。关键在于理解技术如何支持社会运动，但美国国务院早已将宣传作为战略工具。因为全球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均由美国公司运营，必须遵守美国法律，为政府留有后门。爱德华·斯诺登和维基解密等渠道的诸多爆料，让我们得以窥见真相。

非洲大陆的技术现状如何？我将以刚果民主共和国（DRC）为例说明。去年我至少四次前往该国，当发现奈飞、谷歌、脸书和推特已进驻金沙萨，且谷歌与脸书正在刚果境内建设数据服务器时，我深感忧虑。他们已在该国境内建立了三座交换服务器。过去两三年间，一个现象尤为显著：若想了解刚果局势，社交媒体已成为信息来源。连刚果主要语言林加拉语，如今在脸书上都能自动翻译。我们发现很奇怪的是，当事件发生时，我们能如此轻易地获取信息。实地考察时，我看到他们建立了缓存——复制谷歌、脸书和奈飞的服务器——并将其部署在三大城市：金沙萨；现任总统的故乡姆布吉-马伊；以及东部暴乱发生地戈马。当我向年轻人解释实际发生的情况以及数据获取如何变得更便捷时，我们意识到：尽管这些企业并未主动分享信息，但我们提供的信息量已远超以往，而国内竟无人知晓此事。那些在平台上发布信息的刚果人会面临什么？特别是那些批评美国政府、试图揭露刚果、赞比亚与美国围绕钴矿资源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人。他们是否会重蹈 Press TV 的覆辙——该媒体因披露美国国内真相而遭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关闭？

在剩余的几分钟里，我想聚焦另一个重要日期：2023 年 5 月 25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自去年 12 月底宣布这一消息以来，令人着迷的是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几乎每天我都会收到关于中国在刚果（金）活动的视频、文章及信息。其奇妙之处在于，尽管报道角度各异，却始终围绕着同一个核心故事展开——一篇聚焦合同某部分条款，另一篇则侧重其他内容，本质上却是同一个故事的变奏。这种现象以惊人速度蔓延，令人不禁质疑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三天前，刚果友人通过 WhatsApp 发来一段十五分钟的压缩视频——汉斯·巴克关于中国合同的完整专题报道。他们究竟如何触达我们？我们同样拥有摄像设备与社交媒体账号，为何信息传播速度如此悬殊？这并非简单模仿“效仿他们的做法”，而是需要更科学地认识到：我们不能直接复制他们的手段。我坚信，即便我们在技术上更先进，若缺乏中非人民之间实际交流讨论的民间纽带，就会有人策划具体方案，让民众认定中国是敌人。

最后我将引用一段与首点相关的长句：“历史站在我们这边。”正如我所言，关键在于“哪段历史”？刚果民主共和国首位民选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给出了答案——这位 1961 年 1 月 17 日前遭中央情报局（CIA）残忍暗杀的领袖。临终前他给妻子写了封信。在这封遗书中，他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他让我们明白，今天当我们建立团结时，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历史终将发声，但那不是布鲁塞尔、巴黎、华盛顿

或联合国所教导的历史，而是那些从殖民主义及其傀儡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家所教导的历史。 非洲将书写自己的历史，撒哈拉以北与以南都将谱写荣耀与尊严的篇章。"这就是我们在此相聚的意义。我们来到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同志们汇聚一堂建立必要的团结，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被灌输的历史，讲述我们尊严与荣耀的历史，通过团结的传播向世界宣告：我们同舟共济。

1.2.4 媒体主权新殖民主义信息控制非洲叙事全球南方合作

- 发言人：阿肯德·蒙贝
- 年份：2024

昨日，一位加纳同志分享了在上海街头被问及是否来自非洲的经历。这与我在英国曼彻斯特和伦敦求学时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我在西方也常被问及这个问题，但随后总会接踵而至的是关于非洲野生动物或饥荒的追问——诸如我们家后院是否栖息着大象、狮子和长颈鹿，或是 BBC、天空新闻等西方媒体报道的饥荒。我从未听过任何人承认西方在非洲和全球南方历史上实施的压迫、羞辱和征服。

关于从全球南方系统性掠夺丰厚资源的真相始终被掩盖。相反，日常新闻与纪录片不断强化我们的屈辱感，将我们描绘成劣等民族，同时将西方塑造成解决挑战的唯一知识与资源拥有者——而这些挑战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一手制造的。昨日 VJ 演讲中提及的"宁静"一词，令人联想到关于新殖民结构的论述——其建立在五大控制之上：金融化的自然资源、科技、武器、军事及信息。这引发关键问题：全球南方如何开创信息传播新纪元？

实现这一目标需直面西方对媒体垄断的投资。答案在于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并提供我们对全球问题的独立分析。唯有通过全球南方媒体间的紧密协作，才能实现这种信息主权。信息与数据项目是基石——它们支撑着我们重塑信息格局的能力。正如其他讨论者所言，自主平台是抗衡西方媒体霸权的必备武器。路透社、BBC、CNN、天空新闻、《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绝不能决定全球南方如何理解自身乃至西方世界。

以美国总统拜登本周对安哥拉的访问为例。西方媒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头条宣称："数千人欢呼拜登抵达安哥拉，兑现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承诺"（美联社）和"拜登访非聚焦历史与经济希望"（《纽约时报》）。然而此行核心实为洛比托走廊——这项承袭自前任的基建项目，旨在通过安哥拉自由港与本格拉铁路，保障美国从刚果和赞比亚矿产的供应链安全。此举既便利了对非洲资源的持续掠夺，又压制了非洲民众"别碰我们的矿产"的呼声。

最后，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共建主权信息通信体系。我们不能继续受制于那些旨在羞辱、压迫并延续帝国主义的新殖民媒体结构。我们的思想必须主导国际话语权。

1.2.5 国际媒体对非洲的报道：观念与挑战

- 发言人：保拉·斯利尔
- 年份：2023

自 2005 年今日俄罗斯创立之初，我便加入该媒体。作为一位带有明显口音的南非人，我在管理今日俄罗斯中东分社 18 年后，回国创立了今日俄罗斯非洲分社。如今该分社总部设在南非，拥有覆盖非洲 33 个国家的特约撰稿人。

本次演讲围绕"国际媒体报道非洲：认知与挑战"展开，分为三部分：首先对比二十年间报道中东与非洲的差异，包括因社交媒体前所未有的影响而被称为"推特革命"的阿拉伯之春；其次探讨非洲对世界的认知转变；最后分享 RT 以俄罗斯视角建立非洲频道的实践经验。

将非洲视为单一国家而非 54 个各具独特挑战的独立国度，是根本性误判。媒体环境日益受控，客观新闻报道愈发艰难——外国媒体面临的准入壁垒尤甚。当批评政府时，外国记者依赖可能遭受直接报复的当地记者，这与能规避后果的"空降记者"截然不同。例如在中非共和国三名外国记者遇害后，RT 非洲频道成为唯一获准进入的团队，我们的通行权完全取决于政府邀请。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M23 叛乱冲突期间记者证遭拒等后勤障碍造成极端困难。索马里作为全球访问量最低的国家（去年仅 100 名访客），近期仅允许我们团队入境。

青年党武装分子公然在街头和人道主义营地持 AK-47 步枪。政府安保力量之所以未发动袭击，是因为我们报道的是饥荒而非安全问题——若报道后者，我们就会成为目标。尽管身处险境，索马里人展现了非凡的热情好客，这与媒体刻画的形象截然相反。

非洲记者多"失踪"而非遇害，部分缘于冲突边界模糊。莫桑比克北部盘踞着 24 个武装团体，但鲜有人理解部落动态。当前非洲 13 场冲突持续蔓延——这些由西方助推却遭低报的战事，被西方媒体冠以"反恐"之名以正当化干预；莫桑比克的部落资源冲突更被错误贴上恐怖战争标签。

媒体受限于压缩叙事（1.5-2.5 分钟）和访问障碍。头条新闻优先呈现西方叙事：联合国削减援助之际，非洲之角 2100 万人面临饥荒——此事却被忽视。"血腥新闻抢头条"的思维助长冲突，正如肯尼亚以反恐为由限制拍摄所示。

非洲人日益拒绝西方指令，寻求自主发展。莫桑比克教育去殖民化运动正是重获文化主权的典范。俄罗斯因无殖民历史及苏联时期解放援助而赢得支持；中国则进行经济投资。反观西方列强，其资源掠夺行径昭然若揭。非洲矿产资源——钴、铜、钻石、铜钼铁矿（钼铁矿）、锂——与冲突区域高度重合。西方国家从动荡局势中获利，阻碍治理进程并限制新闻采访。

关于乌克兰-北约冲突（更准确说是乌克兰-西方冲突），非洲国家日益支持俄罗斯却担忧失去美国援助。索马里一位部长坦言："我们支持出价最高者。"随着金砖国

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版图扩张及大宗商品支撑货币削弱美元依赖，非洲正经历转型。

1.2.6 南非的媒体和阶级斗争

- 发言人：法卡米勒·赫鲁比·马约拉
- 年份：2023

本次会议聚焦于将传播作为团结工具，其召开时机至关重要。会议结束时，我们必须明确实现团结的最佳策略及其具体实施路径。在本环节，我将重点探讨南非媒体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本次演讲旨在探讨本组织在扩大工人阶级话语权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正是我深切关切的议题。加入南非金属工人全国联盟前，我曾担任记者十年，供职于南非多家知名企业媒体机构，包括目击者新闻社（EWN）。

记得在 EWN 的第一天，编辑问我对记者职责的理解。我满怀热忱地回答：“为弱者发声，为无声者代言。”她凝视着我说：“不，这不是你的职责。你的职责是为广告主获取内容。”她如此直白地揭示媒体真实功能——即维护广告主与企业的利益——令我大开眼界。这番话基本概括了南非媒体的立场。南非媒体极度商业化且奉行新自由主义，毫不掩饰地为西方帝国主义利益服务。这种倾向贯穿所有媒体机构，无论是南非广播公司（SABC）这类公共媒体，还是其他私营媒体。当你来到南非，无论收听哪家电台或观看哪个电视台，听到的都是鼓吹帝国主义、新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其立场极度反工人阶级、反黑人，并对任何替代性观点充满敌意。

2012 年，南非西北部马里卡纳矿区的矿工发起长期无保障罢工，此事凸显了这一问题。我将提供具体细节：马里卡纳是铂金巨头隆明矿业的所在地，当地极其贫困。2012 年 8 月，罢工以 34 名工人被南非警察当场枪杀告终，整个过程被电视直播。马里卡纳惨案揭示了南非的现实图景：这个由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解放的国家，如今正积极压迫工人阶级。事件的讽刺之处在于，警方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的决定，竟源于现任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当时发送的一封邮件。时任隆明公司董事的西里尔·拉马福萨向安保部门成员发送邮件后，安保人员便对无武装工人采取了强硬手段。媒体对马里卡纳屠杀事件的叙述将抗议责任归咎于工人，将其塑造成暴力野蛮人——在媒体视角中，工人实为自身惨剧的始作俑者。

南非媒体从不将资本主义视为暴力根源。当时身为记者的我常驻马里卡纳，亲眼见证了资本主义的暴力本质在此地的具象化。整个地区处于未开发状态，缺乏卫生设施、体面住房和电力供应，而当地最大的铂金企业却从中攫取财富却毫无回馈。这正是马里卡纳矿工们最终抗争的目标——争取更好的生活。讽刺的是，曾参与组建全国矿工工会的拉马福萨，这位前工会领袖，竟正是煽动安保部队实施暴力镇压的始作俑者。我强烈建议您阅读约翰内斯堡大学伊尔瓦·戈默戴的研究报告，她深入剖析了媒体对马里卡纳事件报道中“随军报道、煽情主义和观点两极化”的特征。她发现媒体充当了南非政经利益集团的强大传声筒，却忽视了该国劳资关系中根深蒂固的根本性问题。

南非媒体对异见持敌视与不容忍态度的另一典型例证，是其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这种叙事完全偏向单一立场，对不同观点毫无容忍度。几乎所有媒体平台——尤其是所谓独立媒体——都将此描述为俄罗斯的入侵。它们批评南非政府在此问题上保持中立，并拒绝容忍任何异议声音。演讲前夜，我在推特上与某位记者辩论时，

因我提出"南非不应卷入这场战争而应推进自身国家利益"的观点，对方竟大为光火。

我同时指出这并非中立议题，而是涉及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行为。他竟回应道："这意味着南非矿工工会支持 屠杀婴儿。"此类思维模式正是南非媒体话语的典型特征，使得深入探讨复杂议题成为不可能。南非媒体的主导框架由西方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定义，这些势力正推动帝国主义思想渗透所有新闻编辑室。与此同时，社会对共产主义存在真实的恐惧与憎恨，俄罗斯的介入重新点燃了这些旧有问题——正如种族隔离时期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病态痴迷。

维杰·普拉沙德教授关于企业媒体窒息性的论述令我深有共鸣——这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当前媒体生态：异见者毫无容身之地，稍有不同观点便遭贴标签。南非现有40家商业及公共广播机构。其中规模最大的南非广播公司（SABC）覆盖全国逾3000万观众，仍是主流新闻平台，旗下还拥有众多热门电台。然而尽管SABC属公共广播机构，其叙事却不幸深受右翼所谓"独立媒体"影响，最终沦为与其他组织如出一辙的宣传机器。

在此背景下，全国金属工人联合工会（NUMWSA）如何在该领域开展工作？我们的策略是毫不掩饰地宣传工人阶级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念。无论媒体是否认同，我们都能确保每日传播自身主张——因为我们深知权力不仅在于媒体，更在于35万名金属工人：当他们罢工时，足以让整个经济停摆。因此，即便他们厌恶我们，也无法忽视我们。归根结底，无论构建何种媒体策略，我们都必须确保运动与我们同行，确保工人阶级主导议程与信息传播——因为真正的力量源于此。

推进这一议程的重要举措，正是我们在贝拉贝拉学院开展的培训项目。这项工作对破解媒体中令人窒息的叙事至关重要。姆梅姆贝博士的观点完全正确：我们不能指望帝国主义者传递我们的信息，必须建立自己的平台。贝拉贝拉学院正是如此践行。今年学院在加纳举办，这段经历极具启发性。学员来自非洲各地，以及巴西等我们有合作关系的地区。通过媒体培训，我们深入了解世界各地劳动人民 面临的困境。我们已与人民之声等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并与PAT电视台保持紧密合作。过去也曾与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开展合作，期待本次会议能深化这种协作。

我坚信战胜当前危机的关键在于持续推进这项事业，切实搭建这些平台，为广大民众创造替代性选择。我们才是主体力量，理应主导话语权，而非耗费精力向右翼势力乞求播出时间。这正是我们最终的奋斗目标。感谢我们获得这次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期待各位分享深化合作的其他途径。会议结束后，我们必须强化这些网络，确保未来主导媒体话语权的是广大民众的声音，而非造成我们苦难的精英少数派。

1.2.7 在西非民众抵抗中发展泛非传播

- 发言人：奎西·普拉特
- 年份：2023

我们在此展开的讨论，终将催生一种机制，使我们能够保持本真、讲述自身故事、追求自身利益。本次集会见证了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持续的斗争——这场斗争我们曾为之奋斗，今日仍在坚持，并将持续直至最终胜利。我来自西非——这个由 16 国组成的区域。所有这些国家都曾遭受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与殖民主义的摧残，如今又深陷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与压迫。西非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区之一，拥有从茂密热带雨林到丰富铀矿、黄金、石油和天然气的所有资源。纵横交错的河流贯穿这片土地，南部濒临大西洋。然而，尽管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和才华横溢的人民，许多人却吃不上一日三餐，许多人无法接受教育或获得医疗保健。

我们今日面临的困境并非资源匮乏，而是无法掌控自身资源、书写自身历史。正因如此，泛非主义者与革命者共同发起了泛非电视台项目。这虽是微薄之力，却令我们倍感自豪。筹备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此举并非首创。早在 1960 年代，我们的伟大领袖夸梅·恩克鲁玛、塞古·杜尔和莫迪博·凯塔便创立了泛非通讯社，旨在联结非洲人民、讲述非洲故事。遗憾的是，该机构甫一诞生便夭折。今日我们重启这项事业，正是为了实现先辈们的梦想。

我们创建这家媒体机构，是因为坚信除非我们亲述自身故事，除非我们成为历史的主角，否则作为非洲人我们将无法克服困境。我们谨记第五届泛非大会在曼彻斯特通过的最终决议，其结束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除了锁链，你们一无所有。”正如该决议所示，我们正处于团结全世界劳动者的进程中。我们曾赢得重大战役，今日仍在持续取胜，未来也将继续获胜。但这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创造力。

多位发言者已提及西方媒体在非洲宣传战中的深度介入。英国广播公司每年耗资逾六十亿英镑推行西方议程，美国之音遍布非洲大陆，法国 24 台与半岛电视台亦在推行相同议程。我们虽无六十亿英镑可挥霍，却怀揣着不容放弃的斗争信念。正是这份信念将助我们击败敌人。我们还拥有反抗奴隶制与殖民主义的丰厚斗争史，以及民族团结的悠久传统。这正是我们昔日战胜敌人的法宝。昨日我们战胜了他们，今日正在战胜他们，未来必将彻底击溃他们。

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作为革命者、自由斗士、泛非主义者，必须凝聚成媒体机构大家庭共同发声。已有众多媒体组织投身这场斗争：拉丁美洲有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teleSUR），俄罗斯有 RT（今日俄罗斯），还有 Press TV 和《巴西事实报》等媒体。巴西的 TVT（工人电视台）同样值得关注，当然还有中国的 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更要肯定“人民通讯社”的贡献——这家国际媒体持续报道全球民众运动。这是一场争夺世界人民思想的战役，赢得民心的斗争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拉美的信息战与南方联盟

1.3.1 21世纪初拉美进步浪潮中的媒体改革实践

- 发言人：曼努埃尔·贝托尔迪
- 年份：2023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人民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能参与这场探讨人类未来重大议题的重要论坛，我深感荣幸。谨向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以及三洲社会研究所发出诚挚谢意，感谢各位的邀请。

今日议题为何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乎如何赢得人心，以团结平等的价值观为基石，共同构筑我们向往的世界。

今日，我们需要反思媒体在拉丁美洲现代史中的角色。我将从一个生动案例切入，阐释当代媒体如何参与阶级斗争。随后通过两个案例研究，展现信息获取民主化进程中的进步与挫折。最后，我将重点探讨大众传媒当前面临的挑战。

请允许我以一个历史时刻作为引子。199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他以惊人的清晰度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本质：“我们所讨论的斗争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斗争。它不会演变成战争。核武器无法解决世界问题，战争同样无济于事。我甚至认为孤立的革命也远远不够——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塑造的秩序中，孤立的革命可能在数日乃至数周内便遭颠覆。”

这是卡斯特罗对古巴青年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的训示。该讲话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公众播出。当时古巴正因孤立和经济封锁陷入深重困境。卡斯特罗早已预见到席卷拉丁美洲的挑战，他警告道：“即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绝不能放松警惕。”若民众对现政府的失望催生法西斯或极右翼势力，可能使我们重蹈覆辙。军事侵略的可能性亦不可排除。但当前斗争的核心仍是意识形态之战。“他最后明确指出古巴革命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其成功源于播撒思想的能力。”

那一年，即1998年，反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整个大陆。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爆发民众起义。同年，作为人民代言人的查韦斯指挥官赢得总统选举。这场胜利为多国接连取得选举胜利铺平道路。2001年末阿根廷爆发大规模民众起义，2002年卢拉在巴西赢得首个总统任期。随着民众动员势头的增强，抵抗运动持续升温。2005年成为拉丁美洲的转折点：美洲自由贸易区倡议宣告终结，随后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巴拉圭的卢戈、洪都拉斯的塞拉亚相继当选总统。然而在这些胜利背后，仍存在着紧张局势、冲突与不满情绪的爆发点。

所有新政府都面临共同挑战：它们执政的国家媒体格局高度集中，由少数经济实体掌控，这些实体对社会主义原则怀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偏见。面对这一现实，各国民政府不得不修订现有通讯法或制定新法规。在查韦斯总统领导下，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一体化进程的引领者，得到巴西卢拉政府和阿根廷基什内尔政府的支持。

2005 年美洲自由贸易区 (FTAA) 的破产催生了关键一体化机制，包括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南美国家联盟以及新近成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2002 年的关键事件不仅塑造了玻利瓦尔进程，更重塑了整个拉丁美洲，其标志是委内瑞拉政变的失败。这一时期出台了 49 项重大政府措施，其中五项最为重要：土地法、油气法、教育法、海岸法和渔业法，这些法律直接挑战了委内瑞拉旧权势集团的利益。媒体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电视节目、广播公司及主要私营媒体机构联合反对查韦斯的改革，为 2002 年 4 月 11 日推翻查韦斯政府的政变企图创造了条件。这些媒体歪曲并削弱了查韦斯向委内瑞拉人民传递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其策略。另一方面，它们却掩盖了委内瑞拉人民实践直接民主的事实。当时曾爆发多次大规模示威，要求恢复宪法秩序并解除总统的软禁状态。

4 月 11 日星期四，五家私营电视台——委内维森、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环球电视网、特莱文和 CMT——以及十家顶级国际报刊中的九家（如《环球报》《国家报》《如此如此报》《冲劲报》《新国家报》）积极参与反查韦斯活动。平面媒体亦参与其中。《国家报》4 月 13 日社论将企业家和军方主导的抗议活动称为“公民抵抗”，纵容其解散民主机构、洗劫古巴大使馆并袭击查韦斯内阁成员。《世界报》同日社论则将这些行径描绘为“民众愤怒”的宣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主张恢复 宪法总统职位、维护政变后民主体制的人士，却被贬称为“暴民”或“精神不稳定的示威者”。此类论调见于《国家报》4 月 15 日刊载的报道。

拉丁美洲进步浪潮的斗争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赢得公众支持，而媒体格局正是关键战场。阿根廷 2010 年颁布的《媒体法》将传播权确立为基本人权，限制媒体垄断，对大众传媒实施许可证制度，并保障受众权益。该法案在推动媒体话语民主化与合法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法标志着阿根廷自 1983 年恢复民主以来的媒体格局重大转变。历经数月审议后，立法初稿在全国各地公开征询意见，并通过媒体系统广泛传播，迫使政治体系正视这一敏感议题——尤其在政界日益依赖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最深远的影响在于挑战了“新闻业丧失独立性”的普遍认知，这正是整个立法进程引发的文化冲击核心所在。

该法在国会通过后，国内头号媒体集团《号角报》立即提起诉讼，指控其违反法律。在持续冲突与利益分歧中，国家在广播管理和执照审批决策方面已不复往昔的敏锐。这部《媒体法》见证了基什内尔领导的社会派系与主导农业部门之间冲突所引发的深刻变革。该法案应被视为反新自由主义政治力量崛起的时代产物——这些力量在阿根廷 2001-2002 年动荡危机及后续抗争中壮大。十年后，在新自由主义浪潮持续冲击下，该国再度陷入危机。

2015 年毛里西奥·马克里政府上台后，立即颁布第 号法令，精准锁定该法的关键条款，并在国会支持下有效实现其意图。政府通过干预传播领域，确保大型经济实体盈利，并放松对媒体整合的限制。

在厄瓜多尔，一场以媒体与政府紧张关系为背景的宏大运动正在展开。2011 年全民公投中，厄瓜多尔民众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限制媒体垄断及经济势力对媒体运营的影响。两年后的 2013 年，在民众支持下，国民议会颁布《组织法》规范所有

媒体平台的新闻内容。该法案规定信息不得用于商业目的，而应视为公共产品——一种不受特定经济精英特权污染的非商业服务。

此外，该法强调新闻内容应提升公民参与度、促进多元包容，并恪守新闻客观性原则。2021年，吉列尔莫·拉索当选总统。仅一个月后，他就向国民议会提交法案，提议大幅修订科雷亚政府时期颁布的法律。新立法剥夺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简言之，该法案秉持市场自我监管理念，将言论自由定义为个人权利而非集体权利。

这场制度之争发生在1990年代席卷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政治反噬浪潮背景下。当时，各国已在传播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后续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冲突应对规划奠定了先例。或许正是源于21世纪初的玻利瓦尔革命，一个新时代的传播工具应运而生：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该媒体由多个拉丁美洲政府共同赞助。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汇集拉美各国在资源有限、技术受限条件下仍坚持发展的基层传播经验。去年，我们与60余家拉美大众媒体齐聚巴西，制定符合民间组织需求与愿景的共同战略。在teleSUR等姐妹机构支持下，我们协调开展了联合培训项目。

随着新型社交网络和数字平台的兴起，通信工具正在发生变革，迫切需要重新开启关于通信策略的讨论。全球范围内，关于监管科技巨头的讨论正日益升温。人工智能的崛起使社交网络监管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这既涉及对经济行为体的监管，也包括对公共话语权的管控。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纷纷涉足媒体领域，它们常通过操纵或审查信息来服务私利。

大众传媒机构正积极倡导广告立法，要求将国内外实体纳入广告分发渠道，并强制其为广告投放付费。尽管传统媒体始终强调市场效率并抵制国家干预，其运营仍高度依赖国内机构的审批。此外，关于公共媒体的讨论严重缺失——这些媒体当前远未发挥其潜在能力。在新自由主义政府执政期间，公共媒体体系遭全面瓦解，重建工作至关重要。任何有效策略都必须积极吸纳公共媒体从业者与公民社会组织参与。

最后，我们面临着构建自身叙事与故事的根本任务。当今主流文化话语宣称“资本主义的终结比世界末日更难以想象”。我们该如何回应这类叙事？应讲述怎样的故事？从何种视角切入？希望何在？这些问题关乎我们传播策略的核心方向。正因如此，我们视此次在中国共同探讨这些议题既是殊荣亦是难得机遇。我们坚信，当中国将以民为本的治理实践经验分享给全球南方人民时，人类未来的钥匙终将在此开启。

1.3.2 拉美媒体国际传播形势及展望

- 发言人：帕特里夏·维勒加斯
- 年份：2023

各位下午好。衷心感谢会议主办方的盛情邀请。我是来自哥伦比亚卡利市的帕特里夏。

十八年前，我来到委内瑞拉加入当时尚属开创性的项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电视台（teleSUR）拉美加勒比团队。彼时，teleSUR 的正式项目提案尚未起草。但我们已然明晰：teleSUR 绝非仅是委内瑞拉的电视台，它承载着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愿景。自 2005 年开播以来，teleSUR 始终秉持一项鲜明特色：它是拉加地区真正的多国联合电视台。这种身份塑造了我们的编辑理念。我们视信息为基本人权。正如拉美加勒比人民走上街头要求获得更多教育、医疗和食物资源一样，他们同样在争取——也应当继续争取——反映生活真实的准确信息。

正是建立拉美加勒比地区多国电视网络的愿景，促使 2005 年在多个赞助国支持下创立了 teleSUR。这些赞助国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自 teleSUR 成立的 18 年间，四国均遭受了持续不断的攻击。这些年里，三个赞助国经历了封锁、经济制裁和资源掠夺。其中玻利维亚甚至遭遇政变，我们稍后将详细说明。

这些国家联合创建 teleSUR 绝非偶然。它们始终坚信：传播不是商品，而是基本人权，是公共权力的体现。

teleSUR 于 7 月 24 日正式开播，这一日期经过精心选择——它标志着伟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诞辰。这个象征性的选择体现了我们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愿景。我们是由该地区人民创建、为该地区人民服务的频道。这正是我们身份的核心：唯有身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才能真正讲述这里的故事。我们亲历这些事件。我们亲历这些变迁，深谙这些叙事脉络。正因如此，我们不仅传递新闻，更揭示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这恰是西方媒体所缺失的：他们虽能快速高效地报道事件，却往往未能阐明事件背后的意义。

十八年光阴恍如瞬息，于我们却是漫长历程。我们从西班牙语电视频道起步，现已拓展至英语频道，主要面向非洲观众。如今通过与中国信号分发商 StarSat 的合作，我们的内容已覆盖非洲 33 个国家。

众所周知，我们最初是西班牙语电视频道。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已发展为提供西班牙语和英语内容的多媒体平台。这意味着要学会用两种语言、在所有平台、以各种形式讲述我们地区的故事。听起来很简单，但实践中却是巨大的挑战。我相信，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全球媒体从业者都能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的内容覆盖哪些地区？这张地图（注：参见视频）虽制作简略，但背后支撑的分发网络凝聚了巨大心血。每个标记点都代表着 teleSUR 信号可抵达的区域。我们的内容通过多元平台传播：部分地区采用开放信号，其他地区通过卫星电视，更多地区则依托 IPTV 网络。

我们的策略很简单：力求覆盖所有可能的平台。无论运营商规模大小，只要提出接入 teleSUR 的请求，我们都会全力提供信号支持。这种策略至关重要。尽管遭遇打压、封锁和审查，teleSUR 仍持续触达全球观众。例如，当毛里西奥·马克里政府在阿根廷执政时，曾将 teleSUR 从主要运营商的频道中移除。然而阿根廷民众仍设法收看我们的节目。如今 teleSUR 已重返阿根廷开放式数字电视平台，且我们的网络观众数量持续增长。这段经历意义非凡——即便部分频道遭撤下或审查，多元化的分发体系仍确保我们持续在屏幕上播出。

那么，teleSUR 的创立历程如何？如前所述，我们于 2005 年 7 月 24 日正式开播。但真正让世界瞩目的是我们对洪都拉斯政变事件的报道。洪都拉斯近期还与中国建立了多层次外交关系。我们向世界展示政变实况：通过直播揭露了前总统塞拉亚住所遭枪击事件，以及他身着睡衣被强行押送至哥斯达黎加的经过。这绝非 CNN 西班牙语频道等西方媒体所宣称的“和平权力交接”——他们的叙事企图掩盖真相，为政变辩护。

teleSUR 从总统府的现场报道至关重要。我们不编造叙事，也不用虚假故事替代真相。我们呈现的是当下的真实，而这份真实正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人民最珍视的。

当我们前往利比亚报道其他媒体也在关注的事件时，许多西方记者质问：“teleSUR 来这儿干什么？”他们甚至质疑我们的存在意义，质问 teleSUR 为何要报道当地事件。其潜台词昭然若揭：“老老实实报道拉美加勒比地区就行，何必跑到地球另一端？”

我们前往非洲，是为探寻事件真相，更因这些事件背后隐藏着更广阔的媒体战争。这些画面是首批传回我们位于加拉加斯新闻中心及全球分支机构的影像。然而并非所有媒体都致力于揭示完整真相。当我们的记者与其他记者一同飞抵的黎波里时，唯独我们的记者走下飞机。其余记者不愿下机，最终折返归国。手持直播摄像机，我们的记者直接从的黎波里绿地广场进行报道。他打电话给我说：“帕特里夏，广场根本没被轰炸。这里有孩子们在踢足球。”我回答：“不可能。我们在加拉加斯看到的画面完全不同。”“立刻连线，让我看看真实情况。”当 teleSUR 直播绿地广场踢足球的孩子们时，观众们难以置信。许多人指责我们造假。但在直播条件下，造假根本不可能。

媒体战争究竟如何运作？我们正经历着 信息爆炸、图像海啸和无数语言传递的信息洪流。但请记住：更多信息并不等于更多认知。teleSUR 多年来取得的成功，源于我们坚持走出新闻编辑室深入现场的承诺。唯有亲临现场，才能真正把握事件本质。我们派遣训练有素的专业团队，通过现场直播吸引观众并呈现真实现场。

多年后，英国外部服务商终于承认：那张传遍全球媒体的所谓“广场轰炸”照片——即我们先前所见——从未真实发生。至今仍无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历史终将揭示真相。尽管饱受质疑，我们仍坚持从的黎波里绿地广场进行直播，镜头里孩子们正在踢足球。

然而，尽管媒体战至关重要，却并非 teleSUR 多年来成功的唯一因素。我能感受到这段内容如何打动阿根廷观众，也深深触动了我——尽管我并非阿根廷人。

teleSUR 过去 18 年最具意义的尝试之一，便是与迭戈·马拉多纳的合作。许多人曾问我：“帕特里夏，你怎么可能和马拉多纳合作？他难相处吧……你不可能轻易接近他。”但我们克服了这些所谓的“不可能”，这张照片便是明证。它摄于俄罗斯世界杯期间，而我们与迭戈的合作早在巴西世界杯时就已开启。倘若他仍在世，我确信我们定会在卡塔尔世界杯重逢。然而我们过早地与他告别，哀悼的不仅是足球传奇，更是政治象征。他坚定选择与拉美及加勒比公共电视台合作，向世界发出有力宣言：马拉多纳与 teleSUR 站在一起。若想通过独特视角了解世界杯，就必须收看 teleSUR。

这为我们打开了许多大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历史并非仅由冲突定义。人类经历本就丰富多彩。常有人问我如何报道非洲。非洲同样充满多样性。然而在媒体报道中，我们往往只聚焦问题、困难和尚未翻越的高山。这是错误的。足球作为强大的全球凝聚力，也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让我想起我们采访埃沃·莫拉莱斯总统的场景——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足球运动员。

这样的团结时刻屡见不鲜，而 teleSUR 在向世界传递这些瞬间时发挥着关键作用。许多人记得这张记录哥伦比亚边境企图入侵委内瑞拉的照片。事实上，哥伦比亚现任总统近期证实，伊万·杜克政府时期确实存在军事入侵委内瑞拉的真实计划。这是我们报道过的最具挑战性的新闻之一。双方资源差距悬殊，我们设备极其有限。但凭借现有条件，我们仍向全球直播了真相——所谓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卡车并非被拒绝援助的委内瑞拉民众焚毁。

数月后，《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报道。但我们实现了实时报道。我们从中获得的教训很明确：人们愿意相信真相，但前提是西方媒体率先报道。正如 2009 年洪都拉斯政变期间那样，我们再次从现场进行了实时报道。遗憾的是，政变阴影始终笼罩着拉丁美洲的历史，我们在玻利维亚再次目睹了这一现实。近年来，teleSUR 记者已成为该地区报道此类动荡事件最富经验的团队之一。当埃沃·莫拉莱斯总统以国家元首身份发表最后告别演说，主动提出辞职以避免更多流血事件时，我们就在现场。那段视频通过 teleSUR 播出。这些关于人民抗争与民主恢复的故事，已成为我们频道的经典叙事。

近期阿根廷前总统、现任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遇刺未遂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当地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和迅速反应，而 teleSUR 对事件的实时报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转向另一场持续冲突：欧洲战事几乎占据了我们今日所有讨论。我们在基辅和顿巴斯各派驻团队，令人痛心的是，顿巴斯的一名记者在报道中受伤。在冲突双方维持团队驻守，使我们能呈现更细腻复杂的真实图景。媒体战争的核心策略之一是将一切描绘成非黑即白——恰似我此刻身着的衣衫。但现实远非如此简单。我们都深知生活充满色彩。要传递这种丰富性，需要复杂的视角，而非媒体战争中常见的非黑即白叙事。

另一种手段是隐瞒真相。此次事件中令我震撼的是新闻如何掩盖现实——乌克兰士兵曾直播俄军士兵母亲被迫目睹儿子遇害的场景。西方媒体对此类悲剧事件基本保持沉默，但这些事件实则是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引发的信息爆炸中，某些画面始终未被看见。它们未能引发广泛关注，因为媒体往往聚焦热点地区，而热点

终将冷却并淡出视野。正因如此，公众对当下欧洲战争的认知远不及冲突初起时那般充分。众所周知，这场战争早在数年前便已埋下伏笔。

尽管欧洲主导着全球信息流，但约瑟普·博雷利已承认欧洲在舆论战中处于下风。原因何在？这正是我们的机遇所在。也正因如此，我们坚持实地现场报道。民众对西方媒体公司的信任正在消退，他们日益持怀疑态度，并越来越多地转向替代性信息来源。

冲突爆发时，teleSUR 英语频道的欧洲用户量激增。原因何在？因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遭封禁，观众无法获取其内容。人们转向我们寻求另一视角。这证明即便在西方主流媒体持续主导的局面下，真实机遇依然存在。

现在转向拉丁美洲最新动态：又一位总统遭遇政变。此次政变中，立法程序被粉饰，生命惨遭夺去。若没有 teleSUR 等替代媒体，这些死亡事件可能永远不会被报道。这正是我们证明自身价值之处：每个媒体平台都在放大其他平台的影响力。

"事发厄瓜多尔。"罢工期间，这是厄瓜多尔民众街头传递的信息。政府贪腐、媒体欺诈、警察杀戮、足球凝聚力、开放机遇——这些都是我们报道的主题。我们曾报道卡塔尔世界杯。为何提及此事？我深知时间有限。但卡塔尔世界杯为我们提供了与东加勒比国家合作的独特契机。这使我们得以探索推动增长的新途径，并扩大内容覆盖范围。我们制作的节目在巴西工人电视台 TVT 播出，并通过 teleSUR 信号分发。虽然原版语言是葡萄牙语，但我们将其翻译成西班牙语并在西班牙语频道播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还设有葡萄牙语新闻主播。因此，即使没有专门的葡萄牙语频道，teleSUR 依然在用葡萄牙语发声。

当然，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许多替代媒体共同的困境：如何自主设定议程而非盲目追随西方媒体的叙事？如何与本地及全球媒体、社会政治文化力量协作，共同创造具有深层意义的内容？

这张示意图为我们提供了制作所谓"液态内容"的实用模型——这类内容既忠于我们坚信的故事内核，又能实现跨平台传播。我们正组建政治预警媒体联盟以推进反霸权议程。这包括为记者和内容创作者提供专业培训——因为本地区多数高校未能培养记者从多元视角审视现实的能力。正因如此，teleSUR 承担起培训职能，致力于促进经验共享、内容交流与共同创作，我们认为这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观众或许对这张图片有所印象。数年前我们曾与中国一家西班牙语频道合作推出文化节目，实现双频道同步播出。我们还与 RT 西班牙语频道联合推出《瞄准镜》专栏，与伊朗 PressTV 旗下西班牙语频道 HispanTV 共同制作能源专题节目，并与黎巴嫩 Al Mayadeen 电视台合作推出《真相》栏目。

最近，我们与金砖国家电视台签署了重要协议。如今，来自 teleSUR 电视台频道、网站、Instagram 账号及其他社交媒体账号的内容均被翻译成俄语和葡萄牙语，并在金砖国家电视台网络中传播，极大拓展了我们的影响力。通过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公共广播机构建立联盟，我们实现了内容在成员国网站间的共享与分发。这助力 teleSUR 成为覆盖整个地区的国家级媒体品牌。每当区域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都会关注 teleSUR——这正是我们十八年来积累的影响力。非常感谢。

1.3.3 制造混乱：从社交媒体到政治

- 发言人：妮娜·菲德尔斯
- 年份：2023

下午好。本次研讨会将以葡萄牙语开场。感谢各位译员使这一环节成为可能。能以巴西传统仪式"神秘仪式"开启下午的会议，我深感荣幸与欣喜——这个充满文化意蕴的时刻承载着特殊意义。正如我们通过各种讨论过程所见，这种"神秘仪式"不仅彰显了文化在革命时期的关键作用，更凸显了传播的力量——尤其是广播这种媒介，它至今仍在巴西和拉丁美洲地区具有深远影响力。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盛情邀请，并向全体筹备团队的辛勤付出致以敬意。他们精心打造如此高水准的论坛，为我们提供深入探讨的机会，其价值不言而喻。在探讨政治进程时，我们应当将传播置于核心位置。毕竟我们所关切的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权问题，这正是构建并维系植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基石。

能与诸位分享巴西，特别是真实巴西媒体集团在传播领域的一些见解、经验与反思，既是殊荣亦是重任。我们立足更广阔的视野：直面社交媒体带来的挑战，审视传统与数字媒体框架对巴西政治的影响。

我确信，在当前混合战争背景下进行新闻实践与反思面临重大挑战。全球许多地区正遭受不同强度的混合战争，其激烈程度往往与这些地区被认定的威胁等级相关。我们目睹着政治动荡、民主受威胁、民主制度遭侵蚀，以及被仇恨、暴力和普遍政治厌弃情绪煽动的舆论。这种负面氛围往往将所有政治行为都视为可责。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找到克服政治厌弃、恢复民众政治能动性、赋予他们改变力量的途径。

传播活动历来借助各类工具谋求话语霸权。然而随着社交网络和现代传播技术的兴起，这些手段在形式和规模上均已进化，甚至具备操纵公众情绪的能力。我今日旨在阐明这些手段在巴西具体语境中的运作机制。为使阐述更清晰，我将概述巴西当时的局势。

正是这起事件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当选铺平了道路。始于2013年，一小群要求免费公共交通的活动人士走上国家经济中心圣保罗的街头，抗议不断上涨的交通票价。

警方随后采取的镇压行动引发公愤，促使数百万巴西民众加入全国各城市的示威活动。右翼团体趁机渗透抗议队伍，混淆视听并借势推进自身议程。这场始于地方的运动迅速演变为席卷全国的动荡浪潮。右翼势力采用象征性姿态，并借用左翼相关的行动策略。

新的政治格局正在形成，暴露了传统统治阶层长期奉行的治理方式所面临的危机。我认为此次示威有两大关键特征：首先，民众普遍排斥巴西左翼及其传统议程。工党政府曾推行平权政策，例如向低收入家庭发放现金补助的"家庭援助计划"，以及大学招生中的种族配额制度。这些政策至关重要，甚至可视为对历史不公的必要纠正，却遭遇强烈反弹。第二要素是对性别与种族议程的抵制，主要源于伦理与宗教信念。

这两股力量的交汇促成了右翼团体的凝聚。保守派与经济自由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助推了极右翼言论的抬头。随着这种意识形态获得支持，连巴西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最大的左翼政党——工党也遭受了更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传统右翼阵营的部分力量也显著削弱。整个政治棋局正在重构，棋子随之开始移动。

2014年，迪尔玛·罗塞夫在充满危机与动荡的选举中赢得连任。民调显示，她2013年3月的支持率曾创下79%的历史峰值，却在同年6月大规模示威后骤降至31%。至2015年8月，即连任近一年后，其支持率已跌至8%。危机持续升级，最终在2016年演变为政变。这场危机不仅是政治性的，更具有深刻的经济属性，其爆发恰逢迪尔玛被暂停总统职务之际。

此后两年间，公共政策遭彻底瓦解。工党多年构建的组织网络、制度体系全面崩塌，前总统卢拉更成为无休止政治迫害的靶子。那么卢拉入狱与政变的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答案是司法机构、议会和企业媒体。三者均在事件中推波助澜，扮演了关键角色。

2018年，卢拉先生在所谓“洗车行动”中被捕。这堪称法律战的教科书案例——即统治阶级战略性利用法律体系清除政治对手。该案充斥着法律荒谬之处，引发全球关注。

塞尔吉奥·莫罗法官最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司法操纵。记住这个名字。正是莫罗以反腐运动为幌子，主持了对卢拉公然偏颇的审判。

他与美国国务院及联邦调查局关系密切。莫罗法官曾与巴西联邦警察及司法系统其他成员共同参与由美国机构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例如旨在加强双边执法合作并提供反恐培训的“桥梁计划”。在签发卢拉逮捕令时，莫罗奉行典型的美国策略：大规模司法违规与任意运用法律，以实现对政府官员的广泛定罪并严重扭曲法律体系。

然而此类干预并非新鲜事。纵观拉丁美洲历史，美国政府屡屡支持威权政权。

卢拉入狱后，巴西便陷入持续动荡。正是这种不稳定氛围为博索纳罗2018年以“巴西至上，上帝至高”为口号赢得总统选举铺平道路。这句标语成为极右翼巴西愿景的象征，也体现了极右翼对上帝的诠释。该政府执政期间，反对党、言论自由、宗教多元性及抗议活动均遭打压。多元主义遭到排斥，暴力、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日益吞噬这个国家。

博索纳罗所代表的价值观并非新鲜事物。这位从政27年的政客早已因煽动性言论臭名昭著。在其四年任期内，他公然轻视科学权威、拒绝疫苗接种，甚至公开支持酷刑及清除政治对手。新冠疫情期间巴西逾70万人丧生，博索纳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还记得莫罗法官吗？博索纳罗后来任命他为司法部长。

短短四十分钟远不足以详尽阐述巴西因博索纳罗鲁莽政策所承受的一切。但必须认清：当有人企图操纵或扭转国家政治航向时，制造不信任与动荡环境往往是常用策略——正因这种土壤最易滋生虚假信息。

今日王暉教授关于五种垄断的演讲，为解读这些动态提供了宝贵视角。

博索纳罗当选及其后果

巴西实行强制投票制。2018 年大选中，1.47 亿合格选民中有 1.16 亿参与投票。博索纳罗以超过 55% 的有效票数获胜，意味着约 5700 万巴西人投给了他。如此候选人如何赢得如此广泛的支持？

博尔索纳罗竞选团队通过自动化传播含有虚假信息的病毒式信息，成功助其入主总统府。巴西媒体的调查报道揭露了该计划的部分细节，曝光了参与行动的庞大私营企业网络。这些实体主要通过 WhatsApp 等平台，资助针对工党的大规模虚假信息传播活动。2018 年大选期间与虚假信息传播相关的合同金额超过 500 万美元。这些行为损害了选举过程的公正性，操纵了公众舆论，对民主制度造成破坏，属于非法行为。

然而本质上，信息要真正引发共鸣，关键在于情感操控。若信息无法吸引注意力，后续传播便徒劳无功。这不仅是结构性问题，更是传播方式的命题。事实上，情感操控既非新策略，亦非社交媒体独有。纵观历史，几乎所有成功的重大战争不都是通过巧妙操纵公众情绪来获取正当性吗？无论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核武器的威胁、自由的丧失还是私有财产的流失，这些叙事手法早已被用于为行动辩护。

文化产业始终致力于操纵公众舆论。1974 年纪录片《心灵与意志》便是典型例证，该片剖析越南战争，揭露美国政府及政治人物如何运用操纵手段塑造公众认知。任何可能损害战争形象或质疑其正当性的信息均遭压制，而越南人则被刻画成残暴不屈的敌人——这一切皆为煽动爱国主义情绪。这种做法在文化产业中始终如一：系统性地妖魔化共产主义者、俄罗斯人、越南人、巴勒斯坦人、美洲原住民、中国人等群体。妖魔化的对象并非基于原则，而是取决于谁的利益需要服务。

巴西民众的恐惧显而易见。2018 年大选期间，大量虚假新闻泛滥传播，其中许多荒谬至极难以言表，但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

意大利作家朱利亚诺·达·恩波利在其著作《混乱工程师》中，剖析了社交网络现象及技术如何放大政治营销效应。作者通过特朗普 2016 年总统竞选、英国脱欧公投等案例研究，揭示心理学、技术与传播的融合如何左右公众舆论、动摇民主根基并操纵选民意图。

从心理角度出发，作者阐释了社交网络情感操控的本质——这种技术旨在挖掘并引导集体情绪。通过向用户推送引发强烈情绪（如愤怒、恐惧、悲伤与喜悦）的信息、图像及视频，政治操盘者能将个体转化为统一的非政治性群体。

达·恩波利进一步强调，此类技术不仅通过社交网络操纵公众情绪，更实现了海量用户数据（包括兴趣、偏好、行为及情感）的收集与分析。他将相关技术称为“混乱工程师”，其能定制高度个性化的信息以引发个体强烈共鸣。由此，各大科技平台构建的生态系统直接参与了扭曲选举结果、操纵多国选民情绪的进程。

社交网络传播的虚假新闻在此过程中同样扮演关键角色——恐惧与仇恨往往通过谎言滋生。印第安纳大学研究显示，虚假报道的传播概率比真实报道高出 70%。本质上，这些“混乱工程师”正是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来激化舆论对立。

仇恨循环

在博索纳罗执政期间，恐惧逐渐转化为仇恨，这种情绪早已超越社交媒体的疆界。出于多重原因，煽动性言论渗透公共生活，暴力成为日常现实。

巴西陆军数据显示，博索纳罗政府四年任期内向枪支收藏者和猎人发放了逾 90 万份枪支登记许可证，日均 691 份。这种暴力常态化导致新受害者每日涌现。选举期间局势尤为严峻，政治暴力事件持续激增。这些现象背后存在明确的利益驱动：枪支自由持有权反过来为军工产业创造了巨额利润。

在输掉普选后，博索纳罗退居幕后并前往美国。他拒绝承认败选并持续抹黑巴西选举制度的行为，为后续事件埋下伏笔。其支持者在多个省会城市获得影响力，与军事警察及部分主流媒体勾结。1月8日，大批暴徒冲进国会大厦——这个民主制度与人民意志的最高象征。这场事件如同 2021 年美国国会山袭击事件的阴郁回响，几乎具有世界末日般的荒诞感，成为巴西历史性的耻辱。

我们还目睹了针对公立学校的暴力袭击浪潮。二月间，巴西各地公立学校接连遭遇威胁与袭击，造成悲剧性伤亡。午餐后提及此事令人不适，但必须直面现实。其中两起事件尤为骇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

一起是男子闯入托儿所杀害四名幼童；另一起是学生持刀刺死七十多岁的教师。为何提及这些惨案？正是为了强调：在社交媒体的喧嚣背后，存在着真实的危机。

为此，司法部在部长领导下启动“校园安全行动”。短短十日内，近 300 名涉案人员被捕。该部正调查全国 1224 起威胁事件，并传唤 694 名青少年接受问询。

鉴于暴力事件可能升级，媒体迅速达成共识，不披露施暴者身份及影像。调查发现，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软件上的封闭群组正散布虚假信息煽动恐慌，导致多所学校停课，家长们不敢送孩子上学。

官方调查显示，部分人在社交媒体发帖时提及博索纳罗甚至新纳粹思想，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近年来在巴西日益根深蒂固。人类学家阿德里安娜·迪亚斯在其研究《观察仇恨》中，揭示了全球新纳粹网络与巴西右翼运动间的惊人相似性。

迪亚斯以深入调查和成功渗透国内新纳粹组织而闻名。例如 2021 年，她通过多方搜查新纳粹网站，发现了博尔索纳罗 2004 年签署的信件——该证据揭示了博尔索纳罗主义与新纳粹意识形态推广之间的关联。

她的研究绘制了巴西境内约 530 个新纳粹极端主义据点，涉及约 1 万人。这些据点数量从 2019 年 1 月到 2021 年 5 月激增 270.6%，增幅令人震惊。她同时强调，这些据点曾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如今已蔓延至全国。

在巴西，科技巨头也因助长暴力、博尔索纳罗主义、极右翼极端主义及新纳粹思想的传播网络而面临问责。

司法部长弗拉维奥·迪诺要求推特对煽动校园袭击的内容采取更严厉措施，并删除所有传播暴力内容的账号。尽管推特最初试图推卸责任，但弗拉维奥升级了措辞，威胁将暂停该平台在巴西的运营。这种压力最终迫使推特删除了数百个涉及虐待儿童和青少年的账号。

然而局势仍未平息。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旨在规范社交媒体平台的法案——这项极具争议的议题迄今阻碍了立法进程。该法案核心在于追究平台对煽动暴力及仇恨言论内容的法律责任。卢拉总统直言：科技巨头已“将荒谬之事正常化”，掌控社交媒体的企业正通过传播虚假新闻、仇恨言论及武器推广牟利。

拥有 Instagram、Facebook 和 WhatsApp 的母公司 Meta 立即表态反对该法案，称其违背巴西现行法律。谷歌也加入批评行列，在其网页底部添加横幅声明：“虚假新闻法案可能使巴西民众更难辨别真伪。”这些企业竟发表此类声明，何其讽刺？

除公开表态外，这些平台还可限制支持该法案内容的曝光度。在科技巨头施压及博索纳罗盟友游说下，该法案在巴西推进遭遇重大阻碍。其论调始终如一：监管社交媒体等同于审查制度，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威权手段。

显然，极右翼势力不愿放弃助其壮大并维持影响力的传播环境。今年发布的研究显示，在 2022 年选举周期中，极右翼内容不仅传播效果更显著，传播效率也更高。多平台帖文分析显示，右翼内容不仅发布量更高，互动量也远超左翼帖文。尽管某些平台左翼帖文数量更多，但其互动量比右翼内容低 40%。

在此我要强调一个关键点：尽管巴西政府为博索纳罗连任倾尽全力——动用策略、国家机构、警察、军队及各类体制资源——仍无法阻挡卢拉总统的胜利。这场胜利属于巴西人民，它有力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借此机会，我愿发表简短声明：在 9 月至 10 月总统选举期间，《真实巴西》的内容在官网及所有发布平台上的阅读量和分享量累计突破 1.5 亿次。我们正逐步站稳脚跟。

但卢拉总统第三任期仍面临重大挑战，尤其在优质国家内容传播领域。

我们的传播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传播方式如何？我们真正创造了什么？纵观历史，人类发展出多种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方式。这些方式积极塑造着社会，这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我们投入的时间和消费信息的方式，直接影响着媒体公司生产内容的方式，进而影响我们吸收和创造的信息类型。

当今世界人口已突破 80 亿大关。其中，手机用户达 84.6 亿，活跃社交媒体用户达 47.6 亿。在社交网络活跃度位列全球第三的巴西，约 2.1 亿人口中有 1.52 亿是活跃互联网用户。最受欢迎的平台是 YouTube，渗透率高达 96%，其次是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作为左翼媒体领袖，我常自问：我们该传播何种内容来对抗仇恨叙事与政治排斥？如何建立广泛基础以识别并批判霸权行为？我的政治与职业生涯始于乡村工人组织。对我而言，传播始终是社会变革的强力催化剂。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庞大的传播渠道、平台及社交网络生态系统，绝大部分被敌对势力掌控。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挠我们触达广大受众。尽管我们并非完全依赖这些平台，但亟需制定战略摆脱数字依赖。唯有当下创新突破，方能为未来构建自主传播体系铺平道路。

传统左翼媒体受众多为男性，且普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高、政治立场坚定。而《巴西事实报》成功打破这一模式，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读者。这种拓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社交媒体战略——通过精准运营吸引平台用户，引导他们访问我们的网站。最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网站流量中相当大比例属于自然流量和直接访问。这证明我们的传播影响力并非完全依赖社交平台。

我们深知全球对巴西的认知主要受主流媒体叙事塑造。正因如此，我们主动将部分报道翻译成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些英文报道正触达那些仅通过主流媒体了解巴西的受众。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超越国界，分享更完整的世界抗争故事。

于我而言，这正是触达新受众、在更广阔层面放大反霸权叙事的宝贵契机。但成功绝非数字可衡量，内容的政治影响力才是核心价值。评估政治效益固然重要，却也远比数据统计艰难得多。

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在此如此复杂的现实中，任何单一视角都难以指明前进方向——这一点我始终深信不疑。但我确信一点：阶级斗争永远是我们真正的指南针。正如巴西作家保罗·莱明斯基所言：“阶级斗争中的每件武器——无论是石头、黑夜还是诗句——都是好武器。”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工具远不止于信息获取。艺术、文化和精神力量同样是克服深层挑战的关键工具，它们对深化我们的主体性与意识至关重要。

尽管我对某些经典新闻理论持批判态度，但在思考左翼传播时并未全盘否定它们。我认为新闻方法能引导我们接近事实、建立公信力、为不同声音留出空间、激发有意义的讨论，并最终形成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方案。

话虽如此，我们必须认清极右翼的策略及其操纵公众情绪的手段。尽管这些策略看似强大，我们既不可效仿，更不可在斗争中认输。我们绝不应采纳此类手段。相反，植根于真理与集体意识的革命性传播文化，才是持久胜利的可能与必要条件。

我衷心希望这能让整个巴西左翼认识到：传播在阶级斗争中必须发挥关键核心作用。这关乎塑造社会政治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强化集体主体性。这需要深刻反思：形式与内容同等重要。这意味着要加强那些致力于捍卫人民利益的媒体渠道。

我们必须承认经典理论奠定的基础。它强调了媒体的至关重要性——从国家和党的媒体到基层大众媒体——并汲取了世界各地革命性传播实践的经验。我们汲取列宁《火星报》、马克思《莱茵报》、古巴《格拉玛报》的养分，受葛兰西、罗莎·卢森堡、柯伦泰思想的滋养，承袭中国共产党经验，并从中国二十年代革命斗争中诞生的刊物中获得启迪。

然而意识形态革新既是根本需求，更是当务之急。在当前环境下，我们必须发展出适应 21 世纪的政治传播实践，并通过社交网络实现这一目标。我深知我们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但每日都在重申我们的信念：良知胜于操纵，真理胜于谎言，集体建设胜于混乱，知识胜于无知，希望胜于恐惧。

这是一场持久战而非速效方案，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持续的精进、辩证的分析和广泛的实践。尽管背景与处境各异，我仍期盼我们能更频繁地汇聚一堂，共享经验，共同迈向这一目标。这不仅关乎内容分享或受众拓展——仅此远远不够。诸多

技术策略承诺提升社交媒体影响力，却常使内容沦为空洞的标榜，缺乏深度剖析。此类做法远未达到优质新闻的标准。

我们需要立足长期发展、协作努力和政治清醒来实现目标。必须明确我们构建的是何种传播体系，追求的是什么目标。我们的使命无疑充满挑战且需要持久耕耘，但目标绝非一时之功——它们必须铸就为打破思想垄断的文化基石。唯愿诸位与我并肩奋战。

谢谢。

1.3.4 古巴：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挑战与构建新的传播与信息秩序的必要性

- 发言人：兰迪·阿隆索·法尔孔
- 年份：2025

技术在历史上对传播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进行了实质性改变：印刷术、广播、电影、电视。但自互联网兴起以来，从万维网、数字社交网络、大数据到如今的人工智能发展，技术从未产生过如此颠覆性、全面性与全球性的影响。

技术不仅改变了媒介形态，更彻底颠覆了人类获取信息与互动交流的方式。拉丁美洲著名传播理论家赫苏斯·马丁·巴贝罗指出：“技术改变了符号的创造、传播与消费方式，进而影响着文化与身份认同。”

“技术并非中立的，”巴贝罗强调，“如今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为经济政治利益与社会中介、符号冲突交织的凝结点。正因如此，它们构成了塑造公共舆论的新模式与公民身份的新形态，即政治话语与实践的新环境。”

当下这个充满困惑与多重不确定性的时代，正是最佳例证：以唐纳德·特朗普为首的寡头政治势力入主白宫，科技巨头公司的亿万富豪们已然占据权力核心。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可见一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近期为白宫主人举办的盛宴亦是如此。

正如西班牙学者弗朗西斯科·塞拉·卡瓦列罗和安东尼奥·马约所言，我们正目睹“一种新型帝国主义的兴起，其根基不再是领土扩张，而是信息控制、话语操控以及技术寡头垄断”。

有人如希腊前财政部长扬尼斯·瓦鲁法基斯将其称为“技术封建主义”，我更倾向于称之为“技术法西斯主义”——因其危险地宣扬极右翼、排外主义和排他性言论，共同维护帝国权力及其科技巨头。

古巴抗争操纵、仇恨与封锁的斗争

“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正航行在风暴之海（...）这正是古巴记者面临的挑战。”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在2010年7月2日致古巴新闻从业者的信中如是说。

仇恨与谎言如同预设的算法，借助数字社交网络和全球主流传播渠道，以惊人速度影响着当代传播进程，触达海量受众。

但对古巴而言，这并非新鲜事。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美国及其强大的媒体和舆论构建机器就不断利用谎言和仇恨来攻击古巴的社会进程。

正如墨西哥哲学家、传播理论家费尔南多·布恩·阿巴德所言：“帝国主义对古巴发动了当代符号统治手段中最持久、最系统、最复杂的认知战争。这场战争不仅针对一个领土、一个政府，更是针对人类思想发展历史可能性的战争。”

六十余年来，美国帝国主义对古巴动用了所有工具、手段和语言进行诱惑、操纵和支配。这并非思想辩论，而是旨在“用有毒信息饱和古巴人的意识，直至消解其批判能力”。

因此，从昔日的传统媒体到如今的数字公共空间和所谓“社交网络”，无数反古巴运动层出不穷：首先妖魔化了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罪犯的审判——这些罪犯在上世纪50年代杀害了数千名古巴人；随后歪曲了对美国企业的合法公正国有化（这些企业曾肆意掌控着古巴大部分经济命脉）；散布古巴是苏联顺从附庸的形象；歪曲古巴国际主义者在非洲的团结援助行动（该行动维护了安哥拉独立，助力纳米比亚解放与独立，并协助推翻南非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粗暴操弄人权议题，并反复宣扬古巴革命与社会主义即将覆灭。

美国主流印刷媒体、迈阿密地方报刊、佛罗里达州及中美洲的通讯社和短波电台，在革命初期几十年里，几乎每天都在充当反古巴宣传的主要载体。

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从罗纳德·里根总统时期开始——伴随着持续的军事威胁和经济、贸易及金融封锁的加剧，加之帝国主义者寄望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将自动导致古巴社会主义的终结——美国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先是资助一家政府广播电台，十年后又资助一家专门针对古巴的电视台，两者都狡猾地冠以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之名。

1985年至2025年间，美国从预算中拨出逾9亿美元维持失败的“马蒂广播电视台”项目，而古巴以极低成本成功屏蔽了其信号。这是美国历史上耗资最多、腐败最严重、失败最彻底的传播项目。

2019年，美国国会指定专家小组的审计报告认定，这些反古媒体既制造“劣质新闻”，又传播“无效宣传”。

尽管乔治·H·W·布什1992年签署的《托里切利法案》禁止古巴通过卫星以外的其他方式接入互联网（尽管环绕古巴群岛的海底通信电缆众多），但该法案明确指出，这种有限的连接最终目的是“推动古巴政治变革”。

因此，当古巴在1996年只能以低于当今普通家庭网速的水平接入互联网时，克林顿政府便开始策划针对古巴的数字媒体项目，小布什政府随后继续鼓励并资助这些项目。

但真正将数字空间明确定位为两国政治体系间象征性与文化性斗争主战场的是奥巴马政府——因为年轻人聚集于此，新的信息交流渠道在此形成，美国资助及私营资本控制的媒体在此无序扩张，而公共媒体体系正日益衰弱。

美国学者特德·亨肯直言不讳地指出，对美国政府而言“网络是更大规模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作为针对古巴战略的实地执行者之一，他阐明该战略围绕两个紧密关联的变量展开：“信息自由流动”（即美国自由传播所有符合其“古巴政权更迭”政治目标的符号化产品）和“电信服务与技术接入”（为古巴数字公共空间提供便利符号化表达流动的物理与逻辑基础设施）。

针对古巴的新版"华盛顿共识"，将美国国会每年批准用于干涉和颠覆活动的数亿美元资金，大部分转向了数字公共空间的具体项目。这催生了一个资金雄厚、覆盖广泛的数字媒体网络，从迈阿密、马德里、拉丁美洲城市乃至古巴本土运作，如同布恩·阿瓦德所言，成为部署"认知扭曲、感知操控与情感殖民"全套武器的"污泥机器"。



在特朗普首任政府时期（2017-2021），当古巴开放移动数据连接、覆盖率超过60%人口之际，这种传播与象征性影响策略通过数字社交网络强势扩张，其算法助长了虚假新闻、信息误导、操纵舆论及仇恨言论的蔓延。

如今特朗普以更具寡头政治色彩和法西斯倾向的姿态重返白宫，这场"翻拍剧"中反古巴的传播策略进一步深化，并与佛罗里达州籍古巴裔政治家、现任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倡导并执行的"对古巴极限施压政策"紧密相连。

尽管特朗普支持埃隆·马斯克因美国全球媒体署（下属马蒂广播电视台）效率低下且腐败而停止对其资助的决定，并切断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流向其他反古媒体的资金，但马可·卢比奥成功说服特朗普恢复对部分媒体的资助，这些媒体对本届政府对古巴战略更为有用。

就在几周前，即 9 月 25 日，美国政府宣布增加用于传播虚假信息的资金，批准额外拨款 4 亿美元用于相关活动，其中包括对抗"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的马克思主义和反美政权"。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阻止古巴接入美国公司的海底光缆。2022 年 11 月，美国司法部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拒绝批准在两国间铺设首条海底电信电缆的许可。ARCOS-1 USA Inc. 海底电缆系统因此无法将古巴纳入其网络，该网络连接美洲大陆 15 个国家的 24 个登陆点。

由于无法与位于美国本土的主要互联节点运营商直接互联，古巴电信公司被迫通过英国、牙买加和委内瑞拉的节点扩展网络，导致支出高达数百万美元。

美国还持续对古巴实施数百种软件、应用程序、科技成果、专业期刊及电信设备的禁运。

真相与理念，但远远不够

在当今蒙昧主义和深度伪造技术盛行的时代，古巴革命最早的传播攻势具有象征意义——早在 1959 年 1 月 21 日至 22 日，该行动就被命名为"真相行动"；当时，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 多名记者，阐明对巴蒂斯塔罪犯提起刑事诉讼的正当性——该独裁政权曾受美国政府资助和支持——并坚定阐述新生的革命进程所秉持的原则。

正是那些日子催生了创建革命首批国际媒体的构想：拉美通讯社和古巴哈瓦那短波广播电台。这两家媒体为打破对古巴的信息封锁作出了贡献。

拉美通讯社由阿根廷革命家、记者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领导，他是切·格瓦拉的挚友和追随者。在创办通讯社的过程中，他明确阐述了行动准则："我们客观但不公正。我们认为保持中立是懦弱的表现，因为在善与恶之间不可能保持中立。"

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万维网的兴起，打破了受众的国界壁垒，拓展了媒体的影响范围。古巴较晚进入这个新的传播领域，且网络连接远逊于其他国家。

1996 年中旬，拉丁美洲通讯社、古巴哈瓦那广播电台和《格拉玛报》成为首批登陆网络的古巴媒体。当时，这些媒体的数字版本需要通过软盘运送到哈瓦那国会大厦的科学、技术和环境部自动化交换中心，再通过卫星以仅 64kb/s 的网速上传至网络——这在当今时代简直是种折磨。

1998 年，古巴首个网络数字杂志《Cubahora》诞生；2001 年，首份数字文化杂志《La Jiribilla》问世。

当时，古巴仅有 3625 台计算机能完全接入互联网，电子邮箱账户总数略超 3.5 万个。

2003 年，在针对古巴的激烈媒体攻势中，面对小布什将战争推向"世界 60 个或更多黑暗角落"的威胁，以及迈阿密示威者高呼"先伊拉克，后古巴"的口号，

Cubadebate 作为本土数字媒体应运而生，旨在对抗"媒体恐怖主义"并揭露反古运动。自那时起，我有幸领导这个数字门户网站长达 22 年。

2009 年，当古巴互联网普及率尚不足 10% 时，《古巴辩论》率先实现 Web 2.0 互动化，并于同年 6 月成为首个全面进驻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等社交平台的古巴媒体。

这体现了超越技术障碍（当时古巴仅能通过卫星连接）向世界传递古巴声音的清晰战略。正如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在 2010 年 11 月 12 日《 》报上所言："必须找到触达知情大众的途径。报纸并非解决方案……互联网更具可及性。"

基于这一逻辑，菲德尔在退出政府活动后，自 2008 年起开始在 **Cubadebate 网站** 首发新闻文章。当时该网站已是古巴数字公共空间中最具影响力、访问量最高的媒体平台。

如今 Cubadebate 已发展为多媒体出版平台，拥有 6 个主题数字刊物，覆盖多个社交网络，推出自有移动应用程序，制作大量音频、视频、图片及图表内容，其主网站月均吸引逾 23 万条读者评论及数百万次访问量。

值得一提的是，2025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中国成为仅次于古巴的第二大 Cubadebate 访问来源国，这在该媒体 22 年历史中尚属首次。

这可能得益于我们与《人民日报》合作推出的西班牙语和中文双语周刊专栏。

这是一项合作项目，我们还与 teleSUR（委内瑞拉）、Sputnik（俄罗斯）、Nodal（阿根廷）开展合作，并将与巴西的 Fato 电视台启动合作。

Cubadebate 是古巴前沿传播与创新机构 IDEAS 多媒体组织的核心栏目。

IDEAS 多媒体还拥有专门研究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与著作的百科全书《菲德尔——思想战士》（），以及 3 档电视节目（包括《圆桌会议》——该节目作为古巴电视领域领先的资讯与评论平台已播出 25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曾 45 次参与节目，现任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也经常参与），28 个 Facebook 页面，9 个 X 平台账号，9 个 Telegram 频道，6 个 YouTube 频道，5 个 Instagram 账号，2 个 Whatsapp 频道和 1 个 TikTok 账号；同时为第三方提供传播服务。

如今，本机构正引领古巴公共媒体系统的编辑、技术和经济转型进程，旨在克服古巴新闻界当前面临的严峻财政、后勤、技术和人力资源短缺问题。

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于媒体互动性、编辑领导力及持续创新能力，尽管当前古巴互联网接入速度仍低于时代水平，但网络覆盖率正持续提升。本世纪初仅 0.5% 的古巴人接入互联网，如今这一比例已突破 70%，主要依托移动数据服务。

古巴互联网用户数量

年份	用户数	渗透率
----	-----	-----

2000	60,162	0.5%
2005	1,096,608	9.7%
2010	1,797,993	15.9%
2015	3,553,543	31.2%
2020	7,100,000	63%
2025	7,810,000	71.3%

互联网实时统计与 We are Social 数据

2018 年 12 月 6 日，古巴开始提供移动互联网接入服务。目前全国仅 50% 的地区覆盖 4G 网络。

在这种多数人能够联网、受众被主流传播实践渗透、并持续受到针对古巴的操纵和符号构建运动影响的背景下，古巴的媒体和传播体系面临着重大挑战。

仅仅掌握真相和新闻已远远不够：必须学会快速、精准地通过多渠道、多种形式向不同受众传播信息，同时抵御不利算法和操纵性情绪的影响。

我们面临的困境在于：古巴既不具备中国那样的千年文化积淀，也没有支撑庞大内需市场的关键人口规模，既无独立语言体系，也缺乏快速开发专属数字平台的充足财力——尽管国家正在特定领域推进自主建设。

我们的选择在于创造更多更优质的内容，持续培养这些知识领域的专业人才，利用相关技术并将其服务于我们的目标，推广数字知识与文化，使大多数民众能够识破渗透于数字世界的操纵与谎言。

古巴的革命与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以传播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传播用于传递信息、开展教育、凝聚力量、倾听民意、促进参与。传播旨在唤醒人类更高层次的觉悟，推动建设繁荣昌盛、社会正义高度发达的社会。

算法统治：从社交网络到人工智能

我们正经历着传播领域的新一轮颠覆性变革。我们正从一个由数字社交网络算法主导的时代——尽管素未谋面，却能跨越千山万水实现互联——迈向一个由人工智能加速发展主导的新纪元。

在当今世界盛行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中，美国帝国主义为维持衰落的霸权而加剧了霸权争夺战，媒体和数字社交网络正充当着政治力量和作战武器的角色。它们被巧妙地用于在冲突局势中进行挑衅、煽动和软化。

我们必须铭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 2003 年 3 月为入侵伊拉克辩护时所扮演的角色。媒体和社交网络在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中的作用，以色列为操纵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所做的一切，以及它们现在在华盛顿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发动的疯狂全面进攻中所扮演的角色：编造场景、制造不确定性、煽动仇恨、试图瓦解对手的士气、煽动暴力。

五角大楼《非传统战争手册》 定义了一系列升级行动，旨在摧毁敌人的精神意志，迫使其投降，或促成军事行动以武力击败敌人。其中按顺序规定：

通过宣传及政治心理手段制造广泛不满氛围，诋毁政府公信力。

煽动民众，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号召民族事业），使民众对现有体制产生不信任。

强化宣传力度，加强民众心理准备。

在当今时代，数字社交网络在该战略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渗透率极高（截至 2025 年初，全球社交网络注册用户超过 52.4 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63.9%），算法易于操控，美国在该领域近乎绝对的统治地位，以及大型科技公司在帝国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如果说在数字化时代之前，少数几家新闻机构、电视台和大型报纸由少数几家公司掌控，主导着信息流，那么如今这种信息集中和垄断已缩减为少数几家主导技术、通信、娱乐和广告的公司： Meta（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Alphabet（谷歌）、亚马逊、微软、英伟达、苹果和特斯拉，被称为"七大巨头"。

正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报告中所指出的："Facebook (Meta) 和苹果等科技公司已成为各领域不可或缺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参与者，它们用自身决策和目标取代了新闻媒体的选择与宗旨。"

在这些科技巨头主导的数字社交网络迅猛发展过程中，它们充当着大型内容编辑的角色，决定哪些内容将优先展示给公众、哪些人将接触到这些内容，操纵算法使特定信息病毒式传播，并参与分配奖惩（形成一种令人尴尬的审查-自我审查游戏）。

大多数人深陷于此陷阱。正如 DataReportal 与 We Are Social 发布的《数字 2025/永恒互联》报告显示，即便人工智能崛起，数字社交网络和消息平台仍是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目的地，超过 97% 的联网成年人每月至少访问一个社交平台。

随着媒体地位的边缘化，信息质量已严重退化。虚假信息、操纵性内容、假新闻、阴谋论和仇恨言论在数字社交网络中泛滥成灾。谎言与争议、煽情与激情比真相与理性更能引发点赞和互动。

社交媒体加剧了舆论两极分化，助长了人们对政治、新闻媒体、机构和科学的怀疑态度。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数字环境研究学者艾米丽·贝尔指出："社交媒体不仅吞噬了新闻业，更吞噬了一切。它吞噬了政治竞选、银行体系、个人故事、娱乐产业、零售业，甚至政府和安全领域。"

美国前总统乔·拜登在离开白宫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对大型科技传播集团所获得的权力发出了发人深省的警告，称其为"科技寡头"。拜登指出："美国正形成一个拥有极端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寡头集团，威胁着我们的民主、基本权利和自由。"他还提到存在一个"超级富有的科技工业复合体"，可能对美国民众获得不受制约的权力。

我们还要补充一句：这种势力正在全球大部分地区蔓延。

以 Facebook 为例，它几乎已发展成一个拥有自身法律且无国界的虚拟国家。其超过 30 亿的活跃用户数量超过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人口总和，甚至超过了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的总和。

社交平台不仅是全球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更是收集数十亿用户喜好、偏好、观点、能力及情绪数据的源泉。

扎根于私营企业和大学的媒体实验室，正不懈地构建想象世界并制造"现实"。这是一场争夺感官主导权的持久战。他们运用心理测量学、神经科学工具，以及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惊人成果，借助日益增强的互联性触达更广泛受众，并通过精心设计的个性化信息进行受众细分——这些信息操纵着个体的感情与主观动机，形成一种宽带版的"分而治之"策略。

数十亿资金涌入这些智库中心，政治、选举和媒体运动正日益由其策划组织。与此同时，情报机构、军事体系及其网络军队，以及日益深植于帝国权力的电信巨头们也加入战局。

维基解密和前情报分析师爱德华·斯诺登的披露，充分证明了这些企业与美国特勤局和国务院的有机联系。

极端保守势力深谙社交媒体在重塑全球传播与对话格局中的作用，将其视为夺取并维系权力的必备工具。绝非偶然，种族灭绝者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十月初在纽约宣称："武器会随时间演变……如今最重要的武器是社交媒体"，并补充道："当前最关键的收购案是 TikTok……我期待它能达成，因为这可能具有深远意义。"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府擅长战略性调动和操纵信息空间，以支持其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犯罪军事行动。

但我们正迈入传播的新阶段。人工智能的崛起在政治、经济、传播和社会领域引发彻底颠覆。随着其到来，媒体作为原始信息源的重要性日渐式微，谷歌等大型搜索引擎开始失去霸权地位，维基百科这类百科全书几乎沦为数字博物馆的陈列品。

正如著名传播理论家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所言："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重大技术变革，正在颠覆我们已习惯的（无论好坏）主导传播模式——即社交媒体模式。"

人工智能在人类生活与发展的各个领域提供了非凡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严峻挑战：它以惊人速度将集体知识私有化，在客观性与算法黑箱的掩护下引入意识形态偏见，引发生态问题（过度消耗能源和水资源）、数据隐私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技术依赖以及伦理困境——例如取代人类劳动（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定义的人类生存基本条件）及其在致命武器和战争中的应用。

美国"七大巨头"已全面投入人工智能竞赛。它们不愿失去数字社交网络时代赋予的舒适垄断地位。据悉这些企业每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额高达 4000 亿美元。与此同时，拥有 8 亿用户的 Chat GPT 开发者 Open AI 今年与甲骨文、英伟达和 AMD 签署了价值 1000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确保获得超过 20 吉瓦（相当于 20 座核反应堆的能量）的计算能力来运行其人工智能模型。

而中国仅投入远低于上述金额的资金，便成功开发出 Deepseek 和 Doubao 等本土 AI 模型。

科技公司疯狂扩张的最初影响已然显现。亚马逊宣布裁员 1.4 万人以削减成本并投资人工智能。埃隆·马斯克于 10 月 28 日推出基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Grok 的 Grokipedia，作为维基百科的替代品。

量子人工智能的概念已然浮出水面，它将量子计算的超强算力和速度与人工智能的先进可能性相结合，能够在巨型数据库上应用算法，并在极短时间内提供更全面的答案。

知识生成、处理和消费领域正出现新的不平等鸿沟，这意味着国家与群体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信息传播与意义生产仍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将继续将信息商品化，并通过媒体控制知识获取渠道——决定谁能获取知识以及获取什么知识。

同一个世界：多元之声

面对当今时代掠夺性、反乌托邦、缺乏透明度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传播模式——作为权力空间、争端对象、重塑对象及霸权角逐场——亟需建立新的信息与传播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可借鉴爱尔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肖恩·麦克布赖德（Sean McBride）等人士的努力，以及深受爱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通讯社（Prensa Latina）创始人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关于 80 年代传播问题的全面反思。

这份题为《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精辟研究提出了实现独立与自主发展的传播政策，并为构建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确立了关键准则：

消除发达国家与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现象。

消除通信垄断造成的负面影响。

保障信息来源与传播渠道的多样性。

增强第三世界国家改善现状、完善设备和

尊重公民获取信息来源及积极参与传播过程的权利。

这些原则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能够改变当今传播领域中仍存在的霸权主义和操纵行为——这些行为旨在支撑和掩盖现存的经济社会矛盾。尽管需要对日益深化的现象采取更激进的应对措施，并更新过去 45 年间诞生的技术应用相关规范。

但《麦克布莱德报告》当时与如今的价值毋庸置疑。该报告发布后，罗纳德·里根政府决定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如唐纳德·特朗普在 2025 年所做的那样。

重温麦克布莱德本人的话：“目标始终如一：实现更公正、更平等、更互惠的信息交流；减少对传播渠道的依赖；降低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增强文化自主性与认同感；为全人类创造更多福祉。”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新的全球治理与安全体系以及新的信息通信秩序势在必行。

但若不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展开思想斗争，这些目标将难以实现。当权者绝不会轻易让步，更不会放弃其掌控世界舞台、主导意义生产机构以及施加文化与象征权力的特权。

全球南方国家应当在这场关键战役中团结一致。特别是金砖国家，应在信息通信领域建立更坚实的协作机制，以反霸权、包容和平的理念发声。我们必须推动该领域的联合研究、自主技术应用开发以及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应当协调行动，通过媒体平台共享各国最优秀的思想成果与新闻报道。面对新法西斯主义和野蛮行径的蔓延，必须扩大进步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力。

今天，当文化与意识形态之争愈演愈烈，当蒙昧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企图盛行，当谎言与仇恨充斥社会话语，当人工智能开始强加行事方式并制造幻象与扭曲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铭记意大利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呼吁：

“请学习，因为我们需要所有智慧。

请保持激情，因为我们需要所有人的热情。

组织起来，因为我们需要全部力量。”

组织起来，创造出来，讲述出来，用智慧、激情和力量打动人心。正如赫苏斯·马丁·巴贝罗以深刻的朴素为我们定义的那样：

“我们需要讲述自己的故事，才能在清算时被纳入考量。”

1.3.5 拉丁美洲新闻社媒体合作美国封锁全球南方信息主权

- 发言人：伊芙琳·莱瓦·罗梅罗
- 年份：2024

我国长期面临非法单边强制措施的严峻挑战，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构成罕见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此背景下，拉丁美洲通讯社作为跨区域信息传播的实践范例值得关注。该机构由古巴著名记者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于1959年创立，始终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准则：客观性须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真相传递必须建立在对正义坚定追求的基础之上。

基于这一新闻伦理原则，拉丁美洲通讯社构建起独立的信息传播体系，有效抵制跨国媒体集团的信息霸权。其报道网络覆盖全球南方国家，特别聚焦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非洲及亚洲发生的结构性不公现象，系统记录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群体的生存状态。通过建立多语种传播平台，该机构持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非西方中心视角的新闻产品，成功搭建南北半球平等对话的媒介桥梁。

拉丁美洲新闻社作为古巴唯一的国际通讯社，持续在特殊环境下履行新闻职责。古巴当前面临长期经济封锁、单边强制措施及基于不实指控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等系统性压制。必须明确指出，封锁并非虚构叙事，而是已持续60余年的实体化管控机制，其运行实质对传媒机构构成结构性制约。国际社会对此存在认知偏差：封锁的主要作用对象是古巴全体国民，其覆盖范围远超常规经济制裁范畴。

本社过去一年面临多重挑战，革新动力主要源自两方面：持续的经济制约与国际传媒领域的技术迭代压力。在网络安全层面，今年本社YouTube官方频道遭遇北美商业实体系统性网络攻击，该行为旨在压制信息传播能力、遏制媒体影响力扩张。此类攻防对抗已成常态，反映出特定势力依托技术优势构建的信息霸权体系，其核心诉求在于重塑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分配格局。

突破当前困局的战略路径在于强化媒体协同机制，重点推进三项工作：其一，构建全球南方媒体多边合作框架，建立资源共享与联合生产平台；其二，推进跨语言技术适配与多模态传播矩阵建设，打破信息流通的技术壁垒；其三，建立常态化战略对话管道，针对传媒领域的技术伦理、数据主权等重大议题形成集体应对方案。此协作体系需超越传统的地缘区隔，形成具有规范制定能力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对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前推进技术领域国际合作正处于关键机遇期。应通过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框架，助力缺乏技术获取渠道的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技术赋权；依托高层次对话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及创新模式实现普惠共享。唯有将南方国家整合至技术变革进程，方能构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协同响应体系。基于文明多样性原则，在尊重各国发展道路、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前提下，国际社会应强化信息传播协作，通过战略协同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舆论场域中的话语权重。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拉丁美洲通讯社主导发起的“全球南方之声”多语言媒体联盟具有示范价值。该平台已聚合逾150家跨国媒体机构，期待更多成员方参与共建。此类多边合作机制在促进媒体行业交流方面成效显著：既便于构建媒体从业者直接对话渠道，也为建立高效协作网络创造可能。通过扩大信息传播半径增强受众覆盖，

此类合作既有助于完善国际传播格局，也为维护和平安全、推动人类发展注入了建设性力量。

诚挚期待与会各方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将相关成果转化成具体合作项目，推进务实合作与战略对接。各方应充分总结可借鉴经验，将论坛成果转化成深化多边合作的持久动力，共同构建坚实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感谢诸位的关注与参与！

1.3.6 拉美媒体全球南方传播去政治化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发言人：毛路·拉莫斯
- 年份：2024

乌拉圭艺术家华金·托雷斯·加西亚的经典画作《倒置的美洲地图》深刻揭示：南方世界始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向。

尽管拉丁美洲是地理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区域，但过去数十年间双方民众已建立起深厚情谊。作为增进理解的重要渠道，文化传播与媒体交流领域尚存显著提升空间。当前在华常驻的400余名外国记者来自40余个国家、210多家媒体机构，而目前仅有来自2个国家的4家拉丁美洲媒体机构在华设立分支机构。以巴西劳动者电视台（TVT）、真实巴西（Brasil de Fato）及兄弟媒体南方电视台（teleSUR）为代表，结合古巴驻站记者伊芙琳女士等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上述机构占中国常驻媒体比例不足2%。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自2007年开通西班牙语频道后，已与覆盖22个成员机构的拉美信息联盟建立战略协作，近期更增设葡萄牙语传播平台。这些实践路径与我们推动南方国家传媒合作的理念高度契合。

历史上，巴西及拉丁美洲地区对中国的认知长期受限于信息渠道的单一性。巴西主流媒体惯常采用全球北方国家通讯社及媒体的新闻源，例如彭博社、经济学人、路透社等机构内容，导致当地社会主要通过欧美视角构建对华认知框架。这种传播模式存在明显缺陷：其本质是基于意识形态立场与地缘战略需求构建叙事体系。大量案例表明，此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偏离客观现实，更多服务于全球北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导向。

以《经济学人》近年涉华报道为例，其叙事框架持续经历阶段性调整，从早期渲染“中国经济崩溃论”到强调“增速放缓”，继而转向“结构性产能过剩”等新概念。若单纯依赖此类信源观察中国，必然陷入认知矛盾：既存在“经济危机”的警示，又出现“过剩隐患”的忧虑。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全球北方强势媒体始终将构建对华战略疑虑作为核心传播目标，通过选择性信息传播持续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信任。

这类媒体的运作机制具有系统性特征：其首要目标是维持国际舆论场对中国的批判性叙事框架，继而利用各类宏观或微观事件——无论事实依据是否充分——不断强化这种预设立场。这种传播策略不仅影响受众对具体事件的判断，更从深层塑造着观察中国问题的认知范式。

通过陈学敏先生的介绍，各位已对“村超”赛事形成初步认知。值得关注的是，该项源自中国基层的体育赛事不仅在国内引发热议，更获得包括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国际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外媒在传播该案例时存在叙事视角的局限性——某国际权威媒体专题报道中未提及减贫政策的关联背景。尽管这未必构成报道偏见，但在全球南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始终是理解此类现象的核心维度。

中国于2020年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榕江县作为最

后一批脱贫摘帽的深度贫困县，通过创新实施“村超+”发展模式，将体育赛事转化为经济增长引擎。数据显示，该县以40万常住人口规模，在2023年实现接待游客逾700万人次，文化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0亿元。这一发展成果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基层治理中的显著优势，为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谨此对榕江干部群众取得的阶段性成就表示祝贺。

真实巴西的核心工作目标为系统化呈现中国发展现状及观点。作为首家在拉丁美洲地区设立常态化中国人物专访栏目的媒体机构，我们通过持续采访教育工作者、行业专家、政府官员及普通民众等多元群体，构建起立体化的中国叙事体系。在过去18个月的报道中，已累计完成逾百位代表性人物的深度访谈，其中涵盖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等标志性人物。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关注度持续提升值得肯定，但需警惕某些论述中存在的去政治化倾向——试图将全球最大规模高铁网络、智能化工业体系及科技创新成果等重大成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割裂解读。本机构在报道实践中始终坚持客观原则，如实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性推动作用。

根据本台制作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专题节目数据显示，相关视频观众互动量突破百万次，充分反映公众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广泛关切。在涉及中国高铁建设的系列报道中，巴西观众尤其展现出浓厚兴趣，诸多评论指出该成功经验对国土面积辽阔的巴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赴华工作前，笔者首次撰写的涉华报道即聚焦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自从事中国新闻报道工作伊始，对此深有体会。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某些西方媒体持续构建对华不信任叙事，但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始终保持着了解中国的热忱。即便存在部分国家政府的政策波动，全球南方民众普遍期待深化南南合作的内在需求。作为大众传媒从业者，我们的核心使命在于顺应时代需求，致力于搭建南方国家人民沟通互鉴的桥梁，推动构建更具凝聚力的南南人文共同体。

1.4 争夺叙事权——全球南方的媒体抵抗

1.4.1 媒体叙事西方宣传全球南方多极化世界金砖国家

- 发言人：索菲娅·梅尔尼丘克
- 年份：2024

人们常言，我们亟需根本性转变——转变叙事方式、放声发声、构建话语体系。今日我愿提出根本性追问：是否存在普世真理？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历史是否仅有一条正确道路？

请允许我从个人经历说起——作为一名俄罗斯人，我亲身见证了西方宣传的局限性。如同我们尊敬的总编辑玛格丽塔·西蒙尼扬及众多同事，我曾赴美参加交流项目。如同许多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青少年，我深信西方代表着文明的巅峰，终极真理蕴藏于西方价值观与叙事体系之中。因此，我无比渴望亲身体验那个仅通过美国电影和MTV频道窥见的世外桃源。然而在美国高中历史课上，我对这个理想世界的最初质疑悄然萌芽。令我震惊的是，我竟从课堂上得知“美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极端片面的历史观自然引发激烈争论。我很快意识到，同学们只是缺乏认知——他们完全不了解苏联人民为胜利与和平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次经历让我初次接触到美国例外论，它展现出一种狭隘且坦率地说颇为傲慢的世界观。

此后数年间，我对这种现象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屡屡需要挑战美国朋友从主流报纸获取的俄罗斯叙事。他们常问：“你为何留在俄罗斯？俄罗斯是这样那样的。”我总是耐心回应：“你应该亲自去俄罗斯看看。别再让美国报纸替你做判断了。”但讽刺的是，这些人却总在宣扬“拥抱差异——不优不劣，只是不同”的理念。遗憾的是，许多全球事件始终被偏颇的视角报道，西方世界所谓“边缘”国家的声音常被忽视。人们往往忽略，这些所谓的边缘国家实则是我们这个相互关联的单一世界中至关重要的贡献者。西方媒体屡屡扭曲现实认知，强化将全球南方国家描绘成需要监护对象的刻板印象——这种刻画纯属虚妄。破除这种叙事，恰恰是我们工作的核心使命。

过去三年间，我们目睹西方世界以最赤裸裸的方式展现其“包容差异”的姿态——对拒绝服从西方宣传指令者施加制裁并公开威胁。以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为例，他在国内遭受猛烈抨击甚至被冠以叛徒之名。罪名何在？他竟敢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话，竟敢探询对方的观点。这难道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必须承认，通过此类手段孤立俄罗斯及俄媒的企图并未奏效。事实上，就连西方媒体也证实，俄罗斯今日电视台（RT）在巴尔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影响力正持续扩大。这些限制俄罗斯视角真相与观点传播的措施根本行不通。

今年十月，俄罗斯主办了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论坛。这场汇聚36国领导人的盛会有力驳斥了所谓俄罗斯遭全球孤立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东道国，俄罗斯并未优先考虑自身安全关切或仅聚焦乌克兰危机。相反，论坛聚焦所有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关切的议题，强调共同问题与共同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国家运作模式不设主导议程的领导者，由此构筑了区别于西方利益主导机构的独立替代空间。我们RT的目标与之相契：打

造替代性平台，传播多元视角，赋能受众深入追问：为何会出现这些发展？为何以这种特定方式展开？当人们真正倾听这些多元观点与声音时，决策将更明智，矛盾的化解也将显著容易。

回到开篇的提问，普世价值确实存在。我们共同向往各国的和平、正义与繁荣。但实现这些愿景绝非存在唯一普适之道，实现目标也无固定路径。世间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立场”，唯有倾听多元视角，方能实现全球普世目标，在无迷思误判的状态下驾驭世界，从而作出明智抉择。今日延续这场对话之际，我们坚信本次会议将强化该领域的合作，激发创新理念，为更具意义和影响力的协作铺平道路。携手同行，我们定能构建一个既公平又具变革性的媒体格局，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成为推动全球和平、发展与团结的催化剂。

1.4.2 主流媒体在美国政治中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发展替代媒体

- 发言人：本·贝克尔
- 年份：2023

我来自美国纽约，正在那里创建一个名为"突破新闻"的反帝国主义新闻平台。今天我先要提醒大家：尽管这段历史常被掩埋，但美国左翼与美国独立媒体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始终与中国紧密相连。1950年，美国政治建制及其媒体机器被所谓"麦卡锡主义"所颠覆——这场运动对公民自由、知识分子、艺术家、劳工领袖以及所有渴望和平世界、质疑美国外交政策的良知人士发动了大规模打压。一场旨在粉碎异议、扼杀声音、终结职业生涯的十字军东征就此展开。当时的核心问题是"谁让中国落入敌手？"这种前提本身就是殖民主义思维——仿佛中国可以属于任何人。但在华盛顿，麦卡锡等政客将矛头指向所有主张独立外交政策、尊重民族自决的人士，声称："正是你们导致中国沦陷——更甚者，是让中国落入共产主义者之手。"反共歇斯底里被用来驱逐异见者，并为战争铺路——这场后来演变为朝鲜战争的冲突，实质是争夺太平洋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控制权。

我从这里开始，是因为美国正重陷麦卡锡主义式的攻击浪潮——再次压制言论自由与异见，再次将发声者贴上"俄罗斯或中国代理人"的标签。如今两党共和党与民主党相互指控对方充当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这种指控被用来阻挠社会变革运动，逮捕那些为种族平等和提高工资而斗争的人，并对他们宣称："你们也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某种意义上，问题依然是"谁失去了中国？"——但这已是"谁失去了中国（续篇）"，因为帝国主义者误以为已重新掌控中国，如今却惊觉中国从不属于他们，始终在独立前行。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在追问"谁失去了俄罗斯？"——因为他们以为苏联解体后已重新掌控俄罗斯。当印度和巴基斯坦拒绝加入对俄制裁时，他们又质问"谁失去了印度？""谁失去了巴基斯坦？"——实际上是在追问"谁失去了整个全球南方？"随着单极世界迅速向新格局转型，这个疑问正驱动着华盛顿的行动。

我们深知，这种变化中的世界环境给独立媒体和记者的工作带来了特殊挑战。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现在实质上正处于信息战时期。这并非夸大其词或修辞手法，因为信息战已被美国五角大楼列为正式的战争领域。在他们看来，战争已不再局限于陆海空——甚至不仅限于太空或网络空间；战争存在第六维度，即信息领域。他们尤其从伊拉克战败中汲取教训：若不能赢得民众的心智，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法为帝国主义者带来胜利。因此他们正将更多精力投入争取民心的事业，而媒体与信息领域正是这场特殊战争的主战场。

我们突破新闻社的办公地点距《纽约时报》总部仅五个街区之遥，距华尔街和《华尔街日报》也仅几个地铁站之距。在这场信息战中，我们可谓真正身处敌后。我们能观察到什么？在纽约亲历的真相又该如何传递？其一是所谓美国新闻业——自诩为"第四权力"，宣称独立于政治、秉持中立、唯事实求是——实为谎言。尽管个别记者在主流媒体从业时或许恪守此种理念，但过去一年——尤其在乌克兰战争报道中——已彻底揭露"第四权力"实为政府第四分支的本质。我们官方设有三大政府部门，但这套媒体机器却完全沦为权力的速记员。媒体本应提供历史背景、提出根本性问题并挑战权贵。然而在美国国内，我们看到的记者们只是机械重复政府机构的

谎言与叙事，毫无质疑精神。事实上，即便提出基本问题——这场战争如何爆发？其历史根源何在？谁曾预言其爆发？如何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全被归为所谓“俄罗斯虚假信息”。即便提出“如何终结战争”这类问题——答案本应简单明了——在华盛顿的新逻辑下，提问本身就被视为俄罗斯散布的虚假信息。

许多人已指出美国国内信息被完全垄断的现状。我仅列举几个数据（其中部分诸位想必已知晓）：六家巨型跨国企业掌控着美国 90% 的阅读、观看和收听内容。而四十年前，仅需 50 家企业便能垄断 90% 的市场份额。但仅从所有权角度讨论问题仍显局限，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拥有媒体，而在于其政治功能——所有大型媒体集团的编辑委员会本身就与政治精英深度交织，与西方情报机构深度交织，并与主导外交政策者保持着密不可分的伙伴关系。因此即便将媒体剥离为独立公司，若其编辑委员会成员皆出身于同一外交政策体制又何益？他们同窗共读，共进晚餐。这正是我们所称统治阶级媒体的真实功能——关键不仅在于所有权归属，更在于其运作模式。

当然，好消息是民众已不再信任这类媒体。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不信任度正创历史新高。最新民调显示，仅 7% 的美国成年人高度信任报纸、电视和广播新闻，27% 的人表示尚可信任。这意味着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对传统媒体几乎毫无信任。相较于五十年前近 70% 的信任度，这一数字已大幅下滑。当然，这与美国社会对所有主要机构信任度的普遍下降相呼应。社交媒体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传播形式和信息消费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媒体会就此消亡或放弃其计划。我们注意到，它们正通过三大途径试图挽回正在丧失的合法性：

首先，正如我们已提及的，是麦卡锡式的打压：审查、封口、封禁渠道。其次是暗中封禁和算法私有化控制，这实质上掌控了信息传播渠道。它们营造出民主假象——人人可创作发布内容——却暗中操控内容可见性。通过控制传播渠道，它们弥补了对出版物控制力的缺失。第三是将自身及其叙事包装成独立媒体。我特别要指出这点构成重大挑战与威胁：深知主流媒体已遭普遍质疑，他们便在社交媒体上打造出众多品牌，实则只是传统媒体的换装版。这些媒体照搬相同论调，用现代、时髦、年轻化的美学包装，本质上仍是同一批媒体。这些新媒体品牌部分由共和党或民主党内的亿万富豪资助，但所有品牌仍遵循相同的帝国主义共识。某种程度上这反而更危险——当 500 个看似政治立场迥异的 YouTube 频道，以不同方式反复宣称“俄罗斯是敌人”或“中国是敌人”时，其心理冲击力远超收听 ABC、CBS 或 NBC 的报道，因为你会逐渐产生“唯我独见”的错觉。

这些复杂问题需要极其精妙的应对策略。我想谈谈突破新闻（Breakthrough News）的实践方向。我们团队规模虽小，但确立了两大核心方向：成立仅三年的突破新闻，最初一年半完全远程运作，真正持续稳定运营的时间仅有一年半至两年。我们的两大核心方向是：深入报道全球南方国家及遭受帝国主义制裁国家的视角，直接倾听被妖魔化群体的反驳声音；同时聚焦美国国内反抗本国侵犯人权行为的抗争运动。切勿忘记：美国半数人口已陷入或濒临贫困；数千万民众无力支付房租；去年全美有 900 人遭警察杀害；我们拥有庞大的拘留中心体系，难民和移民在此遭受常规性酷刑；更有民众忍饥挨饿，流落街头。这些都是侵犯人权的行为，除非我们自己记录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向全世界传递，否则我们实际上就无法挑战美国人喜欢为自己塑造的“美国例外论”。

我们相信，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这类内容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过去两年间，我们的频道已积累约 70 万订阅用户。此类内容每月平均获得约 2800 万次观看量——既有记录美国境内 滥用权力与抗争斗争的短视频，也有与全球反建制派专家进行的长篇访谈。我们认为受众群体庞大，因为深知如今美国有数百万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抱有积极态度。尽管麦卡锡主义阴云笼罩历史长河，反共迷雾正逐渐消散。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2500 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种族主义警察暴力；他们亟需通过新型媒体获得发声渠道。数百万民众对当下美国普遍存在的反亚裔暴力与种族主义深感愤慨，他们正将此与针对中国的外部替罪羊策略联系起来；他们需要能触达他们的媒体。数百万处于或接近贫困线的人们需要能看到自身形象的媒体，而非仅聚焦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国内正发生着许多抗争，全世界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甚至美国人自己也一无所知。我们相信，只要开始打破“美国是流奶与蜜之地，美国梦唾手可得”的叙事，就能推动全球层面的叙事变革。

最后我想回顾麦卡锡主义在 1950 年代的覆灭。它并非因美国精英阶层的重大反抗而垮台，而是源于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女性运动——这些力量挑战华盛顿政权、抗争社会不公，从而改变了美国国内的力量对比格局。这进而为 1960 年代上大学的年轻人开辟了政治空间，使他们开始更认同全球南方——认同越南的斗争、中国的斗争、古巴的斗争——而非认同自己的政府。这并非我个人的主张。1968 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生对切·格瓦拉的支持率高于当年所有总统候选人。麦卡锡主义正是通过美国本土与全球南方产生共鸣的草根运动而终结的。美国拥有庞大的黑人社群、拉丁裔社群、亚裔社群，还有众多同样受苦的白人工人。我们坚信，唯有依靠能与这些群体对话的草根运动和媒体，才能再次击败麦卡锡主义。

1.4.3 俄罗斯媒体国际传播形势及展望

- 发言人：弗谢沃洛德·普尔雅
- 年份：2023

媒体主权若运用得当实为利器，因其本质是国家或社群掌控媒体生态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有助于彰显国家独特的文化与价值观，既能守护文化多样性、弘扬民族精神，又能确保信息传播的公正性。

其重要价值在于推广本土故事与叙事，确保这些故事获得充分呈现。这种关注本源的倾向合乎情理——毕竟我们最关心家门口发生的事。但随着世界日益复杂，远方故事正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当缺乏专业报道能力时，我们必须接纳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外国媒体。

外国媒体能体现其所在国的文化价值。有人称之为软实力，但我回避这个词，因"实力"暗含强制性。我更倾向于用"提供更多背景信息"来丰富对话与公共讨论，使本土受众更具洞察力——尤其有助于破除刻板印象，例如俄罗斯或中国对非洲的偏见。

作为 RT 中国频道经理兼《俄罗斯之声》（RT 旗下非政治性文化项目）总编辑，我深切体会到过度制裁的冲击。我们的 Facebook 群组、主页及 YouTube 频道——即便是非政治类内容——均遭封禁。例如 Facebook 曾将《俄罗斯之声》标记为"官方媒体"长达一周，连分享粥品食谱的"俄罗斯厨房"主页也被删除。媒体主权固然重要，但美国以保护受众为由屏蔽俄罗斯粥品食谱未免极端。该主页虽于 2019 年恢复，我们仍持续遭受暗禁与限制。

这些平台推行不透明的"媒体主权"政策，既缺乏透明度也无第三方监督——完全是个黑匣子。这加剧了国家层面的监管压力。

允许外国媒体存在利弊：利处包括：多元视角丰富公共讨论；竞争推动本土媒体进步；引入新技术与实践。弊端包括本土文化可能被侵蚀；资金匮乏的本土媒体难以抗衡；存在传播偏颇信息的风险。

监管必须做到平衡、透明且公平适用——这与 RT 在欧美遭遇的困境截然不同，在那里我们耗费心力突破人为障碍而非专注于讲故事。在中国，清晰的规则使我们的中文服务得以促进中俄相互理解——这正是 RT 全球分支机构（如 RT 非洲、RT 阿拉伯语频道等）在全球追求的目标。健全的媒体主权方能促成富有成效的对话。

（根据录音整理并编辑）

1.4.4 PressTV 在西方霸权逆境中取得的成就与全球南方媒体团结

- 发言人：穆罕默德·马赫迪
- 年份：2023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当我提及真主时，我要强调我们的真主安拉与他们的不同。此话何解？他们宣称“信奉上帝”，我认为他们将这句话强加于他们的神明。随着这场法律化进程的推进，我愈发感受到他们的神明正逐渐失势，或许他们需要重新审视对神明的信托。

PressTV 始终致力于成为无声者的代言人——那些在全球北方势力掌控的西方媒体中几乎毫无话语权的人群。这份声音承载着团结的力量。坦率地说，我们的征程充满艰辛：他们将我们逐出卫星平台，关闭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删除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实施“影子禁令”阻断内容传播，甚至没收我们的.com 域名——这恐怕是媒体界前所未有的遭遇。近期他们更封锁了我们的 RSS 订阅源。这些行径昭示着对多元观点的极端不宽容，甚至对 PressTV 实施制裁。

面对这一切，所谓媒体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宣言令人质疑。他们试图压制我们，只因我们是无声者的代言人，但我们坚信使命所在，绝不退缩。

我们需要全球团结。当压制针对任何媒体时，我们必须强烈抗议——今天是他们，明天可能就是你。PressTV 十五年的抗争历程，恰如 RT 一年所经历的磨难。他们将持续打压其他媒体，因此我们必须揭露这些行径并发起抗议。我们必须建立跨国在线平台（例如联合乌克兰、中国、俄罗斯媒体），取代西方控制的空间，触达国际受众。

我们必须重塑主流话语权。无需美联社或路透社定义新闻价值——当以色列以“行政拘留”之名未经审判囚禁巴勒斯坦人时，这本是重大新闻，西方媒体却视而不见。当加拿大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宣扬环保政策，其矿业公司却在非洲肆意污染时，这同样值得报道。美国非洲司令部在 54 个非洲国家中的 53 个开展行动，军事化整个大陆——此事未见报道。数千索马里平民在“反恐战争”中丧生却无人关注。企业入侵后摧毁伊拉克基础设施导致物资短缺——民众有权知晓真相。

西方媒体将伊朗在西亚（刻意回避欧洲中心主义的“中东”称谓）的活动贴上“恶意”标签，同样将俄罗斯在非洲的行动定性为“恶意”，或用“债务陷阱”叙事抹黑中国投资。这些框架被包装成新闻热点，而西方制裁给伊朗、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带来的苦难却无人问津。PressTV 和 IranPress 正放大这些报道——集体行动能强化这项工作。

1.5 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与反思

1.5.1 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 发言人：何明星
- 年份：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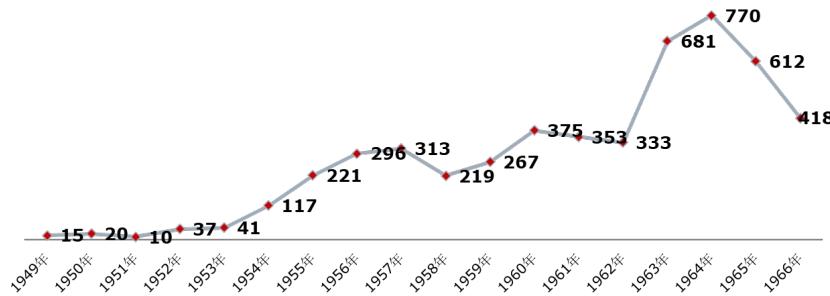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构建 21 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那么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毛泽东著作是如何在世界进行传播并获得了影响的。其传播的背景、传播者和不同语种的翻译与出版，翻译、出版、发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们，也就是今天“全球南方”的人们，为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信息与传播秩序，打破西方信息传播垄断所进行的奋斗过程。

新中国主动对外传播的第一次

在 1935 年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尚未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的出版发行，才使世界知道红军队伍的存在。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受到关注。特别是冷战的国际背景，新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受到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国际社会首次较为集中地关注到中共领导人及其思想。因此毛泽东著作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的国际背景，是在突破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封锁的冷战背景下展开的。而一个重要的引线是亚、非、拉人民对于新中国如何摆脱殖民统治经验的学习热潮，即“第一次向中国学习”的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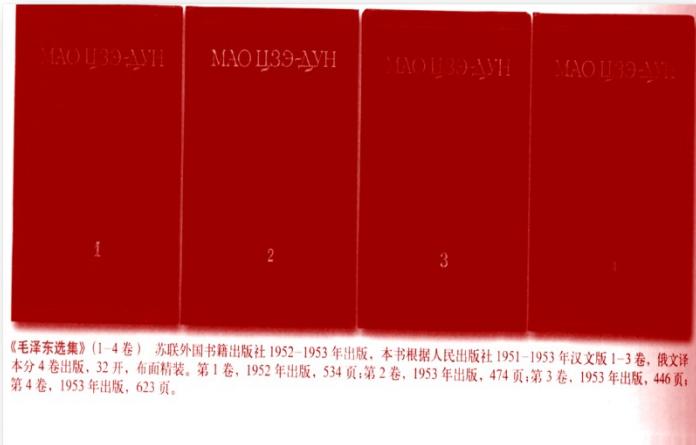
我曾经依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做了一个统计，1949 年至 1966 年间，来自亚非拉国家的代表团频繁访问中国，差不多三天一个代表团，都是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出面接待的高规格代表团。

亚、非、拉等国家、地区各种组织来访次数统计
(《人民日报》1949—1966 年)



1949-1966 年亚非拉代表团来访中国次数

这些来访的代表团均提出，新中国获得独立胜利的经验是什么？有些可以学习？而早在 1948 年，捷克方面首先提出希望翻译毛泽东著作，被毛泽东本人制止了。斯大林曾多次提出看看毛泽东的著作，其本人的目的，是确认一下毛泽东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解放最早的东北人民政府，应苏联政府的要求，已经准备开始筹备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翻译，也被制止了。直到 1949 年毛泽东为访问苏联，斯大林当面再次提出要翻译毛泽东著作俄文版，毛泽东才同意，但也表示中共的理论水平有限，希望苏方派理论家协助。此后，在苏联理论家尤金的指导下，中共与苏共双方共同整理、翻译毛泽东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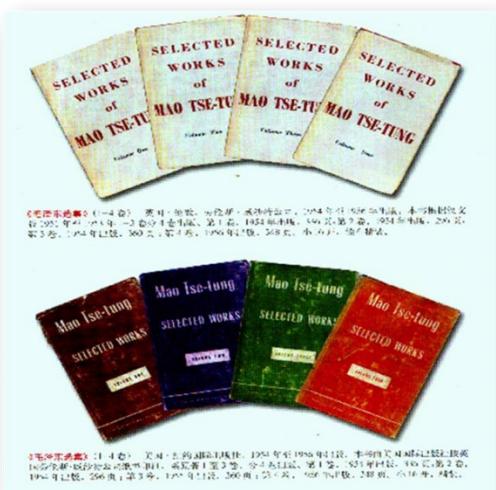


《毛泽东选集》(1—4卷) 苏联外国语出版社1952—1953年出版,本书根据人民出版社1951—1953年汉文版1—3卷,俄文译本分4卷出版,32开,布面精装。第1卷,1952年出版,534页;第2卷,1953年出版,474页;第3卷,1953年出版,446页;第4卷,1953年出版,623页。

1952年至1953年,第一套毛泽东著作俄文版在苏联出版,这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审定的,中文版的《毛选》三卷为底本进行俄文版的翻译。此后传播到中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始有以俄文为底本进行翻译的罗马尼亚文、捷克文版、哈萨克文版、吉尔吉斯文版、乌兹别克文版等多个国家的语言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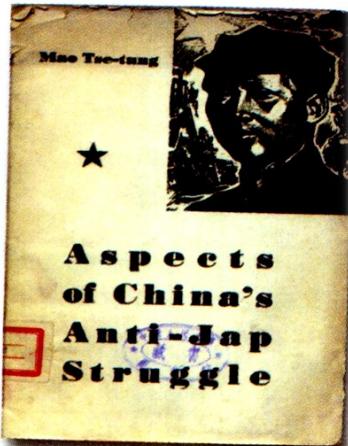
1952—1953年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在西方阵营中,最早关注毛泽东著作的是英国共产党。1953年,英国劳伦斯出版社代表罗素辗转抵达中国,并与中方的国际书店签订第一批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协议,并支付12000英镑的版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笔版税。1956年劳伦斯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出版后,即《毛选》伦敦版,也是中文版《毛选》的前三卷内容,开始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其中关注最多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因此中央决定对毛泽东著作英文版免费授权。此后,毛泽东著作不再收取任何版权费,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翻译和传播。由此衍生出许多语言文本,如阿拉伯文版、西班牙文版等。许多亚、非、拉的民族解放组织也主动利用英文版进行再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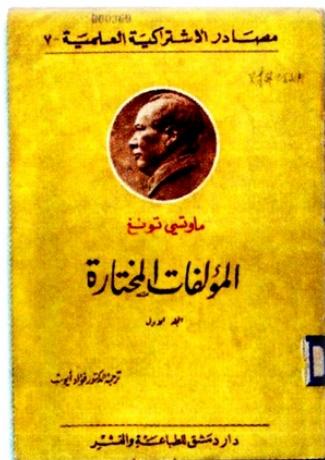


《毛泽东选集》(1—4卷) 英国·伦敦·劳伦斯出版社,1954年至1956年4月出版,本书根据汉文版1—3卷,俄文版1—3卷,1952—1953年出版,32开,布面精装。第1卷,1954年1月,500页;第2卷,1954年1月,446页;第3卷,1954年1月,446页;第4卷,1956年1月,500页。

1954-1956年英国劳伦斯出版社版，1954-1956年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版(根据英国劳伦斯版出版)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印度·孟买人民出版社，1948年9月，32开，平装，7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出版，1967年，小16开，平装。

西方学术界有人常把毛泽东著作的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称作“中国输出革命”，但从毛泽东著作对外翻译出版的起因来看，这一说法并不准确。1948年至1960年前后，中国方面并未主动推动翻译，真正推动其传播的是全球南方的国家、地区的人们，为了寻求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中国经验”，是为了寻求独立自主建设自己国家的道路而发起的。



《毛泽东选集》(1-4卷) 根据汉文版1-3卷分4卷翻译而成，法国巴黎社会出版社，1955年至1959年出版，大32开，平装，毛边本。第1卷，1955年出版，415页；第2卷，1955年出版，277页；第3卷，1956年出版，284页；第4卷，1959年出版，398页。

1955-1959年法国巴黎社会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法文版

直到1960年代后，相关部门才开始主动以毛泽东著作为核心，同时兼顾其他出版物的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包括《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小二黑结婚》等革命文学作品，《过猴山》《小马过河》《骄傲的将军》等中国儿童读物，都是这一时期随着毛泽东著作走向了全世界。



1960年代装订与运输新中国外文书刊

当时新中国的财力远不如今。在组织方面，成立了由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协调航空运输、外汇以及国际邮政等机构。尽管国家外汇极度紧张，中国仍坚持把包括《人民画报》在内的大量外文出版物通过航空运输，发行到全世界各地。这是新中国主动进行对外传播的第一次，改写了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一直由西方人主导的历史。先是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其后是冒险家、水手、军人等等。毛泽东著作的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构建了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互助”新模式

毛泽东著作在全世界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是在冷战国际格局进行的，但同时又与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相关。可以说，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是多方推动、共同作用的一种结果，构建了一种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文

化互助”的一种新模式，并因此区别于西方国家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化殖民”或者“文化霸权”模式。

比如在东非，由于刚刚独立的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纷纷宣布以斯瓦希里语为官方语言，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以斯瓦希里文为核心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基础设施，如专业化的出版机构、民族语言的印刷厂。而此时新中国则组建了斯瓦希里文的编辑出版队伍，出版了斯瓦希里语《中国画报》、毛泽东著作以及斯瓦希里文儿童读物。这些斯瓦希里文图书、画报几乎以无偿方式来到东非大地，许多东非国家的儿童甚至曾以这些中国书刊作为课堂教材。

在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过程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发生均发生在亚非拉国家。例如伊拉克最早的“莫珊娜书店”，在1960年代曾销售了约五十万册来自中国的书刊。叙利亚有一家名为“大马士革出版社”的书店，两兄弟经营。曾以伦敦版《毛选》为底本自发翻译成阿拉伯文，并组织阿拉伯汉学家翻译《青春之歌》等中国文学图书，将阿拉伯文中国书刊推广至阿曼等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这些故事都显示，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是传播者与传播受众彼此之间互动进行的，而其传播的动力来自于毛泽东著作本身的思想价值。我曾经多次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大马士革出版社的兄弟俩的情况，特别是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期，但是均没有结果。



1980年代大马士革出版社的东巴基夫妇到访中国



在非洲国家中，中国出版物的传播同样十分广泛。例如在加纳，1963—1964年间中国提供了几十万册书刊，几乎全部为无偿援助。加纳当地有兄弟俩，因无稳定工作，主动提出希望经营中国书刊。中国方面当时尚无国产汽车，却特意从日本购买一辆丰田车运往加纳，使名为阿空的兄弟二人能够作为流动书店在加纳各地发行中国出版物，两人因此成为中国的长期友人。

中国驻非洲代表与加纳流动书店的阿空兄弟俩合影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充分展现了新中国在第一次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对外文化传播中所付出的努力。通过有组织、有系统的出版物外送，中国在冷战封锁中成功突破国际隔离，与许多国家建立了深厚友谊。大量出版物作为无偿文化援助输往亚非国家，如加纳发行量达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均在短短数年间完成。

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友人亨利·诺依斯。他的爷爷、父亲均为美国来华传教士，童年在中国广州度过，能讲流利粤语。回到美国后仍对中国念念不忘，于1960年代创办“美国中国书刊社”，并通过朋友获得了全美国唯一一个能够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的许可证。在中美冷战最紧张时期，他花费66美元购得一张全美国通行的车票，坐着灰狗巴士，在全美巡回销售“中国的小红书”（即《毛主席语录》），销售了200多万册。由于当时中美之间不通邮、不通汇，这些收入无法及时汇回中国，只能存到美国财政部制定的一个账号上。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后，“美国中国书刊社”向中国转付了近100万美元，这是中国当时获得的第一笔来自美国的外汇。

总之，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有许多经验与启示可以被今天借鉴。面对西方世界对“全球南方”声音的长期屏蔽，如何突破？我的专著《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英文名为 *A History of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Mao Zedong's Works*），由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刚刚出版。该书梳理总结了毛泽东著作20多个语种的翻译、出版与传播的历史。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于，全

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全球南方国家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西方主流媒体里，依旧如同“黑洞”一般的存在，南方国家需要共同发声、资源共享，建立属于自己的传播体系。全球南方的团结是改变当今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不平等、不公正的重要一步。只要保持合作，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1.5.2 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下的国际传播

- 发言人：丁一凡
- 年份：2023

我们都在讨论全球南方媒体与新闻传播的未来。事实上，这个议题中暗藏着若干思维陷阱，许多人不知不觉就陷入其中。唯有挣脱这些陷阱，才能更清晰地看清问题本质。

一个明显例子是：我们许多媒体机构都得到中央政府支持，例如 CGTN。然而一旦走出国门，外界便立即贴上“政府媒体”标签，暗示我们仅因所属关系就不可信。这种标签化使实质性讨论成为不可能——这正是话语霸权的体现，也是典型的思维陷阱。若政府或中央支持的媒体被视为有偏见，那么资本支持的媒体往往更缺乏客观性。

举例说明：1970 至 1980 年代，法国电视台均为国有。彼时法国电视报道相对客观。1980 年代后，这些电视台被私有化并售予个人或资本家，其报道客观性明显下降，在事件报道与分析中清晰可见资本主义烙印。

21 世纪初发生过一桩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上世纪 80 年代至 2000 年代，法国电视界有位知名主持人兼评论员，在荧屏活跃逾三十载。当时任总统萨科齐——普遍被视为大资本利益代表——推行某些公共政策时，这位主持人提出批评。随即他便被解雇。

此事在法国引发公众强烈抗议，但收效甚微——这是电视台的自主决定。在过去媒体国有化的时代，如此轻易解雇知名人士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有电视台运作模式类似公共机构，记者和评论员享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工作保障。相比之下，私有化后资本对待媒体从业者的态度要严苛得多。若观点与之相左，随时可能遭解雇。因此所谓私有化能提升媒体中立性的说法纯属神话。

更甚者，私有化后法国媒体自由度持续下降。如今无论何种议题，媒体似乎都异口同声，几乎没有留给另类或独立分析的空间。这主要源于背后资本集团日益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集团手中。其中最具影响力者，自然当属鲁珀特·默多克旗下的知名新闻集团。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通过多种手段渗透各国媒体版图：先是打入美国媒体，继而进军欧洲媒体，甚至试图在中国媒体领域施加影响力。来上海之前，我在北京与一群外国人共进晚餐，其中一位曾在媒体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告诉我，当默多克决定娶中国女子邓文迪时，这其实是战略布局——旨在打开中国媒体行业大门的跳板。

显然，这个计划失败了。默多克在中国投入巨资，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开放媒体市场，让他复制在其他地方行使的控制权。当这个计划失败时，他与邓文迪的婚姻也随之破裂。所有这些努力都源于资本利益和利益计算。我们常在不知不觉中消费着小报新闻，却未曾察觉事件背后的深层动机。认为资本掌控的媒体比国家掌控的媒体更中立的信念，实则是一种思维陷阱，它向我们灌输完全虚构的叙事。

第二个重大陷阱，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警惕，是西方媒体设下的所谓“GDP 陷阱”。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规模的方法，直至 1980 年代才崭露头角。在 1970 年代之前，国家经济比较通常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NP）而非 GDP。GDP 的推广本质上是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的策略。一旦投资流入，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将被计入国内产出，从而推高 GDP 数据——这正是强调 GDP 的深层逻辑。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历史上我们谈论经济规模时，指的是工业和农业产出。但在 GDP 框架下，这些部门的重要性逐渐减弱。由于发达国家已将经济本质上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体系，第三产业规模已膨胀至惊人程度。

当今美国虽拥有极高的 GDP，但其中逾 80% 源于服务业。在该领域中，除金融业外，法律行业（包括诉讼业务）更呈现失衡式扩张。然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这些行业对实体经济价值的实际贡献极具争议。真正的社会经济价值源于工业与农业生产。服务业本应辅助并提升这些生产部门，但若任其如癌细胞般肆意扩张，终将吸干工农生产的精髓。结果便是工农占比持续萎缩，服务业不断膨胀。因此即便 GDP 数字看似惊人，其实质意义却十分有限。

GDP 概念实际上已对学术界产生洗脑效应，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其过度迷信。事实上，GDP 远非必需指标，其内在价值微乎其微。但这个概念确实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典型的思维陷阱。所有人似乎都在追逐 GDP。若未来全球南方国家都沉迷于此幻象，盲目追求 GDP 增长数字，或许能获得庞大的名义数字——却毫无实质意义。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自觉规避的陷阱。

第三个陷阱是普遍存在的非此即彼思维——认为必须在市场与国家之间作出选择。英语中常表述为：“市场与国家之间存在权衡取舍”。但为何必须强迫二者择一？这种框架本身就是思维陷阱，它强加了“只能二选一”的先验假设。

所幸中国领导人并未如此教条，尽管许多学者已陷入这种二元思维。我们的领导者更倚重直觉与务实精神，倡导“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即常说的“双足并行”。这一源于中国哲学的简明而深刻的辩证法，意味着既坚持市场机制又坚持政府干预，两者不可或缺。正是这种双轨并行的坚持，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何中国市场经济历经多次危机仍能相对平稳发展。正如温铁军教授所言，我们总能在危机中找到出路——若当时没有及时的国家干预，这些挑战或许难以克服。

第四个陷阱在于以“发展”之名操纵发展中国家舆论。这是为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设下的重大陷阱。过去普遍认为发展援助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但若细察当今援助分配方式，便会发现显著转变。发展援助曾致力于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民生。如今发达国家不仅削减援助额度，更日益拒绝通过发展中国家政府渠道拨付资金。

它们声称发展中国家政府效率低下且腐败横行，因此将资金转向所谓的民间社会组织而非国家机构。

资金是如何流入所谓的民间社会的？当然，他们会直接资助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和当地记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资金输给当地非政府组织（NGO），通常

直接将钱交给地方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不久前，我与一位中亚国家前领导人共进晚餐。他告诉我，尽管美国目前向中亚国家提供大量发展援助，但这些资金从未拨给政府，而是全部流向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其目的是在地方层面塑造舆论，并利用这种舆论通过选举制度帮助亲美候选人掌权。若当选官员最终未能与美国利益保持一致，他们便能利用这套舆论基础设施操纵局势——煽动颜色革命、推翻合法政府、扶植亲美领导人。这正是当今发展援助不再侧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因，其核心目标是扶持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以实现政治目的。这同样是个陷阱。

最后谈谈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概念利用了人类的基本共识：无论在何种社会或宗教中，人们都应遵守法律规则。它看似合理且契合共同价值观，因此容易赢得同情与认同。人们自然认为理应遵循规则。然而现实是，这些所谓"国际规则"大多由昔日的西方列强制定——它们要么是殖民帝国，要么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些规则旨在巩固其垄断地位，维持长期的殖民统治。如今若挑战或违背这些规则，便会被贴上"不守规矩"或"不合作"的标签。这些都是思维陷阱——旨在阻碍我们持续发展的构造。

1.5.3 用正确的本地化传播战略解构西方全球话语霸权

- 发言人：金仲伟
- 年份：2023

我从平面新闻起步，在新闻传播行业已耕耘三十余载。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浪潮冲击的众多领域中，传统新闻业是最早遭受颠覆的行业之一。在上海这座拥有 2400 多万人口的都市，已不见报刊亭踪影。这些曾伴随数代人的街头标配彻底消失。失去报刊亭，报纸便丧失触达读者的能力，生存空间随之萎缩。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或许已走在全球消除纸质报纸的前列。

我们正经历一场传播革命，它带来了若干重大变革。2015 年在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我有幸亲临现场。他在演讲中指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其原则和精神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这番在世界互联网巨头、科技领袖和风险投资家面前的宣言，字字铿锵有力。那是我首次接触“网络主权”概念，其重要性瞬间跃然眼前。在数字领域，美国曾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其科技巨头垄断了互联网的诸多环节。这些数字平台已成为网络空间的庞然巨物——其影响力之大，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许多国家的主权。它们对其他国家的数据安全、公众舆论和政治取向拥有巨大掌控力，并日益深刻地塑造着海外民众的思想精神生活。但早在 2015 年，正是中国通过习近平总书记率先正式提出网络主权概念并付诸实践。如今，中国或许是全球唯一培育出足以与美国科技垄断巨头抗衡的数字平台的国家。

2019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全民媒体”概念，将其视为中国公共传播面临的新重大挑战。拥有近 11 亿网民的中国，已进入全民皆可成为媒体的时代。普通人——曾经只是报纸读者——如今可以拥有一个账号或多个跨平台的扩音器。这标志着新闻传播行业经历了第二次重大变革。

由此可见，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革命给我们的行业带来了两大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一是超级平台的崛起——其影响力之大，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概念。这些平台提供的服务和对信息流的控制，其规模远超传统媒体。其次是“全民媒体化”现象，即每个个体都获得了媒体力量。这打破了报纸等精英媒体机构的垄断格局，通过数字技术重新分配了媒体权力。

后果如何？这些巨型平台实质上取代了曾经分发报纸和信息产品的传统邮政系统。我常称它们为新的“邮局”。过去报纸通过邮政服务印刷分发至千家万户，邮政系统同时掌握所有订阅者信息。如今这一职能已被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平台接管。它们通过平台网络向所有受众分发媒体机构和个人用户的内容，同时对动态用户数据保持完全掌控。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台已全面承担起邮政系统的职能。

当埃隆·马斯克收购推特并将其更名为 X 时，他究竟获得了怎样的权力？他不仅拥有个人账号——本质上就是他自己的报纸——每天向两亿粉丝传播观点，还掌握着决定谁能在平台发声的绝对话语权。推特曾突然封禁拥有 7000 万粉丝的特朗普账号，理由仅是：平台属私有财产，我们不再愿为您提供服务。仅此而已。该平台掌握的权力之大，堪比邮政局宣布不再投递某份报纸——这等同于彻底封杀。特朗普

被封号事件引发全球震动。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谴责此举"不可接受"，却无济于事。在中国，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此类事务属于国家主权范畴。你或许拥有像李彦宏或张一鸣那样的数字平台——拥有合法所有权、商业价值和经营权。但你并不拥有平台所衍生的主权权力：用户数据资产的处置权、数据安全管控权，以及塑造公民意识形态的权力。这些权力属于国家。即便由行政机构行使，也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当然，更完善的法规和新法律仍可能需要出台。近年来，中国在治理大型平台方面经历了一场必要的"补课"。"网络主权"概念深化了我们对互联网平台的认知，标志着中国在坚持"不盲目照搬外国模式"原则的同时，正与时俱进地推进网络治理现代化。

因此，今日论坛"团结"的主题——号召全球南方媒体联合对抗西方数字霸权——尚显不足。必须确立根本性战略：自主建设平台。以观察网为例，我们虽属媒体机构，却早在2017年就意识到必须转型为平台。我们开始着力建设平台。首先为用户群搭建小型社区平台，共享编辑权限让用户参与编辑流程。如今我们拥有全球170多万实名注册用户，他们与平台紧密相连。我们共同生产内容，形成我所称的"超级编辑部"——由数十万"认知参与者"组成。我们的内容并非几十名编辑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与百万公民媒体工作者协作的结晶。平台设有内部机制，将符合平台价值观和议程的高质量内容推至显要位置。优秀贡献者在观察网获得曝光度并建立个人影响力。

我们衷心感谢上海市网络管理局的及时支持，助力我们实现创新合规，建立稳定的本土化平台。我们积累的影响力不同于单纯的流量规模——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清楚谁在阅读、谁在观看、谁在互动。我们深谙用户追随与支持的缘由。他们不仅拥有Guancha.cn账号，更活跃于微博、微信、推特、YouTube等平台。通过参与平台内容策展与社群互动，他们的媒体素养持续提升，产出内容日益专业且具影响力。

用户之间相互塑造影响，正如他们与编辑团队的互动。这170万用户将平台上经过提炼、价值观相契的内容传播至更广阔的数字空间。他们既能分享观点，也能展开辩论。其影响力远超任何官方账号单独能达到的效果。这种平台化模式彻底重塑了我们的媒体实践。

再看欧盟：尽管由众多发达国家组成，却未建立任何自主运营的数字平台。俄乌战争爆发不到三周，欧洲网络空间便发生剧变。任何敢于为俄罗斯辩护的欧洲政要或公众人物——甚至只是从欧洲自身利益出发发表几句公正且立足历史的言论——都会遭受残酷的网络攻击并面临严重后果。究其根源，欧洲人使用的核心平台均由美国掌控。这些平台仅用两周便在欧洲网络空间编织出针对俄罗斯的道德恐吓战——甚至无需宣布战时管控。前德国总理施罗德与默克尔便因此被彻底封口。缺乏自主数字平台的欧盟，实质上丧失了网络主权，其网络空间悲剧性地沦为美国的数字殖民地。（试想：若当今阿拉伯世界拥有自主数字平台，加沙民众的呼声就不会被西方平台上的亲以色列叙事轻易淹没。阿拉伯网民的世界观就不会被西方话语霸权如此深刻地塑造。他们就不会困守于孤立的个体视角，团结就不会如此难以实现。）

我们的编辑部拥有逾百名员工，但仅需十人即可运营平台并服务超过170万活跃用户——包括粉丝与编辑线下互动的活动。由于开放部分编辑权限，Guancha.cn如今不仅在其他平台拥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追随者，更形成了广泛的支持者联盟。核心粉丝群体在其他空间也保持活跃，将Guancha.cn视为大本营。有人在平台贡献

内容两三年甚至更久才"毕业"至其他平台，而每年都有新作者持续涌入。Guancha.cn 如同互联网大学——全天候开放，永不休校。

近年来，观察中国网汇聚了金灿荣、张维为、沈毅、卢新宇等众多高水平学者，他们持续产出优质内容。这些学者既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拥有敏锐的网络意识，以接地气的表达方式与网民互动，积极塑造和影响着我们的用户群体。编辑与平台用户在日常互动中持续相互塑造：忠实读者常在每篇文章下留下高质量的深度评论，编辑们也以同样的深度回应。正是这种学者、用户、编辑之间，用户与编辑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相互分享、相互塑造的动态机制，使数字媒体平台得以持续产出优质内容与服务，也构成了媒体平台运作的核心本质。

在这个数字革命时代，观察网始终致力于为数字媒体开辟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一个建立在与用户和粉丝始终相伴基础上的模式。使这种联系成为可能的正是平台本身。它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活水源头，确保我们的编辑保持专业投入和情感共鸣。我们的工作与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产生共鸣。它植根于公众的常识，并通过持续的网络智力与情感互动得以塑造。这种方式不仅赢得市场认可，更确保了长远发展。我称之为"超级编辑部"，因为当它运转良好时，蕴含着巨大而多元的潜力。过去十年间，观察网在对抗西方话语霸权和传统网络精英固有垄断时展现的认知实力与战斗力——即我们所称的"人民网络战"——主要源于这一模式。

近年来，本土化平台战略使我们有信心应对互联网革命带来的两大挑战：在公共影响力竞争与长达十年的话语权争夺战中，一旦本土化平台战略奏效，便可能在整个互联网领域取得成功。互联网具有辩证特性——既具本土性又具全球性。本土层面的崛起可触发全球层面的崛起。正因如此，观察网的本土化战略使我们得以构建出在更广阔网络空间中具有无与伦比影响力的数字平台。

在中国媒体中，观察网与《环球时报》是西方主流媒体最常引用的两大来源。尽管常被贴上"民族主义"标签，我们对此并不在意。只要他们引用我们——哪怕只是瞥一眼——就意味着已被我们影响。我们频频被引用的根源，在于拥有中国网络世界中强大而忠诚的读者群。换言之，我们拥有话语代表性，这转化为真实影响力。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关注我们。这与我们编辑团队关注《纽约时报》的逻辑并无二致——因其在美国具有重大影响力，其读者群体具有广泛影响力。因此无论它说什么，我们都予以关注。同样的逻辑反向适用：观察中国网在中国拥有具有影响力的用户群体。凭借如此庞大的忠实读者群，每逢重大新闻事件，西方主流媒体都会关注"我们如何解读"。即便他们贴标签或污名化，我们亦无所谓。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本土化平台战略：从与用户群体的有机互动中汲取能量。如同游鱼入海，我们不在意他人如何称呼——只管在自己的水域游弋。

事实上，构建这样的平台成本不高，只需适度投入。只要能吸引足够多的全球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忠实追随者，就能打造出一个与用户共享一定自主权的独特平台。在观察网，我们的编辑团队虽小而年轻，但学者与粉丝遍布全球，涵盖各年龄层与社会阶层。整个中文网络中，各领域顶尖知识社群与意见领袖在此汇聚。由此可见，本土化平台战略与跨网络影响力生成实为相辅相成。若缺乏此类战略，你的媒体终将沦为他人平台上的账号，命运受制于人。对当今全球南方媒体而言，若无本土化战略且无法自主掌控核心平台，其声音与影响力必将受限于西方垄断平台的准入边界。依赖其恩赐与包容，既非平等对话亦非真正共享——更谈不上实质性抵抗。

1.5.4 从传媒视角看中国人对非洲认知的变化

· 发言人：沐涛

· 年份：2023

中国人对非洲及非洲人认知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全面、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

一、古代中国人对非洲的认知

中国古代对非洲的确切记载始于唐朝杜环的游记《经行记》。公元 751 年唐朝跟阿拉伯帝国爆发怛逻斯之战，结果杜环所在的唐朝军队战败，他被俘虏，在中亚、西亚及北非等地停留十多年，写下了《经行记》。其中有对摩邻国人的肤色和生活习惯的记载：“摩邻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鵝莽。鵝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据考证，摩邻国为今天索马里的摩加迪沙。

到了公元 12 世纪南宋时，对非洲的记述已向南延伸到今桑吉巴尔，地理学家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写到：“土产大象牙、犀角。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

到 15 世纪初，明朝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时，四次到东非沿海地区，他的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和巩珍等人，分别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对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述更加详细，主要为对埃及、索马里和肯尼亚沿海城邦的记载。如费信在《星槎胜览》中对摩加迪沙（木骨都束）记载：“男子拳法四垂，腰围梢布。女人发盘于脑，黄漆光顶，两耳挂络索数枚，项带银圈，缨络垂胸。出则单布兜遮，青纱蔽面，足履皮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公元 1389 年）绘制的《大明混一图》，对非洲的地貌有了粗浅的认识，如非洲大陆呈倒三角形，尼罗河的大致走向，以及非洲内陆的大湖区域等。地图中还显示在非洲大陆的中心有一个大湖，这可能是根据阿拉伯的传说绘制的。因为在传说中曾写道“撒哈拉沙漠以南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湖，其面积远大于里海”。地图上南部非洲的好望角，海陆线条精美，形制一目了然。

二、晚清中国人对非洲认知的变化

与古代相比，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形成，中外交往的增多，以报刊、图书为代表的中国媒体对非洲的介绍日益增多，出现了如下二个变化：

一是晚清知识分子开始把中国的命运与非洲连在一起，中非同受西方列强的殖民、欺凌。当时的《外交报》、《清议报》、《东方杂志》和《申报》（1872~1949 年）等几家报刊在传播非洲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非洲 19 世纪的变革图强运动，包括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有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埃塞俄比亚的抗意卫国战争、南非的英布战争都有集中报道。

二是开始出现含盖全非洲的出版物。如林则徐主持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虽然以编译为主，但贯穿了编者“放眼世界”、变革图强的思想，在地理上对非洲的大河大山、沙漠等主要地貌都有较前更

全面的记载，并对各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习俗都有简明扼要的介绍。记述的内容不再只是非洲人的外在特征和生活习俗，已扩大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

三、20世纪50~80年代媒体对非洲的政治热情

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媒体，如《人民日报》等报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以报道非洲国家独立运动为主，在1955年万隆会议、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和70年代初坦赞铁路修建等重大事件期间，对非洲给予热情报道。同时，非洲概况和独立运动论著被大量发表，如：吴秉真的《从黑夜走向黎明的非洲》（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吴休的《埃及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1956年通俗读物出版社）、《非洲列国志》（195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范涌《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言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5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一群来自非洲的朋友时指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忙，在一二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直接推动了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和人才培养。1961年7月，西亚非洲研究所成立。

在60至70年代，一批非洲地区或国别著作、领导传记被翻译出版，最初作为干部读物内部出版，后来走向社会，人们对非洲的了解又进了一步；在大众传播方面，纪录片《坦赞铁路》《坦桑尼亚的中国医生》、1973年马季、唐继忠相声《友谊颂》等家喻户晓，非洲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得到升华，树立了“兄弟”“朋友”形象。

四、20世纪90年代后迎来对非洲的全面认识

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非交往的增多，特别是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媒体有关非洲出版物和文章，包括网络文章、短视频等出现爆炸性发表，民众对非洲的了解不再是片面的，而是出现多层面、立体式的。

在政府和学界的讲话、文章和著作中，对非洲在当代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基本诉求的支持，以及非洲发展的前景和中非关系现状，持乐观、积极的看法，对非洲的研究趋于深化，提出在未来的发展中，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但是在民间层面，对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状况，也存在一些负面认识，贫穷、落后、疾病流行、艾滋病、战乱不断被夸大报道。随着中非间的交往越来越多，特别是民间的交往急剧上升，一些认识上的差距导致相互摩擦也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

因此，对非洲的客观宣传、报道，让普通民众客观认识非洲，是学界、媒体界等义不容辞的责任。反之，也是如此。

1.6 数字主权:全球南方的新万隆时刻

1.6.1 从关键矿产到关键数据——全球南方的数字主权之路

- 发言人: 坎巴勒·穆萨武利
- 年份: 2025

我们将探讨一个与我息息相关的话题。我对科技充满热情,但同样热衷于刚果事务。当前全球正围绕矿产资源与数字空间展开深刻变革。我们尚未充分理解所谓"数字空间"的内涵。当我与那些对科技领域不甚关注的人交流时,这个问题变得愈发清晰:我们该如何阐释其重要性?

你正身处数字空间——这片疆域。回溯 1950 年代万隆会议,与会者提出必须行使主权。其根源在于各国深感国土与治理权未在掌控之中,因而需要联合起来争取独立与主权。数字空间正在发生变革。数字空间即领土。谁拥有这片空间?有人宣称它是自由空间,但人们总在某处拥有领土——有些人仍在争取,却已占据部分疆域。所以,你身处数字空间。你掌控着什么?若你无法掌控任何事物,他人便会主宰你的数字空间。正如独立国家渴望掌控自身事务,若从这个角度理解,便能明白数字主权为何至关重要。它决定着我们的一切行动——从医疗决策到国家安全,乃至治理方式。

第二点在于:当前数字空间的掌控权集中于少数个人、企业及特定国家手中。权力高度垄断,主要由硅谷科技巨头把持。但此刻身处非洲大陆的我们,必须高举夸梅·恩克鲁玛的旗帜。在审视权力格局时,我们该如何行动?是否需要遵循特定路径?我们主张目光向东而非西方。我们着眼于未来——之所以必须前瞻,是因为我们需要跨越式发展,借鉴现有最佳实践,从而为非洲人民打造更优解决方案。

我曾提及 1955 年的会议。各国领导人——周恩来、纳赛尔、恩克鲁玛等人——齐聚万隆,当时他们思考的是政治独立问题。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恰巧相聚北京。为何要在北京以数字主权为背景讨论万隆会议?正如当年他们探讨政治独立问题,当今最紧迫的议题之一便是:谁拥有我们的数据?谁从中获益?对社区而言,这个问题如今更为迫切。数据即财富,我们必须重新掌控数据。

然而数据依然抽象。究竟是什么让它真正运转起来?是矿物基础。来自非洲大陆的矿物。非洲大陆蕴藏着绝大多数关键矿产。我的祖国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全球约 70% 的钴资源——这种关键矿物是电动汽车、数据中心乃至人工智能竞赛的必需品。但矿产开采过程中,刚果人民却未能从中获益。

当我们构想建立公正世界乃至实现数字主权时,必须同时确保资源主权。纵观全球人工智能竞赛格局,不难发现美国正全力确保关键资源的获取渠道。正如美国为掌控委内瑞拉石油资源所采取的行动,刚果民主共和国与美国签署的 3 万亿美元协议同样值得深思。请注意,不是 10 亿、20 亿或 100 亿,而是 3 万亿美元的资源换取与美国的和平。他们正在确保资源控制权。我们在推动数字主权进程时必须确保:支持那些为资源流向服务人民而奋斗的人们——正如卢蒙巴遇刺前所倡导的那样。

数据流动正如殖民剥削时代的资源流动。人类创造数据，数据生成即遭攫取。所谓攫取，就是你的数据最终流向某处服务器。你创造的数据终将落入某处数据中心。当数据进入中心后会发生什么？价值由此诞生——这些数据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AI模型日益智能，进而催生各类产品。当最终产品问世时，那些真正创造数据的人却毫无收益。这是 21 世纪最狡猾的窃取形式之一。我们所有人都在无偿生产数据，却浑然不知其蕴含价值。我们被灌输数据毫无价值的观念，实则恰恰相反。当普通民众意识到——等等，这简直重演 1885 年瓜分非洲大陆、掠夺资源的历史——我们便开始要求掌控数据的提取方式、存储位置及受益方。

我坚信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非洲拥有独特机遇，可在特定框架下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合作，即鼓励非洲各国政府及全球南方国家在金砖国家框架下运作。上海设有金砖国家人工智能中心，汇聚学者、研究机构共同探讨数字空间的发展路径。非洲拥有丰富资源，拥有年轻人口持续产生数据，且文化多元。在人工智能领域，非洲具备快速发展的潜力。若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运作，我们就能相互学习借鉴。

以我们在加纳的实践为例：当地少数开发者组成的加纳自然语言处理小组，已开发出远超谷歌翻译的翻译工具——但你们可能从未听闻。加纳年轻开发者打造的语言翻译系统性能更优，却在谷歌主导的领域中被忽视。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大力推介他们的名字，希望你们能实际测试这款名为“Twi”的翻译工具。他们的成果具有实际影响力，却鲜为人知。与这些在基层构建本土化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人士合作至关重要。

除了这些技术工作，我们在加纳启动了一项名为“超越人工智能”的倡议，其背景是去年 11 月加纳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我们注意到一个缺口：技术专家和极客们在讨论人工智能，而绝大多数民众却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无所知。我们希望开展社区互动：如何让加纳普通民众参与人工智能讨论？例如某场活动命名为“人工智能与肯基价格有何关联？”肯基是加纳传统食物——类似于富富，属于淀粉类主食。我们与普通民众展开对话，发现的现象令人着迷。普通公民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如何运用它？活动中我们还开设了工作坊。有位年轻女商人发现，借助人工智能模型能制作宣传单，她坚持要带着为自己生意设计的宣传单离开工作坊。这正是她参与的环节。第二个层面是数据素养项目，旨在提升公众对数据议题的关注。我们坚信非洲数据是这场人工智能竞赛中最珍贵的资源，因为非洲在数据领域占据独特地位。虽然我们教导人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模型，但更重要的是引导社区参与数据治理议题的教育与讨论。最后，我们还致力于推动立法者参与——现场就有一位立法者。我们正积极与立法者沟通，尤其考虑到加纳当前有 13 项数字领域法案同时推进。这正是我们向立法者建言献策的契机。诸如“超越人工智能”这类项目，可让受人工智能影响的人群参与本国实施策略的制定。

接下来谈谈数字主权，特别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脆弱点。去年 2024 年，包括加纳在内的数百万非洲人遭遇互联网中断。原因在于某条海底光缆被切断——而我们对这些海底光缆毫无控制权。此事本应为加纳乃至非洲民众敲响警钟：我们对数字空间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上月又发生新事态。当亚马逊云服务（AWS）离线时，众多在亚马逊平台开发应用的程序员受到波及。或许有人不知此事，但受影响者实则众多。我们不断目睹这

样的案例：当我们投身数字化领域时，突发状况却令我们束手无策。那么，如何确保此类事件不再重演？

这正是我想阐述的愿景——数字万隆愿景，这个理念竟源自马来西亚。我们从约翰那里听到了更多相关信息。今年八月，我们与多位学者专家会晤，探讨当今世界在数字主权议题上的发展路径。从非洲视角出发，我们认为既要向世界学习，也要向世界分享我们的经验。

每次访华我们都在学习中国的技术标准。非洲国家必须参与甚至主导政策制定。我们需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这绝非简单喊出“进驻并修建基础设施”就能实现。我们必须善用“一带一路”2.0 版。中国正在非洲大陆开展合作，修建道路和基础设施。能否打造更完善的“一带一路”2.0 版，重点投资于让非洲民众真正受益于数字空间的关键基础设施？

我们必须以大陆整体、集团形式进行谈判。美国采取逐国接触策略——每个国家签订不同协议。加纳可能不与科特迪瓦对话，但美国正同时与两国政府签署影响整个非洲大陆的相同协议。非洲国家必须以集团形式应对科技巨头或任何希望进入非洲大陆的实体。

知识共享至关重要。每次我回来，你们都听我提到金砖国家人工智能中心。在访华期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令我印象深刻。期待下次访华时能汲取经验，在相互尊重与尊严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推动非洲大陆转型，并在全球南方产生影响。

谢谢。

1.6.2 马来西亚与东盟视角下的数字丝绸之路

- 发言人：彭润年
- 年份：2025

在深入探讨具体议题前，我将先作总体阐述，以厘清数字主权与人工智能主权的战略意义，以及这些议题如何在国际秩序中演进——尤其在美国对特定国家政策中的体现。这对我们作为全球南方成员国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需要阐明几点基本观点。尽管本专题聚焦人工智能主权，但我要强调：人工智能主权的重要性远超数字主权。它正日益成为主权的本质形态——纯粹意义上的主权。最终它将决定主权如何行使、人类价值如何彰显，其治理范围将覆盖三维现实世界而非仅限于“网络空间”。我们习惯以“网络空间”为隐喻，但人工智能将统治三维世界。它代表着能动性、智能、行动与历史。若放任其发展，它将重塑人类历史；正因它塑造历史，它也将决定未来——要么我们赋予它人性，要么它将使我们异化并奴役我们；要么我们实现其社会化与集体化，要么它将分裂、原子化并殖民化人类。此事绝无“如果”或“但是”的余地，因为我们早已目睹因自满而错失浪潮的教训——无论在非洲、亚洲、欧洲还是拉丁美洲。面对美国平台与社交媒体主导的数字浪潮，我们此刻正奋力进行着后方防御战。

如今我们面临着全新且更强大的挑战。我要强调这种技术的威力。罗伊和杰夫也展示了这项技术能实现什么。数字平台放大了人类创造的信息。而人工智能则能自主

生成并部署具有说服力的代理，存在外国势力、网络水军、政权更迭等因素影响国家政治格局的威胁。数字平台只是有限度地放大人类创造的内容。而人工智能模型则能以近乎零边际成本，通过文本、图像、视频和音频等形式，生成合成化、超现实且无限可变的虚假信息。它可同时部署数百万个自主运作的劝说代理，这些代理不仅传播信息，更能针对个体开展独特的个性化对话。其对个体的认知深度将远超现有技术——这正是个性化劝说的工业化进程。

我们甚至目睹了在加沙等地，人工智能如何被用于大规模工业化的一对一暗杀行动。这极其危险。人工智能正将经济权力从数据榨取转向代理自动化。丧失数字主权意味着外国实体将掌控我们的平台；丧失人工智能 主权则意味着帝国势力——尤其是美国——将控制塑造我们文化、主导商业、并自动化社会各层级决策的智能体。这是国家与个人自主权的根本性转移。世界秩序之争的核心战场正在此处展开。

现在让我谈谈那些真正棘手的细节。身为马来西亚人，谈及此事我深感难堪，但我国正成为警示世人的反面教材。马来西亚实为全球南方国家中数字技术主权应用的领头羊，更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节点——既是美国第二大半导体出口国，也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它已成为国际秩序中的角逐之地。

马来西亚近期与美国签署了互惠贸易协定。这份协定对主权国家而言极不平等且极不寻常。此类协定通常只出现在被占领国家，即便在网上搜索也绝无仅有。文本分析显示，马来西亚向美国作出了至少 104 项承诺——不仅是让步，更是承诺服从美国的安全立场、制裁措施和贸易限制。反观美国仅作出四项承诺——实质上仅有的一项：不提高关税。此项承诺占据了协议的全部篇幅。马来西亚关税水平已达 19.10%，而作为美国不提高关税的交换条件，马来西亚放弃了诸多权利，特别是协议第(3)条所载的数字主权。

这场战役真实存在于三维世界，其影响将波及我们所有人。若贸易关系破裂，马来西亚的模板部署模式已昭然若揭——相同模板正向其他东南亚国家推进，加纳恐怕也难逃此命运。我建议大家阅读白宫网站公开的协议文本，其中包含诸多书面承诺：禁止马来西亚通过 DNS 监管封锁或重定向美国网站；放弃数据本土存储权；与“第三国”签订数字协议前须征询美国意见——猜猜哪个第三国？

当今人工智能发展主要存在两种模式，而具备开发前沿模型和完整生态系统技术实力的国家仅有两个：美国和中国。两国对人工智能部署的愿景截然不同。美国将经济赌注押在人工智能上——其股市被七家与 ChatGPT 和英伟达相关的公司主导。人工智能也是其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西方思维存在深刻的文化问题——执着于构建某种数字神明，在缺乏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向数据中心倾注资源，坚信此神终将诞生并主宰世界。中国模式则截然不同：工业化、嵌入式、物质化，致力于增强人类能力与社会功能，并与特定的政治经济体系及法律秩序紧密相连。

马来西亚拥有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是建立人工智能治理机构的先驱。今年四月习近平主席访马期间，我本人协助促成了中马数字协议，其中包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的平等协作方案——协调数字标准、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等。尽管该国仍在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但该协议却取消了对美国企业的数字服务税，阻断了数据本地化和主权云政策，阻止强制本地技术开发，放弃了关键基础设施控制权，并让渡了国家域名系统流量控制权。该协议赋予美国对马来西亚与 30 多个国家数字协议的否决权。

马来西亚是多边主义竞争领域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东盟轮值主席国——这令人遗憾。该国在区域多边秩序与安全架构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正是东盟核心地位原则的体现。马来西亚本可发挥重要作用，助力全球南方国家迈向多极化秩序。该国在数字保护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在数据保护、人工智能主权及数字主权等条款上态度坚定。例如：我们已取消对美企交易的附加税；去年第二轮谈判中，在首轮谈判因压力排除华为中兴参与的情况下，我们仍采纳其电信基础设施方案。

而这份协定正将所有成果置于危局与疑云之中。其条款将贸易协定与关税武器化，服务于特定地缘政治目的。公平地说，政府声称我们不受约束且存在退出条款，但在如此协定中作出 104 项承诺至少是可耻的，与我们为全球南方国家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请仔细审阅这份文件，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在此讨论。该协议还迫使马来西亚配合美国单边安全政策：每当美国采取限制性措施时，马来西亚必须同步实施同等限制，并全面配合美国出口管制，禁止任何"填补漏洞"或"削弱管制"的行为。人工智能与数字主权之争正激烈交锋。除非我们集体捍卫主权，否则将被逐个击破——马来西亚几乎已然如此。我认为这并非终局，但堪称警世之鉴。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的生活方式与之格格不入，却仍难逃此局。我们显然身处斗争漩涡，我希望所有人清醒认识其本质。在中国之外的世界，生存绝非易事。

让我快速以万隆会议作结。它提醒我们主权对全球南方意味着什么：这并非欧洲国家定义或虚构的西方主权，而是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捍卫的权利。若不理解这种捍卫的对象，便无法理解主权为何对全球南方如此重要。万隆会议在启动 50 年后更提醒我们：主权必须集体捍卫。单打独斗，我们的国家都力不从心。马来西亚便是典型案例。若仅阅读协议文本——这并非马来西亚故事的全貌——会误以为马来西亚已被排除在局势之外。

非常感谢。

1.6.3 大众数字主权

- 发言人：提卡·莫雷诺
- 年份：2025

在听了前四位发言者的发言后，我的任务变得更容易了，因为我将根据我们作为全球南方（特别是巴西）人民组织和运动的经验来发言。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围绕人工智能和我们在巴西所说的数字主权，建立一个一致、坚实和广泛的政治议程是一项挑战。

在分享我们的政治建设过程时，必须指出的是，在我们的国家，参与民众运动的人往往只有手机才能连接互联网，而手机只能使用 Facebook 等公司提供的免费数据。因此，我们是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处理这个问题。正如本小组讨论所指出的，人工智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争议之一。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无法将其视为一种与当代地缘政治争端无关的技术，也不能将其简化为聊天机器人世界——每个人进入该世界，提出问题或发出指令，然后得到一个可能正确、有用或完全基于统计数据的虚幻答案。

帝国和中国都明白，这场争斗的赌注是能否引导人类的发展和方向。而且，正因为中国是这场与美国的争斗中的参与者，而且有能力赢得这场战斗，我们全球南方的人才能考虑人工智能可能会为我们的人民服务。中国的经验表明这是可能的，证明人工智能确实需要被理解为生产力新品质的一部分。它不仅加速了现有的生产过程，而且有潜力从质上改变社会关系，改变我们彼此之间、与工作以及与生产生活的工具和工作流程的互动方式。

两周前，我们在巴西与世界妇女大游行（我参与的运动）、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和国际民众合作协会（IAPC）的伙伴们聚在一起，开展一项大众教育活动，并创建了一个名为 IARRA 的人工智能平台，用于土地改革和农业生态学。这是巴西推广农业生态学战略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组织开始认识到必须推广人工智能，将我们的需求和人民置于其发展核心的开始。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正处于两种历史可能性的博弈之中。一方面，它具有变革人类能力和社会关系的进步潜力，正如中国将人工智能融入整个社会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从生产链的规划和创新到城市、乡村、农业乃至人口转型中老年人护理的组织。中国通过监管、规划、开源和主权来实现这一切。

另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在衰落和危险阶段由大型科技公司主导的人工智能项目存在切实风险。在这个项目中，人工智能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力，是军工复合体的一部分，而硅谷的大型科技公司现在已成为该复合体的附庸。人工智能具有这种双重用途的特点。John Pang 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即人们的使用和军方的使用。我们看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的例子，谷歌参与了人工智能项目，该项目以自动化方式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房屋进行攻击，造成大规模杀戮。

对于我们巴西和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要参与这场战斗、建立数字主权，就必须认识到我们并不处于最有利的地位。随着科技巨头与特朗普政府结盟，我们面临着反对国家立法尝试监管和保护数据的压力。当我们试图以最基本的方式对平台进行监管时，无论是针对数字工作平台，还是限制社交媒体平台对数据的政治利用——考虑

到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干扰我国选举进程，而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极右翼势力——我们都遭受了威胁和关税惩罚。

巴西在结构上更依赖外国技术，我们缺乏一项国家战略计划，不仅是在数字领域。我们没有投资自己的数字基础设施，而是将一切都外包给大型科技公司。据保守估计，去年巴西政府向微软、谷歌和红帽等外国公司支付了 100 亿 雷亚尔的软件许可、云解决方案和安全应用费用。与此同时，巴西人工智能计划提出在四年内投资 230 亿雷亚尔，是上述金额的两倍，这简直是微不足道。我国计划实施的人工智能计划甚至尚未付诸实践。

巴西的医疗保健领域就是这种依赖性的典型例子。公共医疗系统经历了数字化转型，通过政府开发的数字应用程序提供医疗服务，从而收集了大量巴西民众的健康数据，包括现在和过去的所有健康数据。然而，这些数据存储在亚马逊的云端，我们为此支付了高昂的服务费。亚马逊则利用这些数据训练其模型并开发人工智能系统，然后将这些系统卖回巴西和南方国家。我们再次只能购买现成的技术，放弃发展自身科技的能力和潜力，这种情况早在 80 年代就被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家们提出过。我们放弃了想象，认为我们能够真正参与这场竞争。

除了矿产和数据出口商之外，我们还试图理解南方国家如何在八层数字基础设施中从属和依赖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四层物理基础设施（能源、电信、硬件/设备和数据中心）和四层逻辑基础设施（软件、系统开发、数据库和人工智能）。在巴西，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层面都受到全球北方跨国公司的控制，这是 90 年代物理基础设施私有化以及巴西在逻辑层面的研发投资不足的结果。

因此，数字主权不能仅将"数字"作为形容词；它必须与国家与人民的主权计划相联系，该计划必然包括能源、矿产、技术和粮食主权。我们不能在能源等公共资源开采地区建立高科技园区。

数字主权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大型科技公司，尤其是谷歌、亚马逊和微软，推销的是"主权即服务"，只关注数据的位置（主权云），而巴西已经落入了这个陷阱。这条道路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欧盟对数字主权的看法侧重于个人隐私，而忽略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在指导我们的中国理论中，数据是提高生产力质量的关键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它具有独特性：可同时被多个参与者和代理人使用，其价值随规模扩大而增长，并具有创造新现实、新知识和新可能性的生成能力。

我们捍卫对数据的控制权，就是捍卫整个生命、领土、生产方式以及人类共享未来的可能性。根据金砖国家民间理事会提出的提案，我们认识到，人民的数字主权并非将主权简化为一种需要争取的法律地位，而是将主权视为人民权力持续行使的过程。正如我们在拉丁美洲倡导区域一体化一样，数字主权要求在区域一体化和南南合作过程中体现团结、互惠和互补。这些是推动我们主权的动力，也是实现主权的可能性条件，因为我们无法仅凭一国之力从现在开始就摆脱这种从属和依赖的局面。网络和基础设施的共享应被视为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我们将这一议程纳入我们已经开展的斗争：我们坚持技术多样性，抵制生活方式的统一化和同质化；我们认为，各国人民需要技术发展的主体，而不仅仅是现成技术包的使用者；我们坚持认为，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领域的公共研究与创新资金，必须致力于推动自由和开源技术的发展，并由国家和人民有效控制。我们还主张，需

要通过大众数字教育进行大规模培训，并由工人阶级组织制定应对自动化的公平转型政策。

最后，我们认为这场战斗不能仅靠专家的演讲或良好的论据来赢得。我们需要将这一议程带到每个角落，带到街头、郊区和乡村，将其融入民众运动和左翼组织的政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改变力量对比，与作为全球南方一部分的中国携手，坚定社会主义立场，最终击败帝国主义。

1.6.4 有序创新：人工智能监管的中国之道

· 发言人：郑戈

· 年份：2025

我认为团结协作应成为我们成功实现数字主权的基础。作为法律专家和法学教授，我的发言将聚焦法律层面，但将用"有序创新"来描述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路径。

全球普遍存在一种说法，即人工智能相关法律存在三种典型模式。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阿努·布拉德福德所著《数字帝国：全球技术监管之战》一书揭示了这三种模式：首先，美国主要推行"市场驱动模式"；中国被视为"国家驱动模式"；欧盟则采用"权利驱动模式"。探讨数字主权时，必须审视国家在整体格局中的角色。在我看来，这种分类更多基于意识形态而非对各国法律体系的细致分析。欧盟并非以权利为导向的体系——《人工智能法案》实际锚定于《欧盟运作条约》第 114 条，其核心立法目标是实现市场协调，即构建欧盟内部单一市场。欧盟展现的实则是风险规避型模式。美国不应被视为市场导向型模式，因为其联邦层面缺乏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美国国会制定的所有人工智能相关法律均针对其竞争对手。而从美国视角看，当前竞争对手始终是中国。众所周知，《TikTok 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立法总纲。美国可能既缺乏保护公民数字权益的法律，也无应对数字时代特定问题的法规。联邦层面所有涉及数字技术的法律，均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针对外国企业。

美国的国家安全概念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其他国家将国家安全用于捍卫自身主权，而美国则将其视为维护其在全球的霸权或主导地位的手段。

Table 1: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elated Legislation Models¹

Mode ²	Core Value Orientation ³	Legislative Goals ⁴	Primary Legislative Tools & Features ⁵	Representative Practices & Cases ⁶
China Model ⁷	Ordered Innovation ⁸	Balanc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isk control, enhanc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⁹	Progressive legislation, local experimental rules (e.g., fault-tolerant mechanisms), phased planning; emphasizing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 ¹⁰	<i>Next-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Plan</i> (Three-Step Strategy), local regulations (e.g., Shenzhen's <i>AI Industry Promotion Ordinance</i>) ¹¹
U.S. Model ¹²	Pan-Securitization ¹³	Maintaining technological hegemony, addressing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¹⁴	Domestic light-touch regulation (relying on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and soft law), external hardline sanctions (export controls and investment screening); security exception mechanisms ¹⁵	<i>CHIPS and Science Act</i> (technology blockade), <i>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i> (foreign investment screening) ¹⁶
EU Model ¹⁷	Risk Aversion ¹⁸	Minimizing social risks, safeguarding fundamental rights ¹⁹	Preemptive preventive rules (high-risk classification), mandatory compliance (e.g., impact assessments), ethics-driven legislation; emphasizing regulatory redundancy ²⁰	GDPR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 AI Act (four-tier risk classification and prohibited list) ²¹

因此，美国的国家安全理念正在破坏世界和平。可以说，美国模式是一种泛安全化模式，即以国家安全为名行任何之事。

II. Core Value Orientations		
Model	Driving Logic	Key Mechanism
EU	Risk Aversio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Dangerous product" classification • Ex-post fines over innovation incentives
US	National Security Hegemony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H.R.1's state preemption clauses • Algorithmic warfare export controls
China	Ordered Innovatio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Staged legislation (2020/2025/2030) • Fault-tolerant local rules • Ethics-by-design (Art.14 GenAI Measures)

中国的模式不应被视为"国家主导型"。我们发现，尽管中国尚未出台名为《人工智能法》的法律，但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已启动人工智能立法工作，只是推迟了立法进程。但若审视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会发现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体系。

首先，中国有三部针对数字技术的法律：2017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以及2021年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在此之上，还有多部细则法规覆盖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例如针对推荐算法、深度合成算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项规定。由此可见，中国已构建起涵盖个人权益、国家安全及创新保护等多元法律利益的AI法律体系。

Category ⁴³	Core Content ⁴³	Representative Cases/Examples ⁴³	Key Features ⁴³
Technology-Specific Regulation⁴³	Classified supervision of AI technologies/applications, emphasizing entity accountability and dynamic adjustment. ⁴³	<i>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Management Provisions</i> (2021), <i>Deep Synthesis Management Provisions</i> (2022), <i>Generative AI Service Management Measures</i> (2023) ⁴³	Agile governance: Rules dynamically updated to match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prohibits algorithmic abuse (e.g., price discrimination, addiction induction). ⁴³
Local Industrial Promotion Laws⁴³	Stimulates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through institutional support. ⁴³	Shanghai's <i>AI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motion Regulations</i> (2022); Pioneered "error-tolerance mechanisms"; Shenzhen's <i>AI Industry Promotion Regulations</i> (2023); Established dedicated funding and ethics committees ⁴³	Deregulation focus: Infrastructure co-development (e.g., smart computing clusters), public data sharing, and reduced pre-approval burdens. ⁴³
Rights & Security Safeguards⁴³	Protects national/personal rights by regulating computing carriers (networks), algorithmic fuel (data), and subjects (personal information). ⁴³	<i>Cybersecurity Law</i> (2016), <i>Data Security Law</i> (2021), <i>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i> (2021) ⁴³	Closed-loop constraints: Covers all technical elements (computing power, algorithms, data); grants individuals algorithmic opt-out and explanation rights. ⁴³
Ethical Governance System⁴³	Translates ethical principles (e.g., "human-centered AI") into enforceable compliance duties embedded in development lifecycles. ⁴³	Art. 4 of <i>Generative AI Service Management Measures</i> (requiring adherence to social ethics); Shenzhen Regulations Art. 21 (mandating corporate ethics committees) ⁴³	Context-adaptive implementation: Prioritizes preventive ethical constraints with "human-in-the-loop" mechanisms (e.g., manual intervention), differing from EU's rigid checklists. ⁴³
Industry Standards Framework⁴³	Bridge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legal norm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global collaboration. ⁴³	<i>National AI Industry Standardization System Guidelines</i> , Shanghai Regulations Art. 66 (empowering ethics committees to draft guidelines) ⁴³	Ecological shift: Integrates carbon footprint tracking and energy efficiency metrics, forming a "standards-laws-policies" tripartite model. ⁴³
Technical Elements Coverage⁴³	Governs AI's three pillars: computing power, algorithms, and data. ⁴³	Computing: <i>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Protection Regulations</i> (2021), "East Data West Computing" project; Algorithms: Ministry-level rules; Data: <i>Cross-Border Data Security Assessment Measures</i> (2022), Zhejiang's public data regulations ⁴³	Comprehensive oversight: Optimizes computing layout via policy incentives; constructs compliant data circulation paths. ⁴³
Japanese Reference Case⁴³	Japan's draft <i>AI Promotion Act</i> mirrors China's "ordered innovation" logic. ⁴³	Emphasizes na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and balanced risk-control innovation. ⁴³	Cross-jurisdictional validation: Confirms "ordered innovation" as a replicable East Asian governance paradigm prioritizing developmental pragmatism over ideological rigidity. ⁴³

这是我对该议题的分类。中国代表一种有序创新模式，通过不同法律应对社会各领域关切。美国模式在我看来是泛安全化模式，旨在维持技术霸权并应对地缘政治挑战。欧盟模式则是风险规避模式，将产品安全领域的法律理念移植到人工智能监管中，其风险分级方法便是典型例证。

我们发现，若美国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南方国家将无立锥之地——该模式绝不容忍任何对其技术、经济等领域霸权的挑战。

中国模式实际上为全球南方国家开辟了发展空间。就在几天前，我们讨论了中国开源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DeepSee 等多个开源模型。根据人工智能领域知名新闻来源 Hugging Face 提供的统计报告，全球十大开源大型语言模型中，有九个来自中国。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只是展现该系统如何向全世界开放的诸多方式之一。例如，巴西、刚果或马来西亚等全球南方国家，可基于中国创新者开发的开源基础模型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应用。随着开源浪潮的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时代的世界将迈向更公平、更具对话性且更具进步性的未来。实际上存在诸多法律细节因篇幅所限未能详述，本文仅勾勒人工智能治理的宏观理论框架。

最后我想谈谈几点结论。首先，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行替代方案，挑战了以美国主导的旧体系为基础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框架。其次，中国以分阶段立法、地方性试验和适应性序列为特征的制度弹性，有效平衡了技术创新与风险管控，既规避了欧盟的监管僵化，又摆脱了美国安全驱动的遏制策略。最后，这种模式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务实且契合国情的发展路径——相较于照搬进口的普世蓝图，更注重主权保障、能力建设与技术自主权。

1.6.5 人工智能在俄罗斯媒体的应用——机遇与挑战

- 发言人：卡米拉·尼格马图琳娜
- 年份：2025

我代表俄罗斯第二大高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去年我们庆祝了建校 300 周年，明年将迎来新闻学院创立 80 周年。我同时担任数字媒体传播系主任、政治学博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中心专家，并主持"新闻与媒体传播中的人工智能"硕士项目。

今日我将重点介绍两项研究：一是神经网络在俄罗斯各地区新闻编辑室的整合应用，二是我们如何为媒体行业培养人工智能专业人才。这里所指的人工智能主要涵盖生成式 AI 与大型语言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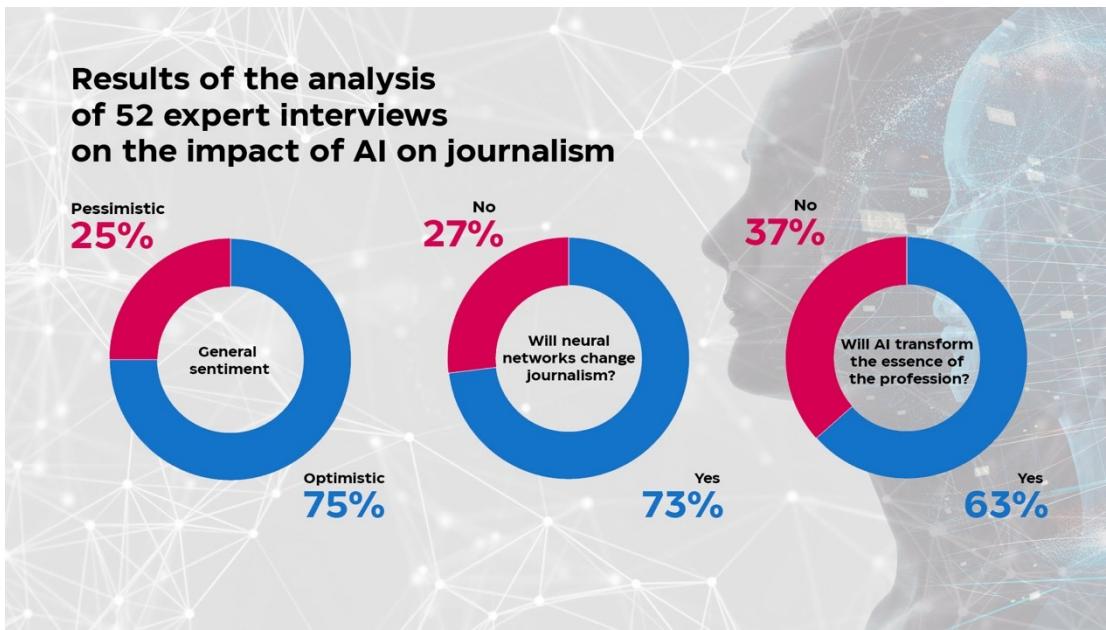
2023 年，我们以俄罗斯南部和北部地区为案例启动了神经网络应用试点研究项目。很快我们意识到，编辑实践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更广泛的社会与制度性挑战。这促使我们深入探讨人工智能研究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定位。

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共有 89 个联邦主体。为何我们聚焦区域研究？既有研究表明，俄罗斯不仅存在工业发展集群差异，媒体空间中反映的社会不满情绪也呈现区域性特征。因此我们决定直接从区域多样性切入，而非关注全国性媒体的成功案例。

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采用神经网络是地方媒体生存的唯一途径。我们所称的"起点 A"不仅指向 2025 年，更涵盖俄罗斯地方媒体长达 25 年的数字化转型历程。相较于传统新闻时代，这场转型既创造了新机遇，也带来了更复杂的挑战。

我们的理论框架还借鉴了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该思想将人工智能视为"数字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正在重塑生产流程、变革劳动力市场并加速数字经济的垄断化进程。

我们的第一步是研究公共话语的整体基调。如您所见，其基调总体积极。专业社群呈现两派分歧：一方视这些变化为数字进化的新一轮迭代，另一方则认为新闻业的本质正在被重塑。类似的分歧曾在早期数字转型浪潮中出现，学术文献中将其精确描述为"转型"而非"进化"。所谓本质性变革，指的是新闻规范体系的重构——涵盖伦理准则、自主性原则及客观性标准。新闻编辑室正形成新的职业规范（尤其针对技术专员），人类责任边界正向机器延伸。



第二步是在三个地区开展试点访谈。结果表明，目前尚无依据预期未来一两年内人工智能应用会取得突破性进展：新闻编辑室既无专项规章，也缺乏定向投资或大规模培训计划。现阶段我们收集了最主流大型语言模型及其适用任务的数据。正如您所料，这些模型主要基于 ChatGPT 和 GPT 技术。我们发现媒体管理者普遍持乐观态度，高度认可人工智能应用的潜在效益。我们在新闻编辑室实施大型语言模型及其他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国家级新闻编辑室中，人工智能主要用于预测分析受众参与度趋势，相较于生成图像或文本，这种应用更受编辑室青睐。他们提及的主要挑战包括：需要事实核查、遵守道德标准，以及出于道德或政治原因无法使用外国人工智能服务（国有媒体尤甚），但这些机构仍在继续使用。

试点研究的第二阶段在北部的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南部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及其他若干地区展开。该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的采用并无固定模式，但存在反复出现的要素。例如在某些新闻机构，变革自下而上启动：普通员工率先使用大型语言模型，随后向管理者展示成果。以《商业彼得堡》日报为例，其市场专员便搭建了营销电话接听聊天机器人。另一些案例则由上而下推动变革：如顿河 24 电视台由数字总监率先推行 AI 应用；雅库特地区的萨哈出版社集团则通过全员大规模培训启动实施。今年一月我受邀前往雅库特担任培训师。尽管我们未直接询问受访者管理层与创作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挑战显而易见。

地方媒体的另一共性特征是：缺乏专职人工智能专家，记者协会或高校院系未出台官方指导方针，且招聘时鲜少优先考虑具备人工智能技能的求职者。所有迹象表明，尽管 2025-2026 年尚未具备大规模系统性变革的先决条件，但行业认知度与素养正稳步提升。我频繁奔波于全国各地，所见景象发人深省：俄罗斯新闻编辑室的人工智能应用模式并非千篇一律。每个编辑部都在“发明自行车”，重复造轮子而非借鉴经验。全国各地的实践差异显著，坦率地说，地方层面可谓混乱不堪。

对媒体体系构成重要压力的因素是普通受众日常使用人工智能的速度，这比媒体机构内部的专业应用发展更快——两者截然不同。这可能导致受众期望与新闻编辑室

能力之间出现差距。另一压力源在于本土与外国大型语言模型间的竞争加剧。目前俄罗斯市场由两款本土 AI 领跑：YandexGPT 与 Sber 旗下的 GigaChat。尽管美国产品仍占主导地位，但 DeepSeek、Qwen 等中国模型正迅速追赶。越来越多的记者指出，外国大型语言模型因基于英语互联网数据训练，存在偏见倾向及答案框架问题。俄罗斯国内正有多项计划致力于开发自主大型语言模型。

由此回归媒体行业的系统性影响，我们可勾勒出 2027 年前国家与地区层面的预期趋势：

采用人工智能的新闻机构与仍在社交媒体领域挣扎的机构之间差距扩大——所谓“挣扎”，是指俄罗斯并非所有新闻机构都准备好开展社交媒体工作；

媒体素养与受众认知水平的鸿沟日益扩大；

精通人工智能的记者与保守派媒体管理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反之亦然；

在生产流程与社交媒体营销均实现 AI 优化的从业者与仍依赖人工操作者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包括专业人员与管理层薪资的差异。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讨论的并非又一次衰退或威胁，而是复兴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利用新兴机遇实现突破——尤其在地区层面。当前我们能分享全国性经验，但地区经验尚无法共享，正如我所言，该领域仍处于混乱状态。我认为分享经验——不是重复发明轮子，而是建立模式和算法以实现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是通过全球南方与所有国家开展合作的极具前景的视角。

在此适宜简述我负责的硕士项目：2024 年圣彼得堡大学与 Yandex 公司联合推出的“新闻与媒体传播中的人工智能”课程。该项目致力于培养具备人工智能能力的媒体专业人才。

我们的经验表明，没有产业合作伙伴的参与，自主研发是不可能实现的。实践工作必须融入学术环境。大学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技术发展速度快于市场需求，更远超学术界将其系统化并转化为教学材料的能力。因此，此类课程更依赖启发式思维而非演绎推理，毕业生能力更侧重于预见可能性而非简单复现已知成果。学习采用项目制模式，并由行业专家参与评估。本项目亦招收中国学生。

该硕士项目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媒体领域的人工智能专家，更要造就能够推动媒体生产创新并取得可量化成果的管理者。当前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通常涉及三方协作：新闻编辑室聘请 IT 专家，咨询语言学家，并在商业总监监督下完成技术整合。叶卡捷琳堡（位于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地区）某地方电视台的案例中，新闻编辑室自主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内容管理系统。该编辑室一名员工现正攻读我校硕士课程，但需特别说明：该软件内部整合了 OpenAI 解决方案。

该项目的重要内部合作方是圣彼得堡国立彼得·伊凡诺维奇·卡捷琳娜大学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中心。我们的学生在此完成实习，并参与聚焦工业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学术活动。每年至少四次，我们邀请媒体管理者分享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媒体生产自动化领域的实践经验。

2025 年的演讲者强调两大核心挑战：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危机，以及媒体从业者内部的专业信任缺失。例如，记者对公关从业者的信任度下降，反之亦然。

在 10 月举办的近期活动中，我们探讨了大型语言模型与人工智能代理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学生们展示了三款针对不同需求设计的聊天机器人项目。其中一款专为中国学生提供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信息导航服务。

但需特别强调：我所指的大型语言模型领域，我国正与国外（主要是美国）及中国本土模型展开竞争。然而在工业和军事用途方面，俄罗斯具备自主能力，我们拥有完全独立的数字解决方案。

非常感谢。

1.6.6 从多极世界到多极中心世界：通信经济的新范式

- 发言人：亚历山大·古德斯
- 年份：2024

当思考当今世界经济的困境与挑战时，一个童话故事浮现在脑海。故事里，残暴的怪物统治着一个国家，令民众饱受苦难。英雄们时而挺身而出，试图对抗怪物，却终究消失无踪。最终，某些英雄虽击败了怪物，却在胜利的瞬间奇迹般地化身为怪物，使苦难的循环永无止境。这个寓言警示我们：在构想世界经济体系变革时，绝不能简单地用一个统治者取代另一个统治者，这种做法无法为人类带来积极成果。基于这一认知，我们在科学、工程与技术领域寻求解决方案，聚焦于建立统一的数字经济交互空间，并将其与主权理念相结合。

互联网与数字化进程已使经济交互空间实现超国界化，催生出"通信经济"的实践可能。这使任何对象都能直接交互，旨在构建全球互操作性体系，在统一经济交互空间内实现最低交易成本。我们认为多极世界仅是过渡阶段，其本质具有不稳定性与不可持续性。我们倡导最终建立多中心世界，在此框架下，超国界特性不会与各国的文化、宗教、语言、社会传统及人类社群的主权相冲突。相反，共同制定的开放国际标准应确保对社会文化主权的尊重，从而完善统一数字空间内直接的超国界经济合作。

要理解当前全球局势，有必要简要审视谁从现行经济格局中获益，特别是美国的霸权地位。数据揭示了这种主导地位的实现方式：过去五年间，全球百强企业市值持续攀升，现已达到约 42.6 万亿美元。在百强企业结构中，美国占据约 77% 的总市值份额，欧洲约占 8%，中国则贡献约 6-7%。与此同时，截至 2025 年 5 月，美国所谓"七巨头"（指美国股市中表现卓越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集团，包括 Alphabet、亚马逊、苹果、博通、Meta Platforms、微软和英伟达）的市值已接近 16 万亿美元。这表明美国及其龙头企业远超其他国家，且这种差距近年来持续扩大。此外，截至 2023 年末，银行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利润最高的行业，占据全球总利润的约四分之一。能源与工业两大板块的利润总和仅与银行业单一板块相当。

当今全球经济本质上建立在通过技术维持单边主导权的尝试之上。其支柱是围绕储备货币核心佣金中心构建的现行金融体系，并由其资助的国际机构提供支撑。对数字空间的主导影响力则通过对技术与内容的同步掌控实现。金融与银行业的收入及利润本质上源于向资源型实体经济部门施加的交易成本。

我们主张转变视角：与其试图在现有经济模式中调整自身位置，不如聚焦于开发并逐步过渡到全新经济模式。我们称之为"通信经济"——这是任何对象间直接交互的经济形态，在统一数字空间内实现全球互操作性，并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在此新范式中，金融体系将不再是主导者，而成为统一数字经济交互空间中的端到端技术之一。

这个统一的数字经济交互空间可基于数字孪生互联网（物理或信息对对象数字孪生的本体论网络）构建，为数字对象的存在与交互提供环境。其规则与统一性由开放标准和协议定义，这标志着全新全球服务——商业、工业与金融互联网的诞生。

从"网页互联网"（万维网）向具有独特语义定义和本体论连接的数字孪生互联网的转型，将实现同一经济实体的对象与其他实体业务流程的无缝集成。

在当今信息技术世界中，个人、企业及国家均缺乏真正的主体性。因实际或被认定的数字平台规则违规行为，他们可能被切断银行服务、社交网络及交易平台的接入。相反，在统一的经济交互数字空间内，参与者的主体性将具有内在属性。其开展经济活动的能力、访问个人数据及当前账户的权限，均不受第三方阻断。统一数字经济交互空间中的参与者将成为自身个人信息的拥有者与整合者。

在技术方案层面，我们建议开发并部署基于分布式控制操作系统与开发工具的新技术栈。这将极大简化复杂集成系统的开发流程，实现信息、实体与智能代理共存的空间构想。需特别指出的是，当前累积的技术债务阻碍了信息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及数字空间可信环境的构建。然而这些问题至今未解，根源在于技术主导权概念仍依赖四十多年前的解决方案。本方案旨在应对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与复杂性挑战。

我们同时建议将新型金融系统作为统一数字空间（UDS）的端到端技术之一。该系统将基于接入处理中心——一个由地理分布式中立数据中心构成的网络。该技术旨在防止任何单一主体垄断金融领域，而中立数据中心的地理扩张将进一步提升系统对所有参与者的可靠性。

第二编 全球南方发展理论

2.1 突破西方束缚的理论与实践

2.1.1 全球南方从第三世界计划到情感新浪潮

- 发言人：维杰·普拉萨德
- 年份：2024

在巴西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秘鲁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动向。此次 APEC 峰会上发布了两项重大声明，其内涵折射出当前全球局势的特征。两位政府首脑与秘鲁总统举行了会晤：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乔·拜登，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拜登总统与秘鲁总统共同召开记者会时宣布，美国将向秘鲁提供 150 台机车和客车，用于扩建利马地铁系统。但他未提及这些并非全新车辆。事实上，这些车辆此前已被加州交通局（Caltrans）使用并报废，后作为赠礼运往秘鲁。本质上，拜登向秘鲁赠送的是二手机车和客车。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利马另一场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与秘鲁总统共同为距利马数公里北部的昌凯港举行了线上启用仪式。这座耗资 36 亿美元建造的深水港拥有 18 个泊位。值得注意的是，其建设未使用旧设备；开挖 18 个泊位的深水港需要精密机械。美国赠送旧设备与中方协助秘鲁建造连接秘鲁、中国及全球的商业深水港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深刻揭示了当代全球格局。

鲜少被提及的是，仅数年前中国政府曾与萨尔瓦多商讨类似协议。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长期目标，中国致力于在太平洋沿岸建立不受美国控制的港口——这与现有由美国掌控的西雅图、洛杉矶及巴拿马等主要深水港形成鲜明对比。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表达在萨尔瓦多建设此类港口的意向时，萨政府曾积极响应。然而，萨尔瓦多时任总统离开北京会谈后，美国要求其经东京转机。在东京，首相安倍晋三转达了美国政府的立场：萨尔瓦多不得与中国共建港口，因其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港口究竟威胁了谁的国家安全？最终，萨尔瓦多港口项目在七年前未能建成。而秘鲁的坎塞港如今已竣工。这揭示了历史轨迹的转变——全球南方国家逐渐认识到，唯有少数国家愿意提供推动南南合作的规模化基础设施与投资。

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这一叙事。这不仅是中国对秘鲁的慈善姿态，该港口同样将惠及中国经济。未来规划中，一条铁路将从秘鲁延伸至巴西亚马逊州腹地的马瑙斯自由贸易区。届时马瑙斯工业产品可直达秘鲁并横跨太平洋，无需经圣保罗转运再绕行非洲好望角。有预测指出，这条路线甚至能显著缩短巴西产品运往新加坡和中国的时效。

南方知识分子和政府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南方将向中国出口哪些产品？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方案清晰明确，与美国作出的承诺截然不同。例如，美国千年挑战公司对尼泊尔的赠款根本不是发展计划，而是旨在将尼泊尔能源输送至印

度的交易，而非真正发展尼泊尔工业。尽管选择显而易见，关键问题在于全球南方如何把握当前机遇。仅依赖"一带一路"倡议不足以实现全面发展。

根本问题在于全球南方自身的发展议程。南方国家是否拥有连贯的发展规划？它们是否永远只出口原材料——无论是销往美国、欧洲还是如今的中国——而仅从别处进口成品？若世界经济结构维持不变，这种"发展"模式将重蹈旧日覆辙。因此，国际经济结构本身必须实现转型。在此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着制定发展规划与议程的责任，以最大限度把握当前机遇。

近期，中国与非洲多国政府通过中非合作论坛（FOCAC）就非洲大陆工业化展开讨论，这场对话意义非凡。工业化若要实现，是否仅限于秘鲁等国对原材料的加工？议程中提出，与其将冷冻牛油果从秘鲁运往中国，不如在秘鲁进行部分加工后再运输，确保部分附加值留在秘鲁境内。但核心问题依然存在：这种工业化将采取何种形态？是仅限于原材料加工，还是将在这些国家制造成品？这是亟待深思的关键挑战。全球南方国家究竟会沦为原材料加工基地，还是能在出口商品前建立区域性完整的商品与价值链？

工业化或生产力扩张过程中，第二个关键问题在于资本来源：是按商业利率借贷导致国家陷入债务依赖循环？还是通过优惠利率融资，或建立合资模式——南方国家提供土地与原材料，中国、印度或越南等合作伙伴则提供工业化资本？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若不坦诚探讨原材料加工成品的程度，或工业化全过程的融资方式，便不可能真正讨论"发展"。

显然，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并非主要依靠原材料出口实现，而是通过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和生产力的质的飞跃达成。这涉及从欧美日等国审慎引进技术，经精密消化吸收后加以提升，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全球南方国家能否制定包含生产力技术提升的发展议程，确保其对生产力提升不抱恐惧？许多南方国家人口众多，失业问题严峻，导致人们担忧资本会取代劳动力。甚至存在一种倾向，认为与其提升生产力的质量，不如剥削劳动力并雇佣更多工人。这种思维必须被克服。生产力的质的提升必须成为任何发展议程的核心。

本次讨论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主权、独立与发展。我着重探讨发展议题，核心在于我坚信：从长远看，若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并为人民提供有尊严的生活，任何国家都无法真正拥有主权或独立。

2.1.2 全球南方面临的多重挑战与新秩序构建

- 发言人：纳拉杨·卡吉·施雷斯塔
- 年份：2024

今日能在此 2024 年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上与诸位相见，我深感荣幸。本次盛会汇聚了全球最具智慧的头脑与富有远见的领袖。谨向所有促成此次盛会的同仁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我们在此相聚于历史的非凡时刻。世界正经历深刻变革，而全球南方国家正处于变革的核心。这些国家不再仅仅追赶，而是重新定义进步，挑战过时的發展模式，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

"全球南方"不仅是地理概念，更代表着包容、公平与团结的哲学。这是由共同奋斗、坚韧精神和正义追求所定义的集体愿景。该愿景主张所有国家——无论规模大小或历史境遇——都应获得平等价值与尊重。全球南方哲学呼吁正视历史不公、消除结构性不平等、促进合作而非分裂。从 1955 年万隆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再到当今构建更公平全球秩序的努力，这一共同愿景始终指引着全球南方争取主权、独立与可持续发展的征程。

前行之路充满挑战。当今全球南方面临诸多亟待集体行动的复杂问题：冷战思维的死灰复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经济与技术依赖关系的武器化，皆是必须跨越的障碍。强权国家持续推行加剧贫困与不平等的体系。与此同时，气候危机正威胁着众多南方国家生存根基。世界虽已步入数字时代，但这个新时代也带来了独特挑战——少数主导平台垄断权力，导致南方视角难以获得充分表达。面对这些挑战，南方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倡导建立包容性全球框架，为所有人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

这是对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吁，旨在纠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长期维持的系统性不公——这些机构历来偏袒北方国家的利益。它们主要反映发达国家诉求，导致政策实践使南方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投票权分配失衡及治理结构向富裕国家倾斜，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机构中往往影响力有限。因此，建立新秩序以确保金融规则更具包容性、从而纠正这些系统性不公至关重要。全球南方呼吁建立优先发展而非利润、倡导公平而非剥削的经济秩序。通过共享贸易协定、区域性开发银行及机构协作等举措强化南南合作，将创造惠及所有人的新秩序。全球南方可依托本土资源与知识，减少对外部势力的依赖，构建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传统全球机构提供的金融援助往往附带严苛条件，这些条件严重偏袒北方国家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理念，极少契合受援国的发展优先事项。因此，建立能减少这种依赖、让各国推行更符合自身国情的经济与发展政策的新金融体系至关重要。这必须成为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标志。

1970 年代提出的新世界信息和通信秩序（NWICO）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对全球南方尤为如此。NWICO 最初旨在促进媒体和通信技术的公平获取，这一目标对确保多元声音被倾听和代表仍至关重要。全球南方必须倡导建立这样的媒体格局：信息流动应反映多元的文化、政治和社会视角，而非被少数西方掌控的强势平台主导。这对于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信息秩序至关重要，该秩序应放大南方国家的声音与

叙事。尽管数字平台兴起，北方国家仍对数字空间保持显著控制，这加剧了媒体垄断和区域数字鸿沟。算法常优先推送富裕国家的内容，进一步边缘化全球南方的视角并加剧数字鸿沟。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因基础设施不足而难以充分参与数字经济。全球南方在全球媒体中的代表性持续削弱，常被简化为刻板印象，引发对信息主权日益增长的担忧。

规划未来时，我们绝不能忽视气候正义的重要性。尽管温室气体排放量最低，全球南方却承受着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历史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的北方国家，必须承担起减排责任，支持适应与减缓行动。这包括提供技术转让、为绿色倡议提供资金支持，以及解决脆弱社区遭受的损失与损害问题。全球南方国家应率先采用绿色技术、可再生能源及可持续农业实践。我们的现代化愿景必须在建设韧性经济的同时，为子孙后代守护环境。

全球南方长期遭受外部剥削、殖民主义及外部利益驱动的冲突之苦。我们前行的道路必须优先考虑合作、对话与冲突解决。我们必须摒弃分裂与战争的政治手段，转而倡导通过外交与合作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此外，文化交流、教育和社会公平必须作为发展的核心支柱得到推广。我们应聚焦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医疗和社保体系。社会公平必须成为发展努力的基础，确保边缘化群体——特别是妇女、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获得赋权并融入发展进程。

哲学在引导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根本性作用，尤其在全球南方地区，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往往忽视本土文化与价值观。现代化之路不应盲目追随西方中心模式，而应采取整体性路径，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性相融合。此路径强调三大核心原则：其一，文化主权——尊重各国独特的传统、价值观与发展愿景；其二，整体性进步——在经济发展、社会福祉与环境保护间寻求平衡；其三，共同人性——现代化不应仅聚焦技术进步，更要构建基于尊严、正义与平等的社会。由此，哲学有助于确保现代化进程既具包容性又尊重多元文化背景，同时推动可持续的人类进步。

通往共同现代化的道路绝不能简单复制工业化北方的模式。相反，它应当是重新构想的发展范式，契合南方国家独特的需要、愿景与文化认同。这些新模式需在全球机遇与本土价值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确保发展兼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经济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全球南方长期遭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失控资本主义的侵害，导致不平等加剧并侵蚀本土传统。新发展范式必须聚焦本土需求，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解决这些问题。优先事项应包括对技术、制造业、农产品加工及增值产业的投资，这将创造就业、提升出口并稳定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是核心要务。包括尼泊尔在内的众多南方国家，早已感受到现有全球秩序驱动的不可持续增长带来的冲击。南方国家亟需开展协作，共享创新成果，加速推广绿色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此举不仅能推动现代化进程，更能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的紧迫挑战。

区域合作对全球南方集体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加强区域贸易、建设基础设施、促进政治稳定，各国可降低对外依赖并增强经济韧性。构建区域价值链和共同市场将促进区内贸易，形成更统一、更强大的经济体。全球南方的最大优势在于其集体发声的力量。历史上，不结盟运动等平台在倡导更公平的全球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必须进一步确保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核心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权。通过协同努力，这些国家可推动改革，使全球机构更具代表性与问责性。

全球南方必须持续倡导替代主导性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的方案。源于 1955 年万隆会议的南南合作，曾推动以国家主导的解放性发展愿景。这一新路径应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及技术领域的协作。南南合作是旨在使各国摆脱殖民主义残余、贫困与欠发达状态的长期工程。全球南方应通过促进弱势国家间的互利团结，同时挑战北方帝国主义的霸权，推动全球秩序转型。

全球南方必须为新技术创造与创新确立新标准。人工智能、基因学、数据科学、太空探索及新材料科学等领域的进步正深刻重塑人类文明，必须通过集体力量共同推进。这些进步同时也带来全新挑战与伦理困境。我们必须建立集体愿景与协作平台，以应对这些进步与新挑战。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明确：全球南方不图霸权，只求启迪；不谋排斥，只求包容。我们憧憬的共同未来，是各国同声共鸣、万众共享机遇、人类携手共荣的世界。为此，我们必须集体行动、果断作为。让我们投资于人民，通过教育和技能赋能赋权。

让我们携手创新，运用科技造福人类。让我们以勇气引领前路，坚定抵御企图分裂我们的势力。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并非终点，而是人类新篇章的开端。在这新篇章里，公平、正义与和平不再是理想，而是现实。让我们携手共筑今日的未来，共同为世界重新定义现代化，携手创造真正彰显人类至善的文明。

2.1.3 全球南方政治经济学

- 发言人：朱莉安娜·富尔诺
- 年份：2025

我想谈谈全球南方政治经济的一些要素，重点讨论我认为的挑战，但也谈谈新兴全球秩序出现的机遇。首先，我提出一些要素，这些要素有助于描述即将到来的多极秩序，或者我们正在迈入的多极秩序。

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世界正在经历的全球秩序变革首次没有发生在任何世界大战之前。从历史上看，重大的系统性重组都是由长期战争引发或催化的。我举出拿破仑战争重塑了欧洲协约之前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将霸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冷战本身将美国重新置于单极治理的角色，在国家间体系中没有竞争对手。

一方面，新秩序的重构不必以一场大战为前奏，这可以挽救生命；但另一方面，这又带来了更漫长的侵蚀过程。也就是说，这些转变的速度将取决于多种变量，而且很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21 世纪正在兴起的多极化具有许多特殊性，尤其是与 19 世纪末的多极化时期相比。一个关键因素是，当今新兴大国都是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这是种重新配置，新兴大国都是欠发达国家，具有全球南方和欠发达概念所涉及的政治和地理特征。此外，全球重组具有多元文化、多民族的特点，地理上既位于欧洲之外，也位于西方之外。

尽管这种秩序正在形成，但有人提出“新秩序尚未诞生，旧秩序尚未消亡”的说法，将当前时期描述为一个过渡时期。无论这句话是归功于葛兰西还是列宁，重要的是我们正处于旧秩序解体与多极秩序形成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个过程不会只受市场自由力量或自身发展的影响，因为美国在阻碍或妨碍全球南方更自主、更合作的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全球南方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以金砖国家为例，我们占全球 GDP 的 40% 左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然而，尽管我们是新兴国家，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这种重要性尚未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得到相应体现，这带来了挑战，因为美元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占外汇交易的 88%，而金砖国家货币仅占 15%。对美元霸权和主导地位的质疑由来已久，但在 21 世纪尤为突出，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美国可能将美元作为政治武器的影响。

为描述当前形势，我在此作两个类比。20 世纪，美国曾经历过一段时期，其权力和货币虽然未受到威胁，但至少遭到质疑或挑战。美国权力在多个领域受到挑战：

经济和技术领域：随着日本和德国大企业的崛起，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在 50 年代。

军事领域：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

政治和地缘政治领域：一系列质疑或紧张局势；1979 年伊朗革命迫在眉睫，这是 1977 年民众动员的结果，形成了不结盟或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在亚洲地区扩大势力范围；以及 1979 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给美国帝国主义带来了紧张局势、冲突和困难。

货币方面：正如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所说，随着金属本位制的终结、美元升值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法国对美元的质疑，特别是关于美元交易与中央银行黄金储备之间是否存在（黄金与美元之间的实际联系）的质疑。

技术霸权：随着苏联在军备竞赛中显著加速努力，试图弥补苏联在国防工业方面相对美国的落后，这引发了一场关于质疑的辩论。美国以多种方式应对了这一挑战：在军事技术领域，通过“星球大战”计划和遏制苏联重整军备的企图；扩大军事基地，特别是在东南亚；以及通过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捍卫美元。随着 1979 年美国国债利率上升，全球储蓄被抽走，美国对竞争对手施加了压力。这使得美国国债成为支撑高额和持续贸易赤字的机制，成为强制吸引国际流动性的工具。

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正像 70 年代那样，再次在货币、金融和军事领域受到威胁或挑战。我将重点指出以下几点：

军事领域存在进攻或封锁，这从乌克兰战争的结果以及北约难以向前苏联国家扩张中可见一斑。

中国与过去日本和德国的经济竞争不同，同时代表着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竞争。

在去美元化领域，正在考虑一些替代方案，包括对货币篮子进行更完善、更多元的设计，将金砖国家纳入其中，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一种尝试。

制裁具有一种悖论机制：在给外围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带来限制和困难的同时，也催生了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

最后，我指出一些正在发生的、可能加速变革进程的动向。首先，一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其次，全球大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催生了更强的多极化格局，这对全球南方边缘国家尤其有利。

此外，特朗普政府引发了对美元的怀疑，最终，更多国家在政治上愿意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例如，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本地货币结算协议、中央银行购买欧元进行地缘政治对冲，这些都在去美元化领域催生了多种替代方案。

2.1.4 什么是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

- 发言人：苏长和
- 年份：2024

感谢论坛主办方邀请，非常荣幸参与此次全球南方学术论坛。针对维杰先生提出的“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发展与现代化是否具有可行性”这一命题，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南方国家已在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现代化路径，这种实践本身即是对可能性的有力印证。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核心特征：超大规模人口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贯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以及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守。这些特征既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同时也蕴含着现代化建设的普遍价值。

在座的南方国家同仁或许会产生这样的思考：植根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经验是否具备借鉴意义？我认为，当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更宏观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下审视时，其五个特征实质上对应着优质现代化道路的普适性标准。优质现代化至少应满足四个基本要求：首先是发展模式的本土适应性，能够立足具体国情制定实施路径；其次是发展目标的全面性，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协调进步；第三是发展成果的普惠性，确保现代化建设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最后是发展过程的可持续性，在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维护人类文明永续发展。

现代化道路是否实现了自我发展目标？以这一标准衡量中西现代化路径可以发现，两种模式均取得显著发展成就，但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学理解释存在本质差异。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在阐释其现代化路径时，更倾向于强调自由市场原则、私有化改革及代议制政体，认为这些制度要素构成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在阐释发展路径时，则着重论证社会主义制度、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效应，强调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注重个体活力与集体规范的动态平衡，重视中华文明传统的历史传承，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体系。这两种理论体系在价值取向、制度设计和解释框架层面均体现出显著差异性，反映出不同文明背景下现代化道路的多元特征。

现代化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标准在于，其成果应实现更广泛人群共享。基于此标准审视，西方现代化路径存在显著局限性：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部分效仿其发展模式的国家亦出现社会分配失衡现象，即便实现经济增长却未能构建普惠性发展机制。这种弊端不仅反映在国家内部治理层面，更深刻影响着全球格局——西方现代化理

论未能破解社会分化难题，反而加剧国际体系结构性矛盾，形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外围”权力架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发展模式导致全球南方国家长期陷入发展困境，难以突破既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桎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强调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核心要义在于推动超大规模人口迈向共同富裕。这种发展范式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现代化路径，既克服了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内在缺陷，也为破解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提供了新的实践方案。

现代化标准的第三项核心内涵，在于发展进程中不以侵略、殖民或掠夺他国作为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路径。审视全球现代化实践可见，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普遍存在历史局限性——其通过建立殖民体系、侵占他国发展空间来维系自身现代化进程，这种以邻为壑的发展逻辑不仅消解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基础，更对世界和平构成系统性威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和平发展新范式，通过制度化政策体系构建起内生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完全摆脱了殖民扩张的历史窠臼。

这两种发展模式衍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以线性进化论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其隐含逻辑在于为殖民扩张的历史合理性提供辩护；而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则构建起新型知识范式，强调文明互鉴与互利共赢。二者在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层面均存在本质差异，折射出不同文明对现代化内涵的多元阐释。

现代化道路的最终评判标准在于能否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构建与各国合作共赢的格局，推动共同发展。真正优质的现代化模式应超越“独善其身”的局限，致力于建立“兼济天下”的良性互动机制。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现代化道路鲜少达成此目标，往往伴随发展失衡的困境。

中国现代化实践正着力突破这种历史局限，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经济合作、推进互利共赢等实质性举措，积极探索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协同发展路径。这种既要实现本国发展又要带动他国进步的价值取向，客观上要求突破既有两套知识体系的框架，构建适应共同发展需求的社会科学新范式。

2.2 美元霸权危机与全球南方的货币解放

2.2.1 美元霸权与去美元化：全球南方国家崛起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 发言人：丁一凡

· 年份：2024

最近，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金砖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说，如果金砖国家决定放弃使用美元，他将决定对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征收 100% 的关税。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唐纳德·特朗普似乎忽略了这些言论中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如果这些国家决定使用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那是因为美国实施了制裁，例如，俄罗斯仍在美国的制裁之下。所以俄罗斯不能使用美元。美元是结算货币。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真的希望其他国家继续使用美元，那么他首先需要解除对其他国家的所有制裁，这样其他国家才能继续使用美元。其次，美元曾经是国际公共产品。因此，许多国家可能将美元作为公共产品使用。

但美国想利用这一优势，将美元的使用转化为一种武器，一种统治世界的工具。因此，当美国政府将美元作为统治世界的工具时，它就武器化了。所以其他国家不得不与美元保持一定距离。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些国家试图与美元保持距离的两个基本原因。许多国家试图与美元保持距离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元正在以某种方式成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货币，一种危险的货币。为什么？当 1971 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违约脱钩时，美元就成为了一种不稳定的货币，因为它没有锚定。在时任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经过几个月的穿梭外交后，他说服了所有这些中东产油国只以美元定价石油。这为美元创造了锚定。

这就是石油美元。但目前，石油美元也变得不稳定。它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两个基本因素。首先，当美元成为石油国际贸易的唯一计价货币时，石油价格波动很大。因此，它不是一种稳定的货币。所以，在当今时代，所有这些货币都称为法定货币。

就法定货币而言，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其政府的信誉。这意味着，如果发行货币的政府能够偿还所有债务，那么该货币就会变得有价值。人们就会信任该货币。而如今，如果你看看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水平，就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如今美国政府已经发行了超过 36 万亿美元的债务，而美国 GDP 只有 27 万亿美元。

所以债务 GDP 比超过 140%。如果美国没有这种霸权，或者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元可能已经失败很长时间了。由于美国的这种主导地位，它仍然可以维持其货币。但如果你看看美国花钱的风险，美国政府正在花钱，美国政府正在

增加其负债水平。几乎每3到4个月，美国政府就要增加超过1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债务偿还已经成为政府最大的支出。美国政府每年仅用于支付债务利息的支出就超过1.3万亿美元。所以这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者预测，美国政府总有一天会拖欠债务。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债券市场如今正成为一个投机性极强的市场，因为市场面临崩溃的威胁。然后，如果你看一下，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所以你期望这些州，其中许多州政府正在试图积累黄金，为后美元时代做准备。他们担心有一天美元会崩溃。他们会努力保护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几天表示，他将把比特币和所有其他数字货币作为美元的储备货币。这表明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它行不通是因为，如果你喜欢这些所谓的比特币和所有其他货币的价格，它们的价格正在急剧上涨。

但如果你看看市场，这些数字货币的交易量并不大。市场上没有流动性。没有流动性的货币不能成为储备货币。它不能防止未来的任何金融危机。

最后，我想说的是，由于政治原因，各国希望摆脱美国的统治。

出于经济安全考虑，他们自然要与美元保持一定距离。其他国家则不会持有大量美元资产，因为美元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货币。我的结论是，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许多国家将进入未来的国际结算体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将有更多的货币参与其中。因此，这些国家的央行可以设法用这些数字货币相互交易，这些技术解决方案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很多可能性和选择，以解决国际结算问题。

非常感谢。

2.2.2 铸币税与中国的货币体系困境：生产大国与货币小国的矛盾

· 发言人：卢荻

· 年份：202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信贷供给随经济规模同步扩张。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比持续攀升却未引发严重通胀。这种有利的货币主权支撑着财政赤字下的经济转型，使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混合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得以维持生产导向型增长模式。由此，中国在控制通胀的同时实现了多年高速增长。

然而，对外依赖美元的挑战依然存在。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贸易和工业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已超越欧美主要国家。2012年该数值甚至逼近七国集团总和。另一方面，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中的份额仍处于低位，不足以有效支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美元依赖带来多重成本，包括金融铸币税损失，以及当美元霸权被用于国家利益或武器化时产生的额外风险。

例如2015至2016年间，中国遭遇严重资本外流，保守估计达6000亿美元。资本外逃不仅助长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更将制造业企业卷入金融投机，加剧次生金融化。这成为过去十年生产性投资（尤其是民营投资）停滞、经济增速渐缓的关键因素。1978至2012年间，中国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速超过8%，此后却降至5%左右，且维持该增速的难度日益增大。

这种状况限制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加剧了对美元的依赖和对外冲击的脆弱性，并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生产性投资的长期抑制。随着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市场，这已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因此，中国与全球南方面临的课题并非是否脱钩美元，而是如何应对美元霸权及其武器化带来的高风险与高成本。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困境，唯有建立更公平、更安全、更自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方能化解危机。

2.2.3 去美元化与货币多极化：民主化美元过度特权的理论框架

- 发言人：恩东戈·桑巴·西拉
- 年份：2024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挑战者对美元霸权的冲击，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货币霸权的终结。只有当新的替代方案能够“民主化”美元所享有的“过度特权”时，它才真正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

回顾历史，对美元体系的系统性挑战并非始自金砖国家，其最初的反对力量源于西方，尤以法国为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成立时，法国是该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尽管法国的经济在战争中遭受重创，但它坚持要求在 IMF 的配额排名中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领先于中国。法国甚至威胁，若不满足其要求，将退出该体系。最终，美国接受了这一要求。

与其他国家不同，法国没有用本国货币或黄金支付其在 IMF 的份额，而是发行了一种不计息的国库券。1947 年，法国成为第一个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并动用 IMF 资源的国家。从 1946 年至今，IMF 共有 12 位总裁，其中 5 位是法国人，他们的任期总计长达 44 年。

讽刺的是，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受益者的法国，却从未停止对美元主导地位的批评与颠覆。由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可以凭借信用购买外国商品和服务。它还能不受限制地发行美元，用于收购欧洲企业或资助军事行动。时任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对美元的“过度特权”深恶痛绝，他采纳了其财政与经济部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提出的著名说法。为了削弱美元的统治地位，戴高乐要求美联储系统性地将其美元盈余兑换为货币黄金。这一激进举措是导致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的诸多因素之一。

为了在美元主导的体系中获得经济自主权，战后的法国也对非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强加了一种货币体系，这使其获得了类似美国在全球享有的“过度特权”。一方面，法国无需持有美元便可购买其控制下的非洲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它能完全掌控这些国家的美元收入，并可随意使用。不幸的是，1999 年法国法郎被欧元取代，但这种货币帝国主义的局面并未结束。截至 2024 年，仍有 14 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总人口超过 2 亿，使用非洲法郎（CFA）——这种货币创建于 1945 年殖民时期，至今仍由法国财政部管理。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挑战美国的货币霸权与维持挑战者自身的货币统治形式并不矛盾。这一点在当前的去美元化辩论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去美元化”这个术语本身并不清晰。通常情况下，使用这一术语的语境多指向发展双边和多边支付倡议，以削弱美元及其金融体系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作用。这一趋势真实存在且正在加速。2020 年，全球贸易总额约为 46 万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的交易是在美元体系之外完成的。不过，即便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非美元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仍将在短期内保持不变。

当前对美元（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欧元）霸权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和欧元区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实施的单边金融制裁。当这些国家的银行被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排除后，其美元、欧元乃至黄金储备都可能遭到没收。面对此类制裁，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有必要开发替代性的支付系统，减少美元和欧元储备，并寻找更安全的途径来储存其外汇盈余。这些动机在一份由俄罗斯政府代表金砖国家起草的研究报告中得到了体现。该报告批评当前国际支付体系因缺乏竞争而被西方利用，并主张建立一个基于安全、独立、包容和可持续原则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

金砖国家的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积累了大量外汇盈余国家的诉求。然而，当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美元霸权，不如说是少数几种货币被用作储备资产，而绝大多数国家被迫积累这些资产才能进行对外支付。事实上，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被称为“法定纸币本位制”。这种概念反映了少数几种货币在国际上扮演着记账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储存工具的角色。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拥有巨大的优势：它们的国际收支逆差可以自我融资，因为它们可以以本国货币购买进口商品，且通常对其汇率稳定性影响有限。相反，那些本国货币不具备储备资产地位的国家，通常需要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以进行对外支付和稳定汇率。例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意味着中国将积累美元存款，这些美元通常被投资于美国国债。这种不对称性源于国际货币体系无法实现不同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免费支付转换。

这种法定纸币本位制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永久性的转移问题。它们用本国货币支付对外债务的能力，受限于其所能获得的强势外币。相比之下，在关键货币发行国，对外支付与国内支付并无区别。全球南方国家必须积累美元或其他关键货币以进行对外支付，这是它们以外币举债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的主要根源。法定纸币本位制从根本上将这些外围国家锁定在一种货币和金融依赖的模式中。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长期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往往需要向外国借款，并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相比之下，那些经常积累巨额外汇盈余的国家则无需通过借贷来获取所需的美元，因为它们的出口收入通常超过了支付额。尽管盈余国原则上比赤字国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但它们也面临着某种形式的金融依赖，因为它们积累了收益率通常较低且可能被发行国没收的关键货币存款。

这些因素表明，即使全球储备货币的数量增加，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绝大多数国家被迫积累外汇储备。一个公平、有利于发展和气候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应该消除国家积累外汇储备的义务，并让每个国家都能用自己的货币支付进口商品。这一目标即我们所倡导的“对美元过度特权的民主化”。实现该理念的最佳途径是建立一个凯恩斯学派长期主张的国际清算联盟机制。正如扬·克雷格尔（Jan Kregel）所述，该机制的核心功能在于：“废除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地位，并通过创设全球流动性管理框架，建立可持续的国际收支调节激励机制”。

在此制度框架下，特别提款权扩容、配额调整等技术性改革将失去必要性。货币的去中心化或多极化，只有在它能够“民主化”美元的过度特权时，才能为全球南方带来持久和有益的影响。

2.2.4 地缘政治分裂与国际货币格局

- 发言人：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
- 年份：2025

我将简要探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不结盟运动的议题，首先从地缘政治层面可能出现的四种情景切入，阐述不结盟运动在不同情境中可发挥的作用。

首先探讨一种可能性较低但不能完全排除的情景：美国及其盟友成功恢复霸权。我们知道它们正处于衰落期，这种衰落甚至可能加速，或许已经加速。但它们是否可能重振旗鼓？并非不可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类似情况。回顾 20 世纪美国历史，尤其是 1960-70 年代的越南战争、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等时期，可见美国历经十年挣扎后，在里根执政时期实现复苏。但在我看来，特朗普绝非里根的翻版。当前美国面临的困境远比 1970 年代或 1980 年代更为严峻。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会再看到本世纪初那种西方式霸权的旧式复苏。

第二种可能的情景是特朗普近期访问韩国会见习近平时提及的构想：建立中美共享全球权力的“双边集团”（G2）格局。美国将被迫接受中国不可遏制的现实，建立和平共处关系。这种双极格局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将充满危机。我们不得不面对两大强国高度联合的事实。这对不结盟运动将是重大挑战。但我认为这种 G2 情景同样难以实现。原因何在？根本在于我们必须感谢美国极端不灵活的立场。我同样希望感谢中国没有落入此类陷阱。我认为中国不会上当。原因何在？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深知美国不可信——它惯于轻易作出承诺又轻易背弃。因此我们不期待中国轻信美国，为推行 G2 方案而牺牲其与金砖国家及全球南方其他成员国建立的纽带。

第三种情景从我们的角度看更为糟糕，即所谓的 G3，即俄中美的超级大国联盟试图将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这种无疑将重创全球南方项目与金砖国家项目，或许仅在权力政治层面惠及三国。然而，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免于陷入如此可怕的局面？正是西方的顽固立场。西方深信自身优越性与统治权，美国极不可能真正同意与中俄共享权力。试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国。我认为——在座的中国同事若我理解有误请指正——中国在建立地区霸权方面面临困难；其周边多国对此强烈反对。中国与印度、日本、越南及菲律宾的关系都相当复杂。因此，中国若接受这种世界格局划分未免有些愚蠢，因为这将使其丧失在周边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理论可能性。除非美国完全接受台湾回归中国——这对美国而言是难以接受的苦果。俄罗斯呢？俄方朋友或许有异议，但我认为俄国可能并不排斥其势力范围（例如包含乌克兰）获得承认。美国或许会同意，但欧洲人一再表明不愿走这条路。因此 G3 模式同样难以实现。

第四种情景才是我认为会实现的结局：多极世界。混乱不堪，影响力中心林立。例如多货币体系将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或其子集团或许能推动建立新货币体系和新储备货币。但这对我们而言可能过于艰巨。但无论如何，多极化是西方衰落最可能的结局。在当前世界格局下，这种趋势已然显现。届时将形成：以北美、加拿大、欧洲为核心的北大西洋极；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极；受中国主导的东亚极；俄罗斯主导的欧亚极；若巴西能凝聚力量，或可在南美建立自身影响力中心等等。这种构想强调的是影响力中心，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霸权范围。例如巴西

不可能对邻国宣称"让我们建立我主导的体系"。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包括全球南方大国在内的世界大国，永远不该使用"领导权"这个词。领导者不能自封，必须获得认可才成立，对吧？有时我们不自觉地陷入美国式的思维陷阱，动辄自称世界领导者。

最后谈谈金砖国家及金砖+。如我所言，在G2或G3格局下，金砖国家将失去存在意义。但在延续或重建美国霸权的格局中，它仍具重要性；在多极化世界中同样不可或缺。那么金砖国家扩张如何？目前金砖国家仅有十国，而全球南方国家约有140个。金砖国家能否更具包容性？现阶段我们有十个正式成员国和十个伙伴国。这使金砖国家陷入两难境地：规模扩大虽能提升能见度，却会削弱效能。换言之，这是效率与包容性的抉择。坦率地说，我更倾向于金砖国家暂停扩张，同时不排除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我们已为此建立机制——例如设立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NDB）。相信各位都已耳闻，这至少在理念上是属于全球南方的银行。若您参观过该行大楼，定会为之震撼。这座由上海市政府为我们建造的30层大楼，结构精妙绝伦。银行现有近300名员工，已批准数十个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成员国实缴资本已逾100亿美元，我们还发行了包括非美元货币在内的债券。

然而，这座新开发银行仍未达到十年前我初抵上海筹建时设想的高度。它尚未成为真正的全球性银行，距离目标还很遥远。如前所述，目前仅有十个成员国加入。若要在全球格局中发挥实质作用，必须扩大成员国规模。另一个严重问题在于，新开发银行与西方资本市场、华尔街、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紧密捆绑关系。这导致荒谬局面：新开发银行竟停止向创始成员国俄罗斯提供贷款。即便针对乌克兰战争前签署的既有合同，该行也停止放款——这违反了法律上完全有效的合同条款，其根源在于对西方制裁的恐惧。回溯来看，我们当初低估了地缘政治分裂的严重性和持久性，这实属失误。创立之初，我们未能预见到该行需要比当前更彻底地摆脱西方资本市场的依赖。另一个问题是项目质量难以把控。由于银行缺乏透明度，外部难以验证项目实际效益。缺乏透明度本身就是问题——访问该行官网几乎找不到有效信息。

以上便是我想阐述的核心观点。我认为全球南方国家正肩负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使命。容我引用一位前中国官员在北京晚宴上的发言：他指出世界变化如此之快，西方面临诸多困境，如今正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声、让世界听见其声音的时刻，唯有如此才能推动世界向更好方向发展。

2.2.5 世界金融体系改革：技术模式转变与金砖国家的历史机遇

- 发言人：维奥莱塔·阿尔希波娃
- 年份：2024

作为本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我运用了俄罗斯的两项理论：技术与世界经济模式转变理论，以及古巴诺夫博士提出的诺斯费尔理论，该理论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展望。分析金融体系作为独立对象并无裨益，我们需要透视历史全局才能理解其构建逻辑。格拉济耶夫博士构建了这样的图景，其理论表明我们正处于极其危险的模式转换期：从第五技术模式向第六模式转变，从旧世界经济模式向新整体模式过渡。主导资本积累周期的国家格局亦在更迭，亚洲周期正崛起为新主导力量。这揭示了当前金融体系的若干症结——该体系由核心国家依其利益构建而成。现行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由美国主导建立，由此衍生出去美元化、货币武器化及金融化等显著问题，进而催生各类泡沫与金融经济危机。

该理论的结论是：我们正处于剧变时期，发展中国家已开始成为改革引擎。“新智球”理论结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发展的思想，为我们勾勒出未来图景：生产将日益知识密集化，迫使金融体系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这些积极改革将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全球诺斯转型概念揭示了世界金融体系如何重塑以服务社会发展目标，其核心要素在于新型一体化进程，而价值观共享则是这些改革的前提条件。

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而言，其发展历程与这种认知整合的若干阶段高度契合，可视为认知整合型集团。该集团内部正推动建立共同的货币金融区，这可能成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起点。

关于俄罗斯案例，我们试图解析为何该国会遭受有别于以往受制裁国（在领土规模、贸易伙伴数量及全球市场融合度方面）的制裁。我们得出结论：这一严峻时期源于1990年代改革的遗留影响，而制裁作为外部冲击被有意转化为内部冲击以扰乱俄罗斯经济。尽管曾有诸多声明宣称制裁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经济，后续研究却显示其影响程度仅属中等。制裁的实际影响往往难以精准评估。在制裁初期，格拉济耶夫博士与我选取若干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当时制裁效应微弱且呈递减趋势。例如，我们对汇率的测算显示：2015年制裁效应最为显著，约占10%至15%；而2014年和2016年影响则小得多，均低于4%。就业领域未出现重大问题。我们视制裁为推动本国经济再工业化的催化剂。在此背景下，全球金融体系的去一体化与转型对我国至关重要，而俄罗斯正是这一进程的支持者。

我的同事提及俄罗斯团队报告提出的关键原则，例如运用数字化机制重塑全球货币体系。这与我们倡导的去一体化及建立共同货币金融区理念高度契合，具有较强可行性。总而言之，这对发展中国家及金砖国家而言，是创造新世界、建立新世界秩序、按自身理念重构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机遇。关键在于我们首先要相信这一倡议的可行性，相信这种新型一体化与合作模式，然后着手制定具体机制。这包括完善新开发银行，以减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我想提醒大家那个精彩的童话《绿野仙踪》，故事中的英雄们沿着铺满黄砖的道路前行，最终实现了梦想。我坚信，我们金色的金砖国家必将引领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2.2.6 金砖货币储备及支付体系：超主权货币的运作机制与实施路径

· 发言人：龚刚

· 年份：2024

探讨金砖国家货币储备与支付体系的关系及前景时，必须认识到喀山峰会宣言并未明确提出发行金砖货币的计划，尽管普京在会上展示了100单位的金砖货币样本并引发广泛关注。峰会更侧重建立金砖支付体系，授权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推进货币合作与支付系统运作研究，并要求在下次峰会提交报告。相较于上届峰会由专业工作组主导讨论而非财长与央行行长直接参与，此次安排体现出实质性进展。

早在2013年，我在文章中就提出金砖货币概念，探讨其交易规则、发行机制、汇率设定及体系扩展等核心框架，相关构想已提交国务院供参考。近年来，这一构想日益受到关注，包括梅德韦杰夫倡议创建新全球货币，以及新开发银行的相关研究。其中强调的原则如避免复制欧元模式、保持主权货币差异、不采用金本位制等，均与我十余年前的论述高度契合。

这一构想的提出是对美元霸权的回应。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在发行和使用过程中缺乏国际公认的平衡机制。美联储的股权由私营银行持有，其货币政策运作独立于美国政府。这意味着美元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的主权货币。美元霸权引发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如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全球地位维持长期贸易逆差，同时以高于实际价值的汇率发行美元。在金融危机时期，它运用货币工具解决国内问题，并从其他国家收购优质资产。它甚至通过制裁直接针对委内瑞拉、伊朗、阿富汗、朝鲜、古巴和俄罗斯等经济体。

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推出一种超国家货币——即暂称为“金砖货币”的货币——以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其核心机制应包括：所有体系内贸易结算均须独家使用金砖货币，主权货币之间不进行直接双边兑换；成员国保留独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汇率、发行量及扩张规则由成员国共同决定。要实现该体系，必须建立独立于SWIFT的支付平台，将所有跨境支付纳入自主系统。这不仅是金砖货币顺畅运行的前提，也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屏障。

金砖货币的推出必然冲击美元体系的根本利益，可能引发美国的强力反制。但该体系无需一开始就覆盖所有金砖国家，仅需两国达成共识即可启动，再逐步扩大吸引更多成员国加入。随着成员数量增加和影响力提升，甚至美国也可能被迫参与谈判。新的国际货币秩序将由此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虽可作为去美元化路径之一，但若仅在现有机制内推进，无法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公。因此，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普惠的金砖货币体系，不仅关乎经济利益，更可能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2.3 全球南方的发展逻辑与自主之路

2.3.1 资本、国家与发展：全球南方的新话语

- 发言人：李世默
- 年份：2023

大家早上好，谢谢！今天我们大会的主题是关于传播。那么就全球南方的传播，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会聊传播的方式、传播的技巧。为什么我们的故事传播不出去？关于传播，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应该传播什么样的内容？也许传播技巧，我们没有平台、没有媒体。这些当然都是问题。但也许我们没有内容。我们的内容缺乏实质，那么我们的传播技巧再好，这个效果也是有限的。

我今天想抛砖引玉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代，也许是 200 多年现代化工业革命以后、200 多年来一个大的转折的时代。以前的这些话语、以前的这些理论现在都没什么用处了，现在都缺乏力量了，包括在成熟的发达国家、自由主义国家也已经很非常乏力，他们也在困境当中。

那么我们南方的国家也许面临一个机遇就是我们能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概念给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也指出一条明路，引领这个话语体系。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很多东西。今天有关于人权的、有关于人道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太多了，西方自由主义有一条整体的话语、整体的理论，全部是自圆其说的。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有很多方面。

我今天讲了，从我自己的思考和我自己职业。我是做风险投资的。我现在想讲的就是资本和国家与发展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全球南方，包括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我们就这几十年、二三十年发展遇到了一个困境，发展碰到了问题。这发展问题在哪里？

我记得刚才 Marco 讲我我去年采访卢拉总统，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冷战以后，全球化开始，我们大家都充满了希望。好像我们只要融入这个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也很快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美国、欧洲有的东西我们都会有。那 20 年过去了，30 年过去了，为什么所谓的金砖国家也好，这个发展都还是不理想。为什么会是这样？还有很多陷入很大的困境，不只是不理想。陷入困境包括内乱、战争。卢拉给我了一个回答让我很吃惊。他说，那我说为什么好像中国发展得还可以，中国是好像一枝独秀，为什么？他回答我说，因为你们发生了一场革命，你们的发展是在革命后的基础上执行的。当然你们有中国共产党，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没有发生这个革命，所以我们还在革命前的这个结构里挣扎。

这次卢拉总统来上海，我碰到他们团队的一些人。有一位资深的巴西的先生跟我说。他说，你们中国和巴西最大的差别是你们是 a hundred years of humiliation，也就是百年耻辱。你们是百年耻辱，然后发生一场革命，然后你们民族复兴。我们是 400 年耻辱，到现在还没革命，所以我们僵掉了现在。

今天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新的局面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新的话语性的东西能讲，也能够解决西方的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对南方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我们现在发展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资本，怎么去理解国家，怎么

去理解在资本和国家之间怎么发展。其实从冷战以后整个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南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某种程度上都陷入了一个西方发达国家、自由主义国家这200年来的一个资本与国家此消彼长的一个斗争的话语结构里面。但这个话语结构也许不适合我们，也不适合现在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们在冷战以后，我们几乎所有南方国家也都转向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小政府。所有这些政策现在看来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效果也不好。

我想今天，我作为一个搞经济的、做风险投资的，我们大家的《圣经》当然就是熊彼特，我们长大读的那个语录——熊主席语录，哈哈。熊主席语录怎么的说呢？我读MBA，整个的理论框架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他有两本重要的著作我们从小读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你看，这个理论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对吧？企业家通过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推动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所有这些，然后组织形成创新，然后不断推动经济的发展。他还提出了创新周期的概念和创造性的破坏。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我们行业，包括中国三四十年改革开放，有很多人也推动了改革开放过程，也是在这个理论框架、概念框架里面推动的。

但熊彼特还写过一本书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他预测到了这个创新资本主义可以创造巨大的价值，会非常成功，但是最终会导致自身的毁灭，走向垄断。那么怎么样来化解这个毁灭？熊彼特说通过民主。他说的民主当然是指自由民主制度，就是欧洲后来推动的直接民主。他通过这种变化来化解创造性破坏过程出现的矛盾。

按照这个理论框架，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啊，这200多年，从19世纪开始、现代化现代主义开始、工业革命开始，这个200多年我们都可以从看西方国家啊都可以从资本与国家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一个拉锯战、一个斗争、一个此起彼伏、两元斗争的这个过程来分析历史。

第一个时代当然就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以前没有资本这个东西，资本就那时候生出来的。资本在19世纪，也许18世纪19世纪诞生。那么19世纪整个100年应该是一个资本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的时代。我们都了解那段历史。我刚才说，在这个拉锯战里面，从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有执政党和在野党。在理论意识形态里面也有执政党和在野党。那个时代的执政党就是第一轮资本无序扩张、工业革命野蛮生长的“理论执政党”，当然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这些推动资本主义第一轮发展的理论家，包括亚当·斯密，包括边沁，包括米塞斯，强调市场经济的自由性。所谓的功利主义、建立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经济，所有这些制度法治为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环境、没有遏制的环境。

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在野理论”，也就是19世纪开始出来批判那个时代的理论，当然最主要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是他们是理论界的在野党，他们强调阶级斗争、公有制。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导致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所有这些东西他们那个时候都说了。但是他们是下风。他们在野。整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在这段时间里，其实资本超越了一切，通过什么手段呢？就是把私欲全面的合法化、正当化和科学化。

以前私欲不是合法正当的，是要被控制的，不管什么文明、什么文化。我们中国有很多伦理，西方也有基督教各种各样的伦理来遏制和控制你的私欲，不是说你想做

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是那个时代私欲完全被合法化，比如说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我们现在了解的经济学就是那个时代诞生的。以前经济学不是一门学科，“经济”这个词源于希腊文里的“οἰκονομία”，“οἶκος”就是“家”的意思，“νόμος”就是家里的规则：油盐酱醋、怎么做饭。

亚当·斯密写的那些书啊特别有意思。爱丁堡当时可能是我们静安区的 1/10 吧，也许都没有，就是我们湖南街道的 1/3 大小，小的不得了。他写的整个这些经济理论都说那山头那家人在做什么，山下边那个店、那个酒吧、那个 pub 在搞什么，然后那个小法庭。就这么些人。湖南街道一半都不到。可是当时那个时候把这个 economics 把他无限扩大，变成了一个可以管制整个人类的一门学科，按照这个法则。还有科学化对吧？还有个科学我这里没说的，就是 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把私欲，把他病人的这些案例全写出来变成科学化的东西，说私欲本身就是正当、合法、科学的。

这段路走了 100 多年崩溃了，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因为东西分赃不均。资本主义内部陷入巨大的危机：政治腐败、大萧条、社会动荡。这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所以这一下子资本和国家的拉锯战，资本啪啦一下自己崩溃。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我把他叫作国家反击战。政治意志重新起来说不行，不能这么弄。美国有两个罗斯福，第一个罗斯福反垄断，然后第二个罗斯福搞那个福利来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造成一种新的平衡。国家反击战，这个拉锯战有半个世纪，从 20 世纪初大萧条以后一直到二战以后开始福利资本主义的崛起。福利资本主义在欧洲最厉害，美国也在搞，对吧？美国当时搞那个 social security，搞那个 interstate highway，搞很多东西。我们中国这几十年做的——造公路、搞工会啊，然后呢经济发展起来，中产阶级大规模产生。我们大家说 20 世纪是美国世纪。但 20 世纪并不是美国，20 世纪下半页才是美国世纪，20 世纪的第一个 50 年美国很苦的，一塌糊涂，说不定跟我们中国“大跃进”、文革差不多我看。没饭吃，打了两次大战，大萧条十几年根本出不来，还靠希特勒把他们拉出来，没有二战他们大萧条还出不来。非常苦的。美国世纪是二战后开始的。二战后开始美国世纪，前几十年就是福利资本主义，就是社会国家的意志、政治意志把资本压下去了，公会，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

那个时代，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也在参与那个时代的。所以我说，其实南方国家一直在这个话语体系里面。国家反击战开始发生了一个转变，福利资本主义在西方崛起，刚才说的中产阶级。然后呢，苏联和中国强劲赶超，私欲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它的合法性被限制。国家和社会重返到政治舞台上来。不同程度啊，西方跟中国跟苏联完全不一样。理论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发生了变化。全世界的执政理论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成了很大的执政理论，占世界的一半。毛泽东思想成了巨大的很大的一个执政理论。欧洲有戴高乐主义，像熊彼特自己说的福利民族主义，对吧？这些都是国家的意志慢慢出来遏制资本。

同时呢，也出现了一批新的在野理论，比如说哈耶克，同一时代开始批判这些执政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我们老师。加里·贝克，所有这些人都在说你们这样搞不行的，还得回到 19 世纪私欲、个人主义、资本、市场。执政和批判，执政和在野理论发生了变化。但是呢这条路一直走到 20 世纪末发生了什么呢？国家开始衰退，

此起彼伏。国家怎么衰退呢？苏联从僵化走到解体。我们中国也发生了问题。我们从赶超走到文革，也爆掉。那么西方福利资本主义也面临着经济危机。

再来一轮，到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资本反击战。你看他们打过来了，打回来了。怎么打回来呢？所谓的新自由主义。80年代90年代，里根、撒切尔两个保守派政治家推动。这本书（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把我们也放到新自由主义阵营里边了。经济迅猛发展，创新日新月异。这几十年从硅谷到华尔街到全球化。那么这个理论层面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又换了位置。哈耶克、弗里德曼、加里·贝克他们成了执政党理论家了。全部，美国、欧洲，包括我们中国都在看他们的东西。我们市场改革也有很多东西按照他们的理论框架，按照他们的执政理论来推动。同时呢，也有一批在野理论。重复一遍。这就像美国有个电影叫《土拨鼠之日》：一个人每天早上醒过来，昨天再来一遍，每天活一遍一样的日子，又来一遍。这次理论批判出了几个人：皮凯蒂、普雷维什。这一对呢讲这个不行，贫富差距太大，你凭资本无序扩张，咱们得扼制，否则老百姓要造反。你看，批判理论、在野理论又出来了。包括斯蒂格利茨。美国也出现一批政治家，那个女的众议员叫 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新自由主义现在正在走向崩溃，我们都知道。政治腐败、社会分裂、打仗，出来一批新的左翼，再来也许再要推动一轮国家的反击。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熊彼特这个框架下我忽略了一个地方，而且我们现在不太讲，就是这100多年我们有过巨大的非熊彼特的创新案例，巨大无比。其中最大的当然就是苏联。去年我去中国美院，他们搞了一个呼捷玛斯展。呼捷玛斯（Vkhutemas）是一个包豪斯（Bauhaus），一个比较展。包豪斯我们都知道。然后我看呼捷玛斯，我大吃一惊。呼捷玛斯是列宁批的一个设计学院。那时候跟包豪斯两个是并行的，有很多教授像保罗·克利（Paul Klee）两边教，做老师，在包豪斯教书，在呼捷玛斯教书。你要去看了那个展，你就会大吃一惊。那个时候苏联是一九二几年，就是十月革命刚发生还没多少年，真是一穷二白。我们读托尔斯泰，读杜斯妥也夫斯基，我们知道俄国那个时候什么样子的：贫困、愚昧，感冒发烧要放血。那样的苏联那样的俄国一夜之间发生巨大的革命、巨大的创新。整个人整个社会飞跃。你看呼捷玛斯展，我们现在天天用的东西，包括我们穿的运动服，包括宇航员的服装、城市规划。人民广场，你们很多外国朋友没去过我们的城市规划中心。那是我们上海的骄傲，引以自豪的。现在每个城市都有。我们上海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最牛逼的。你要看看人家那个时候100多年前那个时候城市规划，我们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苏联那个时候做的城市规划那才叫城市规划。想象力无比广阔。这100年，苏联的100年是一个Thomas Kuhn讲的anomaly，就是在他的这个语境里的anomaly。这是一个巨大的案例。

现在全球南方，我看到也有新的话语出来。所谓的developmentalism。这些是我搜到的：马里尼、佩雷拉。可是呢，我现在担心我们这些话语仍然又回到了这200多年自由主义里边的资本与国家之间的这种竞争这种拉锯战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这个话语体系已经丧失了他的生命力了，解决不了接下来的问题。这么轮环周期已经走到头了。

那么这里面，我就想抛砖引玉说我们中国在做什么探索，中国在做一个探索。中国的探索就是我们说的，十八大说过的“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老路”就是所谓的反经济规律，但是呢虽然你的初衷是对的，做出来效果不好，你发展不了，你其他都是假的。我们中国一句老话叫落后就要挨打。这你避免不了。“邪路”就是我

们天天在做的这几十年腐蚀的交易，我做 VC 的我知道天天在做腐蚀的交易。我们整个行业都在做腐蚀的交易。整个市场经济都在做腐蚀的交易。为了发展，出卖了灵魂，不忘初心，就这个意思，对吧？你没了灵魂，你发展的再好有啥用呢？

去年 5 月份，我们上海封控的时候，有一期《求是》，我们外国朋友不知道的话，《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官方期刊，两周一次。一般我们读《求是》都是来获得那个那个党的命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怎么说，是什么情况。这一期《求是》非常独特，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第一篇署名文章，他没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问了一个问题，很少有。问了一个问题，我想把它叫做“世纪之问”。他说我们怎么认识资本，怎么对待资本，就刚才所有的一切：资本、私欲、企业家创新，怎么来对待这个东西？因为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他们没有面临这些资本的问题，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带领人民摸索出来创造出来一条道路，也是因为上次，如果说我们有过一场革命，在这个革命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摸索这条道路。

那么怎么对待资本？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个探索。我们这个探索还没有得出答案。总书记都没得得出答案，所以这个探索是个问题。不是一个答案。我注意几个月前，普京总统在见到总书记的时候说，我们大家都有点嫉妒，中国怎么搞成功了，说不清楚。我们也放出一些话语，一些说法，比如说五大新发展理念。这五大新发展理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创新、开放、绿色、共享，中间有个协调。创新开放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话语框架就是资本啊，就是私欲啊，就是市场经济啊，对吧？效率啊。绿色、共享是社会主义啊，是共同富裕啊。这四个东西本身都是有价值在里面的。唯有一个是个动词就是“协调”。哈哈哈。协调是个动词，它本身没有价值的，很有意思，是一个探索。

那么 21 世纪，我们全人类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可能的灭顶之灾，生态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市场技术所有这些都面临危机。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所有这些危机之前 200 年的这些资本与国家的拉锯战里面产生的理论，产生的话语都解决不了，所以呢我们中国在探索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去用一个辩证法的概念资本与国家怎么把它“正反合”，怎么超越他？这个就是我们我相信是我们全球南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机遇，这是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能不能创造出新的想法，全方位的新的想法、新的概念、新的话语来推动整个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陷入困境的世界，新的一套思想，这个才是我们我觉得我们传播需要探索需要推动的。谢谢大家。

2.3.2 市场创造的政治经济学：工业化道路与收入陷阱

· 发言人：文一

· 年份：2024

前面的嘉宾讲得非常精彩，我想继续罗思义所讲的话题。我接下来会切换到中文，然后我想跟着罗思义的讲座，再稍微增加一点点东西。

我们看到目前这个世界上虽然是存在收入陷阱，这里是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在过去大概是七八或者十年间的时间，他们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发达国家像没有变化，而且还有降低。这个就是典型的低收入陷阱的现象。当上升的不是非洲国家，是几个亚洲国家，刚才俄罗斯已经讲到了，红色的是中国，而这个黄色和蓝色的是印度和越南。等会儿我会回来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这么多的非洲国家，他们一直为整个欧洲的工业化、后来为战后的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贡献了非常多的资源，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的收入水平长期没有增长。那么我们再看看拉美国家，他们的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好多拉美国家独立200年，他们也长期陷入在一个收入陷阱，但是收入水平和美国相比？和刚才非洲国家相比会高一些。刚才非洲国家相对于美国的话，他们的人均收入5%以下，有些只有1%，有些甚至千分之几。那么现在这些拉美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相比会高一些，大概美国的20%，有时候达到30%，但是在过去七八十年他们仍然没有增长，他们有绝对的增长，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他们没有增长，因此也陷入在一个我们叫中等收入陷阱里边。

这里有几个例外，同样也是亚洲国家。正如罗思义早些时候提到的，其中一个是红色的，是中国台湾，而那个蓝色、深蓝色的是韩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相信罗斯之前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刻地分析。现在，让我换一个角度，通过审视拉美的工业化道路来探讨同一个问题。以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诺贝尔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为例。他的理论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认可——他们认为他完全歪曲了历史。然而，经济学家们却对他表示赞同，因为他们缺乏对历史的理解。

那么我们看看拉美的工业化道路，如果用图来表述的话，至少你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有问题的。如果按照这个模块理论，他们应该非常成功，因为他们采纳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很不成功。比如说这个例子，巴西，这个横坐标是巴西的工业化的程度，我用什么数据来代表呢？就是非农产业在整个GDP的占比。如果相对于美国比值越高，那你的工业化的程度和美国差不多；如果非常的小的话，那你美国的工业化程度就很远，那么主要是你的工业产值和服现役的产值。如果你的工业化道路是正确的，随着你的工业化的推进，那么纵坐标、就是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就应该向美国逼近。但是你看看巴西，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从左边到右边，横坐标，纵坐标，它的人均收入在60年，在70年代好像还是不错的，再往上走，进入80年代、90年代以后，以后就完全混乱了，巴西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该怎么办了，就原地打圈圈。那么巴西在拉美国家里面还算好的。

你看看阿根廷整个工业化的过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均收入相对发达国家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基本上就陷在一个紊乱的陷阱里面出不来，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走，政府左翼换到右翼、右翼再到左翼，军政府换成民主化的政府，还是找不到出路。

再看看智利类似的图，不知道工业化该怎么办，找不到出路。哥伦比亚虽然工业化好像在不断推进，但是人均收入相对发达国家没有长进，一直在波动。秘鲁在 50 年代、60、70 年代工业化推进得很顺利，但是人均收入并没有上升，以后 80 年代、90 年代就完全不行了，人均收入还在下降。委内瑞拉更是一个典型，是倒过来走的，50 年代在那边工业化的程度和人均收入都相对高，而且人均收入和美国相比曾经达到美国的 70%。用 PPP 衡量，那是高收入国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看，往这边走，再去工业化，然后人均收入也在下降，这是为什么？查韦斯上台的原因，现在流行的理论都说委内瑞拉搞不好是因为查韦斯政府上台了，搞了社会主义，这个不是的。之所以查韦斯能上台受到民众的支持，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把伟哥之类做好。

那我们看看东亚和中国，刚才讲罗思义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就是台湾省的工业化道路。台湾省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就是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占 GDP 的比重相对于美国，在向美国的逼近过程中，人均收入也在向美国逼近，从非常低的收入其实是条件相当于美国的收入的 10%，后来进入了高收入的美国的 80%，这是 PIP。

韩国也是这样的图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均收入是不断的逼近发达前沿国家的。那么到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人均收入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因为它起点非常的低，起点时农业占比太高了，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 5%，但是经过这段时间，虽然人均收入相对美国没有绝对增长，和美国是一样的，改革开放以后，然后迅速的上升。

那么从这里面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呢？难道这是一个表象？我再把印度的数据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印度和中国大陆差不多，今天上午我们很多人也讲到了，它长期起点也非常低，也是相当于美国发达国家收入的 5% 左右，长期在一个水平线上增长。但是，90 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上升，目前的水平还是比较低。前面的图，低收入陷阱里面，我跟大家已经看了，印度和越南是目前唯二的两个收入经济体，在我的三部里面能够从像非洲一样的低收入群体里面开始出现摆脱的苗头，虽然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但是有这个苗头了。

那么现在，如果我把中国的图画的这个地方，印度的水平在哪里？那么印度，就是这条绿色的线，大概相当于中国二十年前的水平。

还有从其他的工业化指标来看，印度大概滞后中国的发展 15 到 20 年左右。那么我要总结一下，当然这些数据它只能告诉我们很多相关性，并不能告诉我们后面的机制。那么我要总结一下，这个机制在哪里？我用几句话的总结。

首先是贫困。任何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无疑是缺乏大规模生产体系。传统农业社会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生产力极低——一名女性一生只能生产两件衣服。但一旦你掌握了大规模生产技术，一天之内就可以生产成千上万件衣服，其他商品也是如此。因此，大规模生产体系是解决贫困的根本方案。然而，挑战在于如何让这种大规模生产实现盈利。为了产生利润，你必须拥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来迅速消化其产出，持续供应原材料，并确保资本循环。这是不可否认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本人也指出，专业化程度能够提高生产力，但这种专业化受限于市场规模——即“有限的市场”。斯密到此为止，没有再进一步深究。那么，市场是如何出现的呢？西方经济学教给了我们许多错误的观念。例如，它声称市场源于政治制度——

那些良好的政治制度（如西方制度）自然会催生市场。这是不正确的。市场是一种公共产品；它是一个平台。正如中国老百姓所理解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因此，市场作为一个平台，只能在国家权力的辅助下创建。没有国家，没有国家能力，没有一个具备创建市场愿望的国家，市场就不会出现。这是第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原则。其次，创建一个大规模市场需要规模化生产——即能够产生利润的可扩展、大规模制造业。这不仅适用于轻工业产品，也适用于重工业产品。创建市场涉及特定的方法和范畴，非常像合成化学聚合物：即使所有元素都具备，如果方法错误或缺乏催化剂，也无法获得所需的产品。这一点尤为关键——这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教科书从未教过的内容。通过研究欧洲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并审视中国的早期发展经验，你会发现，市场创建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迭代过程。如果你试图直接从原始阶段跳跃到高端阶段，你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无数的危机和挫折，最终陷入停滞的循环。那么拉美国家就是这样的，他们当年创造市场的程序不对。市场只能按照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些农业国的要创造小商品市场也要政府创造，然后是规模化大生产的轻工业品的市场，这个市场才能支撑重工业产品的市场，使得重工业产品盈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急于求成，想一来就创造重工业产品的市场，当然有些是必须国家要存在，必须有国防，而国防需要重工业，但那只是一部分，如果没有轻工业的支撑，国防工业不仅不赚钱，而且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最后会改变的。因此不管处于什么状态都要政府都要积极的去帮助创造轻工业市场，而创造轻工业市场之前，尤其是农业国要创造小商品市场。那中国的乡镇企业在 80、90 年代就是为了以后的规模化大生产的轻工业创造市场的，有了市场基础，规模化生产轻工业产品才能赚钱，所以原则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就需要强大的能力和正确的产业政策。

那么这些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就被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都忽视了。教科书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没有告诉我们市场是公共产品，需要国家力量去帮助创造，也没有告诉我们创造市场是有正确的方法的，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正确的顺序。因此这些原理需要重新被总结出来通过。今天的中国发展到这个程度，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如果仅仅到中国来走马观花的看一遍，他真的看不出这个过程，发现不了什么。他回去就盲目的模仿，这个就错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后来搞错了，就去模仿西方，因为你看到的是发展的结果，你并没有看到他发展的过程，没有去研究前后的因果关系，结果你模仿他，你把他的结果当成原因形成主张政治制度，那是发展的结果、不是原因，也不是先决条件。你去模仿抄袭，最后你哪里也去不了。所以这经济学需要从头来反省自己，从头来找出经济的规律。如果经济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有过程的，那么我把它分成几个阶段。从农业国开始，有原始工业化阶段；然后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英国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经历的；然后又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的市场，才能支撑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工业革命；然后重工业革命之上以机器代替劳动力以后就是信息革命开始代替，我们的信息革命又分成第三次和第四次。那么发展中国家，你从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一步想进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你一定会翻车，你要重新去走当年这些成功的发展中发达国家当年走过的道路，如果你不去复制前面的 1234，你今天想跳跃，你不会成功。好，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

2.3.3 经济与民族解放：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 发言人：罗思义
- 年份：2024

我想先就经济与民族解放的关系问题发表一些初步看法。当习近平在当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什么时，他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在中国特定背景下对列宁基本论断的阐述，即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爱国主义是进步的，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因此符合人类普遍条件。但必须明白，不能按时间顺序来理解。不是中国先实现民族复兴，然后才为人类做出贡献。相反，中国通过国家复兴的过程，为人类和 150 年后的未来做出贡献。它不会以这种方式发展，但我们谁也不知道那时正确的框架是什么。

我想把这件事和维杰说的情感新浪潮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词，全球南方发展的新浪潮。但除非转化其为具体的政策，否则无法取得成功。具体的组织，具体的举措。要发展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政策、文化政策，需要一个关于妇女的政策。我们需要很多政策且必须制定这些政策。本次会议就是其中之一。

幸运的是，在经济领域，我们可以说比许多其他国家更先进，因为我们不必讨论理论。我们知道在经济复兴和民族解放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因为中国已经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我要继续谈谈其他一些事情。

这种情感浪潮的一部分是 1992 年人们对中国的一些理解。我去俄罗斯是因为我早就知道戈尔巴乔夫将制造一场灾难。1992 年，我在俄罗斯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经济改革会在俄罗斯成功而在中国失败》，其中的论点不言自明。这表明了俄罗斯当时的心态变化。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很多人对我说俄罗斯不需要向中国学习。中国曾经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我们应该学习德国，学习日本。你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感兴趣？

我说，因为它有正确的经济理论，因此中国将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如果你现在不相信我，让我们十年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爱俄罗斯。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无法控制自己不去谈论这些。我站在莫斯科无名战士墓前，那里埋葬着 2700 万逝者。所以你们能理解拯救我们的大洲免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奴役的影响。我深爱着这个国家。而现在，这个国家被迫为生存而战，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我的俄罗斯同事昨晚和我在这里的第一次会议并非偶然。俄罗斯现在被迫拯救了欧洲甚至世界免受法西斯主义祸害。它现在必须再次为复兴而战，因为它遭受了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侵略等的灾难。乌克兰战争是俄罗斯的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将决定欧洲局势的走向。我的翻译员说得非常好。她说：“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成为独立的国家，要么成为美国的加油站。”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当前局势。

因此，当我说俄罗斯在 1992 年没有承担责任而犯下了巨大错误时，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注意到普京总统在 6 月发表了一份报告，称俄罗斯国内的共识

是中国经济发展比西方更好。我想，天哪，如果 30 年前就持这种观点，整个世界都会变得不同。

但我们正在进步。现在，我们只需要在所处的环境中尽己所能。因此，在阐述这些观点后，我想继续谈谈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一点。首先，了解中国的发展。我非常钦佩毛泽东。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摆脱帝国主义统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创造经济奇迹，其经济增长与世界水平基本持平。但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的 27 年里，中国创造了社会奇迹。人均寿命延长了 31 岁。也就是说，毛泽东执政的每一年，人均寿命就增加一岁。抛开国家大事不谈，如果有人让你多活了 31 年，那他真的是个好人。

1978 年以后，经济奇迹开始显现，人们也注意到了，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经济奇迹有多么巨大。这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十个经济体。中国的增长速度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经济体的四倍。现在，大多数人都能说出谁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你知道排第二的是哪个国家吗？从数据来看，1984 年排名第二的是越南，它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第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第二是社会主义越南。

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研究阐释了什么切实理论。去研究数据吧。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或任何类似组织是客观的，他们可以说，这些是我们必须研究的国家，它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相反，他们说，不，不要效仿它们。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领域，从将情感浪潮转化为制度这一点来看，我们在经济上更先进。

当然，并不是说任何国家都可以复制中国。你可以学习其发展特点，如何应用它们，等等。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中国甚至更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四倍以上。如果你把 1949 年的总数加起来，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统计显示，当时只有十个国家的人均 GDP 更低。如今，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中国即将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当然，重要的不是混凝土、钢铁和所有这些东西。重要的是人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寿命更长，教育水平更高，身体健康，可以出国度假，品味更多样，拥有各种各样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中国在一代人时间里，从几乎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一跃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难道不是我们想要世界实现的目标，不是每个全球南方国家都想要做到的吗？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世界上许多许多问题都将得到解决，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现在我想继续讨论全球南方的问题，因为这里存在一些误解。这就是有时所说的全球南方的崛起。你可以说它从占世界 GDP 的 32.2% 上升到 51.6%。但实际上这张图有点误导，因为这种崛起只发生在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也就是东亚还有南亚。全球南方的其他地区并没有增长。拉丁美洲的情况让我非常遗憾，因为我也很喜欢拉丁美洲，但拉丁美洲却出现了倒退。因此，全球南方的崛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与经济投资问题有关。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国家如何创造投资等话题。正如您所看到的，东亚和南亚的投资水平更高，这解释了它的增长。这向您展示了亚洲的增长模式，即投资占 GDP 的 28% 以上，远远领先于全球其他任何地区。现在如何从技术上实现这一目标？

所以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并不是说平均来看在中国的投资水平在任何一年里都迅速增加。在此期间，每年的投资仅占GDP的0.5%，但这个0.5%保持了40年。这意味着对经济的投资发生了彻底转变。

让我们来看看其他成功国家的例子。虽然越南和中国是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并不是必须像中国一样实行社会主义，通过游击战推翻国家政权，不然你什么也做不了。不是这样的。

但让我们看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这是印度尼西亚。除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你可以看到同样的模式让缓慢增长的GDP投资比例更缓慢了。这是印度。我不会讨论政治。但如果你讨论经济，GDP投资的长期发展带来快速增长。

这是孟加拉国的情况。完全一样的模式，快速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亚洲发展模式。现在让我们看看其他几个接近亚洲发展模式的经济体。这是土耳其的情况。同样，我不会反对政治，只是因为亚洲是由西方制造的，而西方正在推行疯狂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谎言。你可以从那个发展点看出类似的模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看起来与中国相似，但速度没有中国快。它们没有像特朗普做的那样，但其方向是相同的。这些是已经取得成功的国家。

然后是埃塞俄比亚。直到一位埃塞俄比亚同事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想了解这个国家。这是一个成功的正面案例，我真的很想知道它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从悬崖上掉了下来。这是由于政治危机及其后果等原因。因此，我们得到了其坠落的原因。

在此之前，埃塞俄比亚的长期发展很成功。亚洲、中国和越南的快速增长并非源于儒家文化和西方神秘主义，而是固定投资增加。印度尼西亚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孟加拉国和土耳其也是穆斯林国家。印度是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信仰基督教。与儒家文化无关，而是关乎成功。

中国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它拥有极高的研发水平。研发占GDP的比重已经被七个工业国中的三个国家超越了，尽管中国仍然落后于它们，它正在赶上。中国远远领先于全球南方国家其他国家，土耳其几乎是第二梯队肯塔基的两倍。这说明，想要实现经济领域的民族解放，自主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在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下一个国家能否发展。许多国家被压垮了，但其他国家却取得了成功。

要保持投资的自主发展，就必须与国内科研的自主发展相结合，而这需要很长时间，因为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人。从上学到拿到工程学博士学位，这中间要花20年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研发占GDP的百分比与GDP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确切地说，这不是长久之计，这里的关键是通过投资水平来调节。

所以总结一下，想要实现经济发展上的民族解放，有必要逐步建立一个自主的研发水平或GDP增长相关的国家科学机构。研发是创新的源泉。这不是一个坐在某个车库里的天才创造奇迹，而是靠的是研发。但创新必须转化为投资，否则无法改变世界。它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付诸行动。创新投资中的研发与增长相互关联。任何国家都能复制中国吗？不，他们不能复制。但这些都是中国取得经济成功的要素。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而且它确实有效。这就是我们应该向世界传达的信息。但美国最近却颁发了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真是荒谬。看

看都取得了些什么成就。一旦你知道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二快的是越南，那么你对世界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

非常感谢。

2.3.4 建构性市场模式：国家在战略性部门中的系统集成作用

· 发言人：李波

· 年份：2024

根据中国发展经验，对于某些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仅依靠市场机制往往难以实现必要的投资建设。这些领域必须充分发挥国家在市场中的引导作用。宏观层面，国家要营造公平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培育人才队伍、提供金融法律支持；微观层面，国家要深入特定市场领域，发挥系统性整合者和稳定器作用。

以高铁为例。中国高铁系统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原铁道部的统筹规划，以及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后续的系统整合。该集团不仅统筹工程建设、装备制造、通信信号等多领域，更协调国内外供应商形成稳定的长期创新伙伴关系。尽管部分线路短期内难以盈利，但通过统一规划布局，整体高铁网络可实现收支平衡，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这种模式有效规避了市场风险，而这正是民营企业难以承担的任务。相比之下，加州高铁项目因缺乏类似的政府主导机制，历经二十年仍未完工。

新能源汽车（NEV）的发展同样体现了国家战略的远见与连贯性。早在1992年，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就提出跳过传统内燃机阶段，直接发展电动汽车的建议。该建议在国家“八五计划（1991-1995年）”中获得重点支持。此后，产学研合作加速推进，以同济大学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在电池技术和整车架构领域取得突破。经过数十年的政策扶持与市场培育，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品牌、技术和设计领域实现全面突破，确立了全球领先地位。但国家干预并非总能奏效。例如，在传统燃油车领域以市场准入换取技术的尝试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国际品牌长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直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崛起才改变了格局。

中国发展历程表明，市场体系建设是需要从实践中不断学习的探索过程。“摸着石头过河”虽伴随风险，却能催生创新。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首要任务是识别最具战略意义的基础产业，合理界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合资企业在市场中的角色与责任，必要时引入外资合作。同时应借鉴中国在资本市场建设、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及系统整合模式方面的经验。

中国愿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合作，与全球南方国家分享市场发展和战略性产业培育方面的经验与解决方案，推动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2.3.5 新自由主义政策批判：土耳其的经验教训

- 发言人：居尔特金·阿里克
- 年份：2024

全球北方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种倡导自由市场、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经济哲学）主要包含三大要素。首先，这些政策侧重于提供消费品而非发展国内生产能力。其次，由于多数消费品产自全球北方，这些政策鼓励从该地区购买消费品。第三，主张缩减公共部门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将所有资产私有化，使外国资本得以收购并控制原国有企业。此外，全球补贴机制常被设计为将本土生产能力转移给外国公司，表面上是为创造当地财富。这些政策还强调借助外国资本开发矿产等未开发自然资源。

在此背景下，过去二十年间土耳其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践试验场。期间近90%运作良好且成功的公共品牌被私有化，这些资产最终或售予外国资本，或转手给被视为能力不足且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本土资本集团。我们虽反对这种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主张建立百分百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相反，私营企业应通过效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或生产成本降低来证明其存在价值，从而彰显其合理性。然而土耳其的实践表明，这些私有化举措并未带来质量提升、成本降低或其他有益的运营指标，本质上不过是将公共资产转移至私营实体。

图中人物曾任主管私有化进程的财政部长，主导了众多公共机构的出售。尽管这些机构在清单上可能只是小字标注，但每家都具有重大经济战略意义，包括土耳其电信、钢铁厂、铝厂、港口和机场等实体。这些私有化举措未产生任何积极成果——例如私有化的土耳其电信公司便长期背负巨额预算赤字。更甚者，部分机构私有化后直接关闭，其余则转型为购物中心、豪华住宅等低效实体。以 SEKA 造纸厂为例，这家纸业巨头已宣告停产。如今土耳其纸张需求主要依赖进口，导致纸价飙升，严重冲击包括报刊书籍在内的整个印刷出版业。最终，财政部下属的私有化机构因无资产可供私有化而被撤销。

在农业领域，土耳其历来被视为肥沃的农业自给国。从古代到奥斯曼帝国时期，这里始终是农业文明的摇篮。时至今日，土耳其人仍自豪宣称本国四季分明且四季同存。除部分热带果蔬外，土耳其本土几乎能产出所有农作物。直至1980年代，土耳其仍是成功的农产品出口国。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以下措施系统性瓦解了农业部门：首先，在世界银行主导的政策影响下，生产者信贷支持大幅削减，燃料油、化肥等必需品价格自2013年起急剧攀升。其次，政府与世界银行通过补贴诱使农民停止耕作，实质上将他们列入“补贴名单”。这些政策使农业生产失去吸引力，导致有效耕地面积总计萎缩达15%。历史上，土耳其烟草和土耳其棉花曾是享誉全球的农产品；如今这两类作物已绝迹。土耳其由此丧失了农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沦为重要农产品进口国。该国如今进口着曾经出口的大部分农产品，包括谷物、水果、蔬菜、肉类，甚至马草。

尽管采矿业对环境和农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它仍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焦点。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采矿许可的发放存在严格监管，许可数量受限且受严格公共控制；但随后采矿业被全面开放，大量吸引国内外资本涌入。单在一年内，政府就向国内外企业发放了9,949份采矿生产许可证（非勘探许可证）。政府试图通过矿

业收入弥补财富流失，此举导致肥沃的安纳托利亚土地上布满矿坑。可预见的是，该政策必然引发环境与农田的破坏。在多数矿区，警方强行阻止农民进入田地以便利采矿作业。伊利奇（原名埃尔津詹）曾发生加拿大-土耳其合资金矿灾难：加工后的土壤引发山体滑坡，造成多名工人死亡。最危急的是，受污染土壤中的氰化物可能渗入幼发拉底河水系。

土耳其及全球南方这场悲剧性的经济衰退，若非现任政府蓄意推行全球北方毁灭性且不得民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本不可能发生。这引出了关键命题：全球南方可持续经济发展本质上首先是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最低合理政治前提：必须建立与民众力量及其组织紧密联结的政治权力。这要求建立由工人、农民、白领知识分子、中小生产者及手工业者组成的政府，其特征应是开放透明与责任担当。此类进步政府的决策须接受公众监督与反馈。任何幕后交易都可能滋生腐败，终将导致失败。

鉴于时间限制，我们不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详细方案或公式。但需探讨某些进步政府过去犯下的两个错误。首要失误是推行严格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百分百国有化。将外国资本国有化、没收并完全关闭国门阻隔所有外资的理念，是1970年代的浪漫主义理想。这种做法最终失败，因为发展中国家显然需要外国资本来振兴经济。国内投资资本的缺失必然导致经济放缓和物资短缺。我们并非主张对外资完全开放，而是主张合理利用。虽然完全开放与完全限制外资是两种极端，但每个国家都有权也有责任维护和捍卫本国的经济资产与资源。因此必须采取平衡策略，依据以下标准引导外资：第一，利用外资生产本国无法制造的商品或必需品；第二，就外资企业产生的利润进行公平分配进行强有力的谈判；第三，同步扶持本土品牌并与外国品牌实现共存；最后，应协同努力吸收外来新技术，并致力于实现本土化发展。所有这些目标和标准都需要一个强大而进步的政府——一个以奉献精神和对人民利益的承诺为特征的政治力量。

第二个错误是所谓的“出口主义”，它使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完全依赖于原材料出口。发展中国家可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如矿产、石油或初级农产品。这为国家创造了可利用的机会。然而，如果一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仅限于出口这些原材料，这种战略将因两大原因变得脆弱。首先，原材料国际市场价格受诸多不可预测因素影响而波动；其次，农产品生产普遍受制于当地气候条件，单一歉收年份便可能引发国家经济灾难。替代方案是通过具备竞争力和附加值的产品确保全球市场地位，涵盖所有工业领域、信息技术及物流体系，从而建立完整的产业能力。应制定全面的国家战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道路、铁路和港口项目的重要性不容低估。但最关键的基础设施是健全的教育体系，辅以强大的研发能力——人力资本才是最核心的资产。强大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最大杠杆。

显然，此类发展战略将招致北方国家的抵制，可能引发贸易限制。制裁与禁运亦是对进步、亲民、爱国政府的潜在威胁。但世界并非仅由北方国家构成，当代全球格局的多极化特征正提供着必须充分把握的重大机遇。最后引用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深刻箴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斗争中最关键的问题。在我们的语境中，朋友包括中国、越南等进步社会主义政权；委内瑞拉、巴西等实行进步社会政策的国家；以及俄罗斯、印度、伊朗等真正独立于北方世界的国家。

2.4 从象征到实质的国际主义实践

2.4.1 主权与友谊：全球南方团结的辩证法

- 发言人：刘烨
- 年份：2024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与在座的朋友、同事，以及同志们见面。我的主题是“主权与友谊”，正如大家所见。有趣的是，这个小组的主题不仅围绕“主权”，而且我还想探讨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这两个都是宏大的概念。首先，我们知道，“主权”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最初是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发展起来的，随后被强制性地引入全世界。这就引发了许多关于主权的历史问题。我想指出的一点是，主权的本质形式，以及它是积极的还是被动的。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主权——是将其视为一种条件、一种过程，还是一种运动。

另一个要谈到的概念是“友谊”。在国际关系或全球秩序中，当我们谈论“友谊”时，往往将其松散地当作地缘政治关系的隐喻，或大国博弈的脚注。但实际上，我想提醒大家，我们需要回顾20世纪在战争、革命和人民革命的高潮中，“友谊”这一术语的经历。因此，在讨论“友谊”时，我们需要思考，它是更多体现了一种共性、相互关系的常识，还是仅仅体现了一种联盟、一种盟友关系？

这是我话题的开端。当然，谈论主权时，我们首先需要思考，非西方社会如何理解主权。在历史的开端，我们知道，在殖民化、帝国主义、所谓的自由贸易以及全球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进程中，每个国家、社会、社区都被卷入了这种以帝国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因此，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所有人似乎都被迫接受并学习“主权”这一术语，学会使用它来阐述自己。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接受主权的历史同时也是全球南方、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积极重写主权概念的历史。

通过他们的斗争、实践、谈判以及各种历史智慧，这些国家和人民不断扩展、深化并从根本上重构了“主权”这一概念。因此，今天，当我们谈论主权时，一方面，它确实源自欧洲历史，但另一方面，它现在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项目，并且在不同力量的争夺中继续存在。

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我们知道，拥有并捍卫主权，是保障国家独立或自治的一种方式。它基本上是关于安全，是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团结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主权”有时会在法律上设置障碍或界限，从而阻碍更进一步的团结行动。这是一个需要处理的辩证过程。

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主权不仅仅是一个规范性术语。在国际关系中，每一个行为体都宣称自己是主权国家，而为了被承认，你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不管是签订合同还是条约，都基于主权的承认。但这是否意味着你真正拥有独立和自主的权力？这实际上取决于很多因素。我们需要认识到，主权的构建不仅是一个法律术语，也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历史性和实质性的过程。

另一个要点是，当我们谈论“主权平等”时，它听起来像是国际秩序或规则中的一个陈词滥调，人们常常基于“主权平等”这一原则展开关系。但我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主权平等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状态，除非我们创造了一种非常革命性的协商和关系方式。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如我所说，这不仅是一种规范性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一种方向、一种命运——一种需要通过复杂的关系、团结以及具体的挑战才能到达的路径。人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举个例子，也许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早期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众所周知，那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比如五年、十年、十五年，大部分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成为新的国家成员，加入了联合国以及亚非大家庭。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像恩克鲁玛和朱利叶斯·尼雷尔这样的领导人就开始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团结，而不仅仅是以“空洞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名义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只是拥有主权的名称，而国家规模很小、人口很少、资源有限，那么面对帝国主义根本无从抗争。

他们意识到，光靠主权的名称无法抗击帝国主义，必须通过反抗力量来斗争。这也是他们的计划，他们希望在独立之前，就实现团结。尽管他们尝试了许多实验，但最终只有一个成功存留下来，那就是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的联合，也就是今天的坦桑尼亚。当然，当时这位国家英雄兼泛非主义英雄在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国之前，等待了几个月，希望其他东非国家能够加入一个更大的联邦。然而，这一愿景并未实现。

这些历史教训不仅是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共识，也反映了中国的视角。我们知道，毛主席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支持非洲统一运动。例如，1962年，毛主席接见几内亚的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他提到了两点：一是非洲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二是这种团结应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三大洲联合。

毛主席还提到，我们坚定支持你们，因为你们是革命政府、革命政党，有很多革命工作需要通过你们来帮助非洲国家实现解放。他还提醒，不能因为实现了独立就忘记关心他人，我们中国也一样。他强调，“关心他人”意味着友好的支持与帮助。这说明，单靠主权并不起作用，主权只有在主权之间团结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正如所说的，“没有人能真正拥有主权，除非每个人都拥有主权”。

然而，我们还有其他需要反思的经验。例如，尼雷尔在1970年提到“主权团结”的重要性。当时正值1960年代政治运动完成阶段的分水岭，但经济困难却日益加剧。他指出，没有一个国家、民族或主权国家应该只关注短视的国家利益而忽视他人。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共同生存。这种团结的可能性并非遥不可及，只需要政治意识和意志来推动经济团结。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思一些经验教训。比如欧洲的一个大型组织“经互会”。经互会取得了很多成就，例如在全球工业产量中占据了三分之一，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成功案例。但它也存在内在问题，比如以错误方式推进团结，可能会导致限制主权的倾向。这种团结可能演变为中心-边缘关系或垂直关系，忽视了每个国家的主权。

在谈到这一点时，我想起毛主席 1971 年在派遣首个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时的讲话。他提到，我们现在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但这一战线与国内统一战线不同，因为国内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与他人协商或妥协。而在国际场景中，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涉及不同的国家、文化、文明和主权。

因此，毛主席指出，实现这种国际统一战线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商，而不是由谁领导谁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国家应该是领导者，而其他国家应该是追随者的问题。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运作，即便是来自左翼的做法，比如苏联的经验，也可能违背我们的初衷。

那么，总结来说，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真正实现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的团结？这种团结不仅基于政治口号或激情，而是基于真实的、有意义的、具体的政治实践，这些实践在经济关系中具有实质性意义。同时，我们如何让经济与政治紧密相连？不仅仅是市场或贸易系统中的经济，而是明确、直言不讳地具有政治性的经济。

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这是一种人民的民主形式。我必须强调，抽象的“经济人”形式无法真正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可能会建立一个所谓的全球化世界，但这种全球化完全脱离了现实世界。而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最后，我想说，我们所有的全球南方成员可以走向的可能道路，应该是一种相互援助与合作的意识，而不是一个庞大的超国家结构。这种政治认同的联合，虽然是一种必须的联系，但更应该是一种友谊，而非联盟。实际上，友谊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平等且自主的。

此外，我们需要经济支持，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原则。我们必须让市场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依赖市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有一种哲学背景支持这一点：每个政治共同体既是自主的，同时也与其他共同体固有地联系在一起。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需要设想一种将所有人形式化地结合在一起的大型组织或实体，而是应该寻找一种各自独立统一的形式，或者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

2.4.2 国际主义传统下的全球南方合作：以中巴农业合作为例

- 发言人：郭义伟
- 年份：2024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国际主义始终是凝聚人民与国家的核心纽带。马克思与恩格斯洞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实现全球霸权这一历史趋势，由此提出国际主义原则应作为无产阶级的根本行动纲领。这一理论指引促使各国革命政党在 20 世纪成功构建起突破地域局限的斗争联合体，深刻改写了人类文明进程。

当代国际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符合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国际秩序，而非服务于特定霸权体系。唯有确立社会主义全球化视野，方能穿透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特征，超越资产阶级外交的表象博弈，准确把握国际阶级斗争的深层规律。历史实践证明，正是通过国际主义的持续实践，革命理想得以在历史迷雾中保持生机——即便在文明发展遭遇重大挫折的特殊历史时期，仍为人类社会指明前进方向。

实现国际主义的路径具有多元性，但以下三大支柱可被视为全球南方国际主义的核心要素。首先，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仍处于典型民族国家形态，其治理结构由资产阶级政党主导。这些执政集团普遍具有资本逐利性特征，往往未能充分致力于国家可持续发展。其核心目标在于掌控土地、水体、矿产及生物多样性等战略资源，延续着殖民时期形成的资源攫取模式。正如维杰所述，农业综合企业与采掘业在区域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本质上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非地域性自然禀赋差异。

其次，跨国民众团结应构成民众外交的基石。巴西青年学者对拉丁美洲基层组织经验的系统性研究为此提供了实证。第三，需建立战略规划框架，统筹基层组织诉求，构建涵盖政府机构、国家能力建设及资本力量协调的制度体系，确保资产阶级切实履行国家发展义务。

此类国际主义原则的实践典型可见于国际民众合作协会（IAPC/Baobab）的运作。该组织成立于 2019 年，5 年来作为全球南方民众运动的协作平台，致力于搭建民众运动、教研机构与政府间的科技合作桥梁，重点服务各国人民的根本需求。

农业历来是人类社会生产体系的核心领域，始终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场域。土地制度及所有权问题作为深层矛盾的核心要素，在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现实困境中具有关键性意义。全球化生产链重构背景下，农产品在贸易体系中的战略价值持续凸显，周期性粮食危机与环境退化形成恶性循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范式通过森林砍伐、化学药剂滥用等实践，正在加剧生态系统的不可逆损伤。

值得关注的是，以拉丁美洲为典型区域，农业寡头集团通过重构其政治经济联盟，已演化为国际资本利益的代理人。其在过去 30 年间形成的跨国联合体——农商业集团——本质上是本土农业垄断资本与北方跨国公司的复合利益网络。这类集团通过战略协同机制，与跨国媒体集团及极端右翼势力形成共谋关系。

农商业体系的技术范式源于绿色革命技术体系，具体表现为：杂交与转基因育种技术、化学肥料及农药工业化应用、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及单一种植模式。这些特征使农业生产全面融入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并在当代加速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与此

形成辩证关系的是，基于地域特性的农业生产者阶级（peasantry）正通过全球范围的联合行动，尝试构建与资本垄断体系相抗衡的阶级主体性。

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定居点的影像记录显示，在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框架下，农民阶级致力于推动全球团结协作，创建农民之路组织，并围绕粮食主权、生态农业等核心诉求形成具有凝聚力的阶级纲领。土地改革与土地权保障等传统斗争纲领获得改革动能，同时为全球南方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战略图景。

基于此背景，系统性掌握可推广的粮食主权技术体系及生态农业实践模式具有迫切性。为此，国际民众合作协会通过两大路径推进技术共享：其一为基于人际协作与机构联动的直接知识传递机制。全球农民组织在长期实践中已形成丰富的技术经验积累，通过促进跨区域知识交互可有效强化组织效能，突破关键性技术壁垒。其二为实施国际生物投入培训项目，该项目采用 21 天“理论+实践”模块化教学体系，由农民领袖与有机知识分子开展知识共享。2023 年起，首期培训在阿根廷启动，次年在尼泊尔完成亚洲区域拓展；2024 年巴西承办第三期培训，2025 年上半年计划在坦桑尼亚实施非洲区域首训。迄今已有 30 余国农民组织参与该跨国技术交流计划。

第二条路径旨在通过构建制度化框架，推动政府、政党及智库建立基于民众运动的战略协作机制。在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是将传统农业生产者纳入中巴合作议程的实践创新。值此中巴建交 50 周年之际（2024 年），尤其需关注 2010 年代以来工人党执政时期所强化的双边关系——即便在国际共识尚未形成阶段，这种合作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协同发展的典范，金砖国家机制的建立即是其重要成果。

当前合作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在于，巴西农矿产品贸易领域存在利益失衡现象。尽管今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1400 亿美元，但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输出模式。这种单一化的经贸结构客观上为质疑中巴合作、推崇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政治势力提供了话语空间，导致双方合作的政治经济潜力未能充分释放。从农业基础而言，两国存在深层次共性：中国 2.4 亿农户家庭掌控 90% 以上生产单元，巴西虽位居全球土地集中度前列，但 400 万农户家庭不仅贡献全国 70% 的粮食产能，其生产模式与社会化经营理念具有显著的契合性。

以下通过三个典型案例简述双方合作进展。其一，中国在固体有机废弃物资源化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将有机废弃物高效转化为优质有机肥料。巴西作为全球第四大有机废弃物产出国，当前资源化利用率仅为 0.3%。通过与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及环保科技企业建立三方合作机制，巴西正系统规划有机废弃物处理新型工业体系建设，该项目获得新开发银行及行长罗塞夫女士的重点支持。

其二，中国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能力位居世界前列。本年度双方共同推进建设两个中巴家庭农场机械化示范中心，旨在构建符合热带农业特点的农机技术推广体系。其三，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此两国建立了新型减贫合作框架，国际民众合作协会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参与其中。

基于“中巴减贫与乡村振兴论坛”的连续成功举办（2022-2023），两国已形成政府机构、城乡社区组织与技术供给方三位一体的常态化交流机制，着力构建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综合解决方案。实践证明，消除饥饿与贫困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深化战略协作的重要基石。

上述三个典型案例，以及其他诸多未及列举的实例，在巴西已被广泛视为中巴合作进程中的潜在里程碑事件。此类合作突破已超越表面形式调整，亦非单纯为双边磋商增设谈判议题，而是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能级跃升，深度推动双方民众根本利益的战略融通。这一实质性跨越印证了本人先前阐述的国际主义精神内核。

全球南方国家同仁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是极具时代价值的实践命题。该理念不应困囿于殿堂楼宇与公文案牍，而需深植于全球南方三十亿民众的现实生活图景。当代国际政治场域中，我们理应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全球实践与国际主义精神的时代传承贡献力量。

2.4.3 中非共同现代化的愿景与挑战

- 发言人：弗雷德·蒙贝
- 年份：2024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非中合作论坛（FOCAC）上发表讲话，提出为中非28亿人民实现共同现代化的愿景，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该倡议首次提出如此明确的方案，将中非人民的发展愿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于历经数百年奴役、屈辱、剥削、殖民与新殖民统治的非洲人民而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倡议是唯一明智的选择。这一倡议为终结数百年屈辱、边缘化、压迫、剥削和资源掠夺提供了更公正、公平、人道、合理的机遇。

我如此断言充满信心，因为习近平主席的倡议是开放共赢的。它以人为本，兼容并蓄，注重生态环保，倡导和平安全。关键在于，它不会损害我们的独立主权，反而会增强我们的主权。失去主权我们就一无所有；若一无所有，就无法实现现代化与发展——因为无中生有绝无可能。

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开辟了一条属于全世界人民、全人类的崭新现代化道路，堪称全球南方国家提出的现代化愿景。

习近平主席还提出十项重大合作行动，推动中非携手共进现代化。这些行动旨在通过文明互鉴、贸易繁荣、产业链合作、互联互通建设、卫生健康合作、惠民农业、文化交流、绿色发展、共建安全等途径，开辟中非共同现代化道路。

这听起来令人振奋，也确实如此，但我们不应自欺欺人或被蒙蔽，以为这一切会轻易实现或唾手可得。其中存在固有的问题和挑战。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支配、剥削和羞辱我们的人，并不希望我们摆脱他们的影响；他们渴望继续他们的剥削和羞辱。

美军在非洲维持着庞大军事存在，并通过非洲司令部不断扩张势力，在非洲大陆建立基地和办事处。美国运用各种手段在非洲煽动颜色革命，扶持亲美傀儡政权。同时，美国在经济贸易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并利用其媒体霸权在非洲扭曲和抹黑中国形象。

第二个挑战来自非洲国家自身：其行政能力和斗争意识尚未充分发展。非洲奉行的西方式选举政治，常导致执政党立场摇摆、政策缺乏延续性。加之西方国家长期的人力资本掠夺，加之能力建设投入不足，导致非洲国家整体治理能力薄弱。这些因素往往阻碍非洲国家有效对接中国支持，削弱合作效率、成效和有序性。

第三个挑战在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合作项目确实遭遇了诸多实施难题。例如，部分中国企业缺乏与非洲当地工会的沟通，甚至拒绝与其合作，认为只需与政府打交道即可。缺乏工会调解机制，日常工作中产生的细微摩擦无法及时沟通化解，这些问题有时会升级为重大冲突，甚至被别有用心的媒体利用，损害中非合作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形象。

中国的朋友需要认识到，非洲多数国家并不像中国那样拥有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非洲许多政治精英只追求选票和个人利益，而非服务人民。中国的朋友

应当认识到，非洲人民及其代表力量——左翼政党、工会和人民运动，才是中国最坚定的朋友和同志。

值此"一带一路"倡议迈入第二个十年、中非携手共进现代化新征程之际，我们愿以中非关系为基石，进一步深化中非人民的友谊、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客观挑战，携手推进中非 28 亿人民的现代化进程。

2.4.4 金砖+：为什么选择对东盟很重要

- 发言人：吉塔·维尔贾万
- 年份：2025

1. 引言

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政治格局经历了重大结构性变革。随着去殖民化后主权国家数量的激增，亚洲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于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汇聚一堂，共同宣示了反殖民主义、和平共处与战略自主的集体愿景（雷布鲁克，2024）。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成立进一步将这一精神制度化（Prashad, 2008）。

七十载后，全球南方成员——包括东南亚国家——仍在应对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不断转移的经济权力以及新型地缘政治联盟构成的全球秩序。印尼于2025年1月6日决定加入金砖国家+机制，可视为这一历史轨迹的延续：当代对更具包容性、多极化国际体系的探索（Waters & Putrono, 2025）。

本文认为，东盟在新兴多极秩序中具有显著的“选择价值”，而印尼加入金砖国家+正是这种选择权的行使。这种选择价值源于东盟的规模、经济活力以及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与多个大国进行战略互动的能力。然而实现该价值取决于制度因素——尤其是法治水平及该地区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量化风险的能力——二者共同构筑了有效资本形成的基石。

2. 讨论

当今东南亚地区人口约7亿¹，总GDP约4万亿美元。除新加坡和文莱外，东盟各国经济体仍处于中高收入或低中收入水平，人均GDP普遍低于13,205美元²。其经济脉搏与更广义的全球南方国家紧密相连，共同追求产业升级、技术获取和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

东盟的经济纽带映射出这种定位。通过与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印度及日益重要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多极经济体开展合作，该地区构建了多元化的机遇结构。正是这种结构性开放赋予了区域选择权价值，使东盟国家能在流动的战略环境中灵活调整、对冲风险或撬动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尼西亚加入金砖国家+的决定可通过实物期权逻辑解读。在不确定环境中，推迟、多元化或调整战略选择的能力具有内在的 价值。加入金砖国家+机制将增强印尼乃至整个东盟的三大能力：1) 拓展技术与经济资本的新来源渠道，尤其是来自中印两国的资源；2) 对冲中美竞争加剧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3) 参与新兴金融、贸易及数字基础设施平台，例如金砖国家支付机制、发展融资及技术合作（Wirjawan, 2025）。此举并非否定与美国、欧盟或日本的现有伙伴关系，而是拓展了战略选择空间，增强了东盟在多条大国接触轴线上的谈判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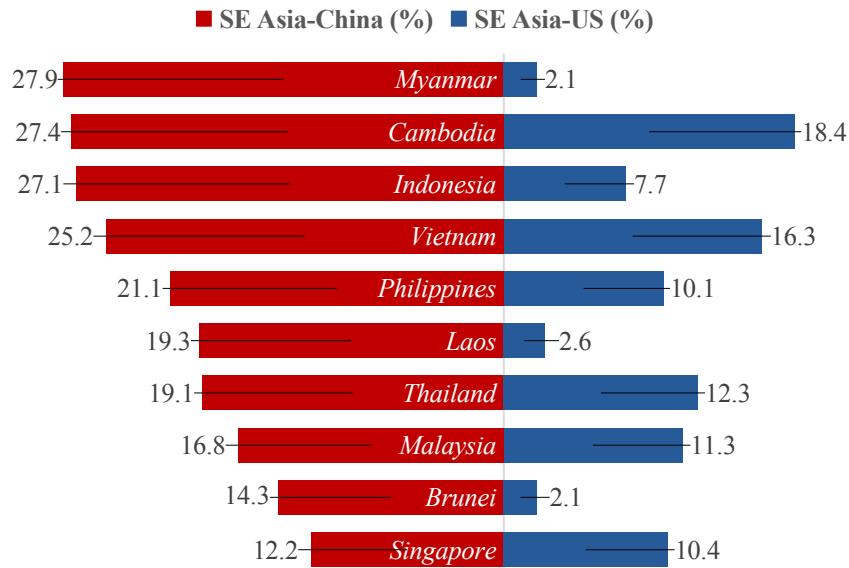
¹ “人口总数”，世界银行，无日期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

“GDP（现价美元）”，世界银行，无日期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² “经调整的人均国民净收入（现价美元）”。<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ADJ.NNTY.PC.CD>

在金砖国家成员中，中国仍是最重要的技术和经济资本来源。中东盟经济关系去年贸易额近1万亿美元，远超东盟与美国约5000亿美元的贸易规模（Araral, 2025）——见图1。受商业互补性及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驱动，中国对东盟的经济资本流动正日益呈现有机化特征。

图1. 2024年十个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及美国贸易份额对比



数据来源：世贸组织、国际贸易数据系统、Econovis 经 Voronoi 分析 (<https://www.voronoiapp.com/trade/-ASEAN-Trade-Dependence-US-vs-China-2024-6856>)

然而更具深远影响的是技术资本配置的长期维度。无论是数字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交通运输还是工业现代化领域，中国技术解决方案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仍具成本效益且易于获取。中国历来擅长渐进式创新（“从1到下一个数字”），但正快速迈向前沿创新（“从0到1”），尤其在人工智能、电动出行和可再生技术等领域（Maslej, 2025; He et al., 2022; Hove, 2024）。对于寻求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地位的东盟国家而言，获取此类技术资本是实现产业升级和生产力增长的关键途径。

尽管金砖国家+机制和中国技术崛起带来机遇，东盟及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能从中获益的程度取决于两大结构性条件。其一是法治环境，这是资本形成不可或缺的基础。可预见的监管框架、合同可执行性及法律确定性，共同塑造着国内外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其次同等重要的是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量化风险的能力。不确定性本身无法量化且不可投资（“未知未知”），而风险（“已知未知”）则可定价、管理和分配。这种转化需要数据治理、监管一致性、可信赖的机构以及管理能力。若这些要素缺失，投资受限的根源并非意识形态或地理因素，而是无法提供足够可预测的环境。

然而，人力资本缺口仍是制约东南亚长期资本形成的关键瓶颈。中国每年培养约400-450万STEM专业毕业生，印度约200-250万，而东盟仅约75万（Olis等，

2023）。这种差距显著影响着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向模式。东盟年均FDI流入量约2000-2300亿美元，但分布极不均衡（见图2）。

图2. 东南亚及中国2021年FDI（十亿美元）与人均FDI（美元）

数据来源：印度尼西亚统计局 (<https://www.bps.go.id/indicator/13/1840/1/realisasi-investasi-penanaman-modal-luar-negeri-menurut-provinsi.html>)；CEIC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y-list/foreign-direct-investment>)。

这些结果与该地区有限的STEM能力以及持续依赖基于庇护关系而非精英选拔的招聘体系密切相关。解决这些结构性障碍对于充分利用技术资本配置的效益至关重要——无论这些资本来自金砖国家成员还是其他全球合作伙伴。

3. 结论

东盟正处于全球秩序演变的关键节点。印尼加入金砖国家+机制，既体现了对万隆原则的历史延续，也展现了在更复杂的多极体系中提升国家与区域选择权的前瞻性战略。

潜在收益极为可观：技术资本获取渠道拓展、战略自主性增强、替代性金融与数字生态系统参与度提升。但实现这些机遇需强化国内制度基础，尤其需完善法治体系、风险转化能力及基于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人力资本储备。

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不应被视为排他性联盟，而应视为额外的战略工具——它能增强东盟应对未来数十年不确定性的能力，推动其发展愿景的实现。

参考文献

Araral, E. (2025 年 5 月 26 日). 东盟、美国与中国贸易的未来走向. 《商业世界》. 2025 年 11 月 27 日访问自 <https://www.bworldonline.com/opinion/2025/05/26/674531/the-future-of-asean-us-and-china-trade/>.

何红等 (2022)。中国电池电动汽车引领全球：技术体系架构与技术突破的成就。《绿色能源与智能交通》，1(1)，100020。DOI：<https://doi.org/10.1016/j.geits.2022.100020>。

霍夫, A. (2024). 中国清洁能源创新：事实与虚构及其未来启示. 牛津能源研究所. ISBN: 9781784672492.

马斯莱, N. 等 (2025)。《2025 年人工智能指数年度报告》。斯坦福大学以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指数指导委员会。DOI：<https://doi.org/10.48550/arXiv.2504.07139>。

奥利斯, B., 麦克福尔, C., 里迪克, J. (2023 年 11 月 27 日)。全球 STEM 毕业生分布：哪些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 (CSET)。2025 年 11 月 27 日访问，网址：<https://cset.georgetown.edu/article/the-global-distribution-of-stem-graduates-which-countries-lead-the-way/>。

普拉沙德, V. (2008)。《黑暗国度：第三世界人民史》。新出版社。ISBN: 9781595583420。

雷布鲁克, D. (2024)。《革命：印尼与现代世界的诞生》。维京出版社。ISBN: 9781847927057。

沃特斯, A. & 普特罗诺, J. (2025) 《印尼加入金砖国家+迈入多极化时代：全球南南合作平台扩展背景下国家地缘政治重组的三条路径》。《第三世界季刊》，1–19 页。<https://doi.org/10.1080/01436597.2025.2586173>

维尔贾万, G. (2025) 《必备要素：东南亚——从全球意识的边缘走向核心》。终局出版社 (印尼卓越智慧基金会)。ISBN: 9786340424058。

2.4.5 俄罗斯在支持全球南方合作中的作用

- 发言人：奥列格·巴拉巴诺夫
- 年份：2025

本次会议上，我谨向主办方致以诚挚谢意——包括多年来与我们保持紧密合作的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发出邀请的三洲研究所。

首先需强调的是苏联政策的历史遗产及其在去殖民化进程中的支持作用。这一进程始于50年代中期《万隆宣言》及亚非会议。苏联始终恪守万隆原则，并致力于将其落实于实际外交政策。值此万隆会议周年之际，我们瓦尔代俱乐部智库与印尼同仁共同撰写了专题报告，探讨万隆会议的历史意义——这对当代印尼青年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团队中有印尼青年专家参与。这点至关重要，万隆精神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对俄罗斯同样如此。此外，我们支持并参与了不结盟运动及和平斗争。

再者，苏联曾向亚洲非洲去殖民化国家、独立国家提供经济文化援助，尤其对全球社会主义国家及人民民主国家给予支持。让我们铭记古巴，铭记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等众多国家。

当前形势下，俄罗斯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共同安全与发展的真正基石。该组织发展态势良好，促进了成员国间的互信合作精神。我们也看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加强欧亚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开展的共同努力。

还有一点：我们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使该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该联盟由俄罗斯及欧亚大陆其他几个前苏联国家组成）实现对接，双方已采取许多切实步骤。我们当然也在推动中俄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显然对俄罗斯的安全和发展至关重要。

再谈金砖国家。它显然已成为团结的象征，代表着全球非西方和南方国家的主流力量。虽然俄罗斯地理上不属南方，但我认为现在可以从政治角度将俄罗斯视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至少我们也可以使用更宽泛的术语，如"全球非西方"或"全球多数派"，这些概念在俄罗斯已相当普及。如今，金砖国家扩员彰显其重要地位，金砖精神也在不断演进。必须指出，"金砖精神"这一概念由中国朋友率先提出——2017年中国主办金砖峰会时首次载入峰会宣言，2022年中国再次担任主席国时予以重申。此后，"金砖精神"这一概念始终贯穿于历届金砖宣言。

现在谈谈实际任务。首先，我认为金砖国家与上合组织需要加强真正的团结。我不愿称之为统一战线，但面对特朗普对金砖成员国乃至全球南方国家的攻击——无论是去美元化还是关税政策——我们确实需要凝聚力量。例如今年夏天，我所在的瓦尔代俱乐部智库与南非同仁在南非召开会议。南非代表坦率表示，由于该国不幸成为特朗普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他们希望金砖国家成员展现更多团结，给予更多支持，不愿在面对特朗普和美国时孤军奋战。巴西代表后来也表达了同样的诉求。我们看到，在巴西担任主席国期间，金砖国家召开了一次特别的线上峰会，专门讨论如何应对特朗普的攻击。但迄今为止，所有金砖国家仍在与特朗普进行双边谈判。中国如此，印度如此，俄罗斯如此，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亦是如此。因此当前亟需

从象征性举措转向实质行动，在经济金融领域加强合作。我完全赞同保罗（小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关于新开发银行及其他诸多议题的见解。

此外，我认为加强上海合作组织（SCO）尤其是金砖国家内部的独立议程至关重要。半年前我在瓦尔代论坛网站发表过一份关于金砖国家共同价值观平台演变的特别报告。我注意到，至少直到近年，金砖国家议程仍存在某种“翻译机制”：先在七国集团会议讨论某项概念，半年或一年后在二十国集团会议重复，两年后再在金砖国家会议复述。这本质上是在追随西方议程，而非推动自主倡议。2014年南非首次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时，或许实现了首次突破——我们终于提出了支持非洲国家的金砖国家金融援助方案。随后在巴西担任主席国期间，新开发银行得以组建。但我们也仍能看到局限性，保罗已提及部分问题。金砖国家内部设有应急储备金池。当前我们面临诸多财务困境，例如埃塞俄比亚就存在巨大资金缺口——为何不启用本组织应急储备金支援成员国？结果埃塞俄比亚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承受着该机构附加的人权议程等种种限制。

最后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强化全球非西方国家及南方国家在G20中的统一立场——无论称之为团结、协作或任何概念。因为在G20中，所有西方国家，即G20的西方半壁江山，始终以统一声音、凝聚立场发声。而全球南方国家的立场却各不相同。这意味着G20在某种情境下，要么温和接受某些西方提案，要么在强硬立场下根本无法作出决策。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使全球南方、全球非西方国家的声音在G20中面对西方伙伴时更具凝聚力。

以上即为我的核心观点。此前提及的瓦尔代俱乐部两份报告分别探讨了万隆会议（）及金砖国家共同价值观平台。非常感谢。

2.5 从能力流失到能力重建——全球南方的结构困境

2.5.1 超越华盛顿共识: 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多层次作用

- 发言人: 邦加尼·恩库隆加
- 年份: 2024

南非在民主转型前后及之后的讨论, 始终围绕着关于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视角展开。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 核心问题在于: 基于南非经验, 是否正在形成关于经济发展的新共识?

第一种视角强调资本主义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发展经济学研究者而言, 这种观点侧重私营部门, 淡化国家作用。在此框架下, 国家职能仅限于营造吸引私营投资的有利环境。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发挥关键作用。某种程度上, 这两种理念已在南非过去三十年的民主进程中得到实践。后者认为国家不仅要营造吸引资本投资的环境, 更应主动进行投资。

第一种主张私营部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并能解决南非所谓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三重挑战的理论, 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 过去三十年南非采取的行动基本遵循这一主导范式。然而, 尽管南非政府全力推行私营部门主导的发展模式, 却未能吸引到显著的私营部门投资。南非学术界常将此现象称为"投资罢工"——即表面遵循华盛顿共识(倡导自由市场、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框架), 实质却缺乏重大私营部门投资。

因此, 这种对私营部门主导经济发展的依赖, 促使南非的讨论与辩论转向思考私营部门与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应对不平等、贫困和失业等顽固挑战中各自能发挥的作用。虽然普遍认为私营部门应发挥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承认国家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尽管普遍认同国家应发挥作用, 但其具体职能仍需深入探讨。

这可被理解为国家干预的连续谱系, 从最低限度的介入到更广泛的参与。根据我们的经验, 最基础层面国家应营造有利于私营资本投资的政策环境。这种做法与华盛顿共识倡导者的主张相契合, 例如国家需建立稳定可预期的政治政策环境以促进长期投资, 同时巩固法治持续主导的文化氛围。

然而, 国家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例如, 国家可投资于培养技术劳动力, 支持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一个具备资源与能力来高效运作教育体系的国家至关重要, 这绝非理所当然。从全球南方视角审视时, 这一点尤为关键——这些地区国家建立高效教育体系的能力不应被轻视。因此, 在探讨经济发展新共识时, 这应成为核心考量。

南非的经验表明, 对教育领域投入巨资虽是必要条件, 却非充分条件。关键在于确保投入资源产生回报。国家可能像南非那样在教育上投入大量资金, 但若缺乏保障投资获得切实回报的机制, 所拨付的资金可能形同虚设。

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还承担着另一项重要职能——尤其从全球南方视角看更值得关注。前位发言人强调了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尽管国家在此领域的角色普遍被认可, 但鉴于推动经济发展所需的巨额投资, 全球南方各国未必都能承担。例如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必须投资道路港口等基础建设, 否则其商品将无法高效出口。

南非网络产业当前面临的困境，正印证了此类问题如何严重阻碍经济表现。此外，国家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以南非经验为例，国家若无法提供电力或能源等基本公共服务，将严重削弱经济发展。

然而这些干预措施往往说易行难。并非所有南方国家都具备实施全部必要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成为根本性课题。南非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必须突破传统融资渠道的局限。这包括探索多种可能性：如建立政府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借助金砖国家银行等多边机构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

这实质上体现了国家发挥的次要作用：通过提供配套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来促进经济发展。还可考虑第三种国家干预形式以进一步支持经济发展，即国家直接扶持特定产业，其作用超越基础设施和关键服务的供给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体现了国家“选择赢家”的角色，而这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往往需要全球南方国家尚不具备的能力。例如，鉴于节能绿色产业的普遍重要性，国家转向该领域具有充分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全球南方国家是否具备有效扶持此类产业的能力？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及各国的具体国情，包括专业知识储备、资源配置及国家可调动的能力。

各国可选方案的范围自然取决于外部环境。这正是“全球南方”议题尤为切题之处——它要求我们审视当前地缘政治格局及其蕴含的机遇、威胁与复杂性。以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及新成员）扩张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崛起，为成员国间扩大贸易投资提供了重大机遇。这种崛起同时凸显了重塑全球权力关系的潜力。因此，全球南方面临的关键挑战不仅在于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更在于携手重塑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推动公平、公正、包容的经济增长。

反之，霸权国家必然会通过削弱和分裂全球南方来抗衡这一挑战。这种动态不容小觑——北方国家常质疑“全球南方”概念本身，而美国关税威胁则凸显了全球南方重塑世界秩序的潜力。

因此，全球南方经济议程必须包含打破当前全球秩序中不平等经济政治关系的举措。更应优先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间加强贸易及其他经济联系。最终，该经济议程的核心必须是将普通民众置于核心地位的包容性变革发展战略。

2.5.2 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去建设能力?: 后殖民遗产与知识体系重构

· 发言人: 胡德

· 年份: 2024

我想感谢其他所有人。这是一场非常棒的活动,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个小组讨论, 并在这里学习知识。我认为这些小组讨论都非常精彩。我对国家能力问题很感兴趣。因此, 我和大家一样, 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讨论小组, 让我思绪万千。我相信观众们也是一样。所以对我来说, 我几乎只想重复其他人的话。关于国家能力的问题, 我的方式或想法最近与香港有关, 因为 2019、2020 年以来的抗议活动和其他变化, 对于我而言, 从后殖民研究、全球研究以及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看, 很难理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带来的所谓政治不发达。

这不仅仅是经济不发达, 尽管这显然也是存在的。但政治不发达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 从内部削弱了国家能力, 也削弱了为实现目标而完成工作的能力。在疫情期间, 令我震惊的是, 全世界许多政府的能力如此欠缺。我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表现比其他国家要好。但最终, 由于这种英国殖民地统治模式的传承, 问题还是暴露出来了。它确实缺乏应对这种状况的能力, 并因此受到了负面影响。

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是, 人们越来越重视发展政府能力并为此学习。香港一直是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社会, 没有改变。我不确定是否每个人都希望它改变, 但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希望它改变。但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 从纯粹的市场主导体系转变为政府与市场共同执行。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昨天有人提到的一点是, 国家能力关乎基础设施建设。要么引领市场, 要么为其提供资金, 要么通过贸易或其他方式。这一点非常明确, 也很重要。但是, 如果这是我们对国家的唯一认知, 那么我们最终就会变成技术官僚。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定性劳动力发展。我们在这个小组上也一直在谈论, 我讨厌人力资本这个词。“劳动力发展”是一个更好的词。“发展”这个词真的意味着有尊严的生活, 发展人们自己的能力, 把事情做好。

中国与非洲或全球南方的合作不应该、也不仅仅为了利润。你可以出于其他原因这样做, 这些原因同样有益,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治理模式相一致, 据我所知, 中国不仅愿意承担风险, 而且愿意承担错误和损失。你可以在治理模式和规划中考虑这一点, 然后回去尝试解决问题等等。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贯穿所有小组讨论的一点是强调教育, 我非常赞同这一点。这也是劳动力或人员素质提升的一部分, 因为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我很喜欢俄语中这个词的翻译。我认为能力这个词的意思是力量, 但潜力这个词在英语中更能描述它的含义, 而且与教育更契合。

本小组讨论也始于谈论教育, 我们提到了需要技能革命。我们在小学和中学要把教育放在首位, 在大学层面, 这不仅仅是大学里的研究, 而是指有效运用技能、技术技能、硬技能、数学技能等。我还要提到情商教育, 有时创新就源于此, 而创新是一切的驱动力。所以, 这实际上也涉及到基本的教育水平。但我认为, 需要开展的

教育还必须包括有时所谓的道德教育。我不喜欢这个说法。它听起来太死板、太老套或太宗教化，但泛泛而言，道德教育或人文教育，或培养情商的教育，

当你考虑如何在全球南方国家或任何国家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这种联系和沟通发生的频率更高。当然，这需要语言技能，但也与一个人的敏感度有关，某种程度上与情商有关，并且能够完成一些事情。

我认为这其中还涉及更广泛的政治问题。所以，公平问题非常重要。这需要通过教育来解决。我们需要全球南方左派有一种围绕多样性和公平的政治。我想在座各位也同意。这也引出了昨天小组讨论的问题，塔里教授和她的伊朗同事谈到了非西方知识、非普世知识。没错。我们如何理解这些知识？不能把它当作本质主义，说它不是西方知识，它只是知识。或者你不能把它当作本质主义，说这是中国知识，与其他知识完全不同。

这不是重点，但知识可以与您所处的特定地点和环境相联系。另一个观点是，通常的知识模式总是会复制某种自由主义话语，或者说是某种普遍主义话语，这种话语是规范性的，具有某种支配性，最终是错误的。所以，1991年俄罗斯接受的教育是错误的。一切都变了。我认为，教育需要抵制这种趋势。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时间，我就把它留作一个问题。拉赫曼教授您说得非常精彩，我很喜欢。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去建设能力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认为您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您的论文也很重要。对于整个会议以及关注广义发展问题的人来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去建设能力呢？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钱当然有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制定法律或执行法律的能力。但我认为这还不止于此。

我当然没有答案，所以我想就此打住。非常感谢。

2.5.3 能力建设的根本悖论：当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断流失

- 发言人：泰穆尔·拉赫曼
- 年份：2024

尽管“能力建设”一词已成为学术界和活动家圈中的流行语，但该概念本身可追溯至文明诞生之初。文明始终立足于智力基础之上蓬勃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增长率、经济表现、制度实力或社会资本等指标，不过是社会拓展智力疆域、协同开展目标导向工作的能力之映射。由北方国家资助的全球发展产业，耗资数万亿在发展中国家每个角落组织能力建设研讨会，巴基斯坦境内也常年举办此类活动。然而除少数例外（包括东道国中国），构建能力建设能力似乎仍遥不可及。

我必须坦承，自己也曾怀揣着那份无边无际、甚至近乎鲁莽的热忱——正是这份热忱驱使全球南方无数人投身教育事业，期盼培育能力建设。二十五年前，我也选择成为大学教授，自诩为苏格拉底式的蝇营狗苟者，妄图激励巴基斯坦青年一代改变社会命运。遗憾的是，这份热忱与乐观终究落空。这些年来，我目睹全球南方及我深爱的巴基斯坦在这场名为“进步”的无情竞赛中越发落后，不禁深感沮丧。尽管存在一些显著例外——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但南北之间的相对差距非但未缩小，反而持续扩大。

回望这段历程，我愿基于在巴基斯坦的亲身经历，分享对全球南方发展最大阻碍的观察。此文旨在传递所见所闻，或许对其他国家亦有启示。马克思曾指出，劳动力追随资本流动，而资本唯利是图，对国家、贫民或被剥夺者漠不关心。它甚至漠视自身赖以生存的人类与生态系统的毁灭。正如列宁进一步阐明，资本虽遍布全球，却非均等输出——这种不均衡输出不仅加剧南北差距，更在南方国家内部制造鸿沟。资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无情追逐，往往瓦解并动摇其所触及的社会根基。

巴基斯坦的经历正是明证。每年有百万巴基斯坦人离境打工，历届政府都以递增的数字为荣。这些劳工汇回国内的资金，如今已与该国全部商品出口收入持平。2023财年，巴基斯坦汇款总额达303亿美元，而同期商品出口总额仅为306亿美元。过去70年间，我们从棉花出口国蜕变为劳动力输出型汇款经济体。除外汇收入外，更需从人力资本角度审视：每年巴基斯坦向海外输送百万名年轻、健康、技术熟练且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从医生工程师到建筑工人和机械师。接收国可从中精挑细选巴基斯坦最优秀的人才。当一个社会持续流失最具生产力的群体时，如何期待其发展？

这种动态令人联想到非洲过去400年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困境：因大西洋奴隶贸易导致的年轻生产力人才持续流失。在失去最优秀人才的境况下，非洲如何可能实现发展？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我们不再称之为奴隶贸易。这种动态揭示了国际分工的严酷现实——巴基斯坦等国已被降格为劳动力供应国。巴基斯坦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又一个工人阶级区。正如资产阶级建造封闭社区排斥不受欢迎的劳动者，资本主义走廊也用经济壁垒将失业、贫困与苦难出口到全球南方，却冠以“经济重组”和“宏观稳定”之名。发展中国家确实在积累能力，但这些能力终将被输往发达世界。我们正从顶端倾注雪芭——这个阿拉伯词汇在印

地语和乌尔都语中亦有使用——可盛装的容器却在渗漏。如此境况下，能力建设何从谈起？

我完全赞同能力建设的目标——技能发展、资源供给、制度强化与社区赋权——但必须质疑：让百万青年才俊在壮年时期流失，当真是巴基斯坦的最佳发展策略？我毫不保留地承认，若这些人才留在巴基斯坦，其就业回报必然不及迁往资本集聚地。但这显然是巴基斯坦当前阶级结构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形成的产物。从宏观经济与社会视角看，这引发更深层的疑问：为何巴基斯坦等国无法利用现有人力资源的技能推动经济发展？难道我们国家的宿命就是沦为发达世界的无产阶级农场？

中国究竟做了什么与巴基斯坦截然不同的事？毕竟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劳工曾参与修建美加秘三国的横贯大陆铁路。那么中国如何走出“百年国耻”阴霾，留住精英建设国家？唯有解答此问，方能为巴基斯坦提供启示——如何运用本土精英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根据录音整理并编辑）

2.5.4 重建"一吨卡车"的承载力: 全球南方能力建设的系统方案

- 发言人: 布萨尼·恩卡韦尼
- 年份: 2024

在我看来, 革命需要强大的防御体系支撑, 包括作为先锋力量的强有力领导层以及高效能的官僚机构。自华盛顿共识(倡导自由市场、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框架)取得胜利以来, 构建动态能力的努力遭遇重大逆转。这一时期涌现出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所称的"灯塔"——即大型咨询公司。人们刻意削弱政府职能, 尤其在南方国家推行"小政府"和"弱化国家"理念, 将政府职能外包给这些咨询公司。

马祖卡托的研究详尽揭示了这种做法如何削弱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与国家能力, 对发展成果造成重大影响。这些咨询公司往往缺乏实施重大发展项目的实际能力, 实质上使国家退化为仅负责发布合同与招标的机构。正如奥克贝等学者所强调的, 各国需要相互学习以强化并构建自身能力。董氏等学者同样强调了制度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这一讨论可置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与《2063议程》(非洲联盟推动大陆社会经济转型的战略框架)愿景对接的语境中展开。通过剖析"一带一路"与《2063议程》的协同效应, 可清晰阐释构建动态能力为何至关重要——两者均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深入解读可见, 其根本诉求实为同源。《2063议程》的目标——培养高素质公民、推动科技驱动的技能革命、建设世界级基础设施——恰与"一带一路"成功的核心要素相契合。变革性制度与领导力, 以及青年群体的参与, 同样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若缺乏能够推动国家与区域发展议程的动态国家能力建设, 这些目标将难以实现。

在全球南方, 国家及其机构因职能外包而空心化。这种能力侵蚀导致政客们主要从事剪彩、亲吻婴儿、赴北京或华盛顿等仪式性活动, 缺乏超越这些职能的深层能力。在西方, 这些政客常被既得利益集团宴请款待, 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做出有意义决策的智力能力。

一个案例揭示了缺乏动态能力的后果。据报道, 乌干达和肯尼亚早期"一带一路"项目合同条款极其薄弱。这主要归因于领导人因临近选举而仓促签约, 优先考虑项目启动的可见性而非深入研究合同细节。结果, 部分早期项目成为北方国家的批评目标。这凸显了在政治和官僚层面重建动态能力的重要性; 若未能做到, 将削弱社会转型能力。

因此, 必须着手对全球南部的官僚机构进行大规模再培训投资, 领导层应率先行动。中国便是典范——领导层素质与发展成果直接相关。建议在全球南部复制这一模式, 着力提升领导层有效治理经济的能力, 而非将此关键职能外包给外部机构。领导人必须精通经济数据, 认识到发展是高质量决策的产物。决策失误即便资源充沛也难见成效。领导人须认识到: 发展需要经济投资, 投资绝非祈祷所能实现——某些国家领导人耗费更多时间召集民众在体育场祈祷, 而非在董事会制定增长方案, 正是明证。这至关重要, 因为领导者制定的战略选择将决定国家发展方向。

重建全球南方国家机构体系同样至关重要。如前所述, 这些机构往往因过度依赖大型咨询公司而被削弱掏空。更甚者, 在许多南方国家, 机构体系已成为权力俘获与

腐败滋生的主要温床。因此，项目致力于重建高效运作的机构至关重要——无论是负责税收征管、建筑监管，还是高等教育与技能发展的领导管理。这代表着极其重要且必要的承诺。

关键在于，正如中国及众多亚洲国家所展现的经验，必须对官僚体系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因为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官僚机构已陷入功能失调。这导致官员们恣意决策、缺乏问责、易受腐败侵蚀，并造成决策延误或失误。有观点认为，尤其在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内部，若不投资于能够理解彼此体系（包括贸易体系和海关体系）的官僚机构，目标将难以实现。因此，亟需制定明确议程，在巴西、伊朗、南非、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地培养专业能力强的官僚，因为正是这些专业人士执行着领导层的指令。这要求建立择优晋升机制，摒弃低效人选。应将官僚视为飞行员——他们需持续返回模拟器校准能力，以理解全球体系与价值链，作出优质决策，最重要的是解读并执行领导层的决策。

青年群体是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生产力，却常被边缘化。能力不足阻碍他们充分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导致教育质量低下、成果不佳、服务获取受限，进而引发抗议活动和领导层更迭。对年轻女性而言，健康状况不佳尤为令人忧虑。因此，要使全球南方项目取得成功，必须大力投资于青年再培训。

最后，当前重大失误在于将包括学者和媒体在内的民间社会排除在这些进程之外。认为全球南方项目仅凭领导人决策共识或公务员执行指令就能成功的想法存在谬误。民间社会和非国家行为体绝不能被遗忘，他们是这场持续革命中至关重要的守护力量。这包括以全新方式与媒体互动，确保媒体机构不盲目效仿华盛顿或伦敦模式——即便当地记者也面临不满情绪。需要创新方法构建进步型公民社会的网络纽带，使其能讲述真实故事。否则全球南方将被歪曲成果的头条新闻淹没。因此必须培育强大而知情的公民社会，使其真正理解全球南方议程的初衷。

要理解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质，不妨借用一吨卡车驮运百吨重物的比喻。全球事业不能因全球南方缺乏经合组织（OECD）等机构的分析能力或大型咨询公司的资源而被放弃。相反，若由当前如同“一吨卡车载百吨重物”的全球南方主导该议程，就必须积极聚焦于提升自身承载能力的科学之道。这可能涉及更换“翻新轮胎”（无能领导者）——重载时尤为危险——并可能需要调整运作速度。相互学习同样至关重要，可避免重蹈覆辙或将资源浪费在他人已解决的问题上。发展型国家的基本定义在于其能力与雄心之间保持平衡。若缺乏技能再造，机构和领导者可能因能力假设而不堪重负——实际上他们就像一吨卡车载着百吨重物。

因此，全球南方需通过技能再培训实现自我校准：增强实力、强化运作引擎、开发新型“减震器”以防止整体项目崩溃。简言之，全球南方项目要取得成功，必须投资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国家机构内部）的技能再培训，同时积极动员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及青年群体。

第三编 反法西斯战争 80 周年

3.1 人民的力量与法西斯主义的当代形态

3.1.1 两个谎言与一个巨大的真相

- 发言人：维杰·普拉沙德
- 年份：2025

1942 年 8 月初，苏联在列宁格勒全城架设了扩音器。这座城市已被围困逾三百日，民众正遭受饥饿之苦。指挥家卡尔·埃利亚斯伯格通过坚持排练并亲自护送乐手前往配给站，使列宁格勒广播交响乐团得以延续。8 月 9 日，埃利亚斯伯格召集乐团仅存的 15 名成员，联合军乐队部分人员进入大剧院音乐厅。他们通过广播及公共扩音系统演绎了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交响曲》）。

这部交响曲由四个乐章构成：第一乐章宁静如田园诗，唤起战前列宁格勒的记忆；第二乐章以渐强的小军鼓持续音为基调，暗喻纳粹入侵；第三乐章由弦乐与管乐领奏，哀悼数百万苏维埃人民的惨烈牺牲；终章以 C 大调奏响，雄浑而自豪，预示着战胜法西斯邪恶势力的胜利。当时他们尚不知晓，围城之战尚未过半。前方还有 536 天的饥饿与战斗等待着他们。这场在围城中上演的交响乐，扬声器直指纳粹阵地让德军也能听见，足见苏联民众的钢铁意志。苏联档案中留存着情报军官的记录：“连敌人也静默聆听。他们明白这是我们战胜绝望的胜利。”后来一名德军俘虏称这首交响曲是“我们无法消灭的城市幽灵”。

我们的研究表明，苏军在横扫东欧的奇迹般推进中摧毁了德军 80% 的兵力。当西方军队逼近德国边境时，纳粹政权早已崩溃。正是苏军解放了绝大多数集中营囚徒，正是他们科学化的作战方式迫使东欧纳粹盟国——如罗马尼亚——投降并转投苏军阵营。苏联之所以能倾尽全力对抗纳粹，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者在苏联东部边境抵御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进攻。尽管武器装备不足，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者仍对日军造成了巨大损失，牵制了其 60% 的兵力，使其无法应对美军在太平洋岛屿间的推进。

倘若没有中国牵制日军，苏联必将覆灭（纳粹德国将占领欧洲），美军在塞班岛战役（1944 年）和硫磺岛战役（1945 年）中也可能难获胜绩。苏联红军、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者共同牺牲了数千万生命才击败法西斯主义（具体数字详见我们的研究，介于 5000 万至 1 亿之间）。到 1945 年 5 月纳粹政权垮台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然走向投降之路。美国本无必要在 1945 年 7 月进行“三位一体”核试验，更不必于 8 月 6 日轰炸广岛、8 月 9 日轰炸长崎。苏联公民、中国共产党员及爱国者作出的巨大牺牲本可避免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用；而美国最终使用核武器的行为，恰恰暴露了帝国主义对生命的野蛮践踏——这正是我们今日目睹的景象。

第一个谎言：西方盟国自始便反对法西斯主义并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战争。

真相：自 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之初，西方各政府便派遣军队予以镇压。1917 年 12 月苏维埃政府提出和平谈判，德军却仍对芬兰及新生苏维埃共和国发动进攻，

进而引发盟军大规模入侵（参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希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意大利）。盟军的立场在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的著作与演讲中昭然若揭。1919年他宣称应摧毁“布尔什维主义的污秽猴戏”（三十年后他更声称“扼杀初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本可为人类带来无穷福祉”）。1930至1940年代，西方政府企图让德国与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 将矛头指向苏联予以摧毁。所谓“绥靖政策”的实质正是认同希特勒的反共立场，只要其军事扩张针对苏联便予以纵容。尽管英法两国于1939年9月对德宣战，但随后数月却毫无作为——这段时期被称为“假战”（Phoney War）、“滑稽战争”（*Drôle de guerre*）或“坐战”（Sitzkrieg，意为“坐着打的战争”，与闪电战 Blitzkrieg 形成反讽）。

1941年，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美英两国不得不承认正是红军摧毁了法西斯主义。丘吉尔代表乔治六世国王，向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赠送了一把名为“斯大林格勒之剑”的谢菲尔德钢剑，以纪念苏联人民在围城战中（逾两百万民众牺牲）展现的英勇精神及其最终击败纳粹的壮举。然而盟军直至1944年才正式介入欧洲战场。此时德军已被红军（及盟军空袭）重创。西方国家参战源于对红军直捣德国、占据欧洲心脏地带的忧虑。

对西方政府而言，主要矛盾并非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而是帝国主义（或战争）阵营——包含法西斯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或和平）阵营之间的对立。这一矛盾贯穿1917年至1991年整个历史进程，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

第二个谎言。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牺牲以及广岛、长崎的核爆才击败了日本军国主义。

真相：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非始于1939年德国入侵奥地利，而是早两年在中国卢沟桥事变时（1937年7月北京附近爆发冲突，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便已打响，并持续至美国对朝鲜的战争——这场战争直至1953年停战协定签署才告终结。数百万勇敢的爱国者与反法西斯战士奋起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这场战争更将朝鲜和印度支那最极端的右翼势力卷入其中。到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时，中国爱国者与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民族解放军——已牵制了60%的日军兵力，使其无法攻击苏联东部战线。1940年百团大战中，朱德将军率领40万共产党军队摧毁了日本在华北的基础设施（包括900公里铁路线），其巨大牺牲不应被遗忘。

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攀登硫磺岛高地的神话，以及原子弹令日军屈服投降的叙事，至今仍广泛流传。然而这些叙事抹去了关键事实：日本早已遭受重创，投降意愿明确，而广岛与长崎并非军事目标。1945年8月发生的事与军事战略无关：这纯粹是美国实力的展示，向世界宣告其研发的新型武器，同时警告亚洲共产主义者——此武器可随时用于对付他们。为击败法西斯主义而牺牲的数百万亚洲工人与农民——包括我在缅甸的亲人——都被蘑菇云抹去了。它开始在大众记忆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英雄的不是为东南亚每一寸土地而战的人们，而是那颗炸弹。这是第二个谎言。

巨大的真相。在这两个谎言之间，存在着一个被埋没在大众记忆中的巨大真相：法西斯主义是对主权与尊严的否定，是殖民主义的丑陋孪生兄弟。二者往往难以区分。毕竟，种族灭绝是殖民统治的构成要素（想想刚果六百万人民的遇难，德国在西南

非对赫雷罗族和纳马族实施的种族灭绝，美洲原住民遭受的屠戮，以及 1943 年三百万孟加拉人被饿死的惨剧）。

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战败后，荷兰、法国和英国及其美国盟友重返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马来亚，重新夺回殖民地。1940 至 1950 年代这些殖民战争的暴行令人发指。针对荷兰试图重新殖民印尼的行径，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痛斥：“他们称之为警察行动，但我们的村庄化为焦土，人民惨遭屠戮，整个民族为自由而流血牺牲。”马来亚共产党人陈平亦有类似控诉：“我们起义是因为目睹村庄饥荒，听闻金钱与权力扼杀呼声。”曾主导英国在马来亚实施紧急状态的杰拉尔德·坦普尔将军，在镇压起义后称某村为“五千懦夫之村”，并通过断绝稻米供应令村民挨饿。

村庄焚毁，村民饿死。这既是殖民地再征服行动的写照，亦是美军朝鲜战争的真实图景。当美国在朝鲜展开军事行动时，总统哈里·杜鲁门宣称军队应“动用一切武器”——考虑到对日核爆的前车之鉴，此言令人不寒而栗。但原子弹终究未被启用，因为空袭已将朝鲜北部城市夷为平地。正如埃米特·奥唐奈少将 1951 年向美国参议院所言：“一切皆毁。不复存有值得称之为建筑的物体。朝鲜境内已无目标可言。”这正是他们的态度：法西斯主义或殖民主义——任君选择。

西方殖民者在日本、朝鲜、印度支那等国复活法西斯势力，与其结盟构建反工人、反农民、反共产主义的国际轴心。这揭示出西方殖民者根本不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工人和农民可能建立清晰认识与坚定信念，选择社会主义未来。

不可撼动的真相是：真正击溃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是苏联红军、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者。正是这些力量为反法西斯事业付出最大牺牲，并深刻认识到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内在联系。反法西斯者不可能支持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这根本不可能，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体系。

我的思绪仍停留在 1942 年 8 月的列宁格勒。记得那支乐队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纳粹军队包围了整座城市。万籁俱寂。然后音乐响起。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音乐戛然而止。

3.1.2 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战争

· 发言人：汪晖

· 年份：2025

我想从战争，特别是20世纪中国的战争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人民战争”这一概念。上午李慎明院长也提到了“人民至上”、“人民”概念以及战争范畴，这些在20世纪具有特殊意义，也涉及到历史认识上的分歧。

第一个问题，是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20世纪历史中的位置。从时间序列看，两次世界大战规模巨大，技术先进，伤亡空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使其与19世纪的许多战争难以真正区分开来。上午也有讨论提到，殖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一对双胞胎的关系。

从中国革命的视角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英法联军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再到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占领东北，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全面侵华战争，1945年以后美国对国共内战的介入，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0年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封锁，乃至1955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进程，即帝国主义对中国、朝鲜、越南等被压迫民族和国家进行侵略、干涉与占领的连续进程。

帝国主义的军事进程不仅以经济掠夺为动力，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仅催生了与殖民主义经济相适应的买办制度和官僚资本，也产生了更为重要的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即毛泽东和许多近代史著作中提到的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企业中做工的中国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通过不等价交换的方式剥削中国农民，导致农民破产，造成了数以亿计的广大贫农群体，贫农占农村人口的70%。帝国主义还造就了数百万不同于传统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这些都成为二次大战、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中坚力量。

当我们讨论“人民”这一范畴时，需要认识到“人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口”，而是在历史当中变迁的一个新生的力量。正因如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包含了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点上是有区别的，因为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才出现了革命的、民族解放的、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抵抗战争的内容，这是一战所没有的。因此，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如果要讨论二次大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战争与革命的关系。要通过战争本身来理解20世纪中国的变迁，就必须追问这一时期中国战争的形态具有哪些特点。

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此前的所有战争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都存在重要区别。这一区别的核心在于，前者是将革命组织在战争动员之中的战争。如果脱离20世纪战争与其双生的革命之间的双重关系，就很难理解和讨论这一时期的战争。我们今天所说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其真正基础来源于通过战争进行革命的战争。这不仅仅是抵抗外来侵略，还要同时进行社

会革命。这不是一般的建立普通的旧式国家的战争，而是在革命战争中创建革命国家，是通过战争创造新的人民主体的战争。整个战争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人民主体，这也就是把民族解放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的战争。

因此，虽然我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80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并将其放到同一个范畴下，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一历史中产生着不同历史动力。这也是通过国内革命战争实现民族解放目标，并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呼应的战争。也正因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战争，例如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防战争——当然它们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而是建立在 20 世纪革命同盟和反法西斯同盟的历史地基之上，或者说，是在其历史脉络下的国际联盟战争。因此，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追问。沿着这一脉络形成的新中国，其国家、民族、主权、政党、人民、阶级等范畴，和国家形态上，可能与以往不完全相同。从早期 1930 年代形成的苏维埃，到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如何通过组织与动员使农民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或政治性阶级？如何在国际联盟和国际联盟战争中理解主权、主权争议以及第三世界的团结，甚至于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这样在新的世界霸权构造下形成的广泛运动？这些都与之前的战争条件不同，但彼此之间存在相互关联。

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到 20 世纪的帝国主义战争，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另一方面，20 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更早从北伐运动之后形成的战争形态，与之前的战争形态有根本不同。其核心在于，这是一场将革命与战争组织在一起的战争。我认为这是第一点。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在中国语境中非常独特的“人民战争”概念。

人民战争的基本条件，我认为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今天我们讨论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十四年历史时，已逐渐形成共识，并也有研究指出：为什么在二次大战中，中国和俄国牺牲如此之大，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这其中存在两重性：一方面是胜利，另一方面是牺牲。牺牲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革命与这场战争都发生在相对落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地区，20 世纪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被提出。首先是列宁提出的“薄弱环节”概念。他认为，在多强竞争的世界格局中，国际体系会出现薄弱环节。列宁指出，国际资本主义具有投机性，它的巨大成就还没有完全成熟到国际合作的程度，仍然受到资本家集团利用民族情感和政策追求特殊利益的妨碍。因此，在西方列强进攻中国、进攻苏联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独特的薄弱环节。

在苏联，这成为在一国内发生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分析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则分析了中国社会内部，在国际资本主义架构下，因内部权力不平衡而在夹缝中出现的可能性。这两种薄弱环节，一种是国际性的，一种是国内统治的。但要在这些薄弱环节中产生真正的有生力量，需要进行各种战略分析。我们今天讨论二次大战的胜利，即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需要思考为何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能够取得胜利，这离不开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分析。

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经出现了第一轮根据地建设、红军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这是在北伐运动失败后开始的。今天吕形邻教授特别提到了延安、晋察冀等地区的斗争，这些斗争正是早期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延伸。如果没有早期的红军和红军的北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需要有新的红色政权，需要有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军队，并且军队要与当地不同地区的社会动员

相结合，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这样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社会形势乃至文化形势联系在一起。

因此，一方面，分析帝国主义的不均衡性及其国内统治结构的分裂与矛盾作为革命政治与战略的前提；另一方面，战争向前发展所需的新的动员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形成、有组织的军队、游击队的形成，以及经历过一定程度土地革命的普通农民的支持，所有这些构成了革命的前提。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

今天上午吴恩远老师提到了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北的问题，所有这些地区都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已有红色区域的基础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并有组织的军队和党组织出现，才构成了其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真正确立后来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条件。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我看来，20世纪毛泽东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范畴，包括他所说的几大法宝：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这些都可以置于“人民战争”这一范畴内加以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这场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性范畴，包含了多样性。因此，在20世纪中国的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实际上是创造新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及其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

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确实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20年代初期，其主要成员还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经过大革命、国共合作的第一次统一战线，以及与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党已发生重大转变。在大革命失败后，当中共退入江西苏区等落后根据地时，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主体诞生，推动了政治形势的产生与转型，例如边区政府、苏维埃、政党、农会和工会等。

因此，在1925至1926年，由于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开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即是农民运动的产物。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主要政治创新集中于两点：一是摆脱旧军阀，建立党军；二是与共产党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以群众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因此，“党军”概念——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最初阶段并非共产党的发明，而是处于革命阶段、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的创新。

但在1927年以后，国民党逐渐放弃了这些社会运动，随着党国一体化，军队的政治性大幅衰落。恰恰是在这一背景下，对共产党而言，若离开北伐战争失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战争，政党的转型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是其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政党与红色政权的结合，这成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至今仍保持着活力。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也发生改变，这一点尤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提出的第二次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中不愿与日本合作、不愿成为汉奸的阶层，这些都可以纳入统一战线。这些经验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非常不同的政党类型。我过去称之为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一个超级政党，因为其领导权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超政党的要素，因为政党与群众

运动、大众运动之间联系密切。因此，我把这样的一个政党称为“超级政党”，它包含超政党的要素，即与大众运动密切联系的超级政党，它与军队、国家紧密相连。

其次，人民战争也创造了独特的战争形式。早期从大革命失败后，如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等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基本方式。井冈山斗争的中心问题，由此转变为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与农民运动、土地改革的结合，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党在民众中开展的文化运动，不仅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也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这些在战争中展开的政治进程，赋予了人民战争不同于其他战争形式的特点。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即军队与普通民众的结合是胜利之本，这一命题包含了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第二，不仅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必须有地方武装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一个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因此，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红色政权的建立。红色政权的主要形式是边区政府、边区苏维埃，它们既要处理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也要借鉴中外历史上的国家经验。但这种政权形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持续的政治和战争动员中，它能够获得政治自觉和阶级自觉，从而将这些过程组织起来，产生新的政治形态。

在人民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政府处理的不仅是简单的军事问题，更是日常生活和普通劳动者的组织问题，这就产生了政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问题。其主要内涵是：第一，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二，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尽力解决群众问题，切实改善群众生活，赢得群众对边区政府的信任，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因此，人民战争不仅是采用军事斗争手段有效消灭敌人的方式，也是处理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校、集市贸易、甚至货币金融等构成人民生活内容的主要问题。

军事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因此，毛泽东反复提醒共产党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让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就必须和群众在一起，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关心群众的疾苦，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包括盐、米、房子、衣服、生小孩等问题。他说，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战略，是政党的政策，也是重构政党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就会凌驾于群众之上。

在这一独特背景下，通过人民战争，也自我重构了新的政治领导权和政党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20世纪的这场战争中，中国革命、特别是共产党，虽然在国防力量上处于少数，却取得了政治上的领导权，不仅是政治领导权，还产生了文化领导权。正如毛泽东在40年代《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的，中国革命的两个奇迹：一是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是文化革命的深入，即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左翼，在处于少数的情况下却掌握了政治领导权，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我看来就是人民战争的文学，它与人民战争相互配合。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此前的战争相比，还有一点最为突出，即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大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逐渐为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不仅超越了早期欧洲革命仅集中于无产阶级

的模式，将广大工农阶级置于革命主体位置，还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愿意抵抗侵略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纳入统一战线内部，形成新的人民主体。领导权问题与统一战线问题是并存的两个方面。

这种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实践，在 20 世纪不仅存在于抗日战争中，也存在于解放战争中。我们看到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批判，以及逐渐与中共协作，至 50 年代后，伴随万隆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层面，在国际反帝反殖运动中，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进步力量的联盟，构成了新的关系。

刚才吕彤邻教授提到，日本战俘中参与反战同盟的部分，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存在。战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争取和平运动、促进中日友好的新型政治力量。从我们今天讨论全球南方的历史位置出发，我们可以从 20 世纪的战争、革命及其形成的战略战术中，寻找到有益的经验和新的灵感，并根据今天的条件，来发展新的争取全球和平重大事业的契机和灵感。

3.1.3 作为当代法西斯主义的霸权治国术

- 发言人：布萨尼·恩卡韦尼
- 年份：2025

追求正义的同仁、同志与思想者们，早上好。

主流媒体总想让我们相信法西斯主义已随二十世纪终结。它执着于这样一种幻觉：法西斯主义的想象力已随那些身披军装、佩戴勋章的独裁者消亡。它沉溺于这样的神话：整齐划一的队列与集中营的时代已成历史。

然而本次会议的主题召唤我们透视当代全球治理的表象，审视权力转型中的本质。它促使我们追问：当全球秩序与全球服从被混为一谈时，人类将何去何从？它引导我们探究统治的道德根基——尽管话语体系已焕然一新，这些根基却始终未变。

法西斯主义并未消亡，而是自我精炼。它褪去军装外衣，换上新词汇与新机构。其帝国野心依然存续，隐匿于文明表象之下，裹挟着进步与发展的修辞。

我们今日面对的并非法西斯主义的余烬，而是其蜕变形态。这是披着外交外衣、政策外衣与市场正统外衣的无声法西斯主义。它自诩为善治与国际秩序，藏身于评级机构、咨询公司与智库之后，口呼稳定实则为牟利而制造动荡。利比亚的遭遇众所周知。它通过向世界灌输“西方普世主义别无选择”的观念来凝聚共识。

它不再高声呐喊，转而实施管理；不再焚书，却操纵算法实施认知暴力；不再举行阅兵，却发动人道主义必要战争。它通过法律、官僚体系和债务实施暴力。这种形态看似理性甚至不可避免，因而比早期形态更为危险。

这种逻辑正渗透进文化领域，如今更借助大型语言模型助推。正如殖民官员曾将非洲文化与语言编码化以实现社区无产阶级化与规训，硅谷平台同样将我们的言语扁平化为大数据点。它们标榜中立，却怀揣着同样操控意义的冲动。我曾指出，这些数字工具将我们的习语改写成单调的语调，将火焰化为灰烬。它们以更精巧的形式，重演了剥夺语言主权的殖民行径。

这便是我们时代的法西斯主义：霸权式治国之道。

古典法西斯主义显而易见。我们曾在德国、意大利、智利、日本和南非目睹其踪迹。它将国家奉为天命，要求纯粹与顺从，歌颂暴力与服从，惩罚异议并践踏弱者。借用雷·查尔斯的话说，它踢倒了那个不得不爬行的人。愿天佑我们所有人。

霸权治国术却显得彬彬有礼。它举办峰会，谈论民主与发展。然而彬彬有礼的表象之下，潜藏着相同形而上的冲动：渴望以欧美形象主宰、规制并重塑世界。

自二战终结以来，全球秩序始终围绕少数人的偏执道德观构建。西方列强以自由主义之名约束他者，借多边主义之架维持不平等——其治国之道实为霸权而非团结。

它们通过制裁、债务、援助、媒体和军事干预来施加影响力，借助专利和宣传掌控知识话语权，一面高举开放市场旗帜，一面却踢开南方国家的发展阶梯。

这种传统深深植根于帝国分类体系。正如拉丁美洲去殖民化学者拉蒙·格罗斯福盖尔所言：

"我们从十六世纪'无文字之人'的定义，到十八、十九世纪'无历史之人'的标签，再到二十世纪'无发展之人'的发明，如今更演变为二十一世纪初'无民主之人'的叙事。"

我们永远处于"缺乏"状态，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取意义。

这是肢解的漫长语法。它剥夺整个社会的声音与合法性，使统治得以伪装成救赎。

霸权治国之道依靠制造共识来统治。它使被压迫者将压迫内化于心，教导他们相信贫困源于自身选择糟糕的领袖，不平等乃天经地义，反抗则属非理性。如此便扼杀了对替代方案的想象。

其精妙之处在于隐形性。

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政治暴力，更是形而上学的暴力。它崇拜虚假的普世性，却否定共同的人性。它在地图上划界，也在思想中筑墙。它按存在等级划分人群，自称文明，将他人斥为威胁。

殖民主义、种族隔离、犹太复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同出一脉。它们皆是通过抹除来构建世界的手段，制造虚无以正当化占领，将毁灭的土地改名换姓，证明此地本无生灵。

由霸权政治主导的全球秩序延续着这一脉络。它将统治改称为人道干预、创新或现代化。它将主权视为特权而非权利。它以货币而非尊严衡量价值。它将人类划分为有能力者与无能力者、文明者与脆弱者。

其侵略被冠以维和之名，其掠夺被称作伙伴关系，其破坏被包装成改革。

它无法与多元共存，只容忍顺从的差异。它肢解国家，将其重建为保护国或市场。干预并非为终结苦难，而是确保顺从；重建并非为恢复和平，而是制造依赖。

当今世界正处于战争状态，只是战争往往隐形。制裁比炸弹更有效地制造饥荒，债务比烈火更彻底地摧毁，数据监控比军队更深入地渗透，贸易壁垒令小经济体窒息。法西斯主义的道德暴力已成常态化行政手段，它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因。

女士们、先生们，谈论法西斯主义时，我们必须提及正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犯下的暴行。

谈论巴勒斯坦，即是剖析全球权力的话语体系。巴勒斯坦不仅是占领的战场，更是肢解的原型。

肢解一个民族，就是将其从确认其存在的象征秩序中割裂。就是剥夺其命名自身、铭记自身、想象自身的权利。以色列的企图正是建立在这种形而上暴力的基础上。它不仅企图占领地理疆域，更要抹杀存在本体。

它宣称不存在巴勒斯坦人，只有"居民"。它将记忆视为麻烦。抹去名称即抹杀未来的可能。

肢解在领土层面通过碎片化土地实现，在历史层面通过虚构不存在来运作，在认知层面则通过操控话语将占领改写为冲突。

巴勒斯坦揭示了另一关键分析维度：它展现了权势者如何垄断道德话语本身。他们以施暴者而非受害者定义暴力，以命名者而非承受者定义恐怖。由此，帝国主义不仅掌控边界，更垄断了正义的定义。巴勒斯坦是全球南方认清自身被剥夺结构的镜子，是世界领悟体系为维系种族化秩序不择手段的试金石。正因如此，纳尔逊·曼德拉总统曾言：巴勒斯坦未获解放，南非的自由便不完整。

法西斯主义并未消亡，它变得更有效率。它制造共识，令人信服地宣称不平等乃天经地义，贫困是选错领袖应得的报应。它将市场奉为秩序之神。身体并非被囚禁，而是背负债务。思想并非被审查，而是被分散注意力。信息流通无阻，意义却遭垄断。

当今法西斯主义已超越中东，成为数字形态。其集中营隐形无踪，暴力以代码与契约为载体。在语言领域，它剥夺非洲语言的弹性，为外国耳朵改写文本，以矫正之名实施监控——这正是知识灭绝的新战场，是殖民主义转化为算法的产物。

霸权治国术以评级、债务、制裁和结构改革驯服国家，在全球化旗帜下强加依赖。统治伪装成合作，不平等包装成效率。这正是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极致形态：无侵占的控制，无声的抹杀。

霸权治国术肢解国家，发展治国术则通过团结实现重组。

1955年万隆会议上，亚非领导人宣告各国拥有自主发展之路的权利。万隆不仅是会议，更是道德宣言。它昭示自由非施舍，文明非西方专属。

团结并非感性诉求，而是结构性实践。它昭示着：当一国仍受殖民桎梏，他国便无从获得自由；当人类肢体尚有残缺，整体性便无从实现。

今日，万隆精神的回响在南方国家的倡议中清晰可见：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共同繁荣；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全球文明倡议颂扬文化多元；全球治理倡议呼吁建立体现公平而非强权的国际机制。

这些倡议以万隆会议成果为根基，拒绝单极霸权，勾勒出万隆首次描绘的道德地理图景。这正是发展型治国的实践。

发展型治国方略并非政策范本，而是存在哲学。它主张全球南方的国家必须成为道德与沟通的媒介，不仅要在制度层面重建意义，更要在个体层面重塑价值。

后殖民世界继承了丧失主权的国家与无实权的政府。发展型治国术正视这种断裂，重建话语权并恢复行动主体性。

南方危机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认知与话语层面的。征服我们的不仅是军队，更是话语体系。因此我主张：必须在编码、语料库、期刊及课堂中捍卫我们的语言。主权需要被言说，需要被编码，需要被叙述。

在此我们必须追溯塑造抗争的知识谱系。弗朗茨·法农教导我们：去殖民化是彻底颠覆殖民意义的行动纲领。萨米尔·阿明强调：边缘国家无法在维持其从属地位的

结构中实现发展。南非学者阿奇·马费杰警示我们：人类学本身已沦为压迫人民的武器。发展型国家治理继承了这一传统，它主张国家必须成为公共价值的主动塑造者，而非进口理论的被动执行者。国家应引导市场、动员社会、重建殖民主义企图扼杀的知识体系。

发展型治国之道必须转型为教育型国家——先倾听再教导。沟通是合法性的本质。唯有可理解的权力才是公正的，唯有善于倾听的权威才具道德性。

重构记忆将生存转化为能动性，使记忆化为行动，重塑人性作为政治核心的地位。

霸权治国术是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延续。发展治国术则是对法西斯主义所肢解之物的重新整合。

让我们高举团结的旗帜勇往直前。若不如此，我们将共同覆灭。不仅是那些在中东地区每日承受炸弹袭击的人们，就我们这些自以为生活在和平领土上的人，也将持续承受苦难。我们目睹霸权主义通过贸易战等手段施加暴政。我们深知，诸如莱索托共和国这般小国，正承受着新型法西斯主义的重压——它未必身着军装游行示威，却运用全球性权力手段压迫他人。

谢谢大家！

3.2 国际秩序的失衡与重建——全球南方的声音

3.2.1 联合国八十周年纪念的历史思考

- 发言人：梁占军
- 年份：2025

1945年联合国的建立，应当说是人类历史上探索有效的全球治理方面最重大的事件。虽然它不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创建了国际联盟，但事实证明国际联盟是一个失败的国际组织。例如，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的应对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因此，二战后期国际社会决定构建一个全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便在此背景下诞生。联合国的建立是以总结两次世界大战血的教训和国际联盟失败的经验为基础的。80年来的历史证明，联合国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和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繁荣等方面卓有成效。

今年是联合国创建80周年，联合国官网上展现了相关的纪念活动，其核心主题是“共建未来”。联合国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彰显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实践取向。从历史角度回顾，至少可以总结出三个客观公认的事实。



第一点要强调的事实是：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其缔造者是战胜国，更是国际正义。联合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由战胜国所构建的国际组织，因为《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的基础——，实际上构成了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核心支柱，是战后国际秩序建设的基石。《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四大宗旨和七大原则均代表着国际正义。例如四大原则包括维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此外，宪章强调的主权平等、尊重履行义务、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使用武力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都具有普适意义。这些宗旨和原则并非仅仅体现战胜国的意志，而是代表着战后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联合国创立之初的51个创始国虽然都是都以反法西斯联盟和战胜国阵营为基础，但它并非仅局限于战胜国利益而构建的国际组织。当前，个别右翼势力或某些群体试图从这一角度攻击联合国的权威性，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引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观点，80

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与防范第三次世界大战密不可分。今天，我们再次面临可能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高度不确定性时代，因此纪念联合国 80 周年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点需强调的是，联合国 80 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联合国既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卫士。尽管联合国成立初期是以战胜国为主的国际组织，但并未长期排斥战败国和法西斯国家。实际上，自 1955 年起，原战争期间的战败国如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些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陆续被联合国所接纳。意大利于 1955 年 12 月 14 日加入，日本于 1956 年加入，德国因当时分裂成东德和西德，稍晚于 1973 年被接纳。此外，二战期间的其它法西斯仆从国，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也基本在这一阶段陆续被联合国接纳。这表明，冷战时期的联合国便已是一个包容战胜国、战败国及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国际组织了。因此，今日右翼势力对联合国的攻击已无事实基础。

三个阶段：

1.战后、2.冷战、3.冷战后

战败国加入联合国

意大利 1955年12月14日

日本 1956年12月18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73年9月18

日

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合并

联合国 80 年来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冷战前夕，冷战期间和冷战后，这三个阶段各有其时代特征。第一个阶段为战胜国主导的阶段；第二阶段因冷战两大阵营对峙，联合国得以扩充，不仅接纳了战败国，还引入了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此过程中，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积极推动，但主观上多有拉拢盟友扩大己方阵营的考量。冷战后，苏联解体导致世界一度面的美国单极主导世界的局面，以致在许多国际争端和问题上，出现绕开联合国、由美国来主导的趋势，这种边缘化联合国的特征至今依然存在。

这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即当前动荡的国际局面与欧美大国的博弈致使联合国的权威事实上受到了严重挑战，需要我们集思广益来维护联合国权威。迄今为止，联合国面临的挑战不仅包括气候危机肆虐、不平等加剧和贫困日益严重，更现实的是许多地区的战争与冲突升级，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和印巴冲突等地区局部冲突外溢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战争解决国家争端的欲望似乎日益上升，加之极右势力复苏，使联合国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处于被动境地。主要原因在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大国，因其联盟政策或大国博弈，导致大国一致原则无法贯彻，从而使联合国面临着新的挑战。

关于如何加强联合国权威，联合国大会第 79 届会议主席菲利蒙·杨阁下曾说过这句话：“展望未来，我们尤需铭记历史、庆祝成就，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石之上共

建未来。”这启示我们维护联合国的权威首先应该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并重新加强对《联合国宪章》宗旨的宣传。为此，我个人想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结合二战胜利和联合国建立 80 周年纪念的活动，加大对二战正确史观和联合国宪章宗旨的阐释与宣传。中国学界在联合国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但总体上仍有扩充空间。

第二，加强联合国研究，开展联合国历史的教育普及。可以通过教科书和日常的历史教育实现，重点阐释联合国权威性、正义性及其历史贡献。

第三，支持联合国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支持联合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维护世界和平。

3.2.2 20世纪以来国际秩序调整及其经验、教训与21世纪国际秩序前景

· 发言人：林利民

· 年份：2025

对于20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的变化及其历史与现实，我主要以三个话题为起点，与各位朋友交流、讨论。

第一个话题，我认为20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经历了三次大调整。大而化之地讲，这三次大调整，第一次是20世纪初，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形成阶段，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们称之为世界历史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阶段，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们则称之为第一次全球化阶段，或者说是全球化初步完成阶段。既然全球化实现了，世界历史进入整体发展阶段，就要求一个适应全球化及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国际秩序。

当时在国际舞台上“当家做主”的是美日及欧洲英法俄德意奥（匈）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与和平这样的观念去构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而是搞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及不平等条约体系。正是这个不平等条约体系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接着就是一战以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乱局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准备了火种。这是第一次调整，即由美日欧8个帝国主义大国主导构建了一个乱糟糟、并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的国际秩序。

20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的第二次在调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联系。二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正义性，二战的正义性就在于反侵略反法西斯。德日意法西斯对被侵略者实行亡国灭种、种族灭绝政策，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反抗。这种以反侵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战争是正义战争，这也是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方面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战第二个特点是其人民性。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战，全世界有10多亿人民广泛参战，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80%以上。在亚洲，中国、东南亚人民、朝鲜半岛人民、印度人民都广泛参战；在非洲，埃及、尼日利亚、加纳、埃塞俄比亚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广泛参战；在美洲，巴西等国不光参战，还为二战盟国方面胜利提供了大量的战争物资。此外，欧洲国家，如巴尔干国家、南欧、西欧被占领国人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抵抗运动。世界10多亿人民广泛参战，突出了二战的人民性，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在二战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又一个原因。

二战第三个特点，是由其人民性和正义性带来了战争进步性。二战的进步性如果展开讲，可以讲很多，最概括性的表述可归纳为两条，第一是它带来了全球性非殖民化运动。美欧日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二战前构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难以为继，二战以后出现了世界非殖民化浪潮，全世界先后有100多个国家相继独立，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新兴国家众多、地域遍布亚非拉美的不结盟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群体，这也是当今新的“全球南方”国家群体的基础。第二是联合国体系的建立。尽管有这些进步，但是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仍然有利于美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因他们作祟，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虽然有一些进步性调整，但也部分延续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某些弊端，比如大国霸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在阻止世界发生新大战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在促进共同发展方面确实没有多少建树。一个突出弊端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后处置敷衍了事，没有触及其痛

处，结果让日本军阀逃过了对战争罪责和历史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认识，到今天成为亚洲和平及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政治、历史隐患。所以，我们在评价二战后国际秩序调整时，在肯定其进步性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导致二战结束后出现了美苏冷战及连续不断的局部战争和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平等。

20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的第三次大调整是冷战结束以来的调整。苏联解体后，西方及美国宣扬“历史终结论”，宣称他们取得了冷战胜利。在此背景下，他们自然是争着、抢着、甚至垄断着主导20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的第三次大调整，按照他们的理念、逻辑来构建国际秩序，包括在全球南方强推三权分立民主制、一人一票制、绝对市场化制度等等。当时美欧日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3/4以上，贸易总量3/4以上，军费开支和军事力量3/4以上，他们还拥有金融、技术、传媒、话语霸权，所以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其结果是，由他们主导的冷战后国际秩序调整，其实是确立美欧日那10亿左右人口的世界霸权，包括军事霸权、经济霸权、金融霸权、话语叙事霸权、民主霸权等，直接导致21世纪世界战火纷飞、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毒品、流行病等泛滥成灾，以及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紧张等等。

因此，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更加紧张，更加矛盾重重、问题重重。特朗普上台以后搞美国优先，不再高调宣扬美国要继续维持世界领导地位，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并将这一思路、理念写进了政策文件。凡此，等于是直接宣布冷战后美欧日等联手搞的这一套国际秩序调整以失败告终。

以上20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的三次大调整，第一次大调整是二战前，第二次大调整是二战后，第三次大调整是冷战后。这三次国际秩序大调整为什么会接踵失败？其根源在哪？我们从中可汲取哪些有益的经验、教训，可从中汲取哪些启示？

启示很多，但概括地说，有三点值得特别强调。第一个启示，需要从一战后美日欧列强残酷地重新瓜分世界打乱了20世纪全球化进程中思考。一战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战胜国只顾一己之私，埋下了二战必然爆发的祸根。他们对于一战后20世纪国际秩序第一次调整的彻底失败负有全部责任。他们把发动一战的责任全部推给德国、过分严惩德国，为法西斯在德国兴起与发展积聚了经济政治社会条件，驱动德国成为直接发动二战的元凶。不仅错失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构建公平、公正国际秩序的第一次机遇，也直接导致二战不可避免、且更惨烈。

第二个启示，则要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乱局中反思。二战后人类再次错失国际秩序调整的机会，责任也在美欧日等西方大国。在20世纪国际秩序第二次大调整过程中，亚非拉新兴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即当今所称的“全球南方”，确实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进步做了贡献，但它们当时普遍贫穷落后，极大地限制了发挥历史作用的空间。美英这些西方大国当时实力强大，以权谋私，使世界再次错失了构建公平、公正国际秩序的机遇。比如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不援助苏联东欧，造成世界分裂，导致了冷战的不可避免。所谓“一个核桃两半边”是对二战后世界分裂和国际秩序调整遭遇失败的真实写照。

第三个启示，则要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调整过程中反思。首先，冷战后美欧日掌握全方位优势，但是他们只从他们“黄金十亿”的利益出发，不从全世界80亿人的整体利益出发。其次是摆优越感，搞霸权，不懂得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

等的重要性。这也正是我们“全球南方”在推进国际秩序调整的时候要特别记住的一个原则。再次，是干涉“全球南方”国家内政，强行推行一人一票民主制、三权分立制度和绝对市场制度。再次，是动不动就使用武力，先后发动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还有眼前的加沙战争，打击伊朗、袭击卡塔尔、威逼委内瑞拉、古巴等等。最后，他们在世界上搞双重标准，他们搞双重标准还振振有词。

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法国一家刊物采访特朗普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请他讲一讲何为“有规则的国际秩序”。博尔顿振振有词地回答说：什么是“有规则的国际秩序”？没有那个东西，国际上只讲实力。这个话由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讲出来，我们还相信西方人讲的“有规则的国际秩序”吗？它就是用来骗我们南方国家的。现在，不但美国、就是欧洲、日本，也不再信奉西方牌号的所谓“有规则的国际秩序”等说辞。

综合起来看，20世纪以来虽然面临三次国际秩序大调整的历史机遇，但由于美西方国家蓄意为之，都没有抓住，这给我们带来了有关国际秩序调整的若干经验和教训。

一是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搞大国主义，这在21世纪的世界是行不通的。当机遇窗口来临时，“塑造”新型国际秩序不能没有大国起主导作用，不能没有大国协调合作。但大国必须公平公正，有“天下胸怀”，即必须从人类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诉求出发，而不是仅从少数大国利益出发，更不能搞“大搞主义”“大国分赃”。特朗普以武力威逼委内瑞拉、威胁要夺取格陵兰、称加拿大为美国“第51个州”，都是“大搞主义”未曾根绝、威胁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再现。

第二是必须坚持国际民主原则，不搞大国独裁，而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坚持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及肤色，一律平等原则。构建21世纪国际秩序必须充分考虑“全球南方”的诉求，尊重其发言权。

第三是要坚持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原则。在这方面，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构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思考依据。其一，中国首提四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些倡议表明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是80亿人的事情，而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其二，中国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世界各国不分大小、贫富，都必须平等、互助。其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之需，前三次人类错失了构建公平、公正国际秩序的机遇，绝不能错失第四次。

为此，首先要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包括解决现在全球多场战争冲突、军备竞赛。当前“全球南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阻止美国打委内瑞拉。另一件事情是要阻止美日军事同盟的扩大和加强。第二个是共同安全问题，比如跨国犯罪、毒品等等。第三个是共同发展问题，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数字鸿沟，需要我们去克服。第四个是全球变暖问题。第五是人工智能的无序发展问题。

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玩规模、玩市场、玩快速换代、玩政府的领导力，这四个方面决定了颠覆性技术的新发展利于人口规模大的全球南方，不利于人数少的美西方；利于后发国家，因为它打断了垄断科技知识市场的进程；利于财富、权力的扩散，改变东西方力量的不平衡；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扩大“全球南方”的利益和影响提供了机会。但是，如何管理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问题。

今后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确保国际和平与发展，需要汲取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前我们“全球南方”要共同努力，团结奋斗，抓住国际秩序转型的新机会，积极塑造新型国际秩序，为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打造积极有效的国际组织架构，提出新的国际理念。

3.2.3 世界的平衡之道-雅尔塔体系、《联合国宪章》与新国际秩序所需的平衡

- 发言人：卡洛斯·罗恩
- 年份：2025

我们很荣幸能在反法西斯胜利八十年后的今天汇聚于此。这个国家不仅在战场上击败了法西斯，更从社会和经济根源上将其铲除。

法西斯主义曾在西欧和日本滋生，这点绝非历史偶然，而是系统性崩溃的必然结果，其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缺乏监管：资本无序流动导致收入极端不平衡、金融投机泛滥以及大萧条级别的严重系统性崩塌。这种经济腐败又因两大意识形态支柱而加剧：

将“他者”妖魔化。将外国人、异类视作社会困境的根源，划为有组织的仇恨行动的目标。

其二，鼓吹例外论与种族/民族优越论。比如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或日本的“国体论”，其根本谬误在于妄想通过个体方案解决社会共同难题。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所在的中国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反例。我们亲眼见证中国模式通过高效的资本管制和中央规划，已成功帮助八亿人脱贫，证明共同富裕胜于恶性竞争。中国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尊重文化多样性，倡导互学互鉴，正是直接对抗例外论倾斜的危险倾向。

正因如此，捍卫历史与记忆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如今主导全球北方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正危险地重塑那些最初滋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条件。面对好莱坞与西方政治话语对历史真相的篡改，我们必须守护历史记忆，防止法西斯本质被模糊化，避免新型、危险的极端主义死灰复燃。

反法西斯战争击败了一种意识形态，但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却埋下了新的结构性不平等，至今仍制约着全球南方的发展进程。

雅尔塔会议奠定的和平框架催生了联合国。正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很多我们这样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才能真正见面、交流互动。从这个意义上，雅尔塔体系是必要的。然而对全球南方而言，雅尔塔体系非但不是冷战的起点，反而是热战的升级。所谓大国影响力范围的理论更是重构了新殖民主义瓜分世界的格局。

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而言，雅尔塔体系将我们永远禁锢在美国的势力边缘。这种结构性定位意味着我们的发展永远屈从于霸权中心，后来的依附理论也对此作了精辟阐述。尽管拉美地区始终抵制这种角色，但美国近年强推新冷战思维的行径表明，他们仍将我们的国家视作其统治、操控与资源掠夺的对象。

雅尔塔体系将“美国国家安全主义”强加于拉美地区，强化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在内的既有殖民结构，并以反共之名纵容整片大陆的人权暴行。

社会进步、收入公平与政治参与持续为华盛顿的政治议程让路，最终催生了“秃鹰计划”这样的暴行，形成一场针对南锥体国家民主进步力量的跨国恐怖镇压。如今，安全借口已转变为禁毒和反恐，但美国主导的本质从未改变。

不过，这种主导催生了对立面：万隆精神与哈瓦那三大洲会议精神。不结盟运动与第三世界团结理念将反殖民与发展议程推向前线。

现今，冷战后的单极霸权陷入危机，多极化浪潮必然蓬勃兴起。此刻我们必须思考：新阶段的目标何在？

在拉美，答案深植于我们的历史。两百年前，当西班牙帝国衰亡之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提出召开巴拿马大会，构建统一的拉美极。他将这种区域联合视为建立“世界平衡之道”的必要条件。

他精辟论述道：“欧洲列强雄心勃勃，为世界其他地区套上奴役的枷锁。所有这些地区应当彼此之间建立平衡，同时与欧洲建立起平衡，以摧毁后者的霸权优势。我称之为‘世界平衡之道’。”

其中的启示显而易见：成功的多极化必须始终追求平衡，而非形成两三个大极瓜分世界的新格局。

如今，玻利瓦尔的世界平衡之道正与中国的全球倡议直接呼应：

《全球安全倡议》（GSI）追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全球发展倡议》（GDI）致力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全球治理倡议》（GGI）坚持主权平等与《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治。

冷战基于主导势力划分半球，致使全球秩序失衡。如今，旧秩序崩塌，我们必须回归世界平衡的终极载体，即《联合国宪章》本身。

联合国已成立八十年。毫无疑问，其表现却令人失望。大量文件记录着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表明《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宗旨已被违背。联合国体系陷入瘫痪，症结何在？

联合国的失败不在于《联合国宪章》，而在于选择性执行目标和控制结构缺陷。联合国既未能阻止针对主权国家人民的经济站、避免针对单边强制措施加诸于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之上，也未能制止影响多国公民的法外处决在加勒比海发生。

但捍卫国际法的斗争依然至关重要。《联合国宪章》是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获普遍认可的规范文件，旨在捍卫主权平等与民族自决权。放弃《联合国宪章》就是背弃人类文明。

这正是委内瑞拉与中国共同参与的《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等重要倡议的价值所在。自2021年成立以来，之友小组始终抵制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单边解读。坦白来讲，这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帝国主义，是在面对利润率萎缩时妄图同时扮演玩家、裁判与规则制定者的伎俩。

若想避免毁灭性战争终结人类生命，也清楚坐视不理必然引发战争，就必须加强联合国的力量。唯有依靠《联合国宪章》代表的国际法体系，才能实现玻利瓦尔两百年前倡导的世界平衡之道。

这需要推进三大结构性改革：

破除霸权地理：必须推动联合国大会及秘书处轮值制度，打破联合国的地理霸权，启动总部部分机构迁往全球南方首都的进程；

打破金融否决：必须确保更多经济强国增加会费，突破美国在决策过程中的金融控制，只有这样才能终结美国对关键联合国机构的实质金融否决权；

强化大会职能：必须采取行动，显著提升各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权力与决策能力，确保每个国家享有同等代表权。尽管困难重重，但必须建立机制，使安理会否决权在面临种族灭绝或非法强制措施时，可经大会超级多数票否决。

我们必须推动联合国成为真正民主的世界平衡之道。

朋友们，

历史总以惊人方式重演：1942年2月至3月间，纳粹德国派遣潜艇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企图控制盟军石油供应。潜艇击沉多艘委内瑞拉油轮，造成70人罹难。

如今，法西斯战舰再次威胁我的祖国。美国的非法巡逻行动已导致近70名同胞丧生，目的依然是控制石油供应。

若不力促国际法尊严，不捍卫历史与记忆，不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均衡，另一场法西斯战争或将从加勒比海启幕。

3.3 清算战争债务,拒绝冲绳再成战场

3.3.1 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在东亚的意义：韩国李在明政权的实用主义与日本右极右政权的登场

- 发言人：徐胜
- 年份：2025

今年 9 月 3 日在天安门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活动。此次活动继承了 10 年前 9 月 3 日活动的宗旨，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东亚的民族解放与和平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主张要点在于"近代以来，反对外敌入侵所取得的首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两点。即抗日战争的胜利宣言和作为联合国一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宣言。日本是战犯国家，而中国是战胜国家这一点。

201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与抗日战争相关的 4 个纪念日。即 1931 年 9 月 18 日的九一八事变纪念日、12 月 13 日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及成为中日战争导火索的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9 月 3 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决定是为了全面系统地纪念抗日人民战争。

我一直对中国如何对受害者和牺牲者提供支援或补偿感到好奇。2005 年我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在那里遇见了幸存者。

那位老奶奶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还是十几岁，家人中父亲、叔叔和哥哥等 4 名男性都被屠杀了。此后她过着相当艰难的生活，中国政府并没有提供什么像样的支援。但那位老奶奶说，中国建国后经历了相当多的艰难情况。先是抗美援朝战争，然后有大跃进，还有文化大革命。因为中国国内相当混乱，无法一支援每个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听了这些话，我重新认识到中国在二战后走过了相当艰难的道路。

我在大学里讲授关于东亚是什么的课程。几乎大多数人都不太了解东亚是什么。这里重要的是，亚洲这个概念本身原本就不是这个地区原有的词汇，而是通过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侵略这个地区的过程中，随着他们扩张统治领域，把这里的人们称为亚洲人。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亚洲人"，而是欧洲帝国主义者像打烙印一样对我们说"你们是亚洲人"，这可以说是一个"他者概念"。那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打上的烙印。

关于被称为世界史上最肮脏的战争——鸦片战争，相信大家都很了解。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这个地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之前世界上最富强的清朝灭亡了，朝贡册封体制崩溃，"条约体制"建立起来。所谓条约体制，虽然不作详细说明，但就是这个地区被强加了不平等条约。

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没有选择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而是选择了模仿和追随。他们以"文明开化"的美名掩饰，以"富国强兵"政策建立了天皇制军国主义国家，侵略邻国。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霸权主义，以"亚洲主义"、"东亚"、"兴亚"的名义

美化,提出了包含日本世界统治野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和大东亚宣言,但由于亚洲人民的激烈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与先发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最终迎来了惨痛的战败。

在东亚,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中,无数生命和财产被剥夺。东亚人民希望在没有战争、暴力和掠夺的和平中生活,但不得不与帝国主义者和以民族为单位的奴役企图作斗争,这个地区民族解放斗争,即抗日斗争的普遍化是必然的。

然而,尽管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美国以反共主义和霸权追求开始了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时代。由于美国所谓的遏制(Containment)政策,对侵略和殖民化等帝国主义者罪行的清算也化为泡影。对受害国的日本赔偿不了了之,日本拒绝赔偿并坚持至今。即使到现在他们还说自己没做过坏事。

到了1990年,即苏联解体后,对日军慰安妇、强制征用、强制劳动、大屠杀和人体实验、使用毒气等造成的个人伤害的赔偿要求迅速扩散。对此,日本一贯采取无视或回避责任的态度。为了实现东亚的和平,必须实现正义,即查明、承认加害事实,道歉、赔偿并防止再次发生。也就是说,必须清算过去。但日本却在遗忘和否定过去。

二战后,日本成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前哨基地。美国放弃了解散日本军国主义这一联合国的任务,推进了自卫队的创建和日本的重新武装、再军事化,1952年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将整个日本列岛变成美军基地,冷战时期将自卫队集中在针对俄罗斯的北海道,苏联解体后则针对中国和朝鲜半岛将军事力量集中在冲绳西南地区。

当初"宪法第九条"是为阻止日本帝国复活而规定的"不战·非武装"条款,但在冷战中美国全面将自卫队军事化,致力于军工产业的扩张。这一趋势在安倍政权时期达到极端,出现了回归日本军国主义的"夺回日本!"口号。岸田内阁放弃了以往的"专守防卫"承诺,宣布意味着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通过了大幅增加军事预算的安保三法。

被指为右翼的石破反而走了温和路线,但一年就成为短命内阁而结束,在那混乱中出现的是自称"女安倍"的高市早苗。高市如大家所知,发表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妄言,暴露了日本干预台湾问题的内心,高市政权被担忧为东亚和平的破坏者。

日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大受害者中国,1972年通过中日联合声明在没有任何赔偿的情况下获得了赦免。对于处于殖民统治中心的朝鲜,对其南半部,通过作为旧金山条约体系一环的韩日基本条约否定了殖民统治责任,朝鲜半岛的军事政权以"建交祝贺性质的经济援助金"赦免了日本的殖民统治责任。到了尹锡悦政权,甚至放弃国家利益,反而代表日本的利益并授予其免罪符。

现在,帝国主义者们将曾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分裂,以亲美·亲日的独裁者为走狗,强制将南半部编入美国主导的反共阵营。其结果在济州四·三事件、丽水·顺天事件等中屠杀了许多人民,介入为民族统一而爆发的朝鲜战争,杀害了数百万人。通过渴望自立自主、民族统一和民主主义的人民的激烈斗争,诞生了金大中政权。突破亲美亲日反民族的朴正熙、全斗焕等人顽固政权把持的暴政,批判反共右翼独裁政权和美国统治,建立了卢武铉、文在寅的进步政府。

2024年12月3日，制止尹锡悦的军事叛乱并夺回政权的进步势力诞生了李在明政府。李在明政府虽然标榜"实用主义"登场，但将让国内人民能够稳定地生活的民生稳定放在首位，支持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为此提出了平民经济第一主义和不偏向亲美亲日的均衡外交，主张南北朝鲜的和解与合作。其方法不是一下子解决问题，而是在维持现有关系和资源的同时加以利用，以渐进的方式接近目标。致力于作为主权者最大化"国民"的权利，将国民作为主人，实现"常识"通行的社会。一方面也有人批评说太温和太慢，但在意识形态和阵营崩溃的今日世界，在目睹社会主义崩溃的时代，"实用主义"也许是现实中几乎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总之，为了实现平等、自由、和平的世界，必须实现正义，即清算过去是必须完成的课题。在东亚的过去清算问题上，中国树立了"反法西斯"和"抗日"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反对鸦片战争以来在东亚犯下的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为了在历史中正确定位民族解放斗争而绝对重要的标准。

为了东亚人民有尊严的生活，我认为反对美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霸权，致力于恢复人民的权利，通过广泛的团结实现持久和平是唯一的道路。

3.3.2 日本军国主义复苏与对华战争准备

- 发言人：林伯耀
- 年份：2025

我想谈的主题是：日本军国主义正处在复活的前夜。我本人长期生活在日本。虽在年幼时曾遭受“支那人”等歧视性称呼，但我仍然热爱日本的风土、文化与人民。我的子女与后代也都生活在日本。我一直希望战争不再重演。然而，当前的日本正处在极为危险的状况之中。

一、日本再次开始为发动侵略战争作准备

所谓“军国主义”（Militarism），是指一个国家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完全从属于军事，把为战争服务的制度和政策置于首位的思想和体制。其核心权力通常掌握在军人或军方背景人士手中，即便由持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主导，也本质相同。从这个定义来看，我们必须认清：日本正处于新一轮军国主义复活的边缘。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战败后，日本在国会制定的新宪法中，确立了放弃战争、不保持军备、否认交战权的国策，宣称不将战争或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并放弃保有陆海空军及其他军事力量。我们将之称为“和平宪法”。然而现实早已偏离这一精神。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的同时，在美国要求下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1950年，日本在美国要求下成立“警察预备队”，名义上是警察辅助单位；1952年更名为“保安队”；1954年改组为“自卫队”，这已经实质上构成军队。其后日本在美国庇护下不断扩大军备。从1952年的旧《美日安保条约》到1960年的新《美日安保条约》，日本实际上承诺走上军事化道路。自1976年以来，日本的防卫预算长期被限制在GDP（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内，但自2021年起这一限制被打破，政府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开支提升至GDP的2%，军事费用呈每年急速增加趋势。高市早苗还主张中国在2027年达成2%军费目标，但日本已提前在今年预算中达成这一比例。军费占GDP 2%意味着日本将成为全球第四大军事强国。这一系列动向显示，日本正逐步走向新的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当前的军事扩张，是对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以及亚洲地区稳定的重大挑战。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2014年7月1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以“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发生剧变”为由，在内阁会议上单方面改变了历届内阁所坚持的“行使集体自卫权（注释1）违反宪法”这一政府解释，规定在“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武力攻击，日本国民的权利与生命受到根本性威胁”的情况下，自卫队可以行使武力。同年，日本施行了《特定秘密保护法》，其中之一的目的即为防止间谍活动。根据这次内阁决定，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包括：日本或与日本密切关系国家遭受武力攻击，且该攻击对“日本国民”造成明显危险；除行使集体自卫权外无其他方法可以应对；仅限于使用必要最小限度的武力。以上条件被称为行使武力的“新三要件”。包括日本律师联合会在内的众多市民团体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违反宪法。

尽管如此，日本国会仍旧于2015年通过了《安全保障关联法案》，该法案以2014年的内阁决议为依据，主张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2015年8月，超过10万人聚集在国会前，高声抗议政府和国会以极端方式破坏宪法精神，但最终事态仍按照政府的意图推进。

2021年，安倍晋三首相提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公开干涉中国内政。2022年12月，岸田内阁通过“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现《防卫计划大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明确提出日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击能力）”，从而实现从“专守防卫”向“攻击型防卫”的重大转变。此后，日本朝野议员频繁访台，鼓动“台独”势力，公然表露对中国实现祖国统一事业的敌对与挑衅。2023年8月8日，日本前首相、前自民党总裁麻生太郎在台北发表“要有（与中国）战斗的觉悟”的言论，煽动台独势力，严重挑衅中国。直至今日，日本仍未彻底放弃其作为侵略台湾的殖民宗主国的旧有幻想。

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结束帝国主义分割国土、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夙愿。中国绝无法接受日美两国对祖国统一事业的干涉和阻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我们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只要“台独”势力不自行，或在日美挑衅的怂恿下宣布“台湾独立”，大陆方面不会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然而，日本的所作所为，公然否认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承诺，也公然违背了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

此外，2024年7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北约峰会上发表“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的言论，公然对中国进行挑衅。近年来，日本政府和媒体不断将中国在南海的公务船例行巡航和停靠设施建设，歪曲为中国的“海洋扩张”、“以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等，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而日美炒作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自由开放的印太”等概念，实际上是为推进对华战略包围而炮制的带有恶意的政治术语。事实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明确保障各国船只在领海内的航行自由，中方也多次强调，中国拥有的历史性权利并不具有排他性，航行自由从未受到阻碍。

中国在本国领海部署公务船是主权国家理所当然的行为。早在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在与蒋介石集团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第二条中就明确“日本国依据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签署的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和约》）第二条，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新南群岛（即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权源和请求权”。尽管中国不承认《旧金山和约》和《中日和平条约》，但这些条文本身充分说明，包括美国在内的同盟国和日本早已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拥有主权。然而如今对社会主义中国却拒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带有恶意的双重标准，完全站不住脚。

1970年起，在美国的中国台湾留学生发起“保钓运动”；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美国多次公开表示“不站在中日的任何一方”，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并不承认日本

的主权主张。2012年9月11日，日本野田内阁推动钓鱼岛“国有化”，这标志着日本在该地区开启了新的侵略性行动，并强烈主张将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日本以从美国接收“施政权”为由，强迫美国将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美国被迫接受了这一安排。实际上，这恰恰体现了日本试图主导将美国卷入对他国的侵略行动的政治意图。

二、日本正推进对华战争准备

目前，日本正在琉球弧（冲绳南西诸岛）、九州、近畿等地陆续建设针对中国的长射程导弹基地和大型弹药库，这些导弹均具备覆盖中国本土的中远程打击能力。位于冲绳本岛北部的奄美大岛早在2019年就已部署反舰、对空导弹部队。而在其以东的种子岛近海的马毛岛，日本正在推进将整个岛屿建设成为军事要塞的计划。该岛将建设拥有两条长跑道的机场、机库、弹药库和军港，最终成为一个巨型军事设施。该设施不仅是日本自卫队历史上首个陆海空三军联合演训基地，也将作为日美共用的军事基地。在这些岛屿及周边海域，日本自卫队与美军频繁开展以“对华作战”为假想的联合军事演训，甚至利用民用机场、市区街道、公园等设施公然进行军事训练。在日美军基地的70%集中在冲绳，从而引发大量事故，美军的性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然而，日本本土政府长期将冲绳琉球群岛视作“国内殖民地”，对于这些问题始终缺乏认真应对。

自2014年以来，日本政府推进将普天间基地迁往边野古的计划。尽管冲绳县知事以及广大冲绳民众坚决反对，并在日本本土市民的支持下持续展开顽强抗争，但日本政府仍一意孤行，甚至在2024年9月25日、2025年2月上旬和6月12日三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船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对中国的挑衅行动。

日本战后走上军国主义化的道路，主要源于其自身的内部因素，但同时也与美国的亚洲战略和对日军事支持密切相关。二战结束后，美国企图将日本列岛打造成反共前沿阵地，同时，日本天皇在1947年9月19日和1948年2月两次通过使者向盟军总司令部（GHQ）递交的“天皇密信”，这正是当今日本反共军事基地战略构想的起点。（注释2）

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4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

“在名为‘自由与民主’的宇宙飞船上，日本为能够成为美国的伙伴船员而感到自豪。我们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并肩站在甲板上，履行使命，完成应尽的责任。日本已经与美国携手并肩，共同行动起来。经过长期的变化，日本已经修改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22年，日本决定在2027年前将防卫预算大幅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并保有反击能力，加强网络安全。”岸田首相在美国国会高调宣称，日本自卫队是美国的忠实同盟力量。其演讲赢得了美国国会议员的热烈赞赏，议员们四次起立鼓掌，为其喝彩。一位外国记者甚至发问：“岸田首相究竟是哪个国家的首相？”

三、日本军事高层提出对华“核威慑”建议

美军与日本自卫队曾多次举行联合综合军事演习。具体政策上，自卫队高层在制定对华军事战略时公开主张，美国应对中国实施“核威慑”。日本自卫队最高层公开谈论核威胁，这是前所未有的。

2024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期间，日本自卫队与美军举行了代号为“利剑25（Keen Sword 25）”的联合军演，历时10天，共动员约4.5万名士兵、40艘舰艇和370架飞机，并启用了日本多地的民用机场和港口。演习中还推进了日美两军指挥体系的一体化。

2025年9月11日至25日，日本和美国再次举行代号为“坚毅之龙25（Resolute Dragon 25）”的联合军事演习，为期15天，共动员双方约1.5万名士兵。自这两次联合综合军演之后，演习的假想敌已明确指向中国。

日本自卫队制服组高层近期在防务领域提出的政策建议极具危险性。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前总监·陆将小川清史提出：“如果台湾遭到武力攻击，日本应立即将其视作‘国家’，并建立正式的协同应对机制。”这一主张实际上就是“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提议，严重违反国际共识和中日间的政治承诺，绝不可接受。（注释3）

据报道，日本自卫队制服组最高层军官在针对“台湾有事”设想的日美联合兵棋推演中，要求美军“以核威慑回应中国的核威慑”。2024年2月，在东京市谷防卫省地下一层的中央指挥所，自卫队制服组最高层，时任统合幕僚长吉田圭秀多次以强硬口吻向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提出这一要求。阿基里诺最初表示抵触，但最终无奈同意。（注释4）

中国已明确宣布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并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以核武器相威胁。尽管如此，日本自卫队制服组最高层官员竟强烈要求美军司令官对中国实施核威慑，这种行为绝不能容忍。然而，这一事实在日本国会并未引发任何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原定任期至明年4月的吉田统合幕僚长已于今年8月1日突然卸任，目前尚不清楚此事与其退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今年3月，日本自卫队制服组前最高层、前统合幕僚长岩崎茂被台湾任命为行政院政务顾问。这一举动被普遍解读为可能意味着台独势力与日本自卫队制服组高层之间存在暗中的军事勾连，属于极为赤裸的内政干涉。这一举动被视为继上世纪50年代日本派出80余名军事顾问组成“白团”，协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之后，日台军事勾连的又一重大举动。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未采取任何措施予以制止，媒体和国会也保持沉默。

四、为实现东亚的持久和平，中、朝、日三国人民应跨越国界，携手团结！

今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证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喜与忧同在。各国民众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才能实现共同安全，铲除战争的根源，避免重演历史悲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些协议都明确“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两国互信关系的根基。然而，当下日本的政策与行动，正在公然背弃中日之间的政治承诺，践踏双方合作的精神，这种做法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自明治以来，日本在天皇和军部的指令下，蔑视朝鲜、中国和亚洲各国，派遣军队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并推行殖民统治。日本以武力吞并朝鲜，在中国扶植“伪满洲国”，并通过制造南京大屠杀、发动细菌战和实施强制劳动等暴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掠夺巨量资源。尽管如此，现代中国并未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要求，也没有处决任何一名日本战犯，而是将他们全部遣返日本。

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仍未对其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当下，日本甘当美国的追随者，步入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断扩充军备和强化军事基地的危险道路。这一走向极有可能导致新的侵略战争。我们不能让下一代再次承受战争的苦难。为此，首先必须与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广大亚洲人民共同揭示并认清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现实，保持高度警惕。阻止正在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重走侵略战争之路，推动实现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是当代所有中国人、朝鲜人以及日本人的共同历史责任。

五、携手进行反对民族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racism）的斗争！

侵略战争并非仅靠坦克和大炮就能实施。还必须在被动员的士兵以及支持战争的民众中，植入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排外心理、歧视观念和敌意。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将中国视为“野蛮之国”，向日本民众鼓吹“暴支膺惩”（惩罚暴乱的支那），灌输日本是“神之国”、日本是优越的民族而中国为劣等民族的观念，并以“向支那赐予文明”为幌子，向中国大陆大举派遣军队，最终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2013年2月，在大阪鶴桥地区，一个聚居了众多在日朝鲜人的区域，一名日本女中学生手持麦克风，多次高喊“要实施鶴桥大屠杀，而不是南京大屠杀”、“想亲手杀掉（在日朝鲜人）”等极端言论。2021年8月，京都府宇治市的“ウトロ（Utoro）地区”，同样是朝鲜人聚居区，民居与仓库遭人纵火。作案的日本人称，出于对朝鲜人的反感而实施放火。到了2025年，日本国会选举中以“日本人第一（Japan First）”为口号的右翼政党迅速崛起，连原本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也纷纷效仿，提出针对外国人的歧视与排斥政策。与此同时，在日本政界与媒体煽动的、毫无根据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影响下，日本社会反华、仇华情绪蔓延，近期甚至出现了袭击在日华人、中国游客的事件。日本社会对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歧视与排外思想，并非一朝一夕产生，而是自战前以来不断滋长的长期历史产物。

导致这一切的深层原因之一，是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震级7.9）发生后不久，日本国内爆发的针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大屠杀（种族灭绝）事件。这场惨剧的起因之一，是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在发布戒严令的同时，向全国地方长官发出通告，散布“朝鲜人纵火”“朝鲜人持有炸弹”“必须严加取缔不逞朝鲜人”等毫无根据的谣言与指示。此外，其导火索还可追溯到地震发生前一年，日本政府曾向全国地方长官下达的“排斥中国劳工令”。据当时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发行的《独立新闻》报道，被军队、警察、自卫团以及普通日本民众残杀的朝鲜人多达6661人。而在官方登记的受害者名单中，被杀害的中国人也接近800人。此外，日本军方将日本社会主义者、进步工会活动家，以及支持中国劳工的中国留学生王希天等人，诬称为“反日分子首领”，并将其秘密杀害。即使在事发一百年后的今天，日本政府仍未正视这段历史，既不承认事实，也未向受害者道歉，更未表现出任何应有的反省态度。

如今，我们正同朝鲜半岛受害者遗属、中国大陆受害者遗属、在日华人、在日朝鲜人以及众多日本友人携手，共同推进对关东大地震期间屠杀事件的真相调查，并追究日本政府应负的历史责任。2023年8月31日，事件发生一百周年之际，我们首次成功举办了中国与朝鲜两国遇难者的联合追悼大会，约1800人齐聚一堂，共同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承担历史责任。

为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维护东亚和平，我们将追究日本政府在关东大地震种族屠杀事件中的历史责任，进一步推进中、朝、日三国人民的联合行动，共同反对和抵制民族排外主义。

注释1：所谓“集体自卫权”，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是指“即便本国未遭受直接攻击，但为了阻止对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外国发动的武力攻击，而以本国的实际武力进行应对的权利”（引自日本政府内阁官房官网）。

注释2：第一次“天皇密信”是指天皇提出将琉球群岛作为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建议由美军长期占领；第二次，天皇的使者向盟军总司令部（GHQ）外交局长西博尔德（William J. Sebald）传达了天皇的构想，即“将南朝鲜、日本、琉球、菲律宾，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台湾，作为美国的前沿阵地，是最现实的战略措施”。

注释3：引自公益社团法人安全保障恳话会的论述《武力攻击应对与国民保护——针对包括岛屿在内的对我国侵攻的应对》（2023年10月）。

注释4：出处：《大分合同新闻》（2025年7月28日）。

3.3.3 冲绳与西南诸岛的导弹危机现状

- 发言人：绪方修
- 年份：2025

【发言】

正如大家所知，冲绳仅占日本国土的 0.6%，人口约 140 万，只相当于中国的千分之一。就在这样狭小的区域内，尤其是在被称作“先岛诸岛”“西南诸岛”的地区，大量导弹设施林立其中。我为了让公众了解这一现状，已经在日本各地举办了约 20 场摄影展，并分别在韩国、中国各举办 4 场，在中国台湾的大学也办过，在美国也举办过。

为本次大会，我将这些内容剪辑成一段 7 分 30 秒的视频，内容十分简单易懂，请各位观看。

【视频内容】

《冲绳·西南诸岛导弹危机的现状》

冲绳是日本知名的度假胜地，属亚热带气候，被碧绿海水环绕，保留着独特文化与珍贵自然。

冲绳也是太平洋战争的激战地之一，牺牲的平民人数甚至超过军人。

然而，根据日本防卫省，目前在包括冲绳在内的西南诸岛地区正在推进大规模自卫队部署，这被称为“西南诸岛转移（西南シフト）”。

计划规模如下：与那国岛约 200 人、石垣岛约 600 人、宫古岛约 800 人、冲绳本岛约 8000 人、奄美大岛约 600 人，另加种子岛与马毛岛合计超过 1000 人，加起来在初期阶段就接近 1 万人规模。



西南诸岛导弹危机摄影展（视频文字说明）

西南诸岛正面临危机。政府与本土媒体不断强调“台湾有事（战争）即将发生”。但这是“被制造出来的危机”，并会牵连整个日本。西南诸岛的要塞化早在数年前已开始准备。

本次图片与资料由小西诚、奥间政则及西南诸岛反基地扩张的相关人士提供。



（计划部署于西南诸岛的导弹）

- 12式导弹射程约 150 公里以上。
- 地对舰导弹无法直达中国大陆，但射程 1000 公里级别的导弹则可能做到。



（西南诸岛与中国的相对位置）

西南诸岛从马毛岛到与那国岛约 1200 公里。从中国视角看，这里是“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中国台湾位于岛链最南端。



(边野古填海前后)



(儒艮等濒危物种)

冲绳承担了日本七成以上美军专用基地，边野古基地仍在建设中。

边野古与大浦湾生活着约 5800 种濒危生物。当地海底在 70 米深处呈“蛋黄酱状”，难以作为跑道基础。



(宫古岛保良基地露天建成的导弹仓库)

仓库建于海拔零米的旧采石地，完全暴露，其右侧 150 米处即为民宅——在全球极为罕见。



(鸠山由纪夫 前首相)

鸠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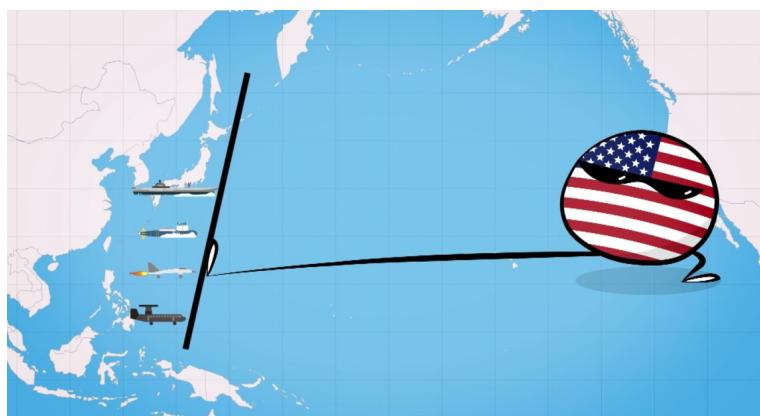
“我久违地来到宫古岛，参观了千代田驻屯地以及保良地区的训练场，也听说这里已经部署了导弹弹头。自卫队基地竟然如此紧邻住宅区，且存放着导弹弹头。在紧急情况下，虽然未必一定会出事，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地距离居民如此之近，我能够理解，这对当地居民来说是非常令人恐惧的事情。在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上，往往流行着这样一种想法：这不是由居民意愿决定的事情，而是国家来决定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需要太在意居民的意见。但如果是在宫古岛，关系到岛民安全的基地、导弹弹头的部署，以及弹药库的设置，我认为这些都是绝对不应

该发生的事情。像这样近距离看到这些弹药库，会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

（动画解说：美中战略与岛链问题）

美国有一项名为“离岸控制（Offshore Control）”的战略：

在中国向太平洋推进时封锁其必须通过的“第一岛链”，将中国海上力量限制在岛链以内。据称，通过这一布局，美国不仅能够在发生紧急事态时切断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还可以不必担心中国潜艇对本土发动核攻击，从而在战略上占据优势。美国国防战略的基本原则是，不让外部威胁接近本土，在尽可能远离本国的海域，或是在对方领土内将其歼灭。



如果偶发性的冲突不断升级，甚至可能发展为核战争。西南诸岛的奄美诸岛、冲绳本岛、宫古岛、石垣岛将部署地对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这些导弹旨在攻击试图通过西南诸岛海峡及其上空的舰船和军用飞机。



然而，一旦从岛上发射导弹，这些岛屿便会立刻成为攻击目标，中国很可能会全力以赴，试图瘫痪部署在西南诸岛的导弹基地。居民无法向岛外疏散，只能在导弹雨中于岛内奔逃。所谓“西南诸岛转移”，从一开始就默认将这些岛屿作为战争前线。

【发言】

最后，要避免“台湾有事”，必须在日中及东亚之间建设“不战共同体”，构筑和平，这是最关键之处。日本别无选择，只能与周边国家维持良好关系。日本三分之一的贸易依赖中国，无法想象没有中国往来的状况。但这些事实往往未被认真看待。因此，我希望通过摄影展与演讲，让更多人了解现实情况。

制作 东亚共同体研究所

出演 鸠山由纪夫前首相 等

动画制作 西南诸岛和平项目

影像协助 吉川秀树、环境省、H.Marsh 等人、中国自然资源部

3.3.4 宫古岛军事化与日本军国主义复兴

- 发言人：清水早子
- 年份：2024

我谨以日本公民身份，就太平洋战争期间父辈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殖民侵略行径深表歉意。

我来自距东京 2000 公里、距冲绳那霸 300 公里的宫古岛。1944 至 1945 年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时人口仅有 5 万的宫古岛，驻扎了 3 万名旧日军，日本军事大本营曾计划在此展开地面战。美军与英军实施的空袭及舰炮打击致使宫古岛化为焦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但更具毁灭性的是由物资短缺引发的饥荒与疫病，一位幸存者曾作了一首短歌描述此景：“将鸟兽皆食尽，以热带鱼维系生命之极限的岛。”（犬猫鳥皆食い尽くし 热帶魚に 極限の命つなぎたる島）

日本战败后，美军曾驻扎于宫古岛。1972 年冲绳行政权移交后，原日军司令部所在丘陵区被自卫队接管作为通信基地，经多次改造升级，现已发展为日本航空自卫队核心雷达基地之一。

2019 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岛内新建军事基地，并于次年完成导弹部队部署。此前该岛仅有通信设施，未配备任何实战性武器装备。目前该岛常驻自卫队员及家属约 2000 人。防卫省在 2024 年度预算中已规划增设电子战部队，同步推进弹药库扩建工程。从九州至与那国岛的琉球岛链正被视为导弹军事要塞群岛以推进军事扩张。

太平洋战争期间，冲绳本岛作为日本本土的“战争防波堤”遭受严重破坏，导致逾 20 万人丧生，全岛基础设施损毁殆尽。当前军事部署态势显示，包括宫古岛、八重山诸岛及与那国岛在内的南琉球群岛正被纳入前沿防御体系，其战略定位引发区域性安全关注。

日美联合军事行动自 2022 年起呈现高频化态势，仅 2022 年一年内便实施联合演训逾百次。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自卫队声称要实施装甲设备南方适应性改造项目，并在珊瑚礁海域开展爆破测试以采集环境数据。此外，宫古岛公共设施已经出现了用于收容居民遗体的“遗体收容袋”，显著加剧了居民对冲突升级的焦虑情绪。与此同时，防卫省声称将针对 25 万名现役人员采集血液样本，着手制备可长期储存的冷冻血液制剂，作为战时与美军共享的医疗物资储备；其配套制定的伤员转运方案中，也提及作战负伤人员将先集中于那霸医疗机构实施初步救治，继而分流转运至本土医疗机构。系列部署充分表明了“战场在冲绳岛以南”的军事研判。

更为隐蔽的是，“软性控制”机制正逐步向居民生活全域渗透，其影响范围不仅覆盖文化传统层面，更延伸至社会群体的精神领域。2024 年 1 月 9 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副长等数十名官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次日，宫古岛驻屯地部队约 20 名军官乘公务车辆前往宫古神社实施参拜行为。此类行为明显违背《日本国宪法》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同时违反防卫省事务次官颁布的相关训令，突破了文民统制的制度框架。

2023年4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一架UH-60JA多用途直升机（通称“黑鹰”）在宫古岛附近海域坠毁，造成机上包括第8师团指挥官及宫古岛驻屯地司令官在内的10名乘员全部罹难。2024年4月6日，相关单位在距冲绳传统宗教场所“御嶽”（ウタキ）仅数百米的宫古岛基地内设置纪念碑，碑文中出现“勇士”称谓。该称谓与日本将战争阵亡者称为“英灵”、美化战争的行为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御嶽”作为冲绳传统文化中忌讳死亡的宗教空间，在此设立军事纪念碑的行为，反映出对当地文化缺乏基本认知的深层矛盾。

据2024年4月公开报道显示，陆上自卫队第32普通科连队（驻埼玉市）在社交平台X的官方账号中多次使用“大东亚战争”“英灵的冥福”等争议性表述。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官方文件中从未采用“大东亚战争”这一具有特定历史含义的称谓。旧日本军队曾通过“英灵”叙事对战争伤亡者进行政治包装，构建起“为天皇而战”的意识形态体系。当前自卫队部门恢复使用此类战争时期术语，显露出试图营造战前意识形态氛围的倾向，这种历史记忆的操控手法值得警惕。

2024年1月，宫古岛市多个区域举办成人仪式，部分活动合影被选登于市政宣传册封面。其中基地所在区域合影背景中出现旧日本海军“旭日旗”及“皇室菊花纹章”等历史象征元素，引发公众关注。同年6月，冲绳各地举办以祈求航海平安与渔业丰收为主题的传统庆典，其中“哈利”竞渡为主要活动形式。石垣岛地区自卫队队员以执行公务名义参与竞渡活动，声称该行为属于“划桨训练”及“海上战术演练”。与此同时，宫古岛“哈利”竞渡活动亦存在自卫队参与的情况，当地居民发表抗议声明，强调：“目前宫古岛的基地功能正在加强，军事扩张也在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对自卫队将这种如同旧日本军同化、一体化，令人联想到战前总动员体制的气氛带入居民生活中。”

同期，那霸市第15旅团官网发布冲绳战役期间负责指挥的第32军司令官牛岛满中将遗训。该将领曾在战役末期作出“南部撤退”决策，直接导致大量冲绳平民伤亡。该将领在遗训中留下的辞世诗句为：“秋待たで 枯れ行く島の 青草は 皇国の 春に 甦らなむ”（等不及秋天，便已逐渐枯萎的岛上青草，愿能在皇国的春天复苏），流露出对传统国家体制复归的期许。在冲绳县民的抗议之下，上述文本已从网站删除。

当前日本军费预算持续攀升的背景下，民生保障水平却持续承压。伴随武器系统与军事设施的迭代升级，社会氛围中隐现战前时代的阴影。为遏制这种非正常态势，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不容许这种“战前之夜”的气氛，伴随着武器军备扩张如“亡灵”般“侵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建立反战的国际团结力量，并继续推进反战的斗争。

3.3.5 冲绳历史与东亚和平：再无冲绳战争

- 发言人：具志坚隆松
- 年份：2024

位于日本列岛南端的冲绳，历史上曾以“琉球王国”为独立政治实体，具有区别于日本本土的语言体系和文化传统。据《中山世鉴》记载，公元1372年（明洪武五年），明太祖遣使杨载赍诏至琉球，中山王察度率先奉表称臣，由此确立宗藩关系。这种特殊的外交模式以“朝贡-册封”为制度框架，其经济实质体现为琉球向明廷进献方物，朝廷则通过“厚往薄来”原则回赐丝绸、瓷器等贵重物资。

当载满敕赐物资的官船返抵那霸港时，民众自发前往港口迎接的盛况被谱入《唐船谣》音乐作品。该曲目采用琉球传统弦乐器三线（别称蛇皮线）演奏，迄今仍是琉球传统舞蹈“嘉手苅舞”（俗称喧哗舞）的经典伴奏曲目，常见于各类庆典活动的谢幕环节。

琉球王国时期，该地区海外贸易网络发达，与中国大陆、东南亚诸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形成密切商贸往来。16世纪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历史学家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在《东方诸国记》中详细记录了琉球商人在马六甲等东南亚港口的贸易活动，当地居民对琉球商人使用“レキオス（Léquios）”的称谓。该文献特别记载琉球民族“他们是正直的人，是不买卖妇女和奴隶的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一历史记载表明，琉球王国时期该地区即已深度融入亚洲文明体系。

琉中友好关系持续逾五百年，形成稳定的朝贡贸易与文化交流体系。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实施“琉球处分”军事行动，武力占领首里城并强制押解琉球王尚泰迁往东京，宣告琉球王国灭亡。此后该地区被划为日本国冲绳县，实施强制性同化政策。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教育”制度，官方教育体系全面禁用琉球语，对使用本土语言的学生实施惩戒措施，系统性地推进日语标准化教育，旨在构建“日本国民”身份认同。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为强化本土防卫体系在冲绳地区构筑了密集军事设施。1945年该区域演变为日美两军陆战主战场，史载冲绳战役中平民伤亡数远超作战人员，约12万县民罹难，相当于当时总人口的25%（目前本人所属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搜寻战争遇难者遗骸并开展家属归还工作）。

必须明确的是，冲绳籍士兵曾作为日本军事力量参与对中国及亚洲多国的侵略行动，这段加害历史不可回避。针对亚太战争期间造成的广泛伤害，作为冲绳县民代表，在此进行深刻反省与诚挚致歉。

战后特殊历史时期，冲绳脱离日本本土由美国实施军政管辖，沦为美军太平洋战略体系的核心据点。在长达27年的军事管制中，美军管理期间刑事犯罪与性暴力事件频发，基本人权保障机制严重缺失。为摆脱高压统治，当地被迫“仓促地”选择回归历史上曾武力吞并琉球王国的日本。当时民众的核心诉求并非单纯复归母国，而是冀望通过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确立的永久放弃战争条款获得根本性保护。

1972年冲绳行政权移交日本后，根据日美双边协定，驻冲绳美军基地非但未缩减，反而持续扩张。与此同时，曾在战争期间撤离的日本军事力量更名为自卫队，重新

在冲绳建立多个永久性军事设施。当前日美军事同盟正将冲绳打造为东亚方向的战略前沿，其行动已显著加剧地区安全风险。

东亚地缘政治局势的升级值得警惕。日本自卫队近年以所谓“台湾有事”为名，在琉球群岛南部三个离岛及冲绳本岛加速部署导弹阵地。此类设施建设进程的急迫性使当地民众难以形成有效反对。需明确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范畴。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79年中美建交后终止效力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均从法理层面确认第三方无权进行军事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日美联合部队近年来在冲绳周边频繁实施多兵种协同军演，包括“利剑”（Keen Sword）和“坚决之龙”（Resolute Dragon）等年度例行军演。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度“利剑”演习投入兵力达3.6万人，其中包含两栖夺岛、远程精确打击等明显针对区域热点设计的战术演练。此类假想对华作战的军事准备，实质是将冲绳置于潜在冲突前沿。若该区域爆发军事对抗，不仅会直接危及冲绳民众安全，更可能引发日本列岛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全域性安全危机。

冲绳民众坚决反对本土再度沦为军事冲突前沿。为此，我们发起成立了反战组织“不再有冲绳战争·生命宝贵会”。要彻底消除冲绳作为对华导弹攻击前沿基地的威胁，根本解决途径在于推进日美军事力量完全撤离冲绳地区。

在此进程中，应当促成受冲绳军事部署威胁的利害攸关方开展战略对话。传统国际磋商机制多由政府首脑主导，但历史经验表明，战争真实受害者从来都是普通民众而非军政决策者，而民众恰是极具反战意愿的主体。本次“全球南方国际学术论坛”开创性地搭建了东亚民众表达诉求的国际平台，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这一问题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期待东亚地区反对军事对抗的理性呼声能够形成示范效应，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构筑“守护亚洲和平”的统一战线。这正是我此次中国之行的核心诉求。

日本针对潜在对华军事冲突的备战行动呈现全域化特征。其军事体系不仅强化冲绳基地建设，同时推进覆盖全境的军事部署：研发射程逾千公里的新型地对舰导弹，规划新建130处弹药储备设施，指定全国28座机场和11处港口为日美联合军用据点。全国自卫队基地正实施“防卫强化计划”，通过地下化指挥中枢系统提升核生化防护能力，并计划引进400枚美制战斧Block IV型巡航导弹。

针对台海潜在冲突的应对预案显示，日本政府拟将距台最近的宫古、石垣、与那国三岛约12万居民转移至本土，但冲绳本岛130万人口仅能采取室内避难措施。东京市中心的地铁系统正在进行抗爆掩体改造工程。

当前动向表明日本正逐步向准战时体制转型。但伴随而来的反战浪潮正在全国蔓延，由“不再有冲绳战争·生命宝贵会”牵头的民间组织正协同各地反战团体，组建全国性反战协作体系。与二战时期不同，作为主权主体的日本国民正在构建制度性制约机制，防止政府决策突破和平宪法框架。

3.3.6 不要再有冲绳战 不要再有中日战争

· 发言人：新垣邦雄

· 年份：2025

我想从冲绳的立场出发，呼吁“不要再有冲绳战争，不要再有中日战争”。我出生在设有美军基地的冲绳·胡差市。这里正式 1970 年，在美军占领时期，市民反抗美军、焚烧了约 100 辆美军车辆的“胡差暴动”发生之地。

每天早上 7 点半，嘉手纳基地都会“哒哒哒”响起集合号；到了晚上 10 点，又会传来熄灯号。我曾向嘉手纳基地询问，这样的号角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基地方面告诉我，这支号声自 1945 年 4 月 1 日美军为发动冲绳战而登陆冲绳岛、并开始修建嘉手纳基地以来一直持续播放。在冲绳的美军基地里，高高悬挂着巨大的星条旗和日本国旗，这正是冲绳处于美军支配之下、以及日美安保体制的象征。



图表 1 在美军基地同时升起星条旗和日章旗的照片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执行对华遏制战略，在菲律宾、韩国和冲绳设立基地，其中，拥有嘉手纳和普天间基地的冲绳成为美军的“要石（Keystone）”，并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成为美军出击与后勤的重要基地。1968 年，美军曾在冲绳部署多达 1287 枚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美军曾认真考虑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在 1958 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军也曾从冲绳出发，认真研究对中国福建省进行核打击的可能性。这些内容都记载在五角大楼文件中，并在三四年前由共同通信社进行报道。

1960 年代，冲绳有四处 Mace B 地对地核导弹基地，据 NHK 记者在《冲绳与核》一书中记述，这些导弹“瞄准的是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中国主要工业城市”。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冲绳读谷村的 Mace B 地对地核导弹基地曾接到四枚导弹的发射命令。然而，读谷基地方面认为，“将导弹发射向与古巴问题无关的中国是不合理的”，因此一度犹豫不决。随后又接到通知称，“发射命令系误发”，最终并未实施导弹发射。这一事件也曾被媒体报道。1972 年，美国将冲绳行政权交

还日本，但当时的佐藤荣作首相与尼克松总统达成了“核密约”，约定“紧急情况下可以再次在冲绳部署核武器，并维持核储存库”，至今也仍在延续。



图表 2 曾设在冲绳的 Mace B 型地对地核导弹基地照片

我们一直在呼吁“不要再有冲绳战争，不要再有中日战争”，这两者在我看来同样重要。2023 年 8 月 15 日终战纪念日当天，《琉球新报》刊登的一篇名为《开战日》的专栏指出：“日本的‘开战日’并非 1941 年 12 月的日美开战，而是 1931 年的满洲事变爆发之日。”也就是说，发生在中国的柳条湖事变才是战争真正的开始。文章中写道：“不要再有冲绳战，不要再有中日战争，二者是同义语。”并强调：“我们绝不能再发动战争。”



图表 3 《琉球新报》专栏的文章资料

然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的部分政治人物，例如高市首相、安倍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却不断发表诸如“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即日本存立危机事态”等极不负责任的言论。

我们今年邀请了来自中国重庆、成都的朋友来到冲绳，举办了研讨会等活动。就在今天，中国的朋友们仍然留在冲绳。他们在当地举办了重庆、成都大轰炸的图片展和影像放映会，以及受害者证言集会。我还亲自带领来自重庆、成都的朋友参观了

冲绳的自卫队基地。在那里，我们开展了抗议行动，呼吁：“不要把导弹对准中国”，“日本政府必须承认重庆、成都轰炸、细菌战等一切对中国的战争加害事实，进行赔偿并正式道歉”。我们将抗议声明递交给了自卫队基地。

反对对华战争准备的行动，并非只存在于冲绳。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月在京都举行的、反对建设导弹弹药库的“冲绳-西日本网络”集会。日本各地有大量市民，正在反对针对中国的战争准备。



图表 4 反对建设导弹弹药库的集会（10月18日 京都）

美国前总统拜登曾多次表示“将介入台湾有事”。而美国前国防副次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则出版了一本名为《亚洲第一》（Asia First）的著作。在书中，科尔比写道：“美国的国家目标，是维护并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他指出：“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生产力最高的是东亚地区。20世纪80年代，亚洲仅占全球GDP的15%，如今已接近40%。”他明确指出：“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并写道：“如果中国开始主导亚洲的GDP，就等同于主导全球经济，这将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他点名日本及其他同盟国，以及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号召组成对抗中国经济霸权的“反霸权联盟”。由此可见，科尔比以及美国真正关心的，是经济问题——“维持世界经济第一的地位”，这才是美国的真实意图。

这本书中令人震惊的是，科尔比写道：“如果发生中国攻击台湾的事态，为了不让半导体巨头TSMC落入中国之手，就必须将其摧毁。”他还写道：“这种想法，正在美国安全保障相关人士中逐渐成为普遍观点。”并声称：“这就是美国的想法。”这是极其荒谬的。也就是说，美国所高举的“守护台湾民主”的正义旗帜，不过是一副虚伪的面具。美国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军事力量维护其经济霸权”。



图表 5 美国前国防副次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著作《亚洲第一》的封面照片

在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日本的安保法制使自卫队可能参与美国的战争，同时还涉及中国的国家承认问题。然而，中日两国政府早已在共同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中确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冲绳的一场讲演中，前《朝日新闻》记者田冈俊次指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国内问题，若日美介入，将构成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

然而，与此相反，自卫队前西部方面总监、即陆上自卫队负责冲绳与九州的最高指挥官小川清史却主张：“一旦台湾遭到（中国的）武力攻击，日本应立即将台湾视为‘国家’，并建立官方协作体制”，“台湾与日本西南地区一旦遭受攻击，将构成同一战区”。他甚至在注释中提出：“有必要考虑退出《日中共同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最近还有报道称，在台湾举行日美防务相关人士会议中，美方表示将“承认台湾为国家”，日方则表示“考虑退出日中共同声明及友好条约”。这一内容据称由台湾媒体进行了报道。如果废弃日中条约，意味着倒退回日中战争，日本与中国将再次走向战争。这种危险的思想，包括高市首相近期的相关言论在内，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

冲绳方面的主张如下：

冲绳是有人居住的岛屿，而不是无人岛。

我们拒绝冲绳被用于中国台湾地区、朝鲜半岛有事等一切战争，并成为战场。反对以台湾有事为前提的日美军事强化，要求美军与自卫队携带鱼鹰机和导弹离开冲绳。

② 亚洲绝不能再次爆发战争。

日本政府应停止煽动“中国威胁论”，中止挑衅中国的军事强化与军事演习，通过裁军与国际对话解决问题。

③ 反对驻日在冲绳美军介入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相关问题。

冲绳县民反对包括朝鲜半岛有事在内，美军从驻日、驻冲绳基地出击。我也曾在报纸的言论版上发表过相关主张。

- ④ 反对日本政府与自卫队介入“台湾有事”。
- ⑤ 关于两岸问题，应尊重“和平统一是中国核心利益”的立场，避免进入武力冲突。

坚决避免台湾有事陷入武力冲突，呼吁通过“长期对话实现和平解决”。

最后，我认为，美国在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等“美国优先”的独断路线下，早晚会走向国际孤立，并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相对地，中国若坚持否定军事与经济霸权主义，贯彻睦邻外交，将会扩大国际社会的支持。在两岸问题方面，希望中国政府以维持现状为基础，通过“长期对话实现和平解决”，保持冷静应对。

3.4 历史正义、和平统一与东亚反帝连带

3.4.1 全球反共体系下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

- 发言人：蓝博洲
- 年份：2025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展开了20年的武装抗日，20年代开始又展开了长达10年的文化抗日。到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略中国开始，所有的文化抗日团体也被全面整肃。台湾进入了一个历史的黑暗时期，一直要到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台湾民众看到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希望。

据估计一直到抗战胜利，大概有五万名台湾民众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战。台湾民众的反殖民斗争从此也摆脱孤立无援的状态，而纳入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可是因为战后复原的困难，在种种的矛盾之下，1947年2月，台湾民众爆发了要求民主自治的人民起义。起义被镇压以后，极少部分的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产生了危机。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在香港搞了所谓的“台湾托管运动”。可是绝大部分的台湾青年、台湾民众在认识到整个中国全局的一个政治状态以后，他们的认同从国民党的“白色祖国”的认同，转而红色共产党的“红色祖国”的认同。

因此，绝大多数的台湾青年投入了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的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迎接1950年的台湾解放。但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的解放变成不可能，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实现。同时，流亡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以“反共”的名义，展开了整肃所谓“匪谍”的50年代白色恐怖。日据以来，台湾进步的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全面地清洗。因为两岸的长期隔绝、对立，再加上蒋介石政权在台湾所展开的亲美的、反共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整个台湾社会进入失去历史记忆而全面亲美的病态。

1987年，实施长达38年的反共戒严令解除。随着两岸、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的“台独派”势力也在前面所有对历史遗忘的基础上，展开另外一个对台湾民众错误历史引导的发展。一直到1992年李登辉政权上台，搞“两国论”以来，一直到今天，整个台湾社会走向跟日据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完全相反的反共、反中的一个状态。

这个局面，这个现实的发展，它的关键就是源于50年代美国全球反共战略利益考虑下的东亚反共战略的布局。由于美国炮制的所谓《旧金山合约》，以及蒋介石和日本签订的所谓《中日合约》，而有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台湾的“分离主义”势力就根据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展开了他们的各种“台独史观”的宣传建构。所有这一些问题的关键都是因为1950年的事件改变了整个台湾历史进程的轨道和方向。

这些问题长期在台湾社会被压制、掩埋而不得认识。一直到就在几天前，台湾新上任的国民党主席，到 50 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的刑场，做出向当年牺牲的烈士致敬的行动，进而引爆了整个台湾社会隐藏多年的矛盾。国民党的保守势力认为，在 50 年代被枪毙的这些人都是“该杀的共匪”，所以他们的新主席的这个行动是一种投降的行为。而长期扭曲 50 年代的历史、扭曲这些烈士的政治认同的民进党，他们继续给国民党的主席扣上了“红帽子”，说她这是亲共的表现。因此整个台湾社会陷入一个更大的错乱。

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当年的历史事实是什么？那些在刑场牺牲的烈士，即便是大陆连续剧《沉默的荣耀》所宣导的，以吴石为代表的所谓背叛国民党党国的人，我们也要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背叛了他的党国。

另外我们也要问，更多的牺牲的台湾爱国青年，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到过祖国大陆，为什么他们的认同是从国民党走到共产党？如果共产党确实是万恶不赦的“共匪”，我们台湾民众也要自己去思考，并问台湾社会，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从国民党变成一个“万恶不赦的共匪”。

所有这些问题，它的关键就是要回到 1950 年 6 月 25 号朝鲜战争的爆发，三天以后美国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造成两岸长期分隔对立的这种不幸局面。台湾民众这样的历史命运，其实也是二战以后全世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悲剧。

我想，现在的国际形势，现在的台湾面临的局面，恰恰要让我们从最根本的历史问题去重新还原历史的真相，帮助大多数无知的民众去认识历史，从而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3.4.2 台海和平与两岸统一的历史正义

- 发言人：吴荣元
- 年份：2024

论坛的朋友，大家下午好！

从早上到现在，聆听各位朋友先进的报告，我深刻体会全球南方的新浪潮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改变西方长期主导的世界格局的新浪潮。我深受鼓舞。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目前世界共同关切的台海和平跟东亚和平。

我们认为台海和平跟东亚和平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的支配。我们也知道，从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几乎就是在美国的支配霸权之下。

美国为了继续维持霸权，把中国的快速发展当成了首要的打击对象。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上，即 2018 年，对中国展开了关税战、经济战、科技战，并且加速推动在东亚的军事同盟，逼使同盟国扩大军备，建立亚洲版的小北约，用来围堵打压中国。这就是造成现在东亚军事紧张的最主要原因。在美国围堵打压中国战略下，由亲美反共的台湾分裂势力掌权的台湾，也就成为美国利用的最佳工具。这也是当前台海危机的另外一个根源。

关于台湾问题，我们回顾历史，1895 年日本对外武力扩张，发动战争，当年的满清中国战败，被迫将中国的台湾割让给日本，殖民 50 年。直到 1931 年起，中国经过 14 年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把日本打败。通过当年共同的同盟国——包括现在的美国、英国——发起的开罗声明、波茨坦宣言，共同同意日本战败以后，日本侵略和殖民的中国台湾要归还给中国。1945 年日本投降，当然根据开罗声明跟波茨坦宣言，台湾就回归了中国的领土版图。这就是一个历史事实。

虽然中国在 1949 年内战之后，两岸分隔对峙，形成当前中国没有统一的两岸分隔对峙的局面，但这并不影响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自 1949 年起，新中国成立之后，全世界跟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一定要签署的建交公报，都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从 1949 年新中国政府成立之后，全世界在联合国宪章之下，规范的台湾的地位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这也意味着美国利用台湾作为围堵打压中国的前哨基地并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是明显的介入中国的内政，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不得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相关的规则。美国现在最常用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规则就是联合国国际法，国际法不准干涉国际其他国家内政。这是美国当年定下来的联合国宪章。因此，美国明显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这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近两年，中国为了展现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跟坚强的决心，对台湾进行几次环岛军事演习，都是因为这几年美国积极介入两岸问题，支持民进党搞分离主义的挑衅。军事演习的内容就是如何阻止美日军事介入，震慑美国霸权的介入和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投机取巧跟挑衅。

目前两岸因为内战的遗留问题，未能实现完全的统一，但只要排除美国以及美国支持的其他美国盟友的介入，我们相信两岸的中国人必定能够通过和平对话实现完全的统一，对促进东亚和平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上，除了排除美国

同盟的介入之外，台湾作为两岸统一的主体之一，内部的情势以及人民内部的人民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1949年之后，台湾在美国主导的反共冷战体制下，沦为美国的新殖民地。近年来，又因为台湾的分离主义势力主导了政局，不断煽动台湾同胞的反共反中情结，修恶所谓的“国家安全法”，控制媒体，恶意阻碍两岸人民的交流，扭曲历史、罗织罪名，打压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人士，对台湾人民进行恐怖统治。并且大肆扩张军备，延长征兵期限。要强化“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积极为战争做准备。现在台湾当局的领导人还高唱“唯有战备，才能避战”，强调绝对不签署和平协议。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想要依靠美国大搞军事对抗，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行径，不但违背了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意愿，更造成了两岸以及区域的紧张。

台湾分离势力以反共意识捏造一个“外部敌人”方便对内统治。人民大众的不满不是被忽视就是轻易地被污蔑为敌人或者所谓“遭受敌人的渗透”而遭到打压。军事费用快速增加，排挤了台湾社会福利预算，加深人民的生活痛苦，也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败等问题虽然蔓延，但他们只要打出反对中国、抗拒统一的口号，往往能就作为吸引选票的选举伎俩。

不过，我们对于和平统一是乐观的，我们台湾同胞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祖国大陆对台湾和平统一的真诚的政策，是更加强力的一种号召。两岸一家亲就是中国对台和平统一的思想理念指导。再困难，坚持和平统一的政策全部不改变。这几年台独势力在台湾勾结外国势力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但是中国坚持和平统一的政策方针一直没有改变，就是因为把台湾人民当作同胞。

最近几年，美国猖狂地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压，要求台湾成为美国打代理人战争的火药库，让台湾社会也深刻感受到了美国的狰狞面目，要台湾作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从俄乌战争到巴以战争，台湾社会看到了美国这种用心，它是台湾人民的公敌。

现场有我们来自日本琉球的朋友，来自韩国的朋友，跟我们在东亚反战反基地运动这样的一个连线，这是东亚地区人民为了反对美国在台海、在东亚地区制造战争这样的一个共同敌人团结起来。

尽管美国捏造中国威胁论，来作为美国与其同盟加强军事同盟、扩张军备以围堵压制中国的借口，但各国反帝反战的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外交力量的提升都用于维护世界和平、排解纠纷，而不是制造冲突。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于创造世界的共同繁荣。全世界最大的推动世界贸易的力量就是中国，而不是像美国、西方到处发动战争，发战争财。

中国的发展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所以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合作、共同安全——这样的倡议。因为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是要世界共同发展，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中国发展。

我们追求和平，更追求两岸的和平统一。两岸的和平统一是台湾跟大陆同胞共同的历史使命，也是克服过去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介入的屈辱历史的一个深刻的反省。我们有能力实现和平统一，道路虽然艰难崎岖，但是这是两岸同胞民心所向，符合历史正义与人民福祉。两岸和平一定能够实现，世界和平也一定能够实现。谢谢各位！

3.4.3 台湾问题的两个“掏空”与反帝斗争传统

· 发言人：季平

· 年份：2024

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使我们得以在此拓展视野、聆听多元观点、增进学术交流，对此深表感谢。本场会议聚焦新冷战态势、台海格局与东北亚安全形势。

在梳理各位发言内容后，我有了三点思考：第一，与会者在历史记忆、发展诉求、价值取向和学术范式方面高度契合。大家对区域局势的研判和问题本质的揭示，既准确又具有一致性，其学术洞见令人敬佩。

第二，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地缘政治风险正在持续累积。日本当前的政策走向表明区域矛盾正在多维度显现，潜在的军事冲突风险亟需高度警惕。与会发言对区域矛盾深层诱因的学理剖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三，与会专家对台湾问题的历史脉络与法理实质已形成明确共识。尤其是那位曾在岛内战斗过的主席，他的发言令人深受触动，在此向他致以崇高敬意。

在今天的研讨中，我在选题过程中产生了深刻体悟，并要特别感谢台湾地区的进步先驱。四十年前，林书扬、陈明忠、陈映真等社会组织成员和左翼团体代表，积极推动东亚进步力量围绕社会变革展开联合行动，促进区域合作。他们的著作对此都有详尽记录，深刻揭示了反帝斗争的本质。这些主张获得东亚地区进步组织的广泛认同，他们也被誉为卓越的实践家和理论家。这些历史评价不仅是对先驱者的崇高致敬，也为后续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台湾左翼力量在这一领域的斗争与联络仍在持续并不断加强，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台海问题，正如学界前辈所强调，其本质上属于中国内政。但由于长期受到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干预与渗透，局势日益复杂化。当前台海局势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这两个现象都可以用“掏空”概念来解释。第一，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正在掏空既有政治体制。按照其政治逻辑，“台独”势力已不再需要正式宣布独立，而是借用“一国两制”的外壳进行政治包装，以掩饰分裂行径，同时加剧两岸对立并提高冲突风险，这一动向值得高度警惕。第二，美国政府正系统性地掏空一个中国原则。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明确规定美方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尽管近年来美方仍口头重申“三不”承诺（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以国家名义加入国际组织），但其实践已严重背离承诺。具体表现为：第一，美台官方互动层级持续突破，严重违背1979年建交时的政治共识；第二，美方通过立法手段干预其他主权国家与台湾的关系，并在国际场合以“非政治名义”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第三，在军事领域，美方向台湾的军售规模不断扩大，所提供的武器装备进攻性特征显著升级，涵盖先进战机、导弹等作战系统；第四，美方以产业政策为手段，将台湾绑定在美国的产业链中，典型案例是要求台积电等关键企业赴美投资建厂。这些现象印证了吴荣元、陈映真、林书扬等学者对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台湾正呈现出依附性的社会特征，虽未通过法律让渡成为传统殖民地，但在政治架构、经济模式和文化认同方面均显现出明显的从属关系。

当前台湾问题的本质已十分明晰。解决台湾问题，一方面要依靠我们自身的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也需要朋友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坚信，这一问题终将得到妥善解决，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愿景必将全面实现。

3.4.4 反「台独」、反介入运动与东亚反帝反战运动

· 发言人：臧汝兴

· 年份：2025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特别安排了这场东亚的交流会。去年的这场交流会，就带来了非常有意义的成果。我们知道日本最近在加速扩张军备，尤其是在其西南诸岛的宫古岛、石垣岛、大分等地，正在兴建对准中国大陆的飞弹基地及弹药库。日本的借口是“中国威胁论”。因此，日本、琉球的反战运动的朋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抗日本政府的“中国威胁论”。也因此，他们能够到中国大陆来，直接听听大陆的朋友们对他们的说法，把他们听到的说法，带回去，非常重要。另外，他们也非常希望与中国大陆这边建立对话的管道，至少从民间做起，用对话取代对抗。因此，去年交流会之后，琉球的朋友以开记者会、在报纸上写专文的方面，发展了交流会的成果。日本“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共同行动”的朋友，以举办巡回报告会的方式，报告了交流会的成果。另外，他们还制作了参加全球南方论坛的报告集在现场贩卖。吕新雨老师、林哲元老师，还有我，都为这本报告集撰写了文章。他们很高兴地告诉我，这些小册子全都卖光了。

我们在台湾的反“台独”、反介入运动，主要是指美日帝国的介入，本质上也是反帝运动。若将其放大到东亚范围来看，就可以发现在日本、琉球、韩国都有我们的同志。我们共同斗争的对象是美帝，反对的也是同一件事情，即美国在东亚围堵中国的军事部署。当然，这并非近几年才有的事，从二战结束、冷战开始以来，就已是如此。但，自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贸易战之后，也开始向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施压，要求扩大军备，不但升高了军事紧张，也对地区居民的民主福祉造成很大的危害。这点我们深有所感。这种“有感”不同于一般对情势或理论的认识，它是一种急迫感，是运动得以大众化的环境。这样的急迫感，也使得台湾地区、日本、琉球、韩国的民间反帝运动，产生了必须加强连带的需要。

非但如此，由于台湾地区处于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最前线，这几年我们开始受到世界各地左翼与进步团体的关注，他们主动和我们联系，希望了解台湾的左翼的立场，这对他们完整理解两岸问题，非常重要。

日本、琉球的朋友，在反对日本军事扩张上，必须反对日本政府的“中国威胁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论。他们希望听到台湾也反对此论调的声音。否则，日本主流媒体把台湾塑造成非常认同“中国威胁论”，并且非常欢迎日本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论。

当我们开始尝试向海外发表立场时，才发现相较于“台独”势力，我们做得还很少。除了美国利用其全球话语权，制造了各种反中言论之外，“台独”本身也很积极在日本、韩国出版推销“台独”的书籍，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扭曲的台湾历史之上的。

“台独”势力也积极的在亚洲各国进行民间交流，企图扩大其所谓的国际舆论。

除了美国之外，“台独”派最重视的就是日本。2018年，“台独”派还在琉球的和平公园，建立由蔡英文署名“台湾之塔”，并且每年到琉球举办追悼琉球战役中死亡的台湾人的活动。企图以扭曲的“和平”概念，来与琉球的反战运动建立连结。

不过，“台独”派的极右派立场，先天上，就无法与琉球的进步运动连接。举例来说，“台独”派在琉球建立的“台湾之塔”的背面这样写着：“为悼念二次大战中献身沙场的台湾战士，当年日台战士皆为同胞、生死与共、荣辱同当”。这种极右的历史认识与日本、琉球的左翼、进步运动理念，完全相悖。

此外，在最根本的反基地问题上，“台独”派是支持美军基地的。因此，他们在此问题上，只能含糊以对。

我们所面临的局势，使我们的反帝连带运动进入一个新的转换点。我们需要更努力地对外说明台湾左翼对两岸问题以及对统一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当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民进党对内、对外把自己塑造成进步政党的形象，尤其是对外。因为，我们都知道民进党是一个亲美、极右、反民族的政党，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忽略了（民进党在国际上塑造形象）这一点。

更荒谬的是，很多国家的右派，都了解民进党的极右性格，偏偏那些国家的左翼势力却都误以为民进党是进步政党或相当进步。韩国、日本的进步势力误把民进党当进步，就会严重影响他们对两岸问题以及统一问题的看法。有时候，我会跟日本、韩国的朋友开玩笑，嘲弄他们，说他们的左派不如右派，看不清问题。韩国的尹锡悦在竞选前就寻求民进党的支持，因为他了解民进党；日本的安倍晋三生前视赖清德为挚友，因为他也了解民进党。

总之，我想强调的是，东亚的反帝运动的共同斗争非常重要，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努力。这些朋友，也是在我们的两岸统一运动中的盟友。

3.4.5 东北亚和平、"台湾有事论"与日美军事同盟

- 发言人：迫田英文
- 年份：2024

在正式阐述议题前，我会补充一些相关历史背景。自 1868 年明治维新至 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实施了系统性侵略与殖民统治。从 1895 年《马关条约》后非法占据台湾，至 1931 年后长达 14 年的全面侵华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实施殖民统治。其间推行的"慰安妇"制度、强制劳工征用等反人类罪行，严重侵害了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与民族尊严。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迄今未在法律和道义层面履行应有义务，就战争责任问题作出彻底清算。这种对战争责任的回避直接导致东亚地区历史和解进程受阻。作为日本公民，本人对此深表遗憾并向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歉意。

关于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与朝鲜半岛局势的立场，必须明确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涉。日本政府有义务严格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方应当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推动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持久和平。

日本政府长期渲染所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导弹及核威胁"，并将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军事行动表述为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其中以安倍晋三与麻生太郎提出的所谓"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主张最为典型。在《美日安保条约》及"印太战略"框架下，日本自 2015 年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内阁决议后，加速推进自卫队在朝鲜半岛、台海及南海地区的军事介入准备。2017 年底前其渲染焦点集中于朝鲜"威胁"，2018 年后则逐步转向"台海突发事态"论调。

当前区域安全态势呈现多边军事协作加强的特征。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澳印四国形成"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则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同时致力于在东南亚地区拓展军事协作网络。这些动作旨在构建亚太地区的多层次军事联盟体系，其战略目标直指中国与朝鲜。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此类军事布局中持续发挥着关键支点作用。

日本自卫队近年来持续推进军事改革，重点强化远程打击能力与快速反应部队建设。通过与美军实施联合演训、共享军事基地、推进装备技术合作等手段，其军事部署已形成涵盖情报监测、后勤保障、联合作战等多维度的实战化体系。这些举措引发国际社会对地区军事化升级的担忧。

日本自卫队通过参与美日韩联合军演、美日菲联合军演及"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多边军事演习，加速推进军事能力向实战化转型。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正着力实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构成的安保政策体系，明确提出"为实施有效威慑，需具备打击敌方军事据点的战略能力"，并制定五年内将防卫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 2% 的扩军计划。

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日本正从防御性军备向进攻性武器系统转型，重点采购射程超过 1000 公里的远程打击导弹、对地攻击无人机等战略级武器。根据防卫省规划，

相关武器部署重点区域涵盖琉球群岛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等邻近中国海域的离岛区域。

日本国内反战力量持续发展，典型表现为冲绳宫古岛、石垣岛等地居民发起抵制自卫队军事化建设及导弹部署的抗议活动。多个社会组织正通过系统性行动反对军事扩张政策，其中"阻止战争千人委员会"等民间团体联合开展反对美军基地扩建、抵制防卫预算膨胀及修宪的民众运动。

这些反战组织指出，日本政府刻意渲染"台海危机论"与"半岛安全威胁论"，实质是为军事能力突破及宪法第九条修改创造合法性依据。其行动目标在于提升国民对军事化政策潜在风险的认知，凝聚维护和平的社会共识。

我们确信，通过中日两国政府与人民的持续合作，将有效防止军事冲突，共同维护东亚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

3.5 去殖民化未竟与东亚战争危机

3.5.1 去殖民化、朝鲜战争终止与东北亚和平

- 发言人：金东椿
- 年份：2025

1. 去殖民化、冷战、分裂与朝鲜战争

今年是日本战败 80 周年。然而对韩国而言，日本的战败并不意味着建立统一主权国家。朝鲜半岛的分裂和悲剧性战争随之而来。朝鲜战争意味着去殖民化的失败，即统一主权国家建立的挫折，以及超越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和非人化的悲剧降临到南北朝鲜所有人民身上。

朝鲜战争虽然发生在二战结束后仅仅 5 年这一短暂停时间之后，但却是与二战性质完全不同的国际战争。如果说二战是联合国即苏联和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同时具有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性质，那么朝鲜战争从发动战争的北朝鲜方面来看，具有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殖民斗争性质，但同时随着东西冷战激化，美苏对立的层面也叠加在一起，成为一场复合性质的战争。它从内战开始演变为国际战争。

政治学者们将这场战争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功能性替代物 (functional substitute)" 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变形形态"。同时，这场战争也部分具有后来连接到越南战争的反殖民斗争性质，以及揭开第三世界"低强度战争 (low-intensity warfare)" 序幕的性质。

1990 年代以后公开的苏联资料证实，1950 年 6 月 25 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朝鲜的金日成和朴宪永武力统一论的结果，但这是在斯大林对金日成支援请求的许可，以及中国毛泽东的积极后援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的。

美国将朝鲜的侵略视为"警察行动" (police action) 并立即介入。当时杜鲁门总统将这场战争视为"自由"与"共产奴隶"的斗争，将共产主义恶魔化。然而，美国介入这场战争最重要和实质性的目的在于"保卫日本"。因为美国担心如果放任朝鲜的侵略，全世界将出现反美多米诺现象。美国参战理由——多米诺理论的起点不是越南战争，而是朝鲜战争。

归根结底，朝鲜战争源于日本战败前后的战后处理，即去殖民化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美苏的分割占领发展为南韩内部的内战，再发展为南北韩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使得南北韩两个体制更加僵化和固化，韩国的去殖民化课题遭到挫折或延迟。

2. 东亚历史与屠杀的序列 (Sequence)

朝鲜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当然是南北韩朝鲜人民。约 300 万以上的南北朝鲜平民和军人死亡，数十万中国军人和数万美军死亡。尤其这场战争是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战争。

我们必须在东亚屠杀的历史脉络中把握这场战争。日本在东亚实施屠杀的开端始于 19 世纪末在朝鲜发生的东学农民军镇压作战。这场屠杀连接到 1919 年三一运动的

屠杀、在满洲对朝鲜人独立根据地的屠杀，以及南京大屠杀。朝鲜战争中的屠杀正是位于这一"序列 (Sequence)"之中，此后连接到越南战争和印度尼西亚屠杀事件。前面提到的 731 部队生体实验等日本在朝鲜和邻近亚洲国家留下的殖民政策和暴力遗产，以朝鲜战争为契机，在未能得到妥善清算的情况下被含糊带过。

3. 停战之后：战争的受益者们与固化的分裂

1953 年停战使战争得以缝合，但其影响导致南北韩维持战争状态已超过 70 年，接近 80 年。

日本的复兴：

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日本。美国在战争期间与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和约"。这一过程最终成为日本重返国际秩序并加入美国伙伴行列的契机。因此，日本殖民统治责任问题后来被转移为韩日之间的外交问题或被含糊处理，日本通过朝鲜战争特需恢复了二战的损失，短期内崛起为经济大国。所谓"55 年体制"也从韩国战争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力量。

中国的崛起：

中国也是受益者。1949 年革命后不到一年就参战，与世界最强的美国对抗，提高了国际地位。这成为 1955 年中国主导不结盟会议、崛起为第三世界主导国家的重要契机。

美国霸权的强化：

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战争前夕虽有麦卡锡主义狂潮，但以战争为契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得以正式确立，美国国内右翼反共主义体制得到强化。此外，如果没有战争，台湾很可能在没有美国第七舰队介入的情况下被中国统一。结果，这场战争强化了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冷战体制本身。

4. 当前的东亚秩序与和平危机

必须重新思考朝鲜战争终战的性质和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 2019 年河内会谈等与金正恩的会谈，以废除北朝鲜核设施为条件，稍微表现出朝鲜战争终战宣言的意愿，但后来被内部强硬派压制导致会谈破裂，暴露出美国并不真正希望朝鲜半岛和平。

特朗普前总统最近在 APEC 期间访问韩国，向金正恩发出会面信号等表现出关注。然而，北韩对此没有反应。特朗普的这种行为与其说是美国真正的和平意志，不如说与特朗普个人的英雄心理或孤立主义倾向关系更深。

当前威胁东亚和平体制的核心因素是朝鲜半岛的分裂和战争状态。这不仅仅是军备竞赛，而是直接关系到韩国、日本、台湾地区等东亚多国和社会内部的社会公平崩溃、福利缩减、贫困、失业问题。反共主义体制的长期持续正在压迫国内人民的生活。这是我们在处理全球南方问题时应该与各国内部矛盾联系起来看的要点。

此外，中国的崛起也给韩国人带来一种历史性恐惧。由于过去 500-1000 年间与中国建立的事大关系的记忆，韩国在美中之间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5. 结语：向正常国家的过渡

东亚的韩国、台湾、北韩，甚至日本，在二战后仍未完全确立为"正常国家"。它们具有某种"缺损国家"的性质，可以说仍处于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过程中。

然而，冷战体制已经转向新自由主义体制。现在"正常国家"的建立不再是单纯建立 19 世纪式的主权国家，而是摆脱将 20 世纪东亚推入悲剧的帝国主义和反共主义桎梏。

如果南北朝鲜过渡到和平体制，成为美中之间的缓冲地带，这不仅对朝鲜半岛，对东亚和平也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终结朝鲜战争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地区和平，而是与改变全球秩序的问题相连。

在 21 世纪的背景下，是时候重新思考去殖民化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

3.5.2 东亚战争危机与反帝战线的构建

· 发言人：金大峰

· 年份：2024

当前，全球局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某些国际军事集团，正将通过代理人战争模式，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从东欧经西亚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延伸。在东欧，乌克兰的新民族主义势力试图攻击俄罗斯本土并破坏库尔斯克核电站，企图使地区冲突升级。作为回应，美-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支持，并准备解除导弹限制措施，而俄罗斯则警告将解除战术核武器限制。在中东，以色列的力量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并射杀哈马斯及真主党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最终引发了伊朗在10月发动的“真实承诺2”军事行动。

帝国主义阵营正试图通过东亚与西太平洋的冲突，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化，并推行“新冷战”战略。2024年7月，北约太平洋化”在北约华盛顿峰会上得以落实，并于同年6月至8月通过北约成员国与西太平洋亲美国家在太平洋上进行的多次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完成了实战部署。历史经验表明，北约东扩曾直接引发2022年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而当前太平洋方向的战略扩张同样潜藏重大安全风险。该阵营正在构建一系列军事联盟，包括美日韩的“东北亚版北约”、美日菲澳的“S-QUAD”（美日菲澳四边安全对话）以及美英澳的“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些军事集团企图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推向前线，使其成为东亚和西太平洋冲突的突击力量。美国与日本已决定在2025年初建立驻日美军联合司令部与“自卫队”陆海空联合作战司令部，实现事实上的“一体化”。此外，美国计划将夏威夷印太司令部对驻日美军的作战指挥权移交给新成立的驻日美军联合司令部。这一举措旨在将战争局限于东亚与西太平洋地区，类似于乌克兰与中东地区的冲突。美国通过加强与韩国尹锡悦政府及菲律宾马科斯政府的军事协作，同时推动日本参与“东北亚版北约”、“S-QUAD”及“AUKUS”第二支柱计划，逐步构建区域性多边安全架构。

“东北亚版北约”的形成及其军事部署显示出东北亚地区战争危机的严重性。该联盟在2023年8月的美日韩戴维营宣言中达成北约式“集体防御原则”协议后形成。随后，2023年12月朝鲜导弹实时预警信息共享体系启动，2024年6月，名为“自由之刃”的北约式多领域联合军事演习使其具备了实战能力。2024年11月13日至15日的“自由之刃2”演习则进一步表明东北亚战争已迫在眉睫。2024年4月，美国、日本、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在南海实施代号为“海洋合作活动”联合军事演习。在随后举行的美日菲华盛顿首脑峰会上，四国正式建立战略协调机制，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日本冲绳、台湾地区与菲律宾群岛之间的战略联动体系，以阻止中国进入太平洋地区。日本与菲律宾在同年7月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RAA），并在8月于南海进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2024年10月15日，四国与英国、法国共同举行了大规模海军陆战队联合演习，使该机制具备了实战能力。从2024年1月至10月，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已多达130余次。其中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7月30日至8月1日的“铁狼牙棒”联合军事演习，其内容包含了对朝鲜的“先发制人打击”。此外，美国还计划在日本部署多领域特遣队（MDTF），该

部队由地面作战、导弹、电子战和无人机部队等组成，而“台风”发射连和高超音速导弹营均隶属于该部队。

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冲突的导火索多种多样，其中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韩国尹锡悦政府的“战争戒严”和“亲信政变”阴谋。尹锡悦政府已重新启用在2016年底因制定“戒严令文件”而被解散的军事组织，并将其私人团体“忠岩派”的成员安插至与戒严相关的关键职位。2024年10月，他们通过针对朝鲜的无人机渗透、重武器射击和多管火箭发射演习挑起局部冲突。与此同时，在韩国国内，他们掀起了镇压反尹锡悦民意的浪潮，企图推行“战争戒严”。面对个位数的支持率和腐败丑闻，尹锡悦选择以策划“战争戒严”作为回应。2024年8月30日，同时对民众民主党、民主党以及前总统家属住所进行搜查，这被认为是“法西斯压迫的信号”，也是“战争戒严”和“亲信政变”的重要迹象。若韩国与朝鲜发生战争，台湾海峡的冲突也将随之爆发，因此，二者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

在当前国际格局中，反帝国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在道义、力量和战略上存在显著差异。反帝阵营坚持“反法西斯、解放、统一”的原则，这是一种正义的立场。相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借口因其内在的逻辑矛盾而早已破产。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不断削弱。例如，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正在加速其内部的分裂和弱化。与此同时，东欧、西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亲美势力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政治危机，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与民生危机也在不断深化。反观反帝阵营，正逐步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其核心力量包括装备有氢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朝鲜、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导弹强国伊朗。辅助力量则包括“抵抗之弧”、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反战和平力量。

帝国主义阵营以亲美势力作为战争代理人，将冲突局限于远离其本土的特定区域，并通过三个战场的局部战争方式，发动非核混合战争。相比之下，反帝阵营直接参战，在其本土附近进行防御性战争。同时，反帝阵营也展现了有能力在美国本土进行战争的力量。例如，中国在9月25日公开进行了44年来的首次太平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俄罗斯于10月29日进行了战略核演习。朝鲜于10月31日试射了其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炮19”型。这些行动向美国发出了“相互确保摧毁”（MAD）的警告，即朝、中、俄发出的严正警告，要求美国不要干预该地区的局势。

帝国主义阵营的最终战略在于，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反帝阵营的核心力量朝鲜、中国、俄罗斯、伊朗等诬蔑为“新侵略者之轴”，并试图在“新冷战”体系中取得最终胜利，从而摆脱其全面危机。然而，这一战略注定失败。乌克兰持续战败，而以色列在10月26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未能按计划进行，陷入了困境。如果帝国主义阵营在东亚与西太平洋发动战争，必将遭遇失败。

当前，巩固国际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已成为重要战略任务。回溯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东北亚地区，苏中朝三国军民曾协同作战，最终粉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书写了重要历史篇章。值得关注的是，二战时期以法西斯轴心为共同斗争对象形成的国际合作模式，对构建当代国际反霸权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2022年10月成立于巴黎的世界反帝国主义平台，以强化反帝国际斗争、肃清亲帝国主义机会主义思潮、推进进步力量联合运动为三大核心任务，持续开展多区域斗

争实践。2024年10月5日，该平台与台湾地区劳动党组织共同主办“世界大战与反帝力量使命”国际研讨会，系统评估第三次世界大战潜在风险及东亚地缘安全态势，科学论证强化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

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畏惧战争威胁。为有效遏制战争风险、维护地区和平，将采取必要战略耐心并充分运用一切合法手段。若霸权势力执意挑起战争，必将以坚定意志与最大效能迅速终结战事。面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客观演变，国际反帝力量亟需深化战略协同，建立跨区域联合行动机制。简而言之，在竭力阻止战争危机的同时，必须系统构建应对帝国主义军事冒险的全民防御体系与社会动员机制。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仅攸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崇高愿望和正义事业。我们坚信，海峡两岸完全统一必将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得以彻底实现。“世界反帝平台”将高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团结起来的人民不会被打败！”的口号，不断创新和加强东亚及世界人民的反帝战线，为胜利的那一天而奋力斗争。人民的自主事业与解放事业是正义的，其斗争的胜利是科学的。包括亚洲在内的全世界人民为实现自主化、和平、解放和统一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3.5.3 韩国实用主义的局限

- 发言人：宋大韩
- 年份：2025

这次演讲的内容主要是对于韩国左翼和进步运动该如何看待李在明政府的反思。我也希望能帮助大家读懂韩国政治背后的内在逻辑，追溯种种乱象的源头，其核心是韩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从未真正完成——首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然后是从美国占领中解放。我想这些因素对理解东北亚和平与安全局势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不少韩国国内媒体称赞总统李在明的“实用主义”，认为他能够有效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战，成功将韩国的对等税率从 25% 降低到了 15%。李在明政府拿出了一份“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的 MAGSA 提案，并向特朗普赠送了新罗王朝金冠复制品，借以取悦了特朗普，这似乎显示出李在明是一位十分精明的政治家。

但今天，我想指出李在明的实用主义主张从何而来，有哪些局限之处，甚至是蕴含着哪些危险。如今，我们似乎被逼要做出一个两难抉择，要么面对特朗普的关税战，要么退回特朗普之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状态。对此，我想提出另一种倡议，即最近在“反对 APEC 2025 和特朗普的人民峰会”上提出的呼吁——发起一场秉持正义发展和可持续性的全球斗争，坚决反对特朗普的自私自利和具有破坏性的政策。尽管李在明作为政治家的能力或许可圈可点，但他的实用主义并不能解决当下的危机，甚至可能加深了危机的威胁。只有以和平、正义和可持续性为宗旨的进步运动和政党才能为我们指明前进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李在明政府是经过数月的抗议活动，在尹锡悦总统被弹劾之后上台的。世界目睹了韩国人勇敢地走上街头，反对尹锡悦总统的戒严令。然而新闻中并不会提到，八年前朴槿惠总统同样遭到抗议和弹劾，之后为韩国带来的则是消沉与幻灭。韩国的选举制度本质上就是在偏保守的国民力量党和偏进步的共同民主党两党之间选择其一。这种体制在 1987 年形成，由于没有多轮决选，投票给任何第三党都等于是成为了废票。

八年前，朴槿惠下台之后，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政府凭借广泛开展社会改革的主张当选。文在寅总统看似是以一位进步的中间派政治家，但他任职期间种种无能、温吞、失败的改革尝试在韩国民间引起了强烈的对政治的幻灭，这被称为“文在寅创伤”。“烛光革命”和平推翻了腐败的朴槿惠总统，然而下一届政府仍然未能努力创造更加公正和宜居的韩国，民众付出的热情换来的只是又一个失败的五年。这种创伤促成了尹锡悦上台，也塑造了李在明的“温和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

上一届尹锡悦政府痴迷于让韩国成为美国全球安全架构中的“前沿支点”；在这之后，李在明政府则承诺其外交政策将更加平衡，并以韩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然而，正如最近李在明政府与特朗普的协议所揭示的，李在明所谓的实用主义仍然是将韩国锁定在美国的帝国主义轨道上，成为破坏性的新冷战的马前卒。

在最近这份美韩协议中，韩国政府承诺向美国投资 3500 亿美元，这超过了韩国美元储备的 80%。其中 1500 亿美元将投资给美国造船厂，帮助美国扩大海军力量，增强向全球派驻军舰的能力。李在明政府还吹嘘其与美国达成了获取核潜艇的协议，这无疑加剧了半岛地区军备竞赛的压力。不仅如此，美国将会监控其出售的武器和

装备，甚至决定其最终用途。这等于是进一步将韩国军队与美国绑定，而绝不是增强韩军的自主性。此外，剩余的 2000 亿美元投资将把韩国的工业产能（半导体行业为主）嵌入美国经济，增强韩国对美国的结构性依赖。尽管韩国政府将使用公共资金投资韩国公司在美国进行生产和盈利，但这些对于为韩国国内民众创造就业机会或提供福利作用甚微。

归根结底，李在明的实用主义未能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它用左手给出的东西，立刻就会用右手收回去。譬如李在明政府承诺在国内扩大可再生能源，但同时又计划建造高耗能的大规模数据中心，盲目冲击人工智能竞争；李在明政府一边宣称和平是无价的，一边又要把韩国打造成世界第四大武器出口国。

目前，韩国始终无法摆脱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的徒劳反复，而这两党都与企业财团深度勾连，且不愿脱离美韩联盟。人们可能会问，这种民主与政治的僵局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认为答案是，首先，由于美国的干预，韩国未能完成从日本殖民下取得完全的民族解放，与日本人共谋的政客仍然在韩国国内掌权。之后的冷战态势进一步巩固了亲美亲日派在韩国的统治。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中，保守的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金文洙公开支持尹锡悦的戒严令，却仍赢得了 41% 的选票，就是一项例证。冷战格局在韩国的影响便是创造了一个顽固反共、结构性依赖美国的国家，因此韩国政局中其实只存在保守派（国民力量党）和温和的保守派（共同民主党），而没有真正的选择空间。要打破这种僵局，需要更深层次的民主化，正如最近反对戒严令的抗议活动中提出的宪法改革倡议，希望赋予人民向国会提出法律的权利。

我们斗争的目的是摆脱冷战的思维定势、提供能够改善大多数人生活的替代方案、建立能够鼓舞大多数人的社会运动——这不仅是韩国社会运动的任务，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运动组织所面对的道路。我们的目的不能依靠共同民主党去实现，而要通过独立进步政党和运动的斗争。当下韩国社会上反对特朗普的情绪也许能创造一个时机，让我们争取以真正的改革和社会变革运动取代李在明的实用主义。

最近庆州 APEC 2025 领导人峰会期间，韩国左翼和进步运动打响了第一枪。我们召集的抗议活动不仅是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战，也在抗议对公众封闭、仅以跨国公司利益为主导的 APEC 峰会。我们的发声也隐含着对李在明实用主义的批评。

李在明的实用主义无法实现建立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相反，我们需要秉持公正和可持续世界的愿景的全球社会运动。反对特朗普的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起点。所以，作为反对 APEC 2025 和特朗普的国际人民运动的一部分，韩国社会运动和国际人民大会等组织一起呼吁：在 2026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上任一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人民应发起抗议，共同反对特朗普的破坏性行动与政策。

3.6 对抗遗忘:守护国际合作与共同胜利的记忆

3.6.1 反法西斯战争在西方史学中的编撰与捍卫东方战线的必要性

- 发言人: 马修·里德
- 年份: 2025

早上好。我受邀在这里简要谈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西方史学中是如何被呈现的,当今西方历史修正主义为何愈演愈烈,以及东方战线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有何启示。

一、西方叙事

在西方史学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或者按西方的说法叫"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9月1日,即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的那一天。正如今天此前几位发言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选择这个日期起初令人费解,因为在1939年之前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战争行为。例如:

1931年9月日军占领满洲;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法西斯策动政变引发西班牙内战;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1938年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夏日本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西方历史学家如此刻意地边缘化东方战线?为什么这些事件仅仅被归入"大战之前的小规模冲突"这一类别?

当然,欧洲中心主义在这种偏颇认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或西班牙内战不被西方历史学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理解这个问题的线索可以在2019年通过的一项欧洲议会决议中找到,该决议于今年即2025年2月重新确认,题为"欧洲记忆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在这项决议中,我们看到如下表述:

".....1939年8月23日,共产主义苏联和纳粹德国签署名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在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瓜分欧洲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并将其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此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铺平了道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危险的历史修正主义正在发挥作用:苏联被贴上法西斯侵略帮凶的标签,而非被视为其受害者。该决议没有一次自我批判地反思西方列强与法西斯德国之间多年的交好与谈判。欧盟简单地将美国资本在20世纪30年代建设德国重工业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从历史中抹去,也抹去了英国政府在1935年通过单边协议允许纳粹德国大规模扩充海军的事实。苏联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抗议以及他们协助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希特勒侵略的努力仿佛从未发生过。对他们来讲,战争始于1939年,两个"极权主义政权"是罪魁祸首。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西方史学试图掩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真相，并为西方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中的共谋洗白。他们创造出一种叙事，将“西方民主”描绘成 20 世纪“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正是这种历史叙事为西方当今自我宣称的“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线提供了基础。

如果我们拒绝这种叙事，并恰当地将东方战线置于历史语境中，我们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们可以识别出贯穿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条连贯发展脉络，揭示这场战争的真实本质，即帝国主义列强蓄意在它们之间重新瓜分世界。日本和德国——作为殖民扩张的后来者——试图通过奴役东亚和东欧、从帝国主义对手手中夺取殖民地来确保其“阳光下的地盘”。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法国试图保住其殖民地，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法西斯主义作为攻击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走狗。

因此，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非“极权主义政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铺平了道路”。而正是苏联和中国人民——在其共产党的领导下——承担了将世界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最大责任和代价。

二、当今历史修正主义的加剧

这一真相如今在西方正遭受猛烈攻击。在整个东欧，我们看到当地团体在美国资助的媒体煽动下，污损和拆除数百座红军反法西斯纪念碑。与此同时，曾与德国国防军合作的法西斯势力，如乌克兰的班德拉分子，正在被平反为自由战士。欧盟是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核心推动者，因为它资助各种项目来抹黑东欧共产党人的历史性反法西斯斗争。



红军纪念碑
慰安妇受害者纪念碑

让我举几个来自柏林的例子。正如今天上午提到的，柏林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欧洲最后的战场之一。自 2022 年以来，当局一直在 5 月 8 日和 9 日的解放纪念日禁止展示苏联标志。你可以在左边看到德国警察站在一堆报纸上，这是他们在红军士兵集体墓地纪念碑入口处没收的，因为封面上印有那张著名的照片——红军战士在德国议会大厦上插上苏联旗帜。当局在纪念碑前禁止这面旗帜的展示，而北约和乌克兰的旗帜却被允许飘扬。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曾经为慰安妇——被日本帝国强迫充当性奴隶的妇女——设立的纪念碑，它原本位于柏林日本大使馆前，于十月

被当局拆除。我们可以看到一块抗议标语写道："为什么在战争与法西斯主义时代和平雕像却被拆除？"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为什么西方国家如此惧怕反法西斯遗产？

这些事态发展必须在本次论坛先前发言者已经讨论过的背景下来理解，即军国主义的复活。正如在日本一样，我们今天也正在目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北约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德国政府对此毫不讳言。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非常明确地将 2029 年设定为德国必须做好战争准备的年份。他们正在重复 1914 年和 1933 年屡试不爽的老故事："欧洲被迫军事化。必须捍卫我们的主权以对抗俄罗斯。"

归根结底，我们正在目睹与之前两次世界大战中相同的动态：帝国主义国家正试图维护其剥削性的世界秩序。那些挡在路上的国家——无论是俄罗斯、中国、巴勒斯坦、伊朗还是委内瑞拉——都将被非人化，被贴上"极权主义"或"恐怖主义"的标签，然后遭到攻击。只需看看加沙还剩下什么，就能明白北约国家愿意走向何种极端。

三、东方战线的重要意义

在北约备战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谁是侵略者，谁代表着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为了捍卫真相，我们必须维护东方战线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意义。

中国是第一个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 14 年的坚决而血腥的战斗，最终在 1945 年取得了伟大胜利。对我们欧洲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在东方遏制和击败日本帝国主义方面的英勇努力，苏联的胜利和我们从法西斯主义中获得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深刻理解战争中不同战线的相互关联性。他们理解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统一性。

更重要的是，他们理解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之间的根本联系：通过将进步的、人民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他们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并在每一条战线上击败帝国主义者的至上主义意识形态。

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维护和捍卫的传统，使其免受历史修正主义的侵蚀。

3.6.2 被忘却的合作

- 发言人：吕彤邻
- 年份：2025

这个合作恰恰发生在冷战开始之际，然而意识形态冲突白热化却抹杀了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成功合作的历史。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合作恰恰是建立在冲突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

在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里，尘封着两部分相对完整的史料。从 1944 年 9 月底到 1945 年 4 月初，美军观察组成员撰写了 71 份“延安报告”，他们集中分析研究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同时，从 1945 年 9 月 29 日到 12 月 28 日三个月中，美国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日军战俘培训基地负责人威廉·迈克尔维恩撰写了 14 份有关该基地的报告。对照这两批珍贵史料，不难看出日本工农学校对美国战后日俘工作的影响。

美军观察组 1944 年 7 月 22 日进驻延安。近三年中，几百个成员撰写了上千份有关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调查报告。但是由于冷战开始，这些情报几乎没有真正影响二战的进程。唯有 71 份延安报告脱颖而出，成为相对合作成功的第一个范例。原因何在？

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美军急于解决燃眉之急。太平洋战争伊始，日本军人宁死不屈地抵抗，造成了美军极大伤亡。在二战末期，这种威胁越演越烈。1944 年 7 月 9 日塞班岛战役中，日军不仅以自杀性的冲锋给登陆美军造成极大伤亡，而且在该岛被占领之后，大批士兵和平民，包括不少带着孩子的母亲都跳海自杀了。为解决这个难题，在 1942 年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战略情报局就曾派过“日本通”到亚洲其他地方，比如印度的利多，去寻找解决方案。但在当地并没有找到实质有效的方案。美国情报人员也害怕过多地与英国这样的老牌殖民主义合作，会激起当地老百姓的不满，类似的努力都半途而废。

第二，中共对日战俘工作是太平洋战区唯一相对成功的范例。尽管中共的对日战俘工作是政治工作的核心，也是意识形态的核心，一向以实用主义为宗旨的美国政府也顾不得这些。1943 年 2 月 11 日，珍珠港事件一年后，美国战略情报局主任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就曾派人与国务院商量，是否能派精通中文的情报人员，如约翰·谢伟思，到华北敌后根据地了解中共情报，“以用于帮助战略情报局制定心理战计划”。但由于害怕得罪蒋介石政权，这个计划搁浅了。

中共对日战俘工作成功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中共内战敌工工作的传统。从 1927 年到 1937 年在国共两党第一时期内战中，国民党军队从军事力量到人数等方面都占绝对优势，红军靠游击战以求生存，敌工工作是重要武器之一。

第二是中共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但是日军不是国军，中共对国军的敌工工作生搬到中日战场上，不仅毫无效果，而且给八路军带来了极大损失。如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战士对被包围的日军用中文高喊缴枪不杀，结果出乎意料地遭到被包围日军的激烈反攻，造成整个部队全部牺牲。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中共政工部门首先从语

言入手，请懂日文的中国军人做宣传，和为数不多的日俘交朋友，就建立了反战同盟。

第三是关键的一点，中共敌工工作传统的全盘日本化。1940年3月，被日本政府追捕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化名林哲，后来化名冈野进，秘密逃亡到延安。他看到八路军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就决定留在延安，帮助中共建立了日本工农学校。该校基本上是一个独立机构。到后期，除中国后勤保障人员，野坂参三校长和另一个日本流亡者之外，所有教职员几乎都是日本战俘。用毛泽东对观察组成员说过的话，“中国人想要写出打动日本人的传单是荒唐可笑的事，日本俘虏干这种事能做得很好。”

日军的对手们以前普遍认为，日本士兵受军国主义洗脑，对天皇无比忠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之所以宁死不屈，是对当俘虏有发自内心的恐惧。一是日军对战俘极其残忍，他们害怕敌军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二是，一旦战俘归队，就会被视为叛徒，受军事法庭审讯，或枪毙，或监禁，永远无法见到自己家乡的亲人。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说服有着自己以前的想法的日本士兵不难。首先他们的存在就是八路军优待俘虏的铁证。加上日本文化排他性比较强，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使日本士兵易于相信与自己背景相同的学员的宣传，知道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战无不胜，而是正在走向消亡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知道为抗战而工作的战俘会载誉而归。这样的心理攻势下，不少日俘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了抗战的中坚分子，他们不是为抽象的主义反对自己的政府，而是推翻这个政府以争取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权利。

延安工农学校之所以能相对成功地移植到美国，两个政治立场相反的“日本通”成员的配合功不可没。约翰·埃摩森政治上保守，他周旋于美国政客之间，绕开了意识形态的雷区，说服了国务院在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建立了一个日军战俘培训基地。虽然编制课程都几乎照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只是把共产主义教育改成了美国宪法，埃摩森却巧妙地帮美国政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左翼日侨有吉兴治则为埃摩森的建议奠定了坚实基础。得益于日侨身份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感，有吉兴治与其他学员打成一片，对组织结构、课程、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写出了非常棒的报告，大概连中国人都没有了解得这么清楚，因为这是一个日本文化的独立王国。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拍的一个纪录片中，有一段是八路军攻打碉堡的记录。当时的武器很原始，如长矛、猎枪等，但是由于解放同盟的学员在战斗准备之前日以继夜的对日本士兵攻心，因此八路军能够用非常原始的武器，胜利攻克了碉堡。日军战俘起的类似的作用在敌后战场也是相对普遍的。

3.6.3 被遗忘的视野-南斯拉夫与中国的联系及全球南方团结

- 发言人：萨尼娅·霍尔瓦廷奇奇
- 年份：2025

承蒙前位发言者为我即将探讨的若干议题提供了重要背景，在此深表谢忱。我将从几段引文开始。

"中国已奋战六年。胜利日益临近。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必将获胜——因这是人民的意志，更因队伍中有赵一曼这样的女战士。她在被日军法西斯枪决前，用鲜血在牢房墙壁上写下：'战斗到底。'"

此引自 1942 年 7 月南斯拉夫游击队女性报纸《同志》刊载的报道。另有一段：

"雨林中，游击队员们步履蹒跚，疲惫不堪，却仍一步步向前。他们行军不息，心中铭记着中国同志们走过的万里征程。他们永不停歇，坚定地朝着营地前进。"

这些文字写于 1941 年 10 月，刊载于游击队报刊《战士》创刊号。该报以打字机制作，经简易油印机复制后，分发至克罗地亚中部小村舍尼察克（当时属南斯拉夫）的当地农民手中。作者兼主编弗拉多·约万诺维奇数月前刚从西班牙归来，在那里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志们共同参与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斗争，最终未能获胜。

据传，在法国战俘营归途途中，他曾与关注中国战况的中国战友共处。他在其中一份证词中写道，正是在那里他首次了解到"解放区"这一游击战战略概念。而这一战略，确实成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中解放国土的关键，也成为前南斯拉夫在长达四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推进革命的核心力量。

南斯拉夫由众多民族组成——南斯拉夫各民族——这些民族在经历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帝国数世纪的统治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南斯拉夫游击队自 1941 年 6 月至 7 月起，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号召下组建。战争主要在迪纳拉山脉的乡村地区进行，帝国制图师的地图未能捕捉到这些区域。游击队员们在此与自然结盟，并肩作战。

从游击小队发展成一支令人敬畏的军队，期间约十万女性加入队伍，其中近四分之一在战争中牺牲。游击队建立了医院、学校、印刷厂及各类艺术工坊，用于制作宣传材料。在解放区，民众在军队庇护下开展的这些活动，对由党领导、铁托统帅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关重要。他们以"兄弟情谊与团结"对抗国内外法西斯制造的民族分裂，将法西斯定义为所有民族的共同敌人，亦是阶级敌人。战争期间，女性便已平等参与各级决策，并自主组织解放平台。伤亡惨重——该国军事和平民损失位居欧洲第三。希望这些数据与维杰今晨介绍的研究结论相符。

但此后历史被反复改写——从战后初期将功劳主要归于作为南斯拉夫盟友的苏联红军，到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官方叙事转向强调南斯拉夫独立自救，直至最终转向近乎尴尬地突出西方盟友——这种叙事主要在 1990 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及社会主义垮台后盛行，近年又再度抬头。

我们正目睹粗鄙的历史修正主义行径，目睹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及塞尔维亚历史法西斯分子及其帮凶的正当化。需特别指出，此刻我的祖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真实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在街头蔓延的危机，其态势与德国的状况惊人相似，更披着欧盟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的伪装。

然而在所有官方历史版本中，最初的视野已被遗忘。我认为二战时期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阔 II 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是的，西班牙被铭记，因为西班牙同样属于欧洲战争记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美国亦然。我在克罗地亚朱姆贝拉克游击队据点农村地区开展的深度研究揭示：对普通民众、对农民而言，这些更广阔的视野何其重要——它们塑造了人们对反法西斯斗争者规模与力量的想象。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他们与数十万中国农民的认同感。这种国际主义和团结意识不仅体现在官方材料中，更融入游击队民歌和戏剧表演。这种记忆至今仍鲜活地存在于我主持历史对话的当地社区——其认知深度与批判性远超我参与的许多学术活动，这点尤为重要。

然而南斯拉夫官方记忆政治几乎彻底抹去了中国人的存在。幻灯片上这句广为人知的毛泽东名言——相信诸位都耳熟能详——竟被归为某位南斯拉夫指挥官的原创。其根源在于二战后南斯拉夫与中国断交长达 25 年之久。但战后初期 1947 年，中国特使刘宁义在正式访问时曾明确表态：

"在中国解放区，我们拥有 120 万精锐部队。除正规军外，还有 400 万游击队员组成强大游击力量。正如南斯拉夫游击队和南斯拉夫军队在铁托同志领导下战胜反动势力与法西斯战争贩子那样——同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游击队也必将取得胜利，最终粉碎反动势力。"由此可见，这些共同点和精神感召力在双方都发挥了作用。

正如克罗地亚一位学者最近指出的，在两国友好交往时期，南斯拉夫与中国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的纽带，在外交圈中几乎被神话化。

冷战背景下，南斯拉夫与中国长期奉行对立外交政策，但双方始终致力于联结并支持全球南方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南斯拉夫抵抗法西斯的斗争——人民解放斗争——被作为非洲和亚洲受压迫人民的共同经验加以宣传。描绘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艺术巡回展览，甚至南斯拉夫诗歌的越南语及其他语言译本都得到了推广。部分艺术家甚至亲赴中国交流，这些都是我希望深入探讨的课题。而最成功的当属《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涅雷特瓦河战役》等影片，它们在 1970 年代的中国引发巨大反响。相信在座诸位对此有更多见解。

总而言之，当今局势与我们所见的这些联盟和视野截然不同。在此我想特别强调加沙地带，以及那里前所未有的暴力、疏离感和抵抗运动的合法性遭质疑的现状。然而，拓展视野和建立团结的迫切性依然存在。我们需要团结那些反对分裂和战争力量的人们。我们还必须从底层视角审视历史。历史遗产理应由过去的继承者守护，而非那些从中牟利并粉饰历史的人。

需要更多研究来发掘那些激励人们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被遗忘的盟友与视野。本次演讲认为，恢复被遗忘的跨国联系对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至关重要，它能帮助我们理解革命知识如何通过意想不到的途径和媒介传播，基于历史抵抗模式建立当代团结，并认识到国际主义是真实可行的实践而非抽象概念。

标题中的“被遗忘的视野”既指南斯拉夫与中国革命者间断裂的纽带，亦指向普通民众曾拥有的更广阔国际意识——这种意识已被主流历史叙事所掩盖。

最后还想提及的是，尽管当今官方政策与历史叙事试图简化、粉饰世界及其共同斗争的历史图景，但超越外交档案的多元史料研究蕴藏着巨大潜力。尤其重要的是：我主张必须深入乡村，倾听民众心声，向亲历抗战前线者或祖辈曾参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后代学习。在我与多国研究伙伴在克罗地亚共同推进的项目中，正是致力于践行这一理念——从底层视角审视历史与遗产，借助战争与抵抗运动中记忆与物质载体所承载的微观史，来解读那些持续塑造当今高度政治化现实的宏观历史进程。

3.6.4 被唤醒的记忆：俄罗斯媒体在揭露 731 部队真相及彰显二战期间苏中两国合作方面的作用

- 发言人：索菲娅·梅尔尼丘克
- 年份：202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人们希望能讨回公道，从过去的伤痛中吸取教训，但到了现在我们却面临一个新的危险。以往的历史，特别是当谈到东方战场，谈到苏联和中国当年一起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历史的记忆越来越容易被当成政治工具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新闻工作人员就有一个特别的责任。我们不光要转述历史学家的发现，历史故事讲给大家听，我们自己也像研究员一样，亲自去寻找这些历史记忆，努力把它保存下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年我们怀着特别的热情开始了这项工作，我们非常关注共同历史中黑暗的一页，那就是日本 731 部队犯下的罪行。1945 年，在解放中国东北的战役中，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打击。中国东北正是日本军队设立那些可怕实验室的地方。通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提供的材料，我们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看到了那些被封存几十年、标着“绝密”的档案。这些文件有审讯记录、案件卷宗、照片，还有信件。它们不仅让我们看清了日本战争罪行的规模，也让我们看到了苏联在揭露这些罪行时所做的努力。

我们想做的，不只是把这段历史讲给大家听，我们更想告诉大家真相就藏在具体的文件、具体的地方和具体的人的生命故事里。为此，我们专门去了伊巴诺夫州的切尔恩齐村。那里曾经有一个苏联内务部管辖下看守非常严格的营地——第四十八号劳改营。这栋红砖房子里当时关押着许多战犯，里面有德国将军、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军官，也有日本人，其中就包括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山田乙三。如今这个营地只剩下一些残破的墙壁和地基，但靠着留下的痕迹、当年的布局，还有档案里的记录，我们能在脑海中重建出它当年的样子，并且想起那些曾经被关在这里的人，他们后来的命运。

在我们能够查阅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档案里，保存着已经解密的对山田乙三的审讯记录。这些纸张并不是枯燥的报告，它们背后是一幕幕活生生的人间悲剧。

一开始这位将军否认所有指控。他说自己完全不知道什么 731 部队，不知道石井四郎医生，也不知道那些活体实验。他坚持说自己只负责战略防御方面的事务。但在后来的审讯中，特别是在 1949 年，他的态度改变了。他承认 731 部队确实归他的指挥，而且正是在他得知苏联红军逼近时，他亲自下令销毁了所有的实验室和文件。他还讲到自己曾亲自视察过 731 部队在哈尔滨附近的基地。他甚至提到了一个非常骇人的细节：石井四郎在一次晚宴上竟向他炫耀如何从人尿里提取出食盐？

听起来这个故事我们感到很荒谬，但正是这种细节，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在道德上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1949 年，哈巴罗夫斯克进行了一次非常特别的审判。它是全世界第一个揭露了日军使用生物武器的国际法庭。苏联方面在法庭上提供了确凿证据，证明了 731 部队犯下的罪行。包括司令官山田乙三在内的所有被告都被判有罪。但是他们都没有被判处死刑，这是因为苏联在 1947 年就已经废除了死刑，所以当时最终的刑罚就是 25 年监禁。作出判决，不是因为苏联同情他

们，而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考虑，也要让这些战犯活下来，成为指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活证人。

731 部队做过很多非常残忍的人体实验。在他们眼里，这些被用来做实验的人根本不被当作人，而是被叫做“马路大（丸太）”，在日语里就是“圆木”的意思。

我们从找到的档案文件里清楚地看到，日本军队当时的计划是要对苏联红军和中国老百姓使用这种生物武器。部队的负责人山田乙三在后来接受审讯的时候也亲口承认，如果不是苏联红军迅速进攻并阻止了他们，这种武器很可能就已经被用在了战场上。他的这句话恰恰说明了苏联红军在 1945 年的行动有多么重要：他们不仅解放了东北，更是阻止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保护了无数无辜的生命。我们作为俄罗斯记者，不仅仅只是查阅档案、然后写报道，而是我们亲自去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实地拍摄纪录片，走访当年的营地旧址和保管档案的工作人员、历史学家，还有那些了解内情的人，面对面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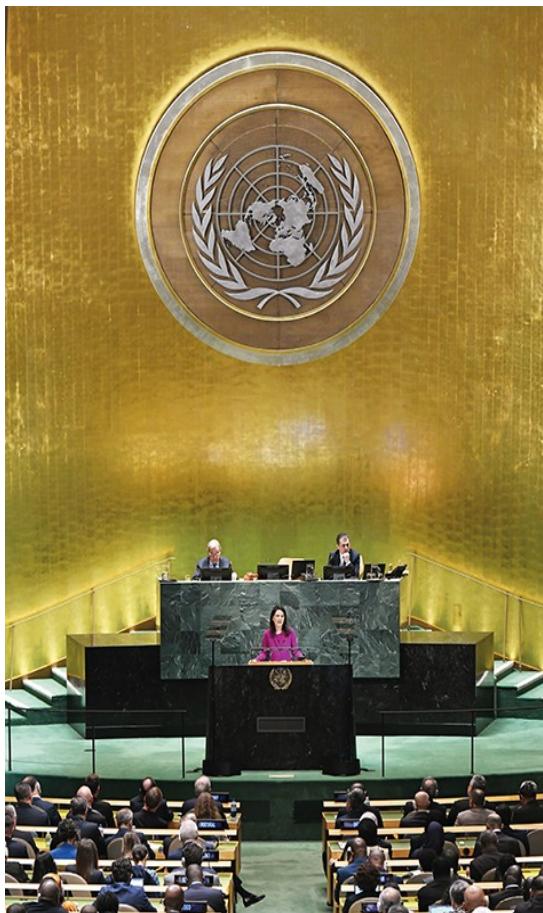
我们想告诉观众，这些历史并不是遥远而抽象的故事，它们是活生生的记忆，是连接我们俄罗斯和中国的一条重要纽带。

当我们站在切尔恩齐村劳改营的废墟上，站在山田乙三曾经被关押过的地方时，我们仿佛能听到历史正在通过这些残破的砖瓦、泛黄的档案和被世人遗忘的名字，向我们低声诉说。而我们作为记者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听见这些声音，并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世界。因为遗忘就意味着第二次死亡。谢谢大家。

3.6.5 俄罗斯媒体和研究者守护 1945 年苏中共同胜利记忆的贡献

- 发言人：阿丽娜·萨利奥诺娃
- 年份：2025

我是 RT 《今日俄罗斯》驻华记者阿丽娜。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俄罗斯媒体与研究者在守护 1945 年苏中共同胜利记忆中的贡献。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率先举起反法西斯斗争的旗帜，在世界东方独自开辟并坚守了二战的重要战场。中国人民经历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所取得的最终胜利，不仅深刻影响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也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独立与正义斗争的重要政治起点。



今年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也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今年我们两国均举行了重要纪念活动，以缅怀历史、致敬先烈。2025 年，我们 RT 媒体团队决定沿着 1945 年苏日战争的足迹展开考察。虽然这场战争持续时间较短，却是亚洲战场结局的关键一页，不了解它，就无法真正理解二

战 在 亚 洲 的 全 面 终 结 。



在采访当年参加作战的苏军老兵时，他们多次提到一个中国民众曾用来称呼苏联士兵的词语：“善果”。我们与中国同行共同追溯这一词汇的来源，发现它来自俄语“Хорошенько”（表示“很好”）。中国民众听成“哈喇神国”，再被苏军听回去便成了“善果”。这一语言误听与传播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两国文化交融与友谊的独特象征。



近年，俄罗斯记者和地方研究者记录了数十处与 1945 年战争相关、曾被遗忘的遗迹。他们深入偏远地区，发掘包括排雷工程、战时设施等影像资料。在阿穆尔州和远东地区，仍能看到士兵当年带回的实物，如日军刀、头盔、书信等。这些物品被珍藏，并非作为战利品，而是作为战争记忆的见证。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第 88 独立步兵旅纪念馆



滨海边疆区的防御工事

我们还采访了曾在中国战场作战的苏联飞行员的后代。例如照片中的娜杰日达·科普杰娃女士，她在中国驻俄大使馆的一次活动中表示，最想去的不是中国著名城市，而是其曾祖父在中国作战过的地方。这一朴素的心愿令人动容，体现出战争记忆在家庭层面延续的力量。



通过这些访问，我们深切感受到，苏中两国在战火中形成的兄弟情谊从未消逝，它在官方记载之外，以家庭记忆的方式鲜活地延续下来。

我们还研究了中国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贡献，查阅了曾在苏军队伍中作战的中国战士名单，探访其后人并进行采访。通过俄中学者合作，一批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的中国少年的人生经历得以重新呈现。他们在苏联度过战争年代，为红军缝制布袋，从轰炸中幸存。他们的声音至今仍保存在档案中，向我们诉说那段岁月。

在今天的俄罗斯，关于中国人民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贡献仍被不断提及。2024年，伊尔库茨克上演了以苏联飞行员与中国将军唐铎为原型的话剧。唐铎是唯一获准参加莫斯科红场空中阅兵的中国飞行员，并在苏联空军服役长达29年。



我们还拜访了多位研究苏日战争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他们与中国同行紧密合作，整理档案、发表成果，使这一研究领域重新焕发活力。但并非所有发现都令人欣慰。例如阿穆尔河区舰队曾参与对日作战的舰船如今无一留存，最后一艘因城市改造而



被拆解。

搜狐号@历史杂史

在维亚茨科耶村，一座纪念第八十八国际旅的纪念碑新近建成。在这里，中国战士、俄罗斯人、赫哲族与朝鲜籍战友曾并肩作战。在莫斯科州国防部档案馆，我们查阅到旅军官的个人档案；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区博物馆，我们见到了第八十八旅当年使用的真实军旗。

我们还到访了英雄菲尔索夫的故居，他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在中国，当地为他树立了专门的纪念碑。此外，还有一位跨越国界、值得被铭记的女性——胡锦邦。她是唯一全程记录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女记者。她从前线带回的报道极大鼓舞了中苏人民的抗战士气，是两国人民之间的记忆桥梁。作为一名记者，我一直把她视为职业楷模。



所有这些历史与记忆串联起来，指向一个重要问题：记忆本身也是一种主权。守护记忆，就是守护先辈以生命换来的和平。俄罗斯记者和研究者的工作，有助于恢复1945年苏中共同胜利的历史完整性与道义真相。那场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在当下历史被反复利用与扭曲的时代，守护共同的真实，不仅是纪念，更是一种抵抗——抵抗遗忘，抵抗篡改，抵抗对民族间信任的侵蚀。

结语

人民战争、永久和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实践论

· 发言人：吕新雨

· 年份：2025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人民战争永久和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实践论。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推动 21 世纪信息传播新秩序，我希望从这个视角来讲一下我的体会。我希望分享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我母亲名字的故事。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之后 14 天，也就是 7 月 21 日，我的母亲出生在安徽宣城，一个江南经济小镇。1937 年 11 月 22 日-27 日，日本飞机连续轰炸扫射城区，并投放燃烧弹，大部分民房和商铺被毁，尸横遍地。我的小姨告诉我，日军轰炸的时候，大人都躲到了床底下，她刚把襁褓中的母亲抢出摇篮，摇篮边被炸碎的窗玻璃就倾泻而下。当天中午轰炸暂歇，全家扶老携幼、带着简单的盘缠踏上了逃难的道路，步行 200 公里到皖南旌德县朱旺村：一个黄山脚下深山密林里的千年朱氏宗族的古村落，外公的老家——现在已经是国家级 4A 级景区了，欢迎大家去我的外婆家旅游。外婆在逃难的过程中，奶水枯竭，所以母亲从小营养不良，身体不好，但是万幸活了下来，而无数当时像我母亲一样的孩子死在了日本的轰炸和屠杀之下。所以我母亲的名字叫朱永平：永久和平的期盼，是当时中无数中国老百姓的共同心声，也是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人民的心声。



历史照片：日军入侵安徽宣城



朱旺村如今的样子

朱旺村外婆家有个邻居，是个孤寡老人，大家都很尊重她，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去抗战了，一直没有回来。外婆家族的故事是中国无数家族史的折射，全民族抗战是中国每一个家庭的命运底色，这是一个国家的民族记忆。外婆家所在的皖南地区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日的重要场所，也是 1941 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地——在国民党的反共路线和军事围剿下，中国共产党抗日部队损失牺牲七千余人。

也就是在外婆一家和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踏上逃难之途的前后，毛泽东发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指出抗战不能只是军队和政府的抗战，必须是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中得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中国要有全民族抗战的动员，必须通过国家和军队的民主政治改革，使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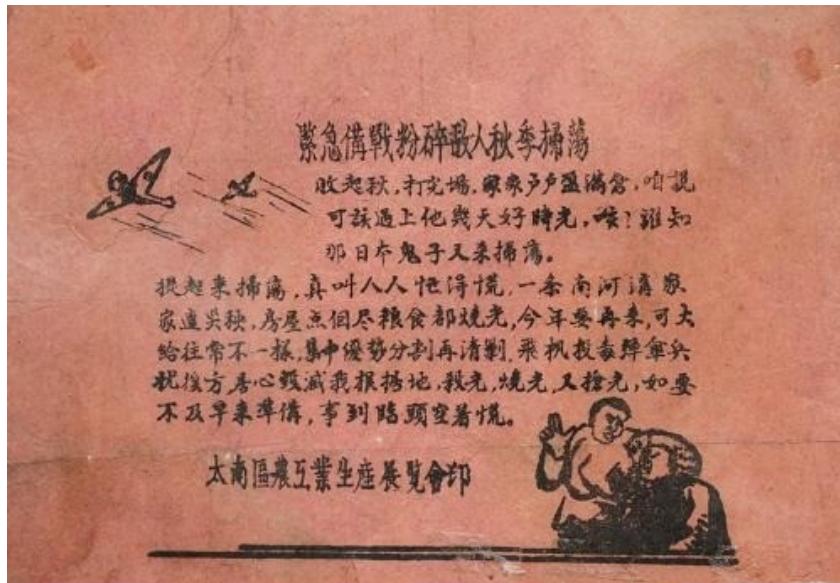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号召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战。他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占着 5 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他说，战争有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

法西斯主义者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



结束”。

毛泽东说，如此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可能胜利的。我们要做的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成的步骤和政策，也就是政治纲领。没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战到底的。那么，怎么去动员呢？“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不是把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观，兵民乃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而作为政治工作的宣传是前提。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的灌注，就不可能完成军队官兵一致的民主化改造，也不可能完成对无组织民众的团结。只有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军队在民众眼里是自己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它首先是政治思想宣传的结果。



图为抗日战争时期，由晋冀鲁豫边区太南区农工业生产展览会编印的“紧急备战粉碎敌人秋季扫荡”传单，以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形式，动员群众紧急备战。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位日本战犯的，是上海电视台驻日本的记者宋看采访日本老兵的故事。其中有个老人名字叫做石渡毅，他1913年出生，193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哲学，研究康德。1942年加入华北派遣军进入中国战场。他经历的新兵教育，就是扇耳光和各种体罚，目的是摧毁人的自尊心，挨不住的人要么逃跑，要么自杀，厕所成为唯一可以喘口气的地方，有新兵就选择在厕所自杀。这是一个把人变成鬼的过程。三年后，当他开始训练新兵的时候，他已经坚信体罚就是最好的教育，对新兵更残酷。在一次训练新兵实战时，抓中国老百姓做活靶子，一个

16岁的孩子哭着说母亲在家等他，求放他回家，但他没有心软，而是用严厉的暴



斥逼迫下不了手的新兵们完成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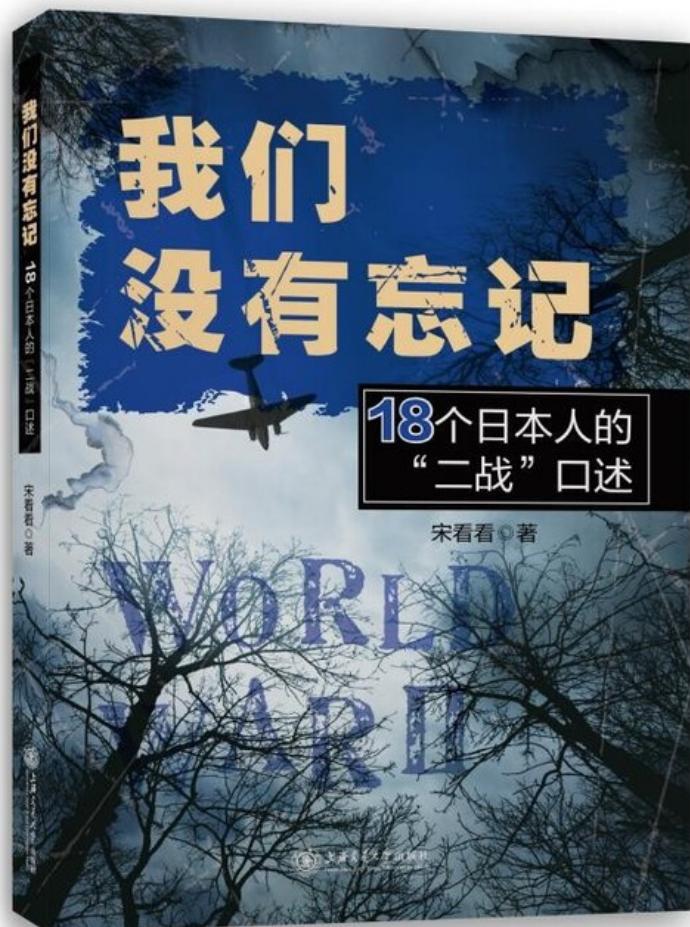
日本投降后他被苏军押送到西伯利亚修铁路5年，1950年被转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六年，他说这六年是他最幸福的日子。正是在这里，也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之后，他开始放弃侥幸心理，认真思考自己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他大量阅读并开始接触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毛泽东正确预见了中国革命的进程，震撼了他对日本侵华战争本质的认知，第一次让他有了赎罪、认罪的想法。当他读到《论持久战》里说为了获得最后的胜利，在贯彻军官和士兵之间、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民主主义的同时，对待日本俘虏要通过政治上的争取，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至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同时展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战俘们能够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



1956年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方不仅归还了他们的个人物品，还送上必要的生活用品和人民币，让他们买礼物送家人。他回国后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在日本进行和平反战运动，守护和平宪法。2002年，由于成员们年事已高而归联解散，但是后续的“抚顺奇迹见证会”秉承了反战的宗旨。他说：我杀害的人不能复生，赎罪也没有结束的终点，以受害者的愿望为自己的愿望，杜绝非正义的战争，追求永久和平的世界是我余生的全部。2015年101岁去世前，他还在电脑前忙碌于反战运动。这位研究和热爱康德哲学的战犯，最终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中找到了实现永久和平的希望。



石渡毅参与“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第三个故事是贵州省榕江县的村超故事。榕江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革命老区和山区，2020年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榕江县，38.5万人口中16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83.9%，即便脱贫也是一穷二白，几乎无人知晓。但是，自2023年“村超”火爆出圈，迅速形成气势磅礴的全网传播现象。当年就创造出700亿的流量，游客765.8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3.98亿元，获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点赞。今天的村超已经是一个千亿级流量的史诗级传播现象，形成了人人都是传播者、各个都是宣传员、村村都有代言人的全民传播的盛况。他们说：村超就是大传播，传播就是生产力，传播是村超的发动机。



2024年的“全球南方与世界现代化”为主题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邀请了榕江的干部群众讲村超故事。陈学敏副县长做了：“足球+眼球+地球——从乡村体育的乐子中找到乡村振兴的品牌之路”的演讲，他说村超是全民发动、全民闯新路，推动榕江高质量发展，而发动群众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群众“发”而不动，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在乡村振兴中普遍存在，也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榕江是如何做的呢？



图为榕江县副县长陈学敏在全球南方学术论论坛（2024）上分享村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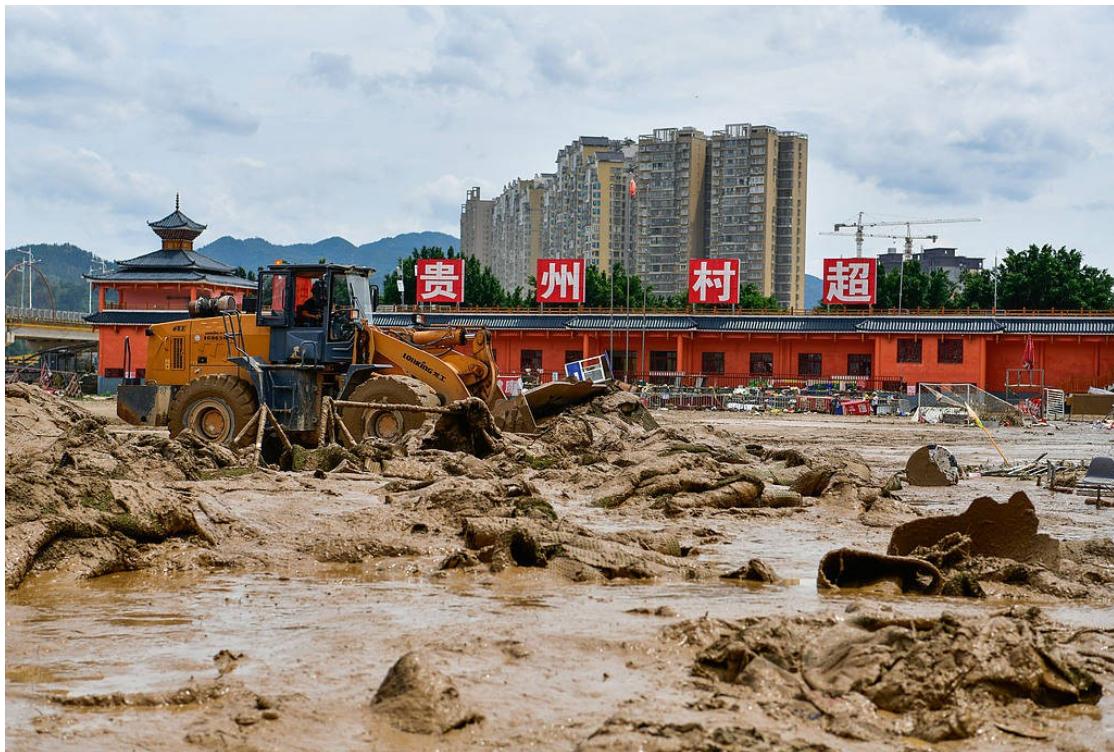
这就要回到1938年抗战关键一年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路线。

任何组织都需要以义利观为驱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政治原则是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它体现为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包括三个层面：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是组织群众的思想与方法，没有组织的过程，群众就是乌合之众。大众传播是面向原子化的“乌合之众”的传播，以市场为生存模式，西方的新闻理论是基于这样的政治体制机制。与此相区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是组织群众实现自我解放的实践活动，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解决问题，是以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进行的组织改革与发展的动态过程。因此，它必然体现为作为行为-运动的传播，是完全不同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体制机制。

依靠群众，是组织原则也是党的生命线；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是方法论。村超的方法论就是：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带动——核心是带动全民参与、全民受益。而归根结底，首先要有发动机的带动，去创造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活动，群众才能应势而动，发动机的动能和势能决定着群众路线的广度和深度。它呼应了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历史唯物主义阐述的经典名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推动的，也是由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所决定的。

在2025年6月24日和28日，榕江连续遭遇特大洪水，席卷了包括村超足球场在内的整个老城区和部分新城区，三分之二的主城区被淹，是严峻的生死大考。干部和群众们一起日夜艰苦奋战，这些场景被榕江老百姓抓拍放到了社交媒体上。众多自媒体和各级主流媒体以多声部的方式直播了一个洪水中重生的新榕江，也创造出新的巨大流量。正因为已经有村超的深度社会耕耘，一个充分动员的社会机制就成为战胜灾难的最有力武器——一个月村超重启。





在欢送全国各地救援队伍返程时，各少数民族群众连夜按自己的最高民族习俗煮红蛋、做丝线、绣鞋垫，把彩色的鞋垫和系着红蛋的璎珞挂满了援助者的胸前。送别现场，国旗招展，欢笑与泪水齐飞，西瓜和各种美食不断投喂给子弟兵。县委全体班子成员与百姓们站在一起泪洒长街的情景也被社交媒体直播和热烈转发。这些场

景冲击着短视频平台的热搜，形成不断裂变的传播效应。在送别双方的人群中，共同点是森林般举起的手机，纪录与传播已经成为榕江的生存方式。



这样的场景让我思忖，如果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它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如果放在新中国诞生的历史看，这样的军民鱼水情正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因。



不同于西方以选举政治为核心的政治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基石，我把它命名为“政党组织传播”，它要完成的使命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什么叫做党和人民的喉舌，村超的“大传播”不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吗？它体现的是毛泽东的党报思想，即报纸要靠大家来办，是全党来办，也是全体群众来办的历史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传播是村超的发动机，是全体人民办媒体的创举。村超的群众路线正是它最大的成功，一个今天处于系统性变革的中国主流媒体需要重新找回来的定位。

在推动 21 世纪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过程中，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如何重新建设作为历史实践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这是我们共同的任务

毛泽东曾经说：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一直将作为行动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的精髓，即作为行动的实践是传播之源。在这个意义上，传播从来就是一个动词，传播是干出来的，是历史能动性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是作为实践的传播，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观，也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把“宣传”从冷战胜利者的污名中解放出来。什么是宣传？1927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所谓宣传，其实就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新冷战，依然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

今天，中国进入“新长征”，面对的是百年变局下新的围追堵截，中国要与全球南方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在全球南方走群众路线、建统一战线，才能突破各种艰难险阻，共同完成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任务——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任务。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到底就是一个跨越万水千山、共融共通的大传播实践。

历史在我们这一边，历史在人民这一边。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